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HUAXIA MAGAZINE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 广东省优秀期刊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華夏

双月刊
ISSN 1003-7373
02
2020 年
2 月
总 216 期
定价：¥30 HK$40 NT$128 $20

独家策划

时代湾区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价值链，藉由历史、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元素，具有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迥异的文化内核，而以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孙中山文化等诸文化开展海内外全方位交流与合作的“人文湾区”建设，是锻造其人文价值链的核心和灵魂。

——丘树宏



084 时代风流
国士无双：钟南山在春天里的七个瞬间

106 侨海时政
海外粤籍华人社团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38 人文中国
梁启超的“新民”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逻辑

224 中国与世界
民国年间潮汕侨批中“家费”的表述方式

海之交响

文 刘迪生 《华夏》总编辑

无论你在何方

每一滴水

都会像大海一样

波澜壮阔　生命无限

华侨华人的心跳是海之交响

他们，正是他们

人类史上最为独特的侨民文化的创造者

世界文明大融合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身怀非凡故事的华夏子民

太平洋两岸

放飞着他们希望的风筝

无论你在何方

慈母手中的线都牵挂着你

为你期待　为你骄傲





《勃发》
林蓝（广东画院院长）/作

我们，永远在一起！

文 《华夏》编辑部

庚子伊始，新型冠状病毒兀然来袭，一场疫情防控的人民战“疫”在中国打响。值得欣慰的是，广东省侨联遍布五大洲的顾问、委员和全体侨胞们，心系祖（籍）国亲人的安危，从抗疫初始到关键时刻，踊跃发动、积极组织广大侨胞支援抗疫，陆续不断向湖北省以及广东家乡捐款捐赠防护用品。美国潮商总会、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合会、西澳广东同乡会、泰国深圳总商会、苏里南华侨华人社团……刘志强、梁冠军、谭子超、刘泽伟、孙怀庆、张福歌……灿若星汉，使灾难深重的东方夜空，因你们的璀璨光焰，平添了无限的亮色。你们满怀赤诚，全力以赴，慷慨解囊，真情毕见。正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识知己，华夏骨肉情，堪比日月辉。你们这种首丘思渊的拳拳之情，将成为人类文明史上光辉的一笔，定会随着人们的感念而千古流芳。

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指挥下，疫情防控工作已初步呈现持续向好局面，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这些成果的取得，离不开各位海外顾问委员和侨胞的真切关心和鼎力支援。顾问委员们是侨社标杆，是广东省侨联的骄傲和自豪！为你们点赞！

目前，疫情呈全球蔓延态势，一些国家还相当严重。抗疫已成为全球人民共同的责任，需要全人类团结一致，风雨同舟，共克时艰。广东省侨联十分关注疫情在海外的猖狂肆虐，万分关切侨胞们的平安和健康。请顾问委员们严守抗疫的科学指引，谨慎防护，在保护好自己的安全的前提下，继续履职担当，呼吁和引领侨胞们做好自我防护，积极投身所在国的抗疫工作，和当地人民一起，打赢这一场为保卫人民身心健康的“世界之战”。

海内外中华儿女情牵万里，广东省侨联和海外顾问委员们十指连心。春暖花开已当时，万水千山粤情重。在这个众志成城的时刻，我们一起挨过了冬雪，眼前木棉花开，春樱烂漫，让我们一起期待春华秋实的美丽时刻：虎门大开，红豆情浓，花城似锦，珠水流长……我们，永远在一起！

華夏

HUAXIA MAGAZINE

2020年2月　双月刊　总第216期



独家策划：时代湾区

038　广东省侨联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林辅毫

042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价值链/丘树宏

046　区域文学的共时呈现/蒋述卓　龙扬志

051　“一国两制”方针下协同港澳推进大湾区建设/邵瑾

054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战略思考/刘飞　陈娟　赖朝安

062　文化认同与宗教自觉/温金玉

069　我在澳门的街头走一走/东方莎莎

072　丝路佛教外交/学愚

079　以检验检疫一体化助推广州国际航空枢纽建设/程海　赖俊锋

侨歌晓唱

001　我们，永远在一起！/《华夏》编辑部

华夏头条

004　国家使命——横琴助力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
纪实/曾平标

环球视野

030　传统技艺与时尚演绎/郭丹

时代风流

084　国士无双：钟南山在春天里的七个瞬间/李楠楠

093　清华重要奠基人：梁诚/钟庆才

098　怀念外公杨力宇/文钦梅

侨海时政

103　从非洲空运而来的“大爱”/赵阳欢

106　海外粤籍华人社团的特点与发展趋势/张应龙

116　广东侨联纪事/林辅毫

《华夏》编委会

编委会名誉主任：黎　静

编委会主任：曹堪宏　邵　瑾

编委会副主任：杨春华

总　　编　　辑：刘迪生

副　总　编　辑：钟敏仪

特　约　编　审：墨　如

总编辑助理：赵阳欢

广东采编中心主任：祝顺祥

北京采编中心主任：白　羲

香港采编中心主任：董榕辉

台湾采编中心主任：林　峥

美国采编中心主任：邝小平

新西兰采编中心主任：萧　萧

加拿大采编中心主任：赵　文

调查新闻中心主任：莫华杰

品牌推广中心主任：林建兰

目录 CONTENTS

人文中国

118 汉字根族大系（总序）/顾作义
120 赣南红土地的文学守望者/杨璐临
123 演唱新时代主旋律歌曲的实践与探索/陈彦
126 时间是生命的感觉/王晓娜
129 干老的干和老——读《王干文集》有感/刘根勤
138 梁启超的“新民”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逻辑/郑焕钊
143 “宗教中国化”的三个命题/张志刚
148 我的合水情缘/顾涧清
150 春风吹来稻谷香/罗学华　冯创志
152 2020福建宁德行/钟小敏
160 一场失控的网络战/何尚
164 茶无国界：如是为外国友人泡茶/徐永胜
165 精神与灵性的圆满/黄月
171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冯秋子

健康中国

180 图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圈圈

粤港澳台

190 游学台湾/房南希
193 一个人的九十年代广州志/浪子
201 香港散文：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钟晓毅

中国与世界

210 天使岛见闻/李柏达
214 开放与文学/顾偕
219 阳光下的风筝/杜镕洳
224 民国年间潮汕侨批中“家费”的表述方式/张钊
227 泰北华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落实的影响/曾伟富
234 恻隐与援助：略论华侨与抗日战争/苏昕宇
238 爪哇岛华校忆旧/赵阳欢
242 我的法裔婆婆与她的中国邻居/牧童歌
247 大马客/祝顺祥
250 新马游散记/孙向学
252 法国音乐剧《摇滚红与黑》：是融合碰撞还是元素杂糅？/温咚荻
254 芬兰教育之“本”/王惠

名家专栏

256 推进西南联大文旅融合/白庚胜
258 无尽的光阴——谈温青诗集《光阴》/李一鸣
261 智慧的痛苦　温暖的祝福——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蒋述卓
262 阿丽玛和达古拉/张宇航
263 王佩瑜——红装素裹，分外妖娆/张欣
264 歌乐山下渣滓洞/王瑛
265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真义/王焱
267 纪信之替/商震

视觉设计：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术编辑：张柳燕
文字编辑：钟小敏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国内统一刊号：CN44-1771/D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3-7373
广告经营许可证：440000100021
发行范围：国内外公开发行
承印单位：广州市金骏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定价：¥30　HK$40　NT$128　$20

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
华夏杂志社编辑出版

国家使命

——横琴助力澳门产业多元化发展纪实

文 曾平标

横琴与澳门一水之隔，最近距离只有187米。

这是内地最贴近澳门的地方，也是中国最为特殊的一个岛屿，它地处“一国两制”交汇点和内外辐射的接合部，与澳门中心城区的地理关联甚至于比与珠海中心城区的地理关联还来得紧密。

这是一块厚重的土地。

南宋时，小皇帝宋端宗赵昰及陆秀夫、张世杰等文武重臣、军士民众数十万人在元兵追击下，逃至横琴岛十字门。宋元开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海战，这场战争，使300多年的大宋王朝画上了句号。

十字门上的澳门和横琴，都写满沉甸甸的故事。

如今，经济适度多元化是澳门城市的追求，同样，横琴也在谋求一个新的历史定位，“一国两制”的皇皇巨著，国家战略的宏伟篇章，能否在横琴岛上翻开新的一页？

1. 琴鸣天下

2009年6月24日，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这天，珠海裹挟着夏季高温，自然界一片祥和。然而，一则来自北京的消息却在南国珠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岛掀起了波澜。

这个小岛名叫“横琴”。

消息最先由CNR中国之声频道播出——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会议指出，珠海市横琴岛地处珠江口西岸，毗邻港澳，与澳门隔河相望。推进横琴开发，有利于推动粤港澳紧密合作、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和维护港澳地区长期繁荣稳定。会议决定，将横琴岛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对口岸设置和通关制度实行分线管理。要通过重点发展商务服务、休闲旅游、科教研发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鼓励金融创新，实行更加开放的产业和信息化政策等，逐步把横琴建设成为“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区、促进珠江口西岸地区产业升级的新平台。会议要求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广东省加强指导和协调，明确分工，完善机制，落实责任，共同做好规划组织实施工作。

沉睡经年的横琴犹如一缕穿透时空的晨曦。8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通过《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册凝聚中国改革开放、科学发展思想成果和新区开发智慧的“白皮书”横空出世！

横空出世，琴鸣天下。横琴这张白纸画了擦，擦了画，终于从国家战略高度一锤定音。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花环悄悄戴在了横琴的头顶上……

黄锐温文尔雅，豪爽热诚，他谈锋极健，语调一如他东北人的性格，清脆而爽朗。时任珠海

市发改局局长的他，参与了《横琴总体发展规划》初期的酝酿、方案拟定和规划编制的组织协调。

“规划从起草到定稿用时多长?”

“4 年多吧！中间数易其稿。”现任职珠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他转身到资料室搬出封皮有些发黄的《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上报稿，说：“这是第五稿了，几乎每一稿我都保存着，工作变动到哪，我都搬到哪。”

我有些惊讶，各种附件图表正本加起来共三大本放在一个精致的书盒子里，拿起来有些沉重。

“打坏了三台打印机。”他一边说一边小心翼翼地将文本装回书盒递给我：“你看，这些都是上报国家批复《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的正本和附件，国务院基本都是按照我们上报的内容来批，有改动，但不大。”

他给我讲了两个台前幕后的故事——

那是 2009 年 3 月，北京城乍暖还寒。

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南楼里，珠海市委书记甘霖，市政协副主席、横琴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刘佳和黄锐来到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的办公室。时值两会期间，甘霖和黄锐此行是来向杜鹰汇报关于横琴开发开放定位的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横琴的定位问题一直就存在着争议，我们想向您请教……”甘霖书记恳切地说。

杜鹰说：“横琴的定位要准，不要无谓地争论。”他扭过身来，面对着黄锐，“上次你参加了井冈山讨论《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的会议，会上确定了珠海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横琴可以考虑成为粤港澳合作平台或者示范区之类嘛!”

黄锐对井冈山之行记忆犹新。

那次会议是《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 ～ 2020 年）》的讨论定稿会，黄锐连夜驱车 7 个小时赶赴井冈山，就是要当面向副主任杜鹰陈情，他恳切地说：“杜主任，我这次是带着珠海全市人民的期



作者简介

曾平标，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代表作有报告文学《中国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小说集《祭梦》、散文集《生死树》等。作品先后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特别奖，中央电视台“中国好书”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军剑杯”全国报告文学征文一等奖，全国报纸副刊散文征文金奖等国家级、省级荣誉。

盼，希望国家在珠海的城市定位上，能定位为中心城市。”

“都叫中心城市怎么行啊！太多了，都争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够多了。”当时杜鹰分管地区司，他略一沉吟，补充说，“可以叫‘核心城市’嘛！”

想到这里，黄锐仍然对杜鹰给予的指示心存感激。

回到珠海，按照杜鹰的要求，黄锐又多次组织课题组和专家对横琴的定位问题进行修正。

“我们的思维一直在‘平台’和‘某某区’的框架里打转，但就是展不开，视野和格局都比较小。”黄锐回忆道。

约莫一个月后，还是在北京，甘霖、刘佳、黄锐又一次到国家发改委拜访杜鹰，杜鹰再次提及横琴的定位问题，他说，如果没有澳门，就没有珠海经济特区，就没有珠海先行先试“摸着石头过河”，珠海在《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被定位为珠江口西岸的核心城市，就是充分考虑到横琴与澳门这两个角色的特殊性，所以，横琴的定位一定要高端，格局要大，要体现“一国两制”，体现合作、创新、服务……

杜鹰语重心长的一番话让一行人如醍醐灌顶。

后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一国两制’下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式的示范区、深化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的先行区、促进珠江口西岸地区产业升级新平台”的定位在审议时一致获得通过。

还有一个故事是“特区中的特区”。

4月，在《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上报国家发改委前夕的最后一次定稿会。刘佳和黄锐再次找到杜鹰，因为中央两次调整经济特区范围，横琴都没有被纳入，横琴开发，不是特区怎么行呢？

“我们建议将它纳入珠海经济特区范围。”刘佳汇报时，一直在细心聆听的杜鹰突然插了一句：“横琴纳入珠海特区范围，珠海都已经是特区了，那横琴怎么叫？”

刘佳说：“纳入经济特区，主要是有利于横琴能享受特区的一些政策。”

“横琴的政策应该比珠海特区的政策还要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下首个落地项目，由粤澳两地政府出资共同成立园区运营主体负责园区的规划、建设、经营、运作及管理。该项目是澳门推动中医药产业化和国际化的重要载体，也是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

‘特’。”杜鹰说。

“我们也是希望这样……”刘佳用略带征询的目光看了看黄锐。

黄锐心领神会，忙说：“杜主任，我们想把它叫作‘广东的浦东’……”

杜鹰若有所思，示意黄锐继续往下讲。

“或者叫作‘特区中的特区’。”黄锐情急智生。

杜鹰沉吟了一会，仍然没有发表看法。

从国家发改委南楼出来，黄锐心想：可能凉菜了。

2009 年 8 月，在国务院的批复文件中，“特区中的特区”被采用，而“广东的浦东”并没有被采纳。

之后，黄锐有些好奇，经多方打听得知，因广州南沙在地缘等方面都比横琴更有优势，故横琴不适合定位为“广东的浦东”。

横琴助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初衷是发挥横琴地处澳门与内地接合部的优势，推进两地深度紧密合作、融合发展。

但规划给出的只是一个框架。

譬如，有哪些点可以突破？禁区的边界在哪里？

别说是广东省和珠海，恐怕连国家的相关部门可能也没有想清楚，哪些方面需要由国家来定夺。

2011 年至 2012 年间，邹桦是横琴对外交流合作局副局长，她被钦点为“驻京催批小组”组长，和邹贤康、叶晓辉等一批同志轮流“驻扎”在北京，唯一的任务就是做好横琴与部委的日常联络沟通工作。

邹桦成了名不副实的“驻京办主任”，她深谙其间不为人知的艰辛与不易。

2012 年 5 月的一天，邹桦来到某个国家部委，把通关模式的政策申请报告递交到相关处。因为《横琴总体发展规划》里确定了“出境功能和入境功能分开”，即在横琴岛和澳门之间的口岸确定为以人为主的“一线管理”，横琴岛与内地之间确定为以物为主的“二线管理”，这里面就需要有更细致的规则和方案报国家批准。

相关处长看完报告后半开玩笑地对她说：“你们广东啊，可真会异想天开。”

听了这位处长的话，邹桦心里“哎哟”了一声，心想这下可糟了。其实，这位处长用“异想天开”这个词也不是什么贬义，只是觉得太大胆、太超前了。“这样吧！报告留下来，我们也仔细学习学习！”

“学习？”邹桦一听凉了半截，内心涌出一种非常复杂的滋味。

在回程的飞机上，邹桦向珠海市委常委、横琴新区党委书记刘佳汇报后请示道：“下一步怎么办？”

刘佳当时阴沉着脸，话简短得只有两个字：“再去！”

三个月后，横琴终于争取到了有关部委同意实行“分线管理”的模式时，邹桦又见到了那个当初说横琴“异想天开”的处长，处长竖起大拇指说：“你们广东人真行！”

在邹桦的印象中，横琴政策小组 60 余次赴京，积累的资料超过 2 米高，17 次对报批文件进行“大手术”。几乎每次上京都是由省、市、区领导亲自带队组成“强大阵容”。她说：“省委、省政府下了大力气，对横琴政策创新寄予很高的期望。”

邹桦说，政策报批涉及国家部委就达 40 多个，为了取得国家对横琴开发政策的支持，他们历时 170 多天，跑了其中的 50 多个司。

有一个周末，邹桦从北京飞回珠海，飞机落地的瞬间，她兴致勃勃地打开手机，正要给家人报个平安，却先传出“滴”的一声短信提示，她点开一看，是单位同事发来的：“明天上午拜访国家 ×× 部，请您立即飞回北京，单位已为您购买好晚上 7 点 20 分珠海往北京的机票。”

刚经历了 4 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疲惫不堪的她看看时间，已是 6 点多。她赶忙从一楼到达大厅转到二楼出发大厅，在办理登机手续的那一刻，她惊奇地发现，乘坐前往的飞机正是自己回来时乘坐的那一班……

一年下来，邹桦已记不清跑了多少趟北京，由于常在珠海至北京的航线上飞，以至于她对每家航空公司的航班时刻、航班号，每家航空公司的机型、准点率都了然于心。

专项创新政策报批既充满悬念又令人翘首。当横琴人多年后讲起这些陈旧的故事时，我同样肃然起敬，深叹他们的专注、执着和智慧。

2011 年 7 月 14 日，所有悬念有了着落。横琴翘首以盼的《国务院关于横琴开发有关政策的批复》获得通过，横琴人听到政策获批的消息时，许多人热泪盈眶，高兴得落泪。

2. 舍得

舍得，是一种智慧。佛教《地藏经》说：舍即得，得即舍。

横琴与澳门守望相助、优势互补、携手共进，在“舍”与“得”的禅意间保持大彻大悟，那就是：配合澳门、服务澳门、扩展澳门、提升澳门。

香港开埠之前，澳门曾经是东方最大的贸易转运地之一，也是欧洲人前往中国及日本经商的必经之地。香港开埠之后，澳门贸易转运地位逐渐下降。澳门地域狭小，地域面积仅为横琴的 1/3，稀缺的土地空间让市民承担高额的成本，产业化发展在澳门步履维艰。

澳门回归以来，澳门市民尽管被特区政府照顾得很好，但澳门企业对产业多元化的内驱力渴望强劲，澳门市民创业、创新的意愿也十分强烈。

澳门人知道，横琴的开发，最终还是要以产业作为支撑。

《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一经公布，正所谓“春江水暖鸭先知”，澳门企业看到了横琴的发展前景，纷纷捷足先登，前来“一探究竟”。

然而现实情况让他们心有“千千结”。

土地出让、产业建设、资本参与、城市基础设施、资源性开发等一系列敏感问题成为澳门最关心的要素。

横琴心领神会，郑重表示：澳门优先！根据之前签署的《粤澳合作框架协议》，横琴实打实拿出 5 平方公里的土地，在“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基础上，采用“共同规划、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享收益”的联合开发模式，由澳门特区政府统筹澳门工商界参与建设，推动澳门居民到园区就业。

海岛寸土寸金，横琴坚持向澳门倾斜，在土地挂牌出让对象条件中明确提出：“凡符合《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需进入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的澳门企业，均可参加竞买……”

一份官方的内部资料披露，在可出让产业用地只有 17.6 平方公里的情况下，横琴为澳门留足土地空间，粤澳合作产业园、澳门新街、励骏庞都广场……加上澳门大学新校区用地，澳门在横琴项目用地达 6.27 平方公里，超过了 1/3，粤澳合作产业园提供给澳门投资者的用地更超过了五成。

立足澳门强基础，拓展澳企大空间。横琴栽得梧桐树，能引来澳门的金凤凰吗？

在横琴，有一家澳门的“国有企业”。

我的好奇心油然而生，便径直而去。一路上有风，天空还飘着蒙蒙细雨。大桥横跨在十字门之上，似琴弦的根根拉线弹奏着一曲《雨中即景》。

沿着横琴新区环岛北路一路往西，在大道的尽头处，三栋安装着深蓝色玻璃的大楼映入我的眼帘，这是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总部科研办公大楼、GMP 中试大楼和检测大楼。

一座白绿相间的独特建筑尤为显眼，走进其



正在建设中的横琴口岸

中，可以通过声、光、电等多种形式了解到中医药文化的博大精深。在产业园，中医药转化医学中心、院士（国医大师）工作站、道地药材认证、交易平台一一从我的视线中掠过。

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是一只从澳门飞过来的“金凤凰”，也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下首个落地项目。

我不禁纳闷，琴澳两地怎么会选择一个中医药项目呢?

其实，澳门在中医药科研领域并非“白丁”，澳门的中医药产业在国际上颇具影响力，世界卫生组织与澳门政府签署了传统医药合作计划。2010 年 12 月，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获得国家科技部批准，建立了一间“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澳门政府冀在将历史悠久的澳门中医药产业链延伸至横琴。

从横琴看，珠海本身拥有百余家制药企业，丽珠、济生、亿邦、华旭等医药企业在业内早已名闻遐迩，横琴也看到了自身的优势，致力通过产业园建设一个集中医药研发、生产、检测、检验等为一体的中医保健产业聚集区。

一谈，双方志同道合：横琴出地入股，澳门出资建设。

一个资本主义制度，一个社会主义制度，横琴“一岛两制”相得益彰、相互促进。

于是，澳门借鉴内地的国企运作模式成立了澳门首家公营公司——澳门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负责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的招商建设和运营工作模式。

这是澳门400年历史上的第一家“国企”。

2011 年 11 月底，产业园合作公司——粤澳合作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注册成立，澳门首期注册资金 6 亿元人民币全部到位。澳门占股 51%，处于控股地位；横琴占股 49%。

中医药产业是澳门推动多元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澳门对这个园区钟爱有加，增资额逐步提高到 100 亿元，股权也增加到了 70%。

由澳门控股主导运营，一时间在两地乃至国内各地引起轰动，有人感到不可

思议。

“这不是被资本主义占领了主阵地了?”

横琴则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充分贯彻落实《横琴总体发展规划》的一项具有开创性的实践工作，遵循的是横琴开发“港澳优先”原则。

澳门主导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后，“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

吕红是澳门人，现任粤澳中医药科技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她告诉我，产业园近两年把中医药的技术和产品带到了以葡语为第一语言的国家莫桑比克，在当地的公立医院，产业园把中医的特色疗法普及到了莫桑比克的老百姓层面。

葡萄牙、安哥拉、佛得角、几内亚比绍……产业园到处“点火”，以医带药，将中医药文化、技术和产品引入葡语系国家，同时帮助企业拓展海外资源和市场。

澳门澳邦药厂正是这个时期进入产业园的。

“呵呵！横琴俾（给）食仲（还）俾（给）打包。”蔡健华是澳邦药厂有限公司行政总监，几乎每个星期，他都会从澳门来到中医药科技产业园。

仅一年，蔡健华就尝到了“甜头”：公司旗下的两款“马交牌”中药产品远销非洲莫桑比克，公司还获得内地知名药企产品的澳门代理权。

“中医药科技产业园真是个好平台。”蔡健华逢人就夸。

与此同时，澳门张权破痛油药厂的“张权破痛油”、石家庄以岭药业的“连花清瘟胶囊”都在莫桑比克完成了产品注册。其他产品也已陆续启动在莫桑比克的注册申请。

“盯”上横琴多时的还有澳门企业家陈志强。陈志强是一名出生在柬埔寨的华侨，文静、睿智而干练。

1972 年 9 月，因为柬埔寨战乱，年仅 12 岁的陈志强随父母从柬埔寨逃难到香港。1981 年，21 岁的陈志强前往法国，在里昂学习纺织技术。1987 年再度回到香港，在香港重庆大厦租了个门面，与租住在这里的非洲商贩做生意，从事服装、日用品等产品的批发、外贸出口。2004 年，他来到澳门开公司，当时澳门房价尚在低谷中，他一口气买了十几套住房。

从事进出口贸易 30 余年，陈志强的生意越做越大，当一切都做得风生水起之时，陈志强的事业却遭遇到成长的烦恼。澳门“太细”（太小），租金昂贵，经济规模不大，想办个大型的商品展示中心都有不少困难。

陈志强的生意迫切需要更大的发展空间。

机会不期而遇。

那是 2013 年 9 月的一天。他一如往常泊好车后大步流星走入电梯，电梯墙上的广告板上，一则由澳门投资促进局粘贴的公告吸引了他的视线：正在推动澳门企业到横琴投资。

陈志强的公司就在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以下简称“贸促局”）的楼上，每天上上下下早已混得脸熟。

他没有进入办公室，而是径直到 4 楼去贸促局。

“真嘅（的）。”贸促局的朋友告诉他，横琴与特区政府在澳门协同招商，项目正在接受申请！

从贸促局出来，陈志强的烦恼变成了一脸笑容。他立即按照项目申请指引准备资料，他期望在横琴谋求到事业的“第二春”。

2013 年年底，横琴首次招商共收到 89 个投资项目申请，涉及旅游休闲、物流商贸、科教研发、文化创意、高新技术、医药卫生等行业。

2014 年 1 月 6 日，澳门“开选”进驻横琴项目，会议持续 3 天。

评审的三大要素包括：整体团队实力、资金实力、项目可行性分析。当然，有利于加强澳门产业适度多元发展，推动横琴与澳门共同发展，为区域旅游休闲发展提供空间的优先考虑，特别

是能带动澳门中小企业入园共同参与大型项目的优先录取。

4 月 14 日，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正式公布粤澳合作横琴发展澳方项目 33 个。陈志强的项目入围了。

2019 年年初，我几经周折总算约到了陈志强。

“之前去过横琴吗?”

“没有，对横琴的认识十分模糊和肤浅，只知道离澳门很近，触手可及。”

“当时你申请了多少面积?”

“7 万平方米。”

“批了多少?”

“7000 平方米左右。”

“十分之一。”

“以前也没搞过建筑，把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弄混了。”他略感尴尬地表示，能成为粤澳合作产业园的首批入驻项目真的很高兴。

“分数排名怎样?”

“还不错吧!”陈志强说，初审终评基本没什么问题。

陈志强是一个很勤恳的人，凡事喜欢亲力亲为，横琴澳门事务局科长杨恺明开玩笑说：“我们都称他为‘劳动模范’。”

“多谢横琴!”陈志强感激地说，“来之前还有些忐忑，因为听说在内地投资手续非常麻烦，需要一年半载才能办完公司注册流程，没想到，在横琴从准备投资到办完所有手续只花了 3 个月。”

“目前项目进展如何?”

“年内笃定要开业。”陈志强正在筹谋运用广交会的平台，引进并销售包括葡语国家、法语国家在内的商品。因为有很多国外客户都会参加广交会，他准备建一个大型的商品展示中心。届时，可以派车直接把客户接到横琴来参观洽谈。

和陈志强一样，越来越多的澳门企业家在粤澳产业园投资，追逐一个共荣的横琴梦想。

2016 年 11 月，第二批 50 个项目入驻横琴，涵盖旅游休闲、物流商贸、科教研发、文化创意、卫生医药以及高新技术等行业的多个领域。

粤澳合作产业园建设步入 4.0 时代。

“这些项目都是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而设计的。”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负责人告诉我，“从园区积极推进的招商引资情况来看，粤澳合作产业园引起澳门投资者的广泛关注，澳门企业进驻横琴积极性很高。”

在横琴规划国土局，我得到一组数据：面向澳门项目所出售的土地均价为 3000 多元 / 平方米，而横琴所支付的回收价和配套成本都在 5600 元 / 平方米，差价达 2000 多元 / 平方米。

截至 2018 年年底，粤澳合作产业园已有 27 个项目签署合作协议，24 个项目已取得项目用地，21 个项目已开工建设，已供地项目投资总额达 753.3 亿元。其中，2018 年新签约项目 3 个，新供地项目 3 个，新开工项目 4 个，封顶项目 4 个。

2012 年 12 月 20 日，珠澳各家新闻媒体不约而同地播发了一条看似与澳门回归日关联不大的消息。

澳门澳亚卫视有这样一则报道——

主播：本台消息，在澳门回归 3 周年之际，横琴新区首块土地出让成交，这是横琴政府对澳门企业定向出让的第一个地块。

旁白：该地块面积 3 万平方米，位于莲花大桥、横琴口岸和综合服务区的中轴线上。毗邻交通枢纽，与广珠城轨延长线横琴站、澳门轻轨横琴站无缝连接，可 24 小时通关澳门，是寸土寸金的“黄金宝地”。

字幕：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牛敬。

牛敬：此宗地块专向澳门企业挂牌出让，是进一步落实《粤澳合作框架协议》要求，推动澳门商界特别是中小企业全面参与横琴开发的集中体现。

这块地之所以引人注目，除了它地理位置相

当优越外，还在于它是定向出让，明确要求竞买人为澳门企业或澳门人在国内注册的全资子公司。

为什么是定向出让？

原来，澳门中小企业较多，为了让他们更好地参与横琴开发，横琴探索了两地政府共建、中小企业联合投资，以大带小、以一带多等多元化的企业进驻模式，让澳门中小企业分享横琴发展红利。

澳门励盈投资有限公司成功以低价竞得。公司行政总裁、澳门中小型企业联合总商会会长周锦辉此时才揭开不为人知的背后故事：励盈投资有限公司是由 42 个澳门商会共同组建而成的。

“怎么这么多股东?”我惊讶地问。

“横琴开发起点高、门槛高，澳门的中小企业如果不联合起来，就很难达到进入横琴的要求。”周锦辉说。

在竞标前两个月，周锦辉联合 42 个澳门商会创立了“澳门中小型企业联合总商会”并担任会长，通过澳门中小企业会员广泛参股的方式，抱团组建了励盈投资有限公司。澳门企业实力普遍偏小，聚沙成塔、抱团取暖的运作方式，解决了中小企业进驻横琴的瓶颈。

对中标这块“黄金宝地”，周锦辉钟爱有加，由联合总商会的成员们共同集资、共同参与开发，取名为“庞都广场”（PONTO）。

2014 年早春三月，横琴岛上生机盎然，南海之滨气象一新。

3 月 28 日，庞都广场动工了。那天，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出席，专程为类似这种“母鸡带小鸡”推动澳门中小企业参与横琴开发的方式点赞。

PONTO 是葡文词汇，翻译成中文是“点”的意思。

“为什么要取名叫‘PONTO’?”

周锦辉的太太陈美仪说，庞都广场位于澳门与横琴的口岸交汇点，项目本身很有葡国特色，因此选择葡文的 PONTO 命名。这想法，大致与陈美仪的成长环境有关。她生长于中葡文化交融的澳门，在她看来，建筑本身就应当是文化的载体。

“我们的初衷是将庞都广场打造成中国与欧式文化的交汇点，营造一个融合欧式文化与生活方式的购物环境。”她描画着 PONTO 的未来——

有潮流集市、画廊展览，还有许多港澳及内地同胞喜爱的品牌；有类似“闲鱼”的线下二手闲置平台，橱窗里摆满“驴友”从全国各地淘回来的纪念品，或者是澳门当地人的“二手宝贝”；当然也少不了电影院，除了常见的放映厅外，还将专设“全天候通票”放映厅；美食也是庞都广场的一大特色。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从“一带一路”沿线，甚至到南半球的拉美等国家美食，分布在商场室内及户外……

她期望庞都广场呈现的是一个融合欧式文化及生活方式的地方，让澳门、横琴两地的消费者不单纯只为购物而来，更多是能够体验本该享受到的美好生活。

“40 多个股东的共同的梦。”

“是的。”陈美仪笑了：“我们乘着梦想一起飞。”

3. 创业谷

2014 年 12 月 20 日。澳门。

这天，珠海市委常委、横琴经济开发区党委书记刘佳应邀参加了澳门回归15周年纪念大会，她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习总书记说：“澳门青少年是澳门的希望，也是国家的希望，关系到澳门和祖国的未来。要保证‘一国两制’事业后继有人，就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要高度重视和关心爱护青年一代，为他们成长、成才、成功创造良好条件。”

刘佳当时就想，横琴有责任落实习总书记的

讲话精神，而且要尽快做这件事情。

翌日晚上 7 点，夜幕悄然降临，横琴大街小巷华灯初上。

居于横琴岛上一隅的新区管委会大楼内依然灯火通明，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横琴新区管委会澳门事务局局长邹桦正在忙碌着。

“丁零零、丁零零……”邹桦拿起电话。

电话是刘佳打来的。她告诉邹桦：“横琴要打造一个为港澳和内地青年交流合作、干事创业、实现梦想的平台，在下一次项目启动仪式上要增加一个青年创业项目，你马上做一个方案，跟澳门方对接一下，尽快送给我。”

邹桦乍一听愣了一下，她知道，之前从来没有谈及这个项目，很显然是临时决定的。

“邹桦，这个任务就交给你啦!”刘佳对自己的下属从来就很有信心。

邹桦扳起手指，时间这么紧，这项目去哪里找？她把局里负责材料的同事叫到办公室说：“你在网上搜一搜，把一些青年创意创业的资料整理给我。”

看完资料后，慢慢地，邹桦心里开始有点底了。她连忙找到横琴新区统筹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闫卫民，商讨对策，连夜赶制方案。

到凌晨 2 点，方案总算成型了。

第二天清晨一大早，邹桦将打印的 10 份方案揣进包里，带着邵文勇直奔澳门。

整整一天，他们先后拜访了澳门大学创业创新中心、澳门中联办、澳门中华新青年协会、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澳门青年企业家协会、澳门青年联合会等。

一开始，对方也是满脸懵懂，因为即便是在澳门大学创新中心，无非也是些小餐馆、咖啡廊、礼品店，不知横琴干的创意是啥东西。

邹桦拿着方案，一番讲解后说：“我们想邀请你们做发起单位。”

“没问题。”澳门方非常爽快。

与此同时，刘佳则把横琴新区规划国土局局长王瑞森、珠海华发集团董事长李光宁、珠海大横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嘉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她说：“关于澳门青年创业，昨天习总书记在澳门做了讲话，当务之急是马上启动，叫你们来，是商量如何选址、如何建、谁来建。”

大家热烈地讨论开来。

“名字叫‘创业谷’，‘硅谷’的谷。”她转过身来对王瑞森说：“总书记在澳门作了指示，我们横琴要落实，你赶快给我弄块地。”

王瑞森于是推荐了澳门大学对面一块地，大约有 13 万平方米。他的理由是，这地方一是与澳门大学仅一路之隔，今后可以成为澳门大学学生创业的一个实践基地；二是靠近口岸和主干道，出入澳门非常方便。

“好，就拿这块地建创业谷，当临时建筑用



横琴励骏庞都广场

地。”刘佳说。

“临时多久?”王瑞森问。

“20 年，20 年后再开发，我们要把位置最好的地留给澳门青年，把这块地作为澳门青年创业的福地。”

刘佳说着又转回身来，对李光宁和胡嘉说：“我要的是快，你们两个都说一下，怎么建？什么时候能完成?”

李光宁和胡嘉互相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把各自的想法和计划说了一遍，刘佳最后拍板：“行，李光宁你们华发来搞吧!”

项目启动那天上午，突然刮起大风，寒风越来越大，气温突降，风肆无忌惮地呼呼刮着，许多参加仪式的人冷得瑟瑟发抖。

在横琴新家园旁边的一块空地上，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项目如期启动。澳门大学校长赵伟、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牛敬和 5 名澳门青年代表一同在一个树林画框上撒下绿粉，原本光秃秃的一棵棵小树赫然变得郁郁葱葱……

2015 年 6 月 29 日上午，横琴岛上的太阳明媚而火辣。与澳门大学一路之隔，横琴精心打造的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开谷”了。

这一天，对于横琴和澳门青年来讲，是一个应当被记住并值得纪念的日子。

创业谷集商务办公、商业服务、人才公寓于一体，占地面积 12.8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13.7 万平方米。孵化模式也很新颖：创业载体 + 创业辅导 + 创投资金。

这是一个整合政府、高校、企业、社会团体资源和服务，为澳门青年打造的创新创业环境。

这是一个可以做“白日梦”的地方，一个将“梦想孵化成现实”的基地。

当天，首批 30 个澳门项目入驻创业谷：全众超级管家、安信通科技（澳门）、澳门科极、澳门购、澳门联动数位科技、云上创客咖啡厅、跨境互联网金融平台、POOCU Calendar……其中互联网类 13 家、文化创意类 7 家、高新技术类 6 家、跨境电商类 3 家、培训教育类 1 家。

众创空间 + 孵化器 + 加速器……创业谷点燃了澳门青年创业的激情。



横琴 · 澳门青年创业谷

周运贤，创业谷里的“明星”人物。

他的珠海横琴跨境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频繁见诸媒体，常常向外露脸。据说在入驻创业谷不久就拿下了一笔高达 3000 万港币的“天使”投资基金。

创业谷有别于传统的、兵营般的工业区，貌似随意架空的连廊、随处可见的草木和咖啡馆让我心旷神怡。我徜徉在花园式的办公环境中，此时此地，一棵棵创业的幼苗正在茁壮成长，我仿佛听到了那“噌噌”拔节的声音。

在一层一间 160 多平方米的大办公室里，整墙的粉红色，随处可见的粉色顽皮豹，Blingbling 的灯光下，一步一景都让初来乍到的到访者好奇心爆棚……聚焦外界目光的跨境说，青春与活力一如这堵与众不同的创意墙，跳跃而明亮。

每个工作日的早晨，周运贤都会从澳门家中出发，来到位于横琴创业谷的公司上班。

“创业谷真是一块福地啊!”他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握手。

在宽敞的产品展示厅，周运贤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几年间，公司的成长超过预期，目前公司已有 1000 多家自媒体，20 多万名会员。”

周运贤祖籍梅州，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读完大学后随父母技术移民到了澳门。一直有着创业梦想的他几年前就开始谋划跨境电商项目。周运贤说，互联网创业的关键是创新，要做就做不一样的事。

“跨境说”俨然成为创业谷一张名片，它是全球第二家、国内唯一一家从事 Saas 云计算的反向电商企业，亦即“电商推手”，业已打通了美国包括亚马逊等多个第三方电商平台。

他将国内外知名网站的发展轨迹做成了巨幅海报，挂在公司办公间的墙壁上。显然，周运贤已不满足于做系统软件，做网站 APP 这种“小不点”了，他的目光所及，是将大服务提供到海外，覆盖到全球。巨幅海报便是在宣誓自己的雄心。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全球正品链接中国’。”周运贤兴奋地告诉我，“拉美、葡语系国家是‘跨境说’网络科技服务拓展的重点，巴西、智利这些国家，就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平台输给他们当地的。”

这家诞生于澳门、成长于横琴的技术型互联网外资企业，从最初的 7 个人发展到 160 人。目前，“跨境说”的触角已延伸至非洲国家佛得角共和国，在那里建立的国家数据中心将作为西非的信息技术服务中心服务到周边的国家……

“我们准备在横琴扎根!”周运贤坚定地说。

同样是做跨境电商，家族在澳门从事赌场贵宾厅生意的 90 后林健龙，走的却是与周运贤不同的渠道。

林健龙痴迷电脑和互联网，决意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到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谷创办“信驿跨境电商”，主打跨境贸易，帮助中国消费者购买全球特色商品。

当初，林健龙提出这样的想法时，家族里一片反对声音：“脑子烧得不轻。”在梦想尚未变成现实之前，生长着无穷变数，谁又能看得到可期的前景呢?

为了说服家人，他甚至在家族会议上路演，努力说清楚、讲明白他想干些什么。

2015 年 6 月，由林健龙领衔担任 CEO 的珠海横琴信驿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在近 200 个申请项目中脱颖而出，成为入驻创业谷的第一批 30 颗“琴澳种子”之一。

这个由 90 后澳门青年组建的创业团队，是第一家与创业谷签约落户的企业，合同编号为 00001。

在创业谷 18 号楼的信驿工作室，林健龙没有单独开辟一间属于自己的办公室，而是选择了与另外 10 个同事相邻，他的办公台就在靠右最里面的位置上。除了他和 4 个澳门青年，信驿工

作室还有 6 个来自内地不同省份的员工。

19 岁就出来“闯世界”的林健龙思维更加国际化。早在 4 年前，他就注意到当时仍被叫作“全球购”的跨境电商概念，当时他与数位朋友成立了“信义屋进口商城”，利用晚上下班的时间帮助内地消费者进行海外代购。

“信义”，就是信用和道义的意思。信驿跨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便是由此而来。

交谈时，林健龙不时摆出大拇指，表达他对创业谷的肯定，也显露出他对创业的自信。他说，位于创业谷的信驿工作室是他创业以来挪的第三个“窝”了，信驿创业的历史比创业谷的历史更长，在此之前，他就在珠海香洲搬了两次工作室。

在创业谷，信驿的成长不断地打破林健龙的计划。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举拿下创业谷的数个“第一”：第一家入创业谷的企业、第一家以跨境电商进行商事登记的企业、第一家获得海关认证的跨境电商企业……

他的专注与执着，起到了“疯狂”的效果：2017 年“双 12”这一天，信驿在零食类商品中就收获了近 3 万宗订单。

他兴奋地在朋友圈里与伙伴们分享：这不是高速，是飞速。

“谁说我们只会发发扑克牌?”1989 年出生的麦浩贤，如日方刚的年华，属于“不想发扑克牌”的新一代澳门青年。

麦浩贤出生的澳门或许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就业地点，拥有世界名列前茅的人均 GDP，令人艳羡的社会保障和福利体系，哪怕不读大学，高中毕业后去赌场找份荷官的工作，一个月也有近 2 万元的稳定收入。在内地年轻人看来，澳门人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

麦浩贤不甘于此，希望展现出当代澳门年轻人的全新一面。

“只要有梦想，并有实践梦想的方案，在创业谷就能找到机会。”麦浩贤带着自己的梦想来到横琴。

“到了横琴创业谷，才发现梦想仍在，竟然被点亮了。”他动情地说。这位不到 30 岁的纤魅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实现了梦想，将精心设计的智能家居解决方案推广到全国乃至全世界。他的公司有澳门人，有台湾人，也有内地人。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的青年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大家在相识中互相启发，在交谈中产生火花。

“其实澳门的年轻人不都是想着去赌场做事，很多人都想把握不同的机遇，这是我们来到横琴岛的原因。”麦浩贤说，“梦想很多时候就是一种证明，澳门的年轻人不光会发发扑克牌，他们还可以做很多事。”

澳门青年选择创业谷，实际上就是选择把自己的梦想和祖国内地的发展连接在一起。麦浩贤说：“在这里，我们安心做自己想做的梦，做自己想做的事，梦醒时，发现自己不再平庸，说不定已抵达彼岸。”

4. 横琴何以成为横琴

到横琴采访之前，我就知道横琴有一个全国独一无二的机构：澳门事务局。顾名思义，澳门事务局就是横琴新区专门负责对澳服务的机构。

2013 年起，澳门企业开始往横琴“扎堆”。

为做好对接服务，横琴新区专门组织召开了一场座谈会，规格很高，由刘佳主持。

“今天这个会是解决问题的会，大家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和诉求都可以提出来，我们会认真研究。”刘佳开门见山，直接切入主题。

寂静的会场气氛开始有了一点小小的躁动。

“我们绝大部分澳门人是第一次到内地投资，找了一些中介，钱花了事却没办成。”一位澳门老板率先开了腔。

“是啊！在横琴投资太复杂了，跑规划、跑国土、跑建设，跑来跑去跑断腿都没走完流程。”

“项目上想拉一根电线都好难……”

会上，澳门投资商一口气提了二三十条意见，绝大部分都是反映政出多门、多头管理，澳门投资项目落地效率低。

刘佳沉默了。

第二天，刘佳召开班子会说：“横琴的使命是助力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现在澳门的企业陆陆续续进来了，却碰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要想想办法，怎么样才能为他们提供高效率的服务。”

“横琴的机构已经是小部制了，很多部门合并后都是一个窗口对澳门企业。”也有人认为，横琴已经做得不错了。

“没错，放在内地范围看，横琴确实已经做得不错，媒体也给予了一致好评，但放在港澳地区看，我们的营商环境远远不够，昨天澳门企业家提出的问题足以反映出问题。”刘佳说。

会议讨论成立一个专门服务澳门项目投资的机构，专事负责澳门事务，包括投资介绍、项目招商、项目落地等一条龙全程服务。

大家都开动脑子想。

“我看就成立一个澳门事务局吧!”刘佳的意见立即得到大部分成员的认同。

“可行吗?”也有人怀疑，因为这也太“离谱”了。

“横琴敢吃第一只螃蟹，也能够吃下第二只、第三只……”刘佳说，将散落在多个部门的涉澳职能吸纳在一起，方便澳门企业有什么不好?

根据设想，澳门事务局将统一负责横琴各项涉澳事务，为澳门社会各界参与横琴开发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务，但大家在酝酿和筹划时，问题来了，在当时的环境下，怎么可能给横琴增加一个机构呢?

刘佳提出将原来的“交流合作局”改为“澳门事务局”，还是原来的那批人、那些编制。

成立“澳门事务局”的机构报到市里，很快得到积极回应。

澳门事务局一挂牌，便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媒体报道出来后，上面来人追责了：“怎么可以成立这样的局?”

刘佳作了自我检查后，说：“澳门企业有所呼，我们政府有所应，澳门有诉求，我们做服务，这是横琴的责任所在，也是横琴的使命决定的。”

澳门事务局于是保留下来。

正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那样：“存在即合理。”

澳门事务局推动澳门项目落地“全覆盖”，成为横琴打造服务澳门的“专业队”。

邹桦是首任“队长”。

2017 年 7 月，在横琴新区那间稍显狭窄的会议室里，我见到了已担任横琴新区管委会副主任的邹桦。

“事务局挂牌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2014 年 4 月 4 日。”

“职责主要是什么?”

“重点协调解决与澳门在产业合作、通关便利、基建对接、法律互动等各类事务以及在横琴投资企业的问题和诉求。”

“事务局有多少人?”

“当时也就 4 个人。”

“事务局成立后的第一项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和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那边进行工作层面的对接。当时澳门一下子推荐 33 个项目过来，需要马上安排会谈。”邹桦说，澳门很多企业家都是第一次来横琴投资，对横琴开发政策、开发流程不了解，毕竟内地和澳门不太一样。

2011 年 3 月 6 日，广东省政府跟澳门特区政府在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了《粤澳合作框架协议》。随着粤澳合作产业园的推进，澳门项目招商以及跟澳门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横琴新区为加强合作沟通、政策对接和精准服务，将产业发展局与交流合作局的职能整合成立澳门事务局，以确保所有澳门项目顺利推进。

动脑筋、花心思、下苦功……澳门事务局对澳门项目是“一对一”服务，一跟到底。

澳门项目一落地，澳门事务局就制定了《推荐项目对接服务分工表》，每一个项目都十分明确。事务局每个月举行一场政企面对面的活动，一直延续至今。项目代表、建设规划，供水供电相关部门都派人参加，有什么问题就在会议上面提出来，管委会的领导甚至直接出面协调解决企业面对的困难和问题。

“那个时候要去澳门企业界推介横琴希望吸引投资，基本上没有企业愿意来，求都不来。”邹桦对此仍记忆犹新。

办事不便利，很难吸引澳门企业前来投资发展，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任也就无从谈起。

“澳门企业一开始在横琴投资慎之又慎、长期观望，这两年变得积极踊跃，对横琴发展的信心更足了。”澳门事务局副局长李娟明显感觉到，虽然沟通协调工作量依然很大，但是实际上变得容易了，有之前长谈不下的项目近些年都能快速落地横琴。

“澳门的事就是我们的事。”李娟曾在多个场合这样表示。

在澳资企业纷纷前来的同时，横琴促进澳门产业多元化的政策也更加精准多元。2016 年，横琴颁布了《横琴新区促进澳门投资项目建设若干措施》和《横琴新区促进澳门中小企业发展办法（试行）》，着力解决澳门中小企业在横琴发展面临的办公、融资、人才招聘、通关以及与内地企业合作等方面的难题，为澳门中小企业优先参与横琴开发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横琴澳门事务局在澳门设立了投资咨询点，为澳门投资者提供全程服务指引，在横琴设立了澳门投资绿色通道，专门服务澳门投资者。

澳门施美兰集团主席罗掌权回忆起澳门拱廊广场在横琴的落地过程，对横琴澳门事务局的服务竖起了大拇指。

“横琴对我们的项目提供了一对一专人专项的跟踪服务，双方信息能够及时传递，另外还成立了绿色通道，为我们在横琴的工商注册提供便利，效率非常高。”罗掌权说，横琴不断改革创新，以优质便利的服务为澳门企业在横琴发展壮大保驾护航，澳门企业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和期待。

杨凯明是一个“澳门通”。我见到他的时候，已经过了下班时间，他的同事告诉我，他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很晚才离开办公室。

杨凯明说：“我们开辟了一条绿色通道和一个审批通道……”我们谈兴正酣，他的手机响了



2009年横琴鸟瞰图

起来，他对我抱歉一笑，然后转身去接听电话。

他用一口流利的日语与对方交流。

回到我跟前，杨凯明继续之前的话题：“从做方案到跟踪落户，每一个流程、每一个重点都必须熟稔于心。在对澳这一块，从立项、环评、报批报建，从工商注册到税务登记，从水电路气讯配套到员工招聘等一系列，我们事务局都要全方位跟进服务。”

“像保姆一样。”我说。

“严格地讲，事务局更像一个居委会。”杨凯明呵呵一笑，“他们就是我们居委会那些居民，什么事都要管一下。有时候他们不熟悉规章，我们就帮忙找部门协调。”

访谈间，朱安邦也“插”了进来：“像这种澳门公司注册的话，刚开始那段还很麻烦。”

他解释说，不是所有产业都能进来，各个审核环节繁琐而严谨。

“跟澳门投资人打交道，你印象深刻的是什么?”

“契约精神，这一点我很佩服。”朱安邦说，澳门人比较遵守契约精神，他跟你签协议时，会反反复复、认认真真地看，包括生产管理、工程期限……甚至政府的服务能力、规划战略，都在他们的考量之中。最后还找法务部门再看一遍，没什么问题才签约。”

澳门项目落了地，事务局的考验才刚刚开始，越来越多的建设工程服务在等着他们。

2016 年，在中心沟有个澳门项目施工，相关部门批了一个搭建工棚的临时用地，因有点远，澳方不愿意，就偷偷摸摸在旁边建了一个，几个月之后，那块地要出让了，让他们搬。澳方老板不愿意搬，就这么执拗。

朱安邦就去协调。澳方老板用三分之一的粤语和三分之二的蹩脚普通话讲，朱安邦用三分之二的普通话和三分之一的蹩脚粤语。大家比画老半天总算明白彼此要表达的意思。

澳方老板磨蹭了一个月才搬走，却又擅自跑到旁边地块建了一个工棚。住了大概两三个月，那块地要施工，发函让他们赶紧搬。澳方老板又不乐意了，说搬一次上百万，怎么能把他们赶来赶去的?

“于是我们又得去解释协调。”朱安邦说，这样的事情初期碰到比较多。

回想起自己的服务经历，朱安邦感慨颇多。从陌生到熟悉这份工作，园区从一无所有到现在渐成气候……其间，尝尽了谈判和服务中的各种酸楚，也获得了满满的成就感。

在横琴采访，我还听到一个“逃跑新郎”的



2019年横琴鸟瞰图

故事——

澳门事务局一小伙子好不容易申请了休假，与恋爱 3 年的女朋友相约去云南丽江拍婚纱照。他们才在丽江拍摄了一天，小伙子接到由自己负责“一对一”跟踪服务的澳商电话。当时澳商不知道小伙子在休假，因有项目准备举办一个开工仪式，要尽快跟小伙子面谈一些细节。

小伙子二话没说，收拾行李“丢”下女朋友就回横琴。回到横琴陪澳商研究并敲定仪式方案后，他才又飞回丽江找女朋友继续拍婚纱照……

正是无数类似的真诚服务，激活了横琴一池春水。

在横琴，有一个耳熟能详的名词：服务澳门。这种服务事无巨细，渗入横琴每个部门、每个横琴人的骨子里。

2012 年 11 月 1 日，澳门人丘玉珍拿到了由横琴产业发展局审批通过的编号为 0001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港澳台企业批准证书。

进横琴投资前，丘玉珍听朋友说到横琴办公司要雇一个专门跑机关的人，办手续起码要几个月。

“没想到登记仅用一天。”拿到了批准证书，丘玉珍十分兴奋，“在横琴注册企业，效率很高，和在澳门没啥太大区别了。”

简化登记手续、降低注册门槛、优化注册流程……登记事项由原来的 11 项减少到 6 项，各类申请表格由原来的 140 种缩减到 70 多种。

横琴工商局局长吴创伟告诉我，横琴的商事登记是一个不断与时俱进的过程，其中商事制度改革是最大的成果。

吴创伟说，当时的企业注册登记条件非常严格，注册地址必须是有房产证的商用楼宇。横琴有房产证的房屋不过 1000 户，基本上都是住宅用房，如果要等新建的商业楼宇投入使用才予以登记，至少要等 3 年，“横琴等不起，招商引资落不了地，怎么办?”

“改革需要破题，倒逼我们转变思路，放宽企业注册登记条件。”他说。

在省工商局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横琴用 3 个月左右时间，起草了《珠海经济特区横琴新区商事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运用珠海经济特区立法权解决了这一困扰企业注册的难题。

2012 年 5 月 24 日，全国第一个关于商事制度改革的政府规章颁布实施。这个《办法》探索出一套有中国特色、符合国际惯例，内容覆盖注册资金认缴制、注册地与经营地相分离等 7 项改革创新措施，大幅降低企业注册登记条件。

横琴的商事登记改革一直没有却步。从 2014 年 6 月开始就推出网上商事登记服务，历经多次更新迭代，网上审批中心实现了“一网通办”，线上线下商事登记全流程系列标准化，网办商事登记业务量占到总体业务量的 50%。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企业‘零跑动’。”吴创伟说，至少是让信息多跑动，让企业、群众少跑动。

同年，横琴再推出商事登记改革 2.0 版本——澳门企业准入、准营“24 证合一”，其中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刻制印章、国地税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四证联办”。经过网上预审，企业最迟在两个工作日内拿到“四证一章”，往返横琴一次即可完成商事登记。

吴伟创还介绍了全国独树一帜的横琴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

“这个是跟银行一起搞的。”吴创伟拿来两张样卡，第一个版本是 2015 年推出的，第二个版本是 2016 年推出的。

“一张简单的卡，没有磁条，没有签名条，但完全可以提现。”他说。卡的两面，一面是银联的标识 Logo，一面有庄严的国徽。

“作为全国第一张电子证照卡，证照与金融的功能完美融合。银行设计一边，工商设计一边。

既要体现电子证照的身份，又要体现银行卡的功能，我们前前后后搞了半年有余。”吴伟创介绍，“当时我们给企业发了营业执照后，企业到银行办理融资贷款等业务时，为规避一些风险譬如虚假合同等，银行往往要到我们工商部门来核查企业的信用和基本情况：地址注册在哪？开户行是哪家银行？法人是谁？我们就想，能不能合作搞一张卡，信息与银行共享，从技术上解决部门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同时解决银行的尽责调查问题。”

中国银行横琴支行觉得这个想法值得一试，于是将报告打到省中行，然后到中国银行总行，再到中国人民银行，流程走得一路顺畅。

但到中国银联时，这事差点“黄”了。中国银联问，磁条在哪？签名条在哪？横琴解释说，“版面有限。”这虽是个理由，但没有签名条不符合要求。省中行派人在北京待了一个月，终于磨通了。

“也不是取消了，是隐藏了这些功能。”吴创伟说。

于是，一张以营业执照信息为基础，集合企业其他登记、许可、备案、资质认证等证照基础信息的可读写标准电子介质在横琴诞生了。

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加载了金融结算功能，与纸质营业执照和其他证照具有同等效力，具有“证照信息电子化、集成化，信息数据权威性，使用功能广泛性”等特点，逐步取代纸质营业执照和其他证照，真正实现企业“一张卡走天下”。

一位前来政务大厅办事的人员告诉我，以往年度审核，审核前需要带上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税务登记证等许多证件，准备材料较多，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现在不用了。有了电子证照卡之后，投资者凭此卡可全天候享受便捷、高效、完整的商事服务，实现“一卡在手、服务全有、政商共用”。所有的信息都在卡内，不用重复递交相同的材料。

“使用的情况怎样?”

“除了中国银行外，目前我们跟七八家银行都有合作，有近 4000 家企业使用电子证照卡，其中不乏诸多港澳企业。”

传统工商登记模式被颠覆，只是横琴创新改革的一个缩影。

横琴工商局名噪一时的“三单”管理，就是专为澳门量身定制的：一是《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提示清单》；二是《横琴与香港、澳门差异化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罚清单》；三是《横琴新区失信商事主体联合惩戒清单》。事前违法提示、事中轻微违法免罚、事后失信惩戒组成了三个全链条、闭合式智能监管模式。

“清单”管理模式的创新很有故事。

初期，澳门企业到横琴投资，经常会出现一些在澳门合法而内地违法的经营行为。比如在澳门，店铺招牌名称可以简化，营业执照无须在醒目位置悬挂等，但在横琴则不行。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怎样才行?”在召开的座谈会上，澳门的企业家有点“不舒服”。

相关的法律法规条款内容分散不集中、不便查询，对于一些经营行为是否违法搞不清楚，澳门企业在经营上如何放开手脚？即便是无心违法也会产生成本。

如何对接港澳监管规则，让澳门企业放胆经营?

2012 年年初，横琴工商局梳理港澳合法而内地违法的经营行为，将涉及工商部门处罚职能的 154 部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 1810 种违法经营行为，按 96 个国民经济类别及 15 个市场主体类型进行分类，并开发专门应用软件方便社会大众查询下载，为企业经营“划红线”“标雷区”。

“有了这个清单，我们企业经营就不怕踩‘地雷’了。”丘玉珍打开横琴新区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提示清单查询系统，选择市场主体类型、行业类型后，不到 3 秒钟，7 大类可能涉及的企业

经营“雷区”便一目了然地展现出来。

“哪些不能做一清二楚。”丘玉珍高兴地表示。“但画红线标雷区，地雷还是太多了。当时的市场监管规定带有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管得过细过严。”吴创伟用了“绊脚石”三个字来形容。

既然要助力澳门经济多元，就要有容错的创新思维。能不能对一些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罚？吴创伟把这个想法分别向新区领导和省工商局和盘托出。

横琴新区把这一创新想法当作重大改革来推动。

2013 年 9 月，吴创伟一行来到北京，相关部门非常重视，当听取汇报后，还找了好几个专家来座谈，专家把吴创伟“批”得体无完肤。

“改革创新也还是在中国大陆，横琴不是澳门吧?”

吴创伟一听，心想完了，这次怕要犯政治错误了。

走出会议室，吴创伟再一次向与会的主要领导陈述想法，领导被横琴的创新精神和执着所感动，将吴创伟拉到一边，说：“小吴啊，你们回去以后稳妥推进，我们支持。”

当时横琴正要搞自贸区，草拟《自贸区促进办法》。“我们就从对接港澳营商环境方面，通过地方立法，获得了授权。”吴伟创说。

2014 年，新区工商局针对市场监管领域内地法律法规与港澳法律差异条款进行了系统梳理，对比分析了部分在港澳合法而在内地违法的监管规定，在全国率先公布《横琴与香港、澳门差异化市场轻微违法经营行为免罚清单》，只要是在横琴登记注册的港澳企业，对首次实施上述轻微违法行为实行免予行政处罚或免予罚款。

在公布的首批共 30 条的工商行政管理类免罚措施中，对澳门企业首次触犯公布的轻微违法行为、对澳门商事主体店铺招牌简化名称、对未在醒目位置亮照……免予行政处罚或免予罚款。

事实证明，这个免罚清单很有用。

2017 年 4 月 21 日，横琴新区正式对外发布《横琴新区失信商事主体联合惩戒清单》，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工商行政管理领域首批违法失信行为、惩戒措施及联合惩戒部门，推动各相关



2019年珠海长隆海洋王国

单位共建信用惩戒大格局。

横琴工商局还推动建立了“黑名单”制度，对市场经营中的失信商事主体开展联合惩戒，并推送失信商事主体名单到相关单位。在全省出台《失信联合惩戒实施办法》，明确多个部门在多个领域对失信商事主体共同实施惩戒，拓展惩戒对象范围，构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大惩戒格局。

一处失信，将会处处受限。

商事主体电子证照卡和港澳负面短清单作为政府智能化监管服务新模式入选全国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的“最佳实践案例”。

横琴和澳门紧密度最强，融合度最高的就是消费维权。

每一年，澳门消委会邀请横琴消委会以“神秘顾客”的身份去澳门参与诚信店评审，“神秘顾客”偷偷来到澳门那些参加评比的诚信店里实地考察，然后打分，评审的结果互认。

澳门的诚信店来到横琴，或者横琴的诚信店到澳门都可以享受相关的优惠，折扣共享。

横琴与澳门建立有一套消费维权体系。

2018 年 11 月，澳门消委会收到一宗投诉，一位澳门消费者反映其因购买珠海房产，向中介公司缴纳了 5 万元诚意金，但进一步查勘后，这位顾客对房子不满意，要求公司退还全部诚意金。

根据《跨境消费维权合作协议》，澳门将该投诉件转到横琴处理。横琴消协调查后发现，中介公司销售人员收取澳门消费者的诚意金后，已经离职，却没有将钱款上报和汇入公司账户，而是个人占用。

中介公司协调后，销售人员退回了 2.42 万元给澳门消费者，余下欠款销售人员承诺在一年内分十期支付。

但澳门顾客不同意分期退回。

中介公司认为其没有收取钱款，且已采取了必要手段，故不同意承担余款的退款责任，双方一度僵持不下。

经过横琴消协现场耐心调解和法律宣传，最终双方达成一致：被投诉方同意由公司先行垫付余下未退还的诚意金 2.58 万元，并承诺于 7 个工作日内退还至消费者，再由公司向该员工追讨；而澳门消费者也同意不要求中介公司承担利息费用。

为这事，澳门消费者来来回回折腾了 5 趟。

这件事让横琴工商局陷入思考：怎样消除两地消费维权程序差异，简化消费纠纷处理流程，实现跨境消费维权“零跑动”？怎样消除消费者两地奔波、维权路径不熟的麻烦？

“我们合作建立了跨境视频调解机制。”这个机制入选 2018 年度“广东十大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2018 年 10 月，两地合作建立了跨境视频调解与仲裁机制。澳门和横琴消费者发生跨境消费纠纷后，可直接向所在地消费维权部门投诉，并由澳门和横琴两地的消费维权部门通过跨境视频调解平台，组织纠纷双方进行在线视频调解。内地消费者在澳门发生消费纠纷时，还可以在澳门消委会组织下进行视频仲裁。该机制已成功调解 2 宗跨境消费纠纷，共为澳门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22.58 万元人民币。

“接地气，真正是在为澳门服务。”澳门主流媒体这样评说。

2017 年 8 月，横琴商事登记改革再推“证照分离”，不再强制“证”“照”办理先后顺序，对企业能够自主决策的经营活动，停止、取消审批或改为备案管理。以前企业办“出生证”，需要和“毕业证”“驾驶证”一起办，现在取消前置审批，可以在从事许可经营项目时再去办理。

从最初工商登记改革的“先照后证”，到后来的市场违法经营行为提示清单、免罚清单，再到“证照分离”、压减审批、强化监管，横琴的商事登记改革从未止步……

趋同港澳税收环境是横琴的一张“名片”。

2018 年 7 月 12 日，澳门人陈志豪打开 V-Tax 手机版，缴纳了上个月在横琴工作的个人所得税。他感叹：“在澳门家里点点手机就可以生成个人所得税电子税票，下载到电脑随时可以打印，真是太方便了。”

陈志豪使用的 V-Tax 远程可视自助办税系统，是横琴新区税务部门在全国首创通过实时音视频远程交互，实现跨境、跨省、跨市、跨区办税，打造“全业务、全天候、面对面、类前台”的新型办税服务模式。

这套由横琴税务局自主研发、全国首创的智能系统用得最多的就是港澳人士，这引起各级领导的关注。

2019 年 5 月 1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李希来到横琴税务局，局长黄勇在向李希介绍了 V-Tax 远程可视自助办税系统的功能时，恰巧有一位澳门办税人员在澳门的家里面通过系统向税务部门咨询相关办税的事情。

这位客户通过微信扫二维码，4 万多元税费一下就进了国库。

李希饶有兴致地看完整个过程，问黄勇：“像这样能在网上办的涉税业务有多少项?”

“6 大类 116 多项，这些都是企业日常的涉税业务，全部通过 V-Tax 远程实时办税终端，实施全程网上办理。”黄勇回答道。

“电子申报率能达到多少?”

“98% 以上。”

黄勇还介绍说，广东省电子税务局启用后，横琴把原来 V-Tax 远程可视自助办税系统跟电子税务局合二为一。也就是现在看到的 V-Tax 升级版。目前，除了澳门、香港纳税人，内地企业都可以安坐家中，足不出户就实现和税务人员进行语音和视频交流办税。

打破传统，寻求突破和创新，将办税服务区域延伸至境外，为港澳纳税人提供同城同质的投资便利化服务，这就是“跨境税银智能服务”新模式。

5. 金融桥

濠江之上，穿梭巴士在彩虹般的莲花大桥川流不息。

莲花大桥是一座“回归桥”，1999 年澳门回归时落成启用。迄今为止，这座桥仍然是连接澳门与横琴的唯一大桥。

澳门人尹志华急匆匆走出横琴口岸，闪身跨进一辆穿梭巴士，将双肩包挪到胸前作掏物状。

他掏出一张 IC 卡放在车载 POS 机上，“滴”一声，屏幕显示他完成了车费闪付。

尹志华在横琴粤澳合作产业园工作，之前乘坐穿梭巴士通过莲花大桥，每次都以现金支付乘车费用。

“有时没有零钱就特别不方便。”尹志华好几次因为没有零钱，只好将 20 或 50 元的钞票往里塞，现在穿梭巴士可以用 IC 卡了，琴澳两地金融卡互联互通，超级棒!

尹志华所说的金融 IC 卡是横琴推出的全国首个跨境公交受理金融卡项目，在琴澳两地金融合作中，金融 lC 卡在跨境公交领域的使用极具代表性。

别看这张小小的 IC 卡，那可是粤澳金融支付合作的一项重大突破。

时间回溯到 2014 年 12 月。

在第十八届粤澳金融合作例会上，澳门方面提出，琴澳两地人员往来密切，莲花大桥高峰日均客流量接近 3 万人次，现金购票难以满足快捷支付的需求，亟须整合资源，加快粤澳支付同城化进程。

双方就粤澳两地共同推动在莲花大桥穿梭巴士上装载车载 POS 机具，共同推动莲花大桥穿梭巴士受理金融 IC 卡项目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2016 年 6 月 26 日，莲花大桥穿梭巴士受理金融 IC 卡支付乘车费用项目得以落实，两地居民以及各地通过横琴口岸往来澳门的游客，只要手持一张金融 IC 卡，就可以闪付穿梭巴士的费用。

从此，尹志华再不用为零钱烦恼了。

随着业务的扩大，尹志华的公司申请获批一台黑色粤澳两地牌车，往来琴澳或珠海市区，每天都要“刷”好几次，于是新的烦恼又来了，因为使用的是内地银行卡交纳停车费和通行费，需要到内地充值。

2016 年年底，工商银行横琴分行与澳门工商银行再推“琴澳粤通卡”，车主也可以在澳门充值，不仅便利停车费、通行费缴费，也为两地个人资金跨境使用提供便利。

金融支付、结算的两地制度衔接，让尹志华这个小小的心愿又实现了。

“琴澳粤通卡”看起来只是制张卡而已，区区一件民生小事，但这张卡的背后却是琴澳两地工行卡系统的整合创新，具有标志性意义。

应聘横琴一家澳门企业的杨秋，外派在澳门上班。之前，他在工商银行横琴分行开立了一张“琴澳粤通卡”（信用卡），主要用于在广东境内高速通行缴费和平常在境内项目的消费开支，卡的使用模式为先刷卡透支再还款。因自己是内地居民，按政策要求，他不能从澳门同名账户汇入人民币资金。

让杨秋困扰的是，他在横琴买了房，每月不仅要按时偿还住房贷款，还要寄钱赡养远在四川老家的父母，因此每月需将部分境外收入汇往境内。

此前，杨秋的做法是先汇入澳币，再使用本人及父母额度兑换成人民币，需承担一定的汇兑差价及人民币汇率浮动损益。

2018 年年初，杨秋听说在横琴可以为个人办理其他经常项目人民币跨境收付业务了，他第一时间联系银行咨询相关政策，很快办了张“琴澳粤通卡”，并通过中银澳门网上银行向境内中国银行横琴分行账户发起一笔 10 万人民币的跨境汇款，中午时分即到账。

“太便利了！”杨秋交口称赞。

金融跨境流动和深度融合，资本助力澳门产业多元化，仅仅是横琴澳门金融合作的冰山一角。

横琴，一个最接近“钱”的地方。这并非杜撰或臆造。

香港是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人民币存款超过 1 万亿元；澳门的人民币存款 1200 亿元，每天的资金流动超过 15 亿元。如果能让两地资金加速流动，必将有利于澳门的产业多元化。

钱，不受地域限制，却受法律制约。诸如两种制度、两种司法、两种货币、两种税制……澳门的离岸人民币市场与内地的人民币市场在濠江两岸间流动滞阻。

能不能在这濠江上架道“金融桥”？

金融上的合作是最难啃的“骨头”。而撬动这块“骨头”对横琴助力澳门经济多元化发展的推力有着“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010 年 12 月，跨境金融的需求终于碰到了横琴这块最适合孕育生长的创新土壤——

国务院批复同意了横琴新区金融创新：允许区内金融机构开办外币离岸业务；允许区内企业参加跨境人民币结算；允许筹建或引进信托机构，发行多币种的产业投资基金，开展多币种的土地信托基金（计划）试点；下放部分涉及金融机构和业务准入、货币交易以及外汇市场方面的审批事项和监管权限……

横琴对标世界银行评价体系，迅速出台了《横琴新区关于支持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业的若干措施》，鼓励两地金融机构互设、跨境投融资便利化，推动两地金融市场双向开放，大力支持澳门发展融资租赁业，探索推动建设澳门特色金融产业园，支持两地旅游、消费金融合作，全力支持和配合澳门发展特色金融产业。

政策创新充满诱惑也充满曲折，但横琴一步步艰难跨越。

2011 年，横琴在全国率先启动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机构刷卡兑换业务，珠海欧亚通汇货币兑换有限公司等 3 家企业获得个人本外币兑换特许业务经营资格。

2013 年 9 月 25 日，横琴见证了中国金融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中国银联携手中国银行、中国光大银行、广发银行等多家银行，在珠海横琴首发包括港币、澳币在内的首张银联多币卡。

这在全国均属首创。

从广西来横琴往澳门旅行的游客陈小姐发现，横琴的外币兑换店不仅能用现金兑换外币，还可以持银联卡刷卡兑换外币。“好方便!”没有带现金出门习惯的陈小姐连连称赞。

银联多币卡是针对横琴新区等跨境合作平台所推出的金融创新支付产品，粤澳首次实现多币种同城支付，同时构建了横琴新区银行机构直接加入澳门同城清算系统。持卡人能在港澳地区及境外直接使用美元、澳门元等外币账户结算。

一招鲜，招招鲜。

跨境转让、跨境并购、跨境租赁、跨境直贷、跨境按揭等跨境金融业务频频冲破“红线”，基金产品、保险服务市场互联互通相继取得新突破，不断摸索实践的横琴跨境金融合作成为一道赏心悦目的“私房菜”。

横琴“金融岛”，内河水波澹澹。

海琴、海韵、海鸣、海贝、海翼 5 座桥梁舒展双翼，飞架于“金融岛”上，流水的澎湃赋予它们生命的力量。

对面，是澳门高达 338 米的旅游塔和清晰可见的葡京娱乐场，它们外观奇特，近在咫尺，仿佛触手可及。

在这个 1 平方公里的财富岛上，横琴国际金融中心大厦（IFC）、南方金融传媒大厦、中大金融大厦、中交南方金融投资大厦、横琴金融谷、新三联现代金融创新基地广场、横琴国金金融租赁大厦、横琴国际交易广场……共有十几个项目干得热火朝天。

与金融岛毗邻的是金融街，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新颖别致的两层办公楼，整整齐齐就像列队的士兵：工行、农行、中行、建行、华润银行……不同的“LOGO”就像不同士兵的闪闪帽徽。

然而，2014 年 1 月，横琴岛破天荒来了个“澳门兵”。

24 日上午，澳门国际银行正式设立横琴代表处。这是 2012 年 7 月《内地与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框架下第一家进驻内地的澳资银行。

澳门国际银行横琴“试水”，澳门大西洋银行则捷足先登。

2017 年 1 月 18 日上午，大西洋银行横琴分行在横琴总部大厦举行开业典礼并随即开展人民币业务。这是第一间受惠于 CEPA 及其框架下的《粤澳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而进驻中国内地的澳门本土银行，填补了澳门金融机构筹建内地分行的空白。

金融机构政策一旦“破冰”，粤港澳金融合作驶上“快车道”：港资东亚银行、创兴银行、工银国际、KKR（亚洲）、六福金融接踵而至……

到 2018 年年底，横琴注册的港澳金融企业达 133 家，其中港资金融企业 109 家，注册资金 501.26 亿元；澳资金融类企业 24 家，注册资本 115.27 亿元。

2018 年 10 月 17 日，澳门特色金融服务基地筹备办公室在横琴揭牌，为澳门发展特色金融提供人才、场所、技术支持和提供全方位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

澳门金融业开拓内地市场的综合能力扶摇直上……

横琴新区管委会主任杨川告诉我：“新区设



2009年建设中的横琴岛澳门大学新校区



2017年横琴岛澳门大学新貌

立以来，横琴承担着探索金融改革、先行先试的任务。国务院以及‘一行三会’等金融监管部门对横琴相继发布了 29 项金融创新政策。”

他举了两个例子——

2011 年 7 月，国务院《关于横琴开发政策有关批复》明确将金融业作为横琴七大产业发展方向之一。

2012 年 3 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横琴开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支持横琴开展金融创新，包括支持粤港澳三地在横琴共建金融创新实验区，在金融机构准入、金融市场、金融业务、金融产品、金融监管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等 7 项内容。

横琴砥砺前行，多么需要理念和决策的智慧之光。只要政策对路、观念改变，横琴什么干不成、干不好呢?

横琴正是立足于国家战略定位，奋起直追，从跨境金融服务、总部金融运营、区域要素交易和服务、财富管理、创业创新金融服务等“五大重点”同步发力。

私募投资基金、融资租赁、商业保理、互联网金融、互联网小贷、融资性担保等一系列扶持政策陆续出台。

各类金融要素快速集聚。

如今，在传统金融机构中，经省政府、“一行三会”批准设立的持牌金融机构达 96 家，其中银行 24 家、证券期货 12 家、保险机构 36 家。

6. 大通关

2016 年 12 月 20 日。上午 11 时，澳门单牌车入出横琴的启动仪式就在口岸车辆入境通道举行。

9 辆澳门单牌车呈“一”字形排开，打头的是一辆黑色奔驰 S400，澳门车主麦建华根据车道上方的提示标志缓缓驶入规定通道，将车暂停在进境车道的闸杆前方，然后主动打开车尾厢和车窗玻璃接受口岸查验人员候检。

11 点 18 分，随着澳门特别行政区保安司和珠海市政府领导为澳门机动车进入横琴启动金钥匙，口岸通行的提示灯变绿，闸杆迅速抬起，麦建华驾驶车辆冲开红丝带，驶出车道，进入横琴。

其他车辆依次缓缓驶入横琴。

车开出入境通道后，喝“头啖汤”的麦建华打开车门，手拿着崭新的黄色司机簿让各路媒体



澳门看横琴口岸综合服务区

记者“咔嚓咔嚓”拍照。

“像我这样同时在澳门和横琴有工作有物业的澳门人不少。实施澳门单牌车政策后，我们驾驶自己的澳门车辆往来横琴方便多了。”麦建华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每个工作日，麦建华自驾车直接从澳门家里开到横琴的办公室，平时从澳门过关到横琴公司至少花费40分钟，现在10分钟就可到达办公室了。

在澳门，单牌车入出横琴政策在澳门坊间的“朋友圈”里广泛转发，十分火爆，拥有“粉丝”众多。

其实，这项惠澳政策得从2016年10月说起。

澳门海关的助理关长吴国庆详细解释了这一政策。他说，车辆放行实行总量控制，要合乎三方约定的条件。第一批100辆，要求在横琴注册设立至少一家独立法人公司，在横琴纳税额达前100名，要承诺5年内不迁出横琴；还有就是取得横琴新区土地的澳门公司及其法人等条件。第二批才将在横琴新区工作、购置房地产以及人才引进的澳门居民纳入可申请范围。第二阶段增加到800辆，第三阶段配额将新增到1700辆，总量达到2500辆。每台车最多可申请2个备案驾驶人。澳门海关与横琴海关分别在莲花口岸与横琴口岸启动了“粤澳两地牌小客车检查结果参考互认”新模式。目前，通关耗时缩短30%左右。

横琴口岸，是国家批准的客货运综合性口岸，也是横琴与澳门之间唯一的陆路通道。在《横琴总体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到将横琴建设成为联通港澳的“开放岛”。

但凡澳门回归纪念日，在横琴口岸总有些“大动作”。

2014年澳门回归15年，横琴口岸24小时通关，我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就在现场。

12月18日凌晨时分，旅检大厅内熙熙攘攘，灯火通明，不少澳门居民听到消息后特意赶来过关，人们都在等待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随着零点的钟声逼近，大厅内的气氛骤然升温，港澳记者们纷纷举起“长枪短炮”，聚焦在旅检入境通道——人群正簇拥着澳门第一位入境的旅客曾文惠。横琴边检站的两位“警花”走上前去，齐刷刷立正敬礼，然后微笑着向她送上一束祝福的鲜花。

“太激动了!”曾文惠说，“没想到自己能成为24小时通关后第一个入境的旅客，口岸实行新的通关安排，再不用赶时间过关了。”

也就是从这一天起，横琴口岸向澳门开启了永不关闭的大门。

冯国增是土生土长的澳门人，现任大西洋银行横琴分行行长。每个工作日，他都准时出现在横琴，两地顺畅的交通衔接以及便利的口岸通关过境，加上横琴务实的政务环境，丝毫没有让他这个“外来者”感到不适应。

作为往来澳门和珠海横琴的“常客”，冯国增说，下班后自己回到了澳门市区的家里“饮茶”，而珠海的同事还堵在上下班高峰期的横琴大桥上。24小时通关后，从横琴回到澳门，比从横琴回到珠海市区更快，到澳门市区也就半小时。

在冯国增看来，毗邻澳门的横琴确实能够成为澳门经济多元发展的有效补充。单从通关而言，无缝连接为澳门人解决了“最后一公里”。

与24小时通关同步实施的，是启用了自助通关通道。这个自助通关是采用生物识别技术来取代传统人工验放的口岸智能化应用。即通过将持有人的生物特征与证件存储备案信息进行比对，直接完成身份识别及证件查验，最快不用10秒即可完成过关，可大大提高了通关效率。

岁月的年轮总是平静地转过似水流年，时光匆匆，岁月无痕，眨眼间10年逝去。

横琴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以不忘初心的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服务“一国两制”伟大实践，着力推动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着力拓宽产业空间、发展空间、生活空间。

传统技艺与时尚演绎

创作 郭丹

在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的领域里深耕细作，传承不是单纯地复制和对传统技艺临摹者的培养，而是对符合传统技艺本质的不断更新和重建，只有这样才能使传统技艺更好地进入当代并与当代产生积极互动，保持长久的生命力，才能让这些瑰丽的记忆永远鲜活、生动。其更有价值之处在于在如何传承与创新传统优秀文化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如果能充分唤起年轻一代的文化自觉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其实不必那么大张旗鼓轰轰烈烈，便可以在润物细无声中更有效率地进行了。



作者简介

郭丹，副教授，高级工艺环境艺术师，广东文艺职业学院产品设计专业主任，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硕士，广州居易文化艺术创始人，中国国际城市雕塑艺术委员会常务理事，中国建筑学会会员，广东省陈设艺术协会理事，广东省青年文艺家联合会委员。

擅长传统技艺与时尚陈设产品设计，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多次获得专利和近百项奖项。作品《Bloom in Joy》受邀参加米兰世博会，《山水间》《叠山》等作品受邀参加法国意大利东方色巡展。





《叠山》作品设计说明

以山为元素，纯金为线，山形随着机械运动，有叠叠山峦的效果，伴随着美妙的音乐，极有治愈感。

《京华》作品设计说明

“京”为“晶”，既为“京城”之意又为“晶莹剔透”之意；“华”华夏之意，有“繁荣”的意思又通“花”——香港区花为紫荆花，用花瓣组成龙的造型，金色与空间主色调相呼应同时代表贵气。寓意华夏银行业务蒸蒸日上，用琉璃的剔透感表示银行开放及透明性，值得信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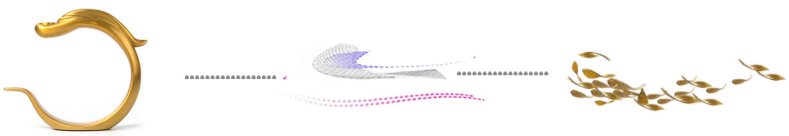
《京华》工艺说明

金色纯手工烧制琉璃花瓣。

《京华》设计思路



紫荆花造型提取　　琉璃烧制的紫荆花造型



华夏银行标志的提取　　华夏龙标志的变形　　华夏龙标志的变形



效果图设计













《森林之路》作品设计说明

当你在城市中，不再去仰视林立的高楼，而是贴切地接近这树枝、花朵。把森林搬到城市、搬到家中，希望人们在此体会到未曾体会过的森林中的所有一切，工艺及材料上用中国传统工艺漆与木结合，完美呈现。



使用材料

木、漆、蛋壳、有机玻璃。







《山水间》作品设计说明

以山水为元素的茶具，正面为杯子，倒扣为山的概念。用具体的形体、抽象的意境来表达这套作品，底盘为纯手工雕刻的水纹。用景德镇的青白瓷烧制，山体线条以国画的用笔为灵感保留块面感，柔中带刚。



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建设的一个关键，是要注重人文价值链的发掘、融合和利用。而人文价值链，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非常突出而独特的底色，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所不具备或者不是很突出的元素。历史、族群、语言和文化的同一性，说明了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非常丰富而集中突出的人文价值链，而这，正使得这个大湾区的交融与合作具备了最大公约数的核心和灵魂。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孙中山文化”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和纽带，是旗帜和品牌。我们要以孙中山文化为重要载体和媒介，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当然，“孙中山文化”还必须结合珠江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近代文化，以及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新旧时期的移民文化来开展交流与合作。

独家策划
EXCLUSIVE FEATURE

时代湾区

策划 《华夏》编辑部



广东省侨联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文 《华夏》记者 林辅毫

2019年，广东省侨联制定了《广东省侨联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旨在汇聚全省侨联系统力量，提高侨联组织助力推进大湾区建设的工作能力和服务能力，彰显“湾区所需、侨联所能”，在凝聚侨界力量、助力大湾区建设中体现侨联新担当、新作为。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重要论述及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实施意见》《广东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结合全省侨联系统实际和新时代对侨联组织建功立业的新要求，特制定本行动计划。

一、充分发挥服务经济发展的作用，助力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1. 打造全省侨联系统“侨创南粤”经济科技工作品牌。打造全



省侨界高水平科技创新载体和平台，服务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展“侨创南粤”创新创业主题活动，成立“南粤侨创会”，吸收更多在粤特别是在深圳创业创新人才加入，建立全省侨界创新创业要素对接的常规性活动载体。从2019年开始，每两年举办一届“广东省侨界创新创业成果交流与项目对接大会”，三年内拟推进在大湾区9市共建30个新侨创新创业基地。

2. 开展海内外“华商南粤行”活动。围绕省委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纲举目张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的要求，聚焦省委“1+1+9”工作部署，助力构建“一核一带一区”区域发展格局。从2019年开始，每年开展“华商南粤行”活动，三年内有针对性地组织1000名海内外华商和省内侨资侨属企业到全省各地开展投资和商贸合作考察活动。逐步加大对深圳“华侨华人产业交易会”的支持力度。

3. 开展青年华商企业家研习活动。积极推动海外华侨华人高精尖缺人才和项目落户大湾区，对回国（来华）创新创业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和在粤侨资企业加强联系引导，服务他们扎根大湾区。从2019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期“侨创南粤”青年华商研修班，每期50名学员，三年内邀请150名杰出青年华商参与研讨研习。

二、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助力打造“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区

4. 团结引导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投身“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充分发挥广东华侨华人众多和侨界人才荟萃、联系广泛、融通中外等独特优势，拓展对海外侨团和港澳侨界社团的联谊，加强对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思想政治引领，凝聚广泛人脉关系，采取多种方式向他们广泛宣传介绍大湾区，引导他们关心支持、积极参与大湾区建设。紧密对接省委省政府深度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部署，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侨界的交流合作，引导海外侨胞参与和支持广东省有关海外合作项目，助推广东文化、企业和产品“走出去”。

5. 搭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

澳门城市风光



区建设交流合作平台。依托广东侨务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支持建设侨界智力、资金、技术等要素的整合平台载体，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货物、资金、技术、信息等资源要素的流动，助力大湾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宜居宜业宜游优质生活圈。不断推进海内外华商组织协作网络和合作机制建设，每年组织策划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主题的经贸交流活动。

6. 打造全省侨联系统“情系南粤”联谊联络工作品牌。深化与港澳侨界社团和海外侨团联系，着力深交社团骨干人士。继续办好面向海外和港澳侨界社团负责人的“情系南粤·海外社团骨干研讨班”和面向侨青的“情系南粤·港澳及海外青年侨领研习班”，每期30~40名学员，三年内邀请200名海外和港澳侨界社团负责人及中青年骨干参与研讨研习。每年承办中国侨联海外联谊工作品牌项目，开展“海外侨胞故乡行·情系南粤”活动，三年内邀请300名海外侨领和港澳同胞参加。

7. 继续大力推动支持有关涉侨平台活动。推动筹办好2020年10月在英国举办的“第十届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支持参与2019年、2021年举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等活动，邀请港澳侨界社团组团出席以上大会，推动各大会举办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相关活动。

8. 多渠道涵养侨联工作人脉资源。围绕广东省开放合作部署，坚持“请进来、走出去”，拓展“一带一路”、欧美发达国家、太平洋岛国、新兴市场等重点地区工作，加强与“三新四有”人士联谊联络。2019年，利用广东省侨联换届机会，调整优化广东省侨联海外顾问、海外委员结构和网络。重视和加强广东省侨联港澳顾问、港澳委员队伍建设，着重培养年轻一代。每年分别在香港、澳门召开一场广东省侨联港澳地区顾问委员座谈会。

三、充分发挥弘扬中华文化的作用，助力共建人文湾区

9. 打造全省侨联系统“风韵南粤”文化交流工作品牌。继续锻造传统品牌，每两年（单数年）举办一届“风韵南粤”（广州）华人文化艺术节，每两年（双数年）举办一届“风韵南粤”中山侨界群众文化节，联合东莞市政府举办“风韵南粤”海峡两岸暨港澳客家山歌（东莞·凤岗）邀请赛，支持深圳举办世界性涉侨文化活动，邀请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参加，丰富大湾区侨界群众文化生活。

主动对接中国侨联，每年配合做好“亲情中华·风韵南粤”艺术团赴港澳开展慰问演出，促进粤港澳三地侨心相连、民心相通。每年举办“亲情中华·风韵南粤”走侨乡文艺演出，邀请海外侨胞和港澳同胞观看。从2019年开始，每年承接“亲情中华·风韵南粤”海外华裔青少年中华文化夏（冬）令营，邀请港澳侨界社团组织港澳青少年（每年300名、三年共900名）来粤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进港澳青少年中华文化认同感和家国情怀，扩大粤港澳侨界青年交流融合，共同塑造和丰富大湾区人文精神内涵。

10. 支持指导侨界文化交流基地、文化社团开展大湾区文化交流活动。指导支持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广东省侨界文化交流基地和广东华侨历史学会、广东省侨界作家联合会等侨界文化社团开展大湾区侨界文化交流活动，促进粤港澳三地侨界的文化交流合作。

四、充分发挥参与社会建设的作用，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

11. 引导侨界为大湾区建设建言献策。围绕发挥侨力推进大湾区建设，进一步发挥侨界智库

作用，加强侨情专报工作。加强海外有关侨情舆情收集，及时收集反映海外侨胞、港澳同胞对大湾区建设的积极反响和建设性意见。特别是推动侨联港澳顾问委员为大湾区建设和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言献策。从 2019 年开始，每年分批组织全省侨界专家学者和侨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开展专题调研，为有关工作决策提供参考。

12. 依法维护大湾区侨界权益。推进大湾区内涉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发挥好侨联法顾委作用，推动侨联法律服务创新发展，做好涉侨涉诉案件协调处理工作。从 2019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期“依法维侨·法治沙龙”活动，宣传维护侨益法律法规，为大湾区侨资企业、侨界社团及侨界群众排忧解难。

13. 打造全省侨联系统“侨爱南粤”公益慈善工作品牌。推动支持粤港澳侨界民生领域合作，深化“侨爱心”工程，实施助侨惠侨行动，关注大湾区内归侨侨眷养老、医疗、子女教育等需求，增进大湾区侨界群众福祉。做强做大广东侨界仁爱基金会，增强其服务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可行性措施。

14. 建立大湾区 9 市侨联与港澳侨界社团合作新机制。积极探索适应大湾区建设的侨联（社团）工作方法，建立与港澳侨界社团协同推动大湾区建设的工作机制。推进落实与省工商联、香港中华总商会、澳门中华总商会等共同签署的《粤港澳工商团体携手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广东省侨联与粤港澳三地工商界联动合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推进落实广东侨界青年联合会（广东省侨联青年委员会）、香港侨界社团联会青年委员会和澳门侨界青年协会共同签署的《粤港澳大湾区侨界青年携手共建大湾区倡议》，团结引领粤港澳侨界青年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指导支持广州市侨联举办“创业中华·粤港澳大湾区侨界组织行动研讨会”，推进落实由大湾区 9 市侨联和香港侨界社团联会、澳门归侨总会共同签署的粤港澳大湾区侨界组织行动《倡议书》，加强与港澳侨界社团的沟通联络和信息共享工作。继续支持港澳侨界社团在粤开展相关活动，鼓励支持港澳青年来粤寻根问祖、创新创业，让港澳同胞特别是青年在粤更好地学习、就业和生活，更充分地融入大湾区的建设中来，助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15. 充分发挥省侨联与大湾区 9 市侨联上下联动的工作效能。每年定期组织对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9 市侨联工作关于助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深度调研，确定工作重点，围绕打造全省侨界“情系南粤”“侨创南粤”“风韵南粤”“侨爱南粤”工作品牌，定期策划研定省侨联与大湾区 9 市侨联助力大湾区融合发展的合作项目，形成更大合力，推进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服务大湾区建设。

16. 抓好侨联党建工作为助力大湾区建设提供组织保障。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国家战略。省侨联要当好侨界的“旗舰”引领，全省各级侨联组织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树牢“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把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践行“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把政治建设贯穿到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全过程。加强对侨联系统的基层党建培训，从 2019 年至 2021 年，每年在大湾区 9 市举办一期全省侨联系统基层党组织书记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基层侨联特别是大湾区 9 市侨联服务粤港湾大湾区建设的精气神，更好地团结动员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为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推进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建设，为广东实现“四个走在全国前列”、当好“两个重要窗口”做出侨界新的更大贡献。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价值链

文 丘树宏

粤港澳大湾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2019 年 2 月 18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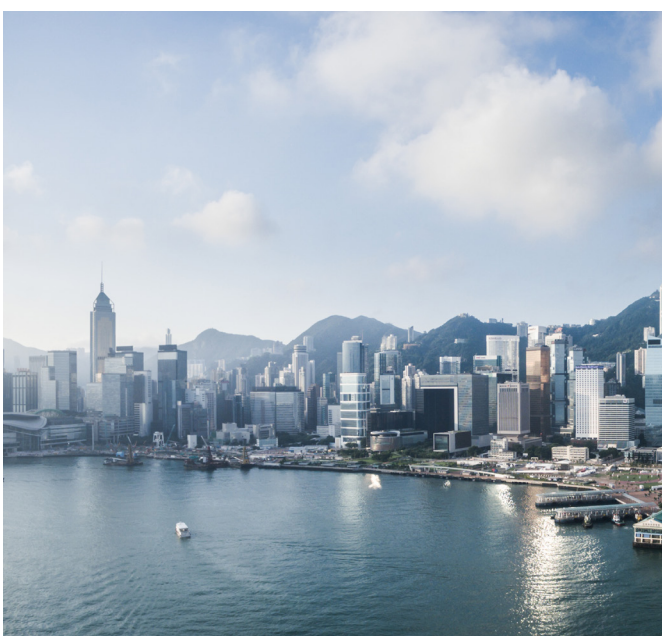
粤港澳大湾区指的是由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肇庆 9 市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形成的城市群。

粤港澳大湾区战略的提出，应该说是包括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城市融合发展的升级版，从过去三十多年前店后厂的经贸格局，升级成为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有机融合最重要的示范区；从区域经济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这为粤港澳城市群未来的发展带来了新机遇，也赋予了新使命。

湾区，从地理概念上看，是由一个海湾或相连的若干个海湾、港湾、邻近岛屿共同组成的区域。总结一下湾区的共同点不难发现，当今世界，发展条件最好的、竞争力最强的城市群，都集中在沿海湾区。比如，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是世界公认的知名三大湾区。可以说，湾区已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引领技术变革的领头羊，由此衍生出的经济效应称之为“湾区经济”。

粤港澳大湾区的提出，当然首先是从地理位置上来考虑的，其发展的核心，无疑是经济建设，比如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利益共享产业价值链的培育，金融核心圈的共建，全球创新高地的打造，大湾区优质生活圈的营造，全域旅游产业的建设，“一带一路”开放新格局的构建，等等。

就经济建设和发展来说，自从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的提出，尤其是“《纲要》”发布之后，各界已经阐述得非常充分。然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还有一个核心元素，同样值得各方面的关注和重视。这就是“纲要”中提出的“共建人文湾区”，这是湾区建设最高、最核心的层面。人文湾区建设的目标，是共建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现代开放创新型湾区新文明。在笔者看来，粤港澳大湾区人文建设的一个关键是要注重人文价值链的发掘、融合和利用。而人文价值链，恰恰



是粤港澳大湾区非常突出而独特的东西，是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所不具备或者不是很突出的独特的元素。粤港澳大湾区有着非常丰富而集中突出的人文价值链，而这正使得这个大湾区的交融与合作具备了最大公约数的核心和灵魂。

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文价值链，大概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历史的同一性。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自古同属于百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岭南之后，又基本同属于南海郡范畴。两千多年来，虽然政制不断变化，但是 11 个城市的人文历史总是维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其次是族群的同一性。粤港澳地区，尤其是广东地区，历史上主要由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个族群组成。大湾区 11 个城市，虽然也有一定数量的客家人和潮汕人的族群，改革开放后在一些城市特别是深圳等几个城市外来人口超过了本土人口，但绝大多数城市都是以广府人为主体。

第三是语言的同一性。与人口的同一性一致，广州话是 11 个城市共同的话语体系，即使外来人口占多数的城市，除深圳外，广州话的地位也依然处于核心地位。

第四是文化的同一性。11 个城市，除了香港和澳门渗入了殖民文化外，岭南文化和珠江文化一直占统治地位。

因为以上因素，《纲要》出台之前，11 个城市的交流合作，尤其是人文的交融，其实就一直伴随着时间和历史的进程，而以各种方式在各个空间紧密进行着。今后，这种人文元素将是粤港澳大湾区交流合作最重要的无形力量，是最高的竞争力，我们必须十分重视发掘总结，需要十分智慧地开发利用。

必须提醒和强调的是，在所有这些人文的渊源之中，还蕴含着一个奇迹性的现象，那就是一代伟人孙中山先生。11 个城市，无不与孙中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无不深深烙上了孙中山的印记。这是包括东京湾区、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甚至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城市群所没有的一个



香港维多利亚港



作者简介

丘树宏，中山市政协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2003 年，凭抗击非典诗歌《以生命的名义》在央视播出造成广泛影响走进诗坛。出版诗集 10 部、人文社科著作 8 部，曾获《诗刊》诗歌金奖、《人民文学》创作赛金奖、郭沫若诗歌奖、广东省“五个一工程”奖和鲁迅文学艺术奖等。近年来转向长诗、史诗和大型舞台节目文学台本创作，大型交响组歌《孙中山》在海内外巡演和央视中播放；《南越王赵佗》《咸水歌》等大型舞台作品是对岭南人文的挖掘、传统文化的创新。

空前绝后的奇迹。正因为如此，“《纲要》”中明确提出“支持中山深度挖掘和弘扬孙中山文化资源”，在整篇“《纲要》”中，唯一提到的人名，那就是孙中山先生。

中山，是孙中山的出生地，是他的故乡；澳门，是孙中山从学校走进社会从医的地方；香港，是孙中山赴夏威夷、早年求学和革命的根据地；广州，是孙中山革命的圣地；东莞曾经是孙中山家族的祖居地；珠海在孙中山时代同属香山县，与孙中山的关系极深；孙中山曾三次莅临肇庆谋划革命；深圳、佛山、江门，都有许多华侨华人追随孙中山革命。11 个城市都有着众多的孙中山文化遗存。

另外，孙中山早于 1919 年就在其《实业计划》中提出空前宏伟的建设蓝图，其中第三计划就是建设一个世界大港。近 100 年前，孙中山就已经注意到珠江口地区具备的港区优势，并将其视为国际发展计划的重要拼图。在《实业计划》之第三计划中，孙中山开篇就阐明广州是此“世界大港”的中心。“吾以此都会为中心，制定第三计划如下：（一）改良广州为一世界港。（二）改良广州水路系统。（三）建设中国西南铁路系统。（四）建设沿海商埠及渔业港。（五）创立造船厂。”在孙中山的构想中，这个“世界大港”应当涵盖广州、香港、澳门，并同时联动珠江沿岸诸多城市。这个“世界大港”涵盖当时的广州、香港、澳门、东莞、佛山、三水、大良、香山、小榄、江门、新会诸地。只是，相比如今粤港澳大湾区“9+2”的城市格局，当时珠江西岸城市远比东岸密集和发达。

由于各种缘故，孙中山没能在有生之年实现他的构想，100 年后，这个伟大的梦想正在付诸实施。

2016 年 11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孙中山先生 150 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说：“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这样一个伟大人物与粤港澳大湾区有着这样特殊而深厚的关系，注定了孙中山是这个大湾区的人文核心和灵魂所在。毛主席曾经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份珍贵的遗产。”习近平总书记也这样说过：“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这说明，孙中山既是一代伟人，同时也是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代表，他的思想和精神是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遗产。

2007 年，中山市曾经提出了“孙中山文化”的概念，其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孙中山的思想、主义，他的精神与品格；第二方面是指这些思想、主义、精神与品格背后的文化元素；第三方面，“孙中山文化”更少不了孙中山本人作为文化人、演讲家，乃至诗人、书法家的文化背景。孙中山，是中华优秀文化最重要的代表和遗产。毛泽东、习近平在谈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候，都用“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总结、继承这样的表述，这说明孔子文化、孙中山文化都是中华文明最核心的代表。

孙中山是中国 20 世纪三大伟人之一，他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他最早规划了中国的铁路和港口，他的《建国方略》对中国各方面建设都进行了规划和设计，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先驱；他是全世界与“一带一路”关系最密切的伟人；他第一个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正是“中国梦”最早的雏形。最重要的是，孙中山文化的特质，除了有着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又吸收了世界先进文明，是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相融合的“咸淡水文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特质高度吻合、高度一致。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理念：“孙中山文化”应该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桥梁和纽带，是旗帜和品牌。我们要以孙中山文化为重要载体和媒介，配合“一带一路”倡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全方位的文化交流与合作。当然，“孙中山文化”还必须结合珠江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近代文化，以及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和新旧时期的移民文化来开展交流与合作。

第一，由广东省政府牵头，联合港澳地区建立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在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领导小组或省宣传文化部门设立文化交流合作专项小组，并建立 11 个城市文化交流合作专项联席会议制度。

第二，在孙中山家乡中山市成立粤港澳大湾区孙中山文化交流中心，负责大湾区孙中山文化交流的联络协调，并引申到所有的人文交流工作。

第三，11 个城市各自相应成立专责小组与当地名人文化交流机构，专门负责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事项，包括结合当地人文与孙中山文化交流中心相呼应、相连接。

第四，全方位开展大湾区文化交流合作，包括以孙中山文化为重要载体和媒介，配合“一带一路”倡议，开展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第五，大湾区及其各城市结合珠江文化、岭南文化、海洋文化，华侨文化、近代文化，以及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以及新旧时代的移民文化，全方位开展交流与合作。

第六，积极争取将孙中山文化上升为国家命题和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支持和推进以孙中山文化为重要媒介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之间，乃至大湾区与全世界的文化交流与合作。

第七，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交流合作，应该包括官方的和民间的、行政协调的和市场运作的，充分发动社会各界力量一同组织和参与。

总之，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和各项工作安排中，我们要将文化交流和合作列入重要的规划之中，要将“孙中山文化”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品牌来安排部署，并将它作为 11 个城市共同的人文价值链，作为利益追求最大的公约数，打造成最具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从而推进和保障大湾区战略的全面实施，提升大湾区发展的战略地位和意义，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应有的贡献。

区域文学的共时呈现

文 蒋述卓 龙扬志

编辑这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丛书”的动念，可追溯到2016年5月在暨南大学召开的“粤港澳青年文学研讨会”，与会作家、学者围绕粤港澳文学交流与发展主题展开对话，从文化视角思考区域文学的共同维度，启用了“大湾区文学”这个有意味的表述。“大湾区”为粤港澳文学在新时代语境下进一步探索积极互动提供了新的契机，如果建立一种类似文学丛书的展示机制，或许可以呈现此时此地的湾区生活与文学境况。从文化区的角度重新理解粤港澳文学的共同属性与多元景观，对文学创作与研究或许会起到意料不到的刺激作用。

虽然美国人类学家奥蒂斯·梅森在1895年使用“文化区”这一术语以确认不同类型的美洲印第安环境，但是有关“文化区”的认知与讨论主要在20世纪展开。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认为文化区的理想情况呈同心、圆形分布，但在实际运行中，逐渐形成以地域特征为主导的文化中心与边缘区域。20世纪60年代中期，米尼格将基督复兴教徒按数量分布划分核心带、主权带、领域带、外围带，进一步发展出文化区空间结构的模型。“文化区”成为人文地理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通常用来描述文化的历史区域分布和动态发展，由此也可以大致看出，文化区首先是一个基于地缘因素形成的文化空间，其中既有主导文化，也有构成文化多样性的文化元素，各文化元素之间互相交流、融合，不断生长，形成更大的文化圈。共同的语言体系与生活习惯，则是促成文化区的前提条件。

粤港澳作为以岭南文化主导的文化区，其文化特征受中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影响。众所周知，岭南文化是一种面向自然生活、日常感性的原生型文化，同时又拥有多民族迁徙中形成的宽厚包容的品格；因为有近海之便，相对于与建立在传统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中原文化更具开放灵活性，在眺望、体验、参与世界文明的过程中形成了开拓进取的探索精神；此外，岭南地区远离政治文化中心，慢慢发展出一套以市民社会和日常生活为价值主导的世俗文化。

因为同根同源的文化基因和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粤港澳拥有共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记忆，又在各自不一样的政治文化空间中吸纳外来文化元素，分别形成各具主体性的文化风格，并彼此参照和影响。如果说所有充满活力的文化具有某种共同的品质，首要提及的无疑是吸纳他者文化的能力，反过来也同样如此，越是具有吸纳异质元素补充自我的文化，越是充满生命的强力，越能在诸种文化的竞争中长盛不衰。威斯勒说：“正是文化的积累特性及其明显的顽强生命力才需要迅速地移植和传播，或用一个更好的术语说，就是对启示的敏感性。”传统意义上的岭南文化以广州为中心，自19世纪中期香港开埠以降，岭南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发展为风味独特的都市文化，这种不同于上海、北京、台北的“港味”文化又在粤港澳交流互动中不断溢出本土界域，成为标志时尚的文化潮流。

正如所有异质文化进入传统认知领域时必然遭遇误解一样，自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香港就被个别内地文人称为“文化沙漠”，又在后续的他者叙述中延伸到整个岭南地区，并一度成为粤港澳确证文化主体性的焦虑来源。如果说域外他者的言说姿态植根于某种“正统”的文化结构，显然忽视了文化对于现实的积极参与功能。正如香港资深报人、文化学者罗孚所说，香港衣食住行的文化相当丰富，出版自由，资讯发达，影视艺术空前繁荣，这些来自“文化沙漠”的文化产品，你尽可以说它是“次文化”，却不能说它是“非文化”。

尽管港澳新文学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省港、省澳的结构化现象，但并非某种单一化的主导 / 依附模式。例如，由港澳台与内地（大陆）建构的中国新文学版图，在长期以来的历史叙述中，澳门文学通常被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然而随着文学史研究的深入，有学者从西学东渐、中西交汇的源头梳理，提出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应从澳门讲起：“中国的近代化和中国文学的近代化，中国被动地向西方开放的近代史，在某种程度上应该从澳门说起。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记忆，澳门文学无论多简陋、粗糙，都将这样的历史以生动的形态记录下来，以丰满的精神状态得以保鲜。包括早期诗僧结社及其相应的创作，包括清代一些隐居澳门的官员感时忧世之作，澳门文学最早传达出近代化的强烈信息，为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注入了最初的活力与资源。”事实上，在中国走向世界尤其是近代以来开启的现代化进程中，粤港澳就扮演过不同寻常的先导与



作者简介

蒋述卓，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级教学名师，广东省优秀社会科学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文艺评论（暨南大学）基地主任。出版有《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佛教与中国古典文艺美学》《在文化的观照下》《跨学科视域中的比较文学》等学术专著，发表学术论文及文艺批评文章 200 余篇。

作者简介

龙扬志，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台港澳文学、世界华文文学、比较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 90 余篇，出版编著文集多种。



中介作用，然而在强调中国内部生产力 / 生产关系冲突与变革的历史叙述结构中，外来的影响已被明显削弱，或者只将其视为装饰宏大历史的一段小插曲。我们固然承认历史的车轮由强大的集体力量所推动，却也不能忽略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因素对历史产生的刺激与启迪。

正如梁启超所述，岭南地区背岭面海、连接中原的地理格局便于交通海外，“故其人颇有独立之想，有进取之志；两面濒海，为五洲交通孔道，故稍习于外事”。因地理之便，西方文化得以继续不断输入，“粤人遂为这种新文化的先锋队，广东成为新文化的策源地”。尽管一个区域的文学往往由伟大的作品来表征，然而阐发、引领时代风气的开创价值，经常需要借助政治、经济、文化诸因素的激发，而文学观念的变革又会加速社会的发展。于是，我们看到了近代以来在岭南地区有“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的爆发，有“二高一陈”的“岭南画派”的兴起，有“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的探索，更有中国现代电影创始人蔡楚生、司徒慧敏、黎民伟的三足鼎立，等等。

以近代印刷术和出版业的兴起为例，澳门、香港、广州之所以扮演极为关键的作用，跟三地开放、相互毗邻密切相关。1815 年至 1830 年期间，传教士马礼逊在澳门、香港、广州尝试以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书籍，在澳门成立“马家英式印刷所”，后又将石印机搬移到广州十三行，逐渐开启中国出版的现代之门。伍廷芳筹办的《中外新闻》于 1858 年创刊，中国迈入自主创办中文报纸的历史新阶段，现代报刊的兴起成为中国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环节。维新派先驱王韬与麦都思创办的墨海书馆结缘（1848），他在从事编校工作期间结识了一大批传教士，对西式印刷有深切了解，这二者对于王韬后来投身出版产生了巨大影响。游历欧洲之后回到香港，王韬集资购买英华书院印刷设备，成立中华印务总局



活字印刷术

（1873），次年创办《循环日报》。王韬打造传播现代思想的媒体平台，目的在于“发幽光于潜德，开悔悟于愚民”，而体现他国际化视野的政论文章大半在《循环日报》发表，自由畅达、直抒胸臆、不拘一格的文风奠定其在近代散文史的地位，其标举文学革新的主张对黄遵宪、梁启超等形成直接的启示。突飞猛进的报刊业有力地促进了香港文化的繁荣，据统计，从 1864 年《华字日报》创刊到 1934 年的 70 年里，香港停办的报纸有 58 家，存续的 11 家，报纸副刊与杂志对文学作品的大量需求，为粤港澳培养出一大批作家，也建构了一个基于现代媒体的文学生产、传播与接受的都市文化空间。

可见，粤港澳凭借得天独厚的舆地条件，在社会文化与文学发展方面发挥着一种独特的整体性作用。一直到 20 世纪上半叶，受惠于港澳自由出入境的便利政策，不仅粤港澳之间的文人往来、文学互动成为常态，而且与内地文坛保持着密切交流。特别是抗战期间，蔡元培、茅盾、夏衍、郁达夫、于伶、萧红、骆宾基、端木蕻良、陶行知、欧阳予倩、戴望舒、穆时英、陈衡哲、萨空了、冰心、郑振铎、萧乾、许地山、叶恭绰、巴金、温源宁、施蛰存、林语堂、胡风等大批文人南下，港澳文学艺术迎来前所未有的活力。仅 1937 年至 1939 年间，香港即组建了华南戏剧研究社、香港中华艺术协进会、香港戏剧协会、中华艺术剧团、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儿童戏剧协会、中美文化协进会、中英文化协进会、中华文艺协进会粤剧救亡服务团等大批文艺社团，先后举行“香港文化界座谈会”、港澳马文化界致电国际和平会、“抗敌画展”、“香港诗歌工作者座谈会”、“鲁迅先生逝世二周年纪念大会”、现代中国漫画展、通俗文艺座谈会等系列文艺活动，除大量创办刊物以外，还推动《申报》《大公报》《学生杂志》《中国诗坛》等报刊在香港复刊，生活书店设立香港分店……以著名诗人戴望舒为例，可以大致看出南下文人对香港文学的贡献。除了负责《星岛日报》文学副刊编辑，他还参与《星岛周报》（1939）、《顶点》（1939）、《中国作家》（1939）、《耕耘》（1940）等报刊的编辑出版，而在主持《星座》期间，刊发了大量名家作品，后来他说“没有一位知名的作家没有在《星座》里写过文章的”。澳门以战时中立地位吸引李供林、陈洵、朱希祖、黄节、詹安泰、章士钊、叶恭绰、廖平子、陈蝶衣、陈融、郑春霆、高剑父等大批文化界、教育界人士前来躲避战火，他们发起成立“四界救灾会”、文化协会、前锋剧社、晓钟剧社、起来剧社、绿光剧社、呐喊文学研究社、怒吼社、淘声社、晓社读书会、前哨读书会、暴风剧社、中艺剧团等文艺社团，爱国华人社团则纷纷捐资创办劳工子弟学校、银业公会小学、菜农子弟学校、水电工人子弟学校、粮食公会小学、鲜鱼子弟学校、航业公会小学、猪腊工会子弟学校等子弟学校，在华人社会普及初级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正因为诸种因缘际会，穗港澳迅速成为南方的“新文化中心”。

所以，尽管类似陈残云、黄谷柳、舒巷城、秦牧等作家经常被当成书写岭南本土文学的标杆，粤港澳作为彰显地方特色的文学空间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实际上远远超过了一般区域文学的作用。如果粗疏罗列一份大体反映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港澳文学状况的作家名单——马朗、徐訏、徐速、叶灵凤、侣伦、昆南、黄思骋、李辉英、林以亮、夏果、曹聚仁、司马长风、张爱玲、姚拓、何紫、倪匡、阮朗、舒巷城、戴天、刘以鬯、金庸、梁羽生、东瑞、白洛、施叔青、余光中、郑树森、钟玲、董桥、张晓风、西西、也斯、李碧华、罗孚、亦舒、陈浩泉、颜纯钩、金东方、穆凡中、陶里、韩牧、云力、鲁茂、周桐、谢雨凝等，就不难发现这些来自港澳台地区与内地（大陆）和海外的作家集聚港澳而产生的文学史意义，他们利用自由港的便利条件，先后

创办《诗朵》《文艺世纪》《南洋文艺》《海光文艺》《文艺新潮》《伴侣》《文艺伴侣》《新思潮》《好望角》《盘古》《红豆》《诗风》《四季》《中国学生周报》《大拇指》《澳门学生》等大批文艺刊物，文学空间的开辟既为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和都市通俗文学的延续与进一步实践提供了丰富多元的生存土壤，又为身居东南亚、北美等海外地区的华人作家打通了相对畅通的交流渠道。即便 1949 年构成了某种文化政治的区隔，港澳文学不仅仍然承担着有关国家叙事的想象，而且继续保持着与内地文学一种更深层次的互动，以不同的方式及时呼应民族国家与时代命运的重大课题。粤港澳文学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重新拉开互动的序幕，曾敏之、刘以鬯、金庸、饶芃子、潘亚暾、陶然、潘耀明、许翼心、傅天虹等作为重要的推动者，除了验证“地域内部不同文化之间的交互作用要比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的交互作用频繁、深刻得多”，也说明文学与文化的关联总是从具体的主体开始，而由地缘、文化甚至血缘所塑造的情感结构，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文化区内在的凝聚力量，并强化为一种建立在“交往”基础之上的“地域共同传统”（Area Co-tradition）。

如果试图描述近 40 年来岭南文化区发生的新变，首要提及的无疑是在国际政治与经济新秩序重构的过程中，珠三角成为极具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板块，涌现了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一批制造业发达和贸易实力雄厚的城市，空前活跃的流动性带来了文化的活力，彻底改变了以往由广州作为单引擎驱动的文化面貌；其次则是迎来了香港和澳门的相继回归，港澳实现了特别行政区的文化政治身份转变，广东除了获得传统意义上的窗口毗邻优势之外，还为内地与港澳之间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承担着引桥的作用，粤港澳朝互鉴互补的局面推进；再次就是国家战略层面的“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启动实施，“大湾区”是受全球视野启示形成、基于地域之间协同发展设置的政治经济框架，正如不同历史年代持续呈现的那样，粤港澳的共同地域传统对文化共同体的想象与操作，本身就是以语言为根基，以血缘、文缘为纽带，紧密联结着民族国家的现代叙事。“人文湾区”体现出对既有行政区域划分的超越，回到文化源流，为人们重新审视本区域的文化、文学发展提供了新的维度。

正如谢有顺所说，粤港澳大湾区原本是一个地理概念。之所以要把它变成文学概念，说明在技术空间、物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以外，我们必须假定有一个文学空间、审美空间和艺术空间。“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个提法，就是开创这种审美和艺术的空间，开创想象的空间，这是超越了物理学、社会学意义上的空间概念。“如果我们把粤港澳大湾区当作一个文学的、审美的、想象的空间，就要意识到在这个空间里，不仅有敞开的东西，比如说借此认识到很多新的人群、新的经验、新的生活，也有很多被遮蔽的东西，那些不被辨识的、无名的经验，而这更应成为被书写的主题。”所以，“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理应强调对未来的关注，顺应文学主题由乡村向城市转移的历史趋势，共时呈现湾区城市居民在信息时代工作与栖居的现代生活状态，具备现代性的意义，既书写一代人的理想与追求，也抒发寻梦者在生命途中的悲欢与困境，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立足大湾区的创业史与抒情史。

从这个意义上，“粤港澳大湾区文化丛书”着眼于岭南文化区地域共同传统的接续打造，历史翻开新的一页，需要从多元化角度出发，丰富“一个地区长时间互相关联的诸文化勾连而构成历史的整体单位”的内涵。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来自大湾区的作者不设题材、文体的限制，之所以要求是来自大湾区的中青年作家，是因为“大湾区”是新的，希望生活的经验转化为文学的经验也是新的。

“一国两制”方针下协同港澳推进大湾区建设

文 邵瑾（广东省侨联党组成员、副主席）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出台一年有余，广东省贯彻落实这一区域统筹发展的整体规划工作，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参与全球竞争的重要空间载体。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视察广东时指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要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主动协同香港、澳门做好谋划和落实工作。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我们的主要体会是：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坚守“一国”之本，善用“两制”之利，以制度创新和规则衔接，寻求最大公约数，协调贯通要素流动，不断释放“差异性”“多元化”的活力潜力。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算好政治账和长远账，提高政治站位，着眼战略全局，计国家民族之大利，弃一时一域之小利，自觉服务大局，实现互利发展。

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要主动协



由广东省港澳办指导的粤港澳合作促进会致力于粤港澳大湾区民间交流合作，其品牌专业委员会于2019年12月7日在广州举办粤港澳时尚盛典

同港澳做好谋划落实工作，担起广东的重要职责，以主动的态度、协同的办法，与港澳同谋划、共落实，形成强大合力。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一项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我们将紧紧围绕大湾区建设，着力发挥港澳工作的参谋助手作用，主动协同港澳，把一件件事情、一条条政策、一个个项目抓紧抓实、办成办好。

一是推动合作机制协同。一方面持续完善粤港、粤澳合作机制，高质量服务粤港、粤澳高层会晤和联席会议。另一方面，支持社会各界搭建参与平台，加强与港澳各大商会、行业协会、社团组织的沟通合作，为湾区建设凝心聚力。按照每年粤港、粤澳高层会晤达成的共识，分别举行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围绕湾区建设等重点议题深入交流，推进落实合作事项；与港澳协商制定实施粤港、粤澳合作框架协议年度重点工作，并适时对外公布；发挥粤港澳三地智库作用，针对重点领域、难点问题开展前瞻研究，积极出谋献策。

二是推动产业发展协同。主要抓两个重点，一方面发挥香港、澳门不同特色和优势作用，携手港澳共同打造高水平的创新体，发挥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作用，争取中央更大支持和综合授权。另一方面充分认识和发挥港澳在现代服务业的突出优势，补齐湾区产业结构短板。从CEPA先行先试、率先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再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业合作不断深入推进。国家有关部委也在我省深度调研，争取依托CEPA政策框架，在服务贸易自由化“广度”基础上，推进市场准入、要素流动、专业服务、标准认证的“深度”开放，实现粤港澳服务贸易全面自由化，推动港澳现代服务业与广东先进制造业协同共进。

三是推动政策措施协同。一方面对照推进大湾区建设工作安排，梳理需要粤港、粤澳双方共同推进大湾区建设工作安排，梳理需要粤港、粤澳双方共同推进的重点事项，与港澳特区政府协商一致，形成共同落实的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征求各方意见后签署实施。另一方面借鉴对接港澳的成熟经验做法，注重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方式推进工作，出台政策前多听取港澳各界意见建议，以港澳能接受的方式、听得懂的语言



粤港澳大湾区粤港青年2019年实习计划于6月1日在香港启动



首期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对接专题研讨班于2019年4月7–18日在粤港澳三地举行

进行政策推广。省港澳办一直联合港澳特区政府有关部门，调研了解在粤的港澳居民对融入大湾区就业、创业、学习和生活等便利政策的意见建议，推动相关政策实施不断优化。

四是推动营商环境协同。坚持“就高不就低”，加快建立与国际高标准投资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规则。在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上有新突破，列出清单、提出工作台账。发挥重大合作平台的先行先试作用，选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促进改革带动，如建筑行业的“硬标准”、专业服务领域的“软规则”等，以“地区试点”与“行业试点”相结合，积累经验后逐步推开。同时注重发挥港澳双重开放的桥梁作用，深入研究和用好新的外商投资政策，争取对港澳资实行“特殊外资”政策，把大湾区建设成为最具国际投资吸引力的地区之一。

五是推动人才资源协同。广泛宣传大湾区高端人才税收优惠的重大政策利好，推动完善教育、医疗、住房、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配套，吸引国内外高端人才和要素集聚，为大湾区建设提供人才智力支撑。同时，为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发展多搭台、多搭梯。广东省已与香港、澳门特区政府联合授牌、共同支持建设首批 13 家青年创新创业基地，为港澳青年到大湾区发展创造便利条件、优化服务。

六是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协同。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大湾区建设一开始就要把生态保护放在优先位置。我们要主动担责，协同配合各有关部门和地市做好东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进一步推进对澳门水供应保障工程，确保供港供澳水质安全，把广东的一江清水送入港澳寻常百姓家，推动形成“饮水思泉”的思想情感。

长风破浪，直挂云帆。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我们务必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决策部署上来，做到有序有力，重在务实，重在落实，苦干实干。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和广东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担当好协同港澳的重要责任，推动粤港澳形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为“一国两制”成功实践行稳致远做出应有贡献，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成为国际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的美好愿景一步步化为现实。

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战略思考

文 刘飞（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陈娟（广州商学院） 赖朝安（华南理工大学创业教育学院）

一、引言

当今世界，湾区已经成为带动全球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引领科技变革的领头羊，以及提升其所在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空间载体，由此衍生出来的经济效应被称为“湾区经济”。东京湾区、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是全球公认的三大世界级湾区。相较于前三大国际湾区，覆盖面积约 5.6 万平方公里、人口约 7000 万、经济总量约 1.67 万亿美元（2019 年）的粤港澳大湾区已经具备了打造继纽约湾区、东京湾区和旧金山湾区之后又一个世界级湾区的条件。尤其是在当今中国经济新常态下，粤港澳大湾区已经上升为国家级战略规划版图，担负着培育中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化对外开放新格局、接轨全球经济新支点以及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大历史使命。

另一方面，纵观全球，制造业是当今世界主要经济发达国家的主要支柱，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随着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信息科技的快速创新变革，正在从根本上引领和推进全球新一轮工业革命。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正成为世界各主要经济发达国家（如德美日等国）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路径、效率提升的必然要求和新动能转变的重要抓手，也是中国在新常态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的必由之路，是打造中国制造国际竞争新优势并实现由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的必选路径，是抢占未来全球经济和科技发展制高点的战略选择。

作为国内制造业龙头地位的粤港澳大湾区（先前以珠三角为代表），经过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快速发展，制造业规模已经跃居世界前列，业已建立起门类齐全、相对独立完整、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体系，并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上的重要一环。然而，在全球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强烈冲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最新贸易政策的严重打压，以及时下新型冠状病毒在全球快速蔓延的严峻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全球及国内工业版图中正经受着多重严峻挑战：一是以德、美、日为首的发达国家通过实施“再工业化”“先进制造业回流”等战略，不断强化其在全球高端制造业中的领先优势，加速挤兑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高端的转型升级；二是以印度、越南、柬埔寨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正以更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快速承接粤港澳大湾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积极抢滩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低端；三是近年来国内长三角、京津冀、中西部、东北部等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快速发展，也给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国内的龙头地位带来巨大的挑战；四是随着国内新零售的快速崛起，消费端的话语权不断提升，也加重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压力。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下，如何依托先前所积累的雄厚的制造业规模、成熟完善的产业

体系、丰厚的金融资本实力、国内领先的信息基础设施等优势，以及国家近年来赋予大湾区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自由贸易区、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华南重要枢纽等种种重大政策利好，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显得尤为重要，而且非常紧迫。这是在人工智能时代通过“换道超车”赢得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端战略新高地和话语权的千载难逢的契机，是新时代继续争当国内先进制造业排头兵的重要保障，也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近年来对广东和粤港澳大湾区工作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批示的坚实保障。

有鉴于此，本文通过对新一代智能制造理论内涵与最新发展动向的解读，并结合先前对华为、广汽、美的、格力等多家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企业以及业内专家学者的深度调研访谈，在梳理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机会与挑战的基础上，基于制度环境和生态系统建设的视角，提出了在人工智能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成功战略转型的发展思路和对策建议，以期在全国率先走出一个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再到“中国创造”的“中国现代化模版”，也为国家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甚至问鼎世界顶级湾区打下坚实而厚重的理论基础。

二、智能制造的发展演进与新一代智能制造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四次工业革命，都离不开同时期科学技术革命的大力推动。每每新兴的科学技术应用到工业领域，都会引起工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而制造业一直都是历次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所以，历次的工业革命发展史某种程度上就是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发展史。

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升级就是一个信息化不断融合于、服务于工业化的过程，从而推动着制造业从低级走向高级、从人工不断走向智能的动态演进，旨在实现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不断提升生产制造企业的产品质量、生产效率、服务水平，不断满足人类日益个性化、定制化、智能化等对美好生活品质的追求，并最终推动着制造业、乃至人类社会向着创新、智能、绿色、协调、开放、共享发展。所以，一般意义上认为，自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信息技术革命，彻底改变了整个制造业、乃至人类社会的生产运作模式，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真正开启，并由此渐次快速迈入制造业智能制造 1.0 时代（数字化时代）、智能制造 2.0 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时代或“互联网 + 制造”时代）。

近年来，随着工业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快速发展并形成群体性突破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正快速走向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智能制造 3.0 时代（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也就是新一代智能制造时代）。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本质特征是具备了学习的能力，具备了生成知识和更好地运用知识的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深度融合，形成新一代智能制造——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制造，是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高级阶段。新一代智能制造将为制造业的研发、设计、制造、物流、营销、售服等各价值链环节及其集成带来根本性变革，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将不断推陈出新、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和改变人类社会的产品形态、生产方式、服务模式，乃至人类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极大地推动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重塑。所以，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新一代智能制造最为核心的驱动力，将为制造业带来根本性、革命性的变化。

不过，从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发展演变

脉络可以看出，智能制造 1.0、智能制造 2.0 和智能制造 3.0 是次第展开、不断迭代升级的，体现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阶段性和融合性特征。三个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阶段及其基本范式沿着时间脉络逐一展开，既是相关信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和产业结合，面临着当时阶段所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体现出其所在阶段的特点，这就是先进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融合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同时，在发展过程中，三个智能化转型升级发展阶段及其基本范式在技术上又不是截然分开和割裂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促进、迭代升级的，这又体现出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的融合性特征。

三、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机会与挑战

（一）机遇与优势

从全球科技发展的角度看，近年来，在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科技革命的快速推动下，以大数据智能、跨媒体智能、人机混合增强智能、群体智能等代表的新一代人工智能不断取得群体性、战略性突破，与历经了（并正在历经）工业 1.0、工业 2.0、工业 3.0 和工业 4.0 革命洗礼的先进制造技术不断深度融合，势不可挡，从技术的层面上为新一代智能制造及其生态系统的孕育提供了天然的肥沃土壤。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全球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区域之一，业已拥有了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升级所必需具备的雄厚的基础和强大的实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从历史渊源上看，自改革开放以来，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历经了开放之初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1.0 时代（“来料加工、前店后厂”合作模式）、世纪之交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2.0 时代（“向微笑曲线两头不断迈进、纵深广发展”合作模式）和近 10 年来的粤港澳大湾区合作 3.0 时代（“深度跨界融合、全面转型升级”的合作模式）3 个发展阶段，业已发展形成全球先进制造产业链条和价值网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与关键节点，也为把握住全球新一轮智能制造发展的重大历史契机奠定了坚实而厚重的历史基础。另外，“一衣带水”是粤港澳大湾区最为重要的区域性特征，多年来，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同源、习俗相近、开放包容等良好的社会文化生态氛围，也都有利于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发展与壮大。

其二，从现实基础和优势上看：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产业集群优势突出，业已形成交融互补、多个层面的智能制造发展“金三角”（其一是珠三角、香港和澳门基于“一国两制”构成的“金三角”，其二是港深、广佛和澳珠三点构成的“金三角”，其三是珠江东岸、珠江西岸和沿海地区三片构成的“金三角”），基于“科技创新 + 先进制造 + 现代服务”的并驾齐驱式协同创新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形成；高端要素集聚、创新能力突出，拥有 4 所世界百强大学、16 家世界 500 强企业、2 万多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6 家国家级重点实验室、121 个院士工作站、高校联盟首批入盟 26 所高校等（2017 年），为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注入了强劲的创新活力和人才储备；拥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良好的生产基地与基础设施以及比较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并成为全球先进制造业产业链条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华为、广汽、美的、格力、腾讯等先进制造龙头骨干与互联网巨头引领带动，大疆、柔宇科技、优必选、微众银行等一大批独角兽企业不断崛起，万千中小微企业不断涌现……构筑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主力军与生力军不断发展壮大。

其三，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相较于世界上其他三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更是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一国两制三



航拍港珠澳大桥

关税区”）。从长远来看，这非常有助于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全方位、立体化、开放式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打造。随着国家级政策红利的不断释放，一旦“三驾马车”（高度市场化和国际化的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贸易中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世界制造中心，以及世界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磨合产生共振效应、乃至聚合效应，其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所释放的能量将不可限量。

（二）困难与挑战

尽管如此，时至今日，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过程中还是存在着很多问题和挑战，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短期内受制于粤港澳三地的多样化制度困境。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一国两制三关税区”多样化制度环境是一把“双刃剑”，至少从短期内来看是如此。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粤港澳三地分属于不同关税区域，经济制度、法律体系和行政体系等均存在较大差异，而且过往多年来过于强调“两制”，虽“一衣带水”“近在咫尺”但又人为地制造了各种“远在天涯”的阻隔，“两张皮”现象还是很明显，三地间资金、人才、技术、信息、数据等推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关键要素资源还难以完全高效自由流动，多个领域还存在同质化（甚或恶性）竞争和资源要素重置错配现象，相关规则与制度的磨合和摩擦成本还比较大，粤港澳三地的高度互补、协同共享、互利共赢的一体化发展模式尚未真正树立起来。其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港澳，特别是香港的以几大高校为代表的科技创新资源与优质国际人力资本，以及高达发达、享誉全球的金融服务业、国际航运业和国际贸业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难以很好地融入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这一盘大棋中来，也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粤港澳大湾区问鼎世界顶级湾区的步伐。

其次，是大湾区“9+2”中 9 个城市间的区域高效协同还不够。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出台了多项促进珠三角、泛珠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性或跨区域性政策，也极大地促进了珠三角的发展，并一跃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制造工厂”。但不可否认的是，快速、粗放发展的背后不可避免地带来盲目无序、各自为政发展的局面，导致各个城市间经济结构相似度高、产业比较雷同、资源重复配置和同质化竞争的不利局面。时至今日，珠三角不同城市间以我为主、为我服务的狭隘的单向发展意识还依然普遍存在，甚至部分地方政府还把对大湾区发展的认识仅仅停留在是一个经济项目，利用国家政策红利争资源、抢项

目、各自为战、重复建设等，缺乏把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一盘棋”并建设成为世界顶级湾区的战略观、全局观和长远观。另外，在面对当前风云诡异的全球政经环境以及略有起伏的香港发展影响下，部分地方政府又过度地放大了眼前的制度障碍（其实，正如上面所言，相对于世界上其他三个湾区，从长远来看，这种多样化的制度环境也恰恰是粤港澳大湾区有潜力尽快升级为世界顶级湾区的一个最大的优势，也为构筑更为多样化、更具健壮性和生命力的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提供了长足的发展空间）。

再者，从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主要参与者来看，尽管过往 30 多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智能化发展水平仍然是工业 1.0、工业 2.0、工业 3.0 和工业 4.0 并行存在、参差不齐，很多传统的制造业、大量的先进制造业和不断涌现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混杂发展，产业格局从整体上看仍然处于全球制造产业价值链中低端。尽管过往多年来我们一直在学习西方发达国家的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模式（如德国的工业 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日本的制造业白皮书等），但是，这些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基础扎实，智能化转型升级起点高，基本都走在从工业 3.0 到工业 4.0 的路上，因此，在这方面也没有太多的成功模版或经验教训可供借鉴参考。加之，近年来西方发达经济体对我国的技术封杀越加严重，高端智能装备、工业机器人、工业封装技术、集成电路芯片等许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共性基础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短期内还难以改变，“缺芯少核”的问题还比较严峻。此外，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全球领军人物、中高端人才以及一线“工匠”型人才短期内还非常匮乏。因此，在新时代，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还任重而道远。

四、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发展思路

在全球新一轮智能制造正蓬勃待发、暗流涌动之时，围绕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发展中所面临的严峻问题与挑战，并结合其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历史使命与功能定位，以及德美日等发达国家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的最新经验，本文提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发展思路与对策建议，以期率先在全国乃至全球走出一条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成功之路。

（一）创新利用“一国两制”多元化制度优势，大力推进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生态系统建设

新一代智能制造本身及其相应的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是一个涉及多企业、多领域、多地域信息集成、应用集成与价值集成的动态复杂巨系统，发展好坏、程度高低离不开其所处的生态系统的孕育、构筑与治理。而“培育智能制造生态体系”是“中国‘十三五’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 2025”的重点任务之一，也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中长期战略诉求能够顺利落地、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成功转型的重要保障。应该说，粤港澳大湾区与世界上其他三个湾区的竞争与角逐，某种程度上就是粤港澳大湾区生态系统与其他三个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与角逐。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崛起的历史渊源与资源禀赋（曾经的最大的“世界工厂”，现在依然是），以及全球回归实体经济与发展智能制造的必然现实，智能制造生态系统无疑是粤港澳大湾区众多子生态系统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其建设的好坏必将“牵一发而动全身”。为此，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要着力强化下面两个方面的工作：

其一，要强化在“一国”的政策框架下

“‘9+2’一盘棋”式落实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建设。如前面所述，我们应该要看到，过往多年来由于过分强调“两制”，弱化了“一国”的政策导向，给当今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生态系统建设带来诸多的观念误区和制度障碍。随着国内社会主义法治的不断健全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在全球新一轮信息科技革命、国际政经环境风云际变和我国已然迈入新常态交汇的关键历史节点上，现在是时候强化“一国”的政策理念和战略导向了。也只有在不断强化“一国”的大前提下，并相应处理好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机制，打造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观念误区、制度障碍和行政壁垒才更容易克服，“一国两制三关税”的多样化制度优势所蕴含的巨大潜能也才能够充分地释放出来。

其二，进一步加强珠三角 9 市高效协同联动建设大湾区新一代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的认知和决心。相较于港澳，粤港澳大湾区内地 9 市同属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基础比较雄厚，信息网络基础设施发达，两化深度融合全国领先，理应更容易达成区域间的高效协同联动，为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新一轮智能制造的全面转型升级做足做实工作。所以，针对过往各城市间以我为主观念误区、产业结构过于雷同、资源过度重复配置、同质化竞争严重、只连接不协同（尤其是珠江东岸和珠江西岸之间），以及过分放大粤港澳三地的制度障碍或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视为一个热炒的一个经济项目等问题，要从国家层面、省委省政府层面做足做实工作，让珠三角的各城市都能够清晰理性地认识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个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是我国在新时代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化对外开放、接轨全球经济、建设世界级城市群和中国现代化模版的一个重要支点和空间载体，珠三角各城市必须基于并服从于这个国家级“一盘棋”的发展战略。也唯有在这个基础上，珠江东岸的电子信息产业先进制造产业集群、珠江西岸的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穗莞深（港澳）科技创新长廊、港穗深澳的高端服务业等才能够进一步珠联璧合、高效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生态系统才将会发挥其强大的倍乘效应、井喷效应乃至几何级数的效应。

（二）继续坚持“多措并举、并行推进、跨界融合、换道超车”发展路径，全面推进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

上面已经提及，与德美日等国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不太一样（他们基本上都处于从工业 3.0 到工业 4.0 的发展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各地区、各行业、各企业面向新一代的智能制造转型升级基础差异大，工业 1.0、工业 2.0、工业 3.0 和工业 4.0 同时存在，没有太多现成的成功经验或模版可以借鉴复制，必须自力更生，率先在全国走出一条差异化协同推进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道路。

事实上，过往近 10 年来，我国陆续推动的“两化融合”“互联网 +”“中国制造 2025”“智造 +”等一系列新常态下制造业战略转型升级举措（也就是“多措并举”的策略，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一直都走在全国前列），都极大地推进了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升级的步伐：一方面，一批数字化制造基础较好的企业成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转型升级，成为数字化网络化制造试点示范；另一方面，大量还未完成数字化制造的企业，则采用并行推进数字化制造和“互联网 + 制造”的技术路线，通过“以高打低、并行推进”策略，在完成数字化制造“补课”的同时跨越到“互联网 + 制造”阶段，切实从整体上提高粤港澳大湾区落后制造企业的智能化水平。

与此同时，在当今面向全球新一代智能制造（智能制造 3.0，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取得了群体性突破并陆续大规模商业化应用为代表）

转型的重大历史时刻，我国和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实际上又走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临着“换道超车”（而不仅仅是“弯道超车”）的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所以，还需继续充分借势行政“有形的手”，大力支持和敦促华为、广汽、美的、腾讯、大疆、地平线等粤港澳大湾区先进制造龙头、互联网巨头或独角兽身先士卒，跨界融合，加快推进基于新一代人工智能、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全面转型升级，率先在全国实现“换道超车”，并带动起其产业链条或生态体系中的广大中小微企业，快速实现“以高打低、跨越发展”的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升级之路，最终从根本上提升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生态系统（特别是在全球制造产业链条中的分工与格局）的国际竞争力，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尽快迈向世界级湾区的前列。

（三）大力扶持大湾区组建多维面的智造联盟，尽快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核心技术的系统性突破

面向新一轮智能制造的基础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的尽快攻关与突破是掌控未来全球高端智造话语权与制高点的关键，这也是当前，甚至今后一段时间内粤港澳大湾区智能制造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单单依靠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某一所高校、某一个智能制造骨干企业，甚或是某几个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攻关，也往往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当前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更何况新一代智能制造本身就是一个涉及多企业、多领域、多地域信息集成、应用集成与价值集成的动态复杂巨系统。

自德国 2011 年吹起“工业 4.0”的号角后，世界各主要发达经济体都纷纷推出自己的“工业 4.0”版本，尤以美国联合“产学研政金”多层次、多维度推动的智能制造生态系统建设更具成效及具有启发与借鉴意义。为了能够在 21 世纪继续掌控全球制造业产业链中高端制高点与面向未来的工业互联网话语权，美国于 2011 年率先由时任总统奥巴马（代表联邦政府）发起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AMP 1.0，现已升级为 AMP 2.0，该联盟联合了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麻省理工学院、卡内基梅隆大学、斯坦福大学等高校，陶氏化学、康宁玻璃、福特公司、英特尔等产业界企业）；随后又依托商务部下属的美国标准与技术研究院设立国家先进制造项目办公室，负责协调、统筹规划与管理等平台管理工作。在此基础上，“产学研政金”陆续全面展开跨界合作，先后成立了先进制造技术联盟（AMTech，公私部门合作，专注鼓励与支持技术创新，尤其是支持具有长远竞争力的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美国工业互联网联盟（IIC，主要由 AT&T、Cisco、GE、IBM、Intel 等知名厂商组建，专注智能制造标准与智慧连接）、开放互联联盟（OIC，主要由 Intel 和 Dell 等公司发起，专注互联互通技术开发）、智能制造领导联盟（SMIC，由制造公司、技术公司、大学、政府、实验室等组成的非营利性组织，专注于协同推进智能化制造）等多个智能制造联盟，再加上诸如 GE、谷歌、苹果、微软等重量级企业自身也在重磅投入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基础共性技术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从而不断打造出一个现代美国版的无比强大的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生态系统。

所以，可以借鉴美国基于多层面、多维度产学研政金联盟联合技术攻关的成功经验，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众多知名高校和创新研发机构、珠江西岸扎实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珠江东岸的先进电子信息制造业产业集群、广深两市强大的互联网产业、港穗深澳强劲的高端服务业等雄厚的根基，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层面还需继续给予大力支持，围绕新一代智能制造基础共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工业互联网标准等领域，出面召集、推动或扶持“产学研金”联合组建不同领域、不同层面的智能制造联盟，或继续优化、完善与督

导既有的各智能制造联盟，以尽快实现新一代智能制造这个复杂巨系统各个关键技术领域的攻关与突破；并充分利用各个智能制造联盟的技术外溢效应，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广大中小微企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整体成功转型升级。

（四）创新完善人才引智与提质，为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的转型提供智造人才支撑与孕育土壤

人才是智造强国的根本，是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成功转型升级的核心力量。鉴于粤港澳大湾区在加快推进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过程中还存在比较严重的四类人才短缺问题，尤其是实战型、高层次行业领军人才和一线高素质、高技能工匠型人才尤为稀缺，而且多层次人才队伍体系尚未高质量形成，本文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或继续完善：

1. 创新现有以科研学术成果导向为主的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军人才评价体系，探索以企业实战为主的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军人才培养与引进办法，依托粤港澳知名高校、乃至全国知名高校与名企合作，可持续培养能够突破新一代智能制造关键技术、带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的高层次领军人才；同时，加大从德美日等发达国家，特别是从美国通用电气、德国西门子、日本富士通等知名智能制造企业引进或临时聘用智能制造实战型领军人才，跨越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高层次新一代智能制造领军人才队伍。

2. 围绕一线高素质、高技能工匠型人才需求，通过采用人才培育专项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措施，引导粤港澳大湾区制造名企与高职高专院校按照德国“双元制”模式培养新一代智能制造“工匠”，大力推动龙头企业（如华为、美的、格力、广汽等）设立智能制造学院，或与地方高职高专院校合作开展“双主体”智能制造专业建设与工匠人才培养模式，快速推动面向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最为紧缺的一线技工的造血机制。

3. 积极探索粤港澳大湾区知名高校、乃至全国知名高校开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学科体系和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如按照订单模式，量身裁体地和粤港澳大湾区名企定向培养复合型或专业新一代智能制造人才，或借助在职工程硕士、工程博士等专业学位平台为企业培养与输送新一代智能制造复合型或专业技能人才。同时，鼓励粤港澳大湾区、特别是珠三角有条件的高校、院所、企业建设智能制造实训基地，培养满足新一代智能制造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专业技能人才。

21 世纪的今天，作为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世界级城市群之一，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坚实而厚重地历经了 1.0 和 2.0 两个时代，业已迈入了全新的 3.0 时代，与全球层面面向新一轮智能制造的信息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形成了天然的历史交汇。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党中央的英明领导下，在当前国内快速稳步推进中国制造 2025 的大好环境，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有着比较扎实的智能制造转型基础和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推动下，粤港澳大湾区能够在全国率先走出一条创新驱动、跨越发展的新一代智能制造转型之路，为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尽快成为世界级经济增长新引擎，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向“智造大国”再向“创造大国”成功转型升级，开创人工智能时代“中国现代化模版”，以及尽快构筑起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代表的中国新一代智能制造掌控新时代全球制造产业链版图中的制高点与话语权做出应有的表率。

本论文系广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加快推进广东省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政策体系研究”（2018A070712008）、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广州制造业智能化转型升级战略、路径与支撑体系研究”（2017GZYB04）和广州市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广州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制造业深度融合研究”（2018GZYB16）的阶段性成果。

文化认同与宗教自觉

文 温金玉（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净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一个国家的发达强盛，既需要坚实的物质基础，也绝离不开强大的精神支撑。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文化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基因，根植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行为方式。当前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凝聚民族精神、开展文明对话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宗教应以怎样的社会责任与历史担当，挖掘各自教义中济世利人的思想内涵，充分发挥历史悠久、资源丰富的文化优势，培植正确的宗教观、文化观，传递宗教正能量，构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讲好中国的故事？

文化认同：宗教与“文化整体”

在2016年4月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就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认识和对待宗教，遵循宗教和宗教工作规律，深入研究和妥善处理宗教领域各种问题，结合我国宗教发展变化和宗教工作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用以更好指导我国宗教工作实践。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和教育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弘扬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支持各宗教在保持基本信仰、核心教义、礼仪制度的同时，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对教规教义作出符合当代中国发展进步要求、符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阐释。寻求宗教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当代使命与历史担当，首先涉及如何看待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宗教作为一种信仰系统，无论是中国本土宗教，还是外来传入的宗教，均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较为独立的文化形态特征，文化的多样性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美国社会学家撒母耳·亨廷顿曾提出“文明冲突论”。他将当代世界划分为儒家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等几大文明，并预言，冷战之后，世界的主要冲突将是文明间，特别是诸非西方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在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时也不能全然否定文化的共性，正是这种共性，才使得不同文化能够互相交流与借鉴。如萨义德就力主以混杂的、融通的方式来看待不同的文化，认为如果以冲突的心态来看待文明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就忽视了彼此间的互动互补、相辅相成。所以不仅要从不同“文明圈”的理论来界定宗教的归属，更要从文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来看待宗教与在地文化的交融。由此，我们在探讨中国宗教在当代弘扬传统文化的职责时，虽然从学理角度可以确立宗教与世俗一般文化体系的区隔性，但应注重在中国文化系统中各个宗教自身转型与更新的具体进路，更不要说本身就是产生于

中国本土的原始宗教、民间宗教以及土生土长的道教。这样的观照视角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若不将宗教置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视域下进行考察，就无法从真正意义上探讨宗教在中华传统文化大系统中的地位与功能，宗教依然是外在的异类分支，这就难免会有对中华文化内涵的误解与对宗教实质的偏见。所以把宗教纳入传统文化整体系统来考量，将是探讨这一主题的原则立场与方法论。

在历史长河中，中国宗教与传统文化其他各个组成部分和合共生，始终呈现融合之道。我们所言中国宗教内涵较为广大，从远古时代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等原始佛教，到夏、商、周三代“敬天法祖”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至汉唐以来广为流传的佛道二教，以及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均属中国宗教范畴。这些不同的宗教构成元素之间存在着普遍联系、相互渗透的关联，同时也与中国传统文化各分支融合吸收，彼此影响，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共同组合为中华传统文化多元结构的共同体。

中国传统文化早期“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倡导王道德治的同时，就辅以“神道设教”，将祭祀作为一种教化的存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祷祠祭祀，教训正俗，以神道设之使民知畏敬故也。祭礼与政教的化世导俗浑然一体。而对于宗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问题的自觉研究与反思，则是从近代启蒙思想的引进才开始的。

自民国以来，西学东渐，启蒙思想势不可挡，1915 年《新青年》杂志创刊，高扬民主与科学的旗帜。继而胡适倡导的文学革命和 1919 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民主主义和科学主义之意识逐渐深入民众。至 1923 年北京学界成立“反宗教同盟”，将宗教看作是“麻痹智力、束缚自由和阻碍进步”之物，加以无情批判，提出了“以美育代替宗教”“以科学代替宗教”“以哲学代替宗教”“以道德代替宗教”的主张。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民众对传统宗教与神圣经典的迷信与崇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宗教鸦片论盛行，虽然在政策层面上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但从思想领域里将宗教作为“颠倒的世界观”进行彻底的批判。十年“文化大革命”，更是从根本上用行政手段消灭宗教。“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科学迎来了春天，宗教也得到了重新认识，在提出“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理论的同时，也提出“宗教是文化”的主张，并得到社会广泛认同。以往对于宗教与文化的关系，大多是在将二者分割的语境下评说，“宗教是文化”的提出，明确地将宗教纳入文化系统框架结构中定位，肯定它是传统文化母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中，宗教对各种文化都发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与哲学伦理、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不仅渗透到文化的精神意识层面，而且渗透到文化的器物、制度、行为层面，且成为一部分社会民众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成为他们生活与行为的准则与道德规范。所以要想了解、认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是无法离开宗教的。撇开宗教就不可能对文化作出完整的解释。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是有其存在的社会基础和文化意义的。学者王晓朝指出：“人类文明史的绝大部分，在各个时代和各个国家，宗教是文化统一的核心力量。它是传统的保护者，道德法则的维护者，智慧的传播者，人们生活的教育者。”

和谐共处：道德完善的共同诉求

宗教不仅是一种信仰体系，也是一种文化现象。美国神学家蒂利希曾有这样的定义：“正如文化在实质上是宗教，宗教在表现形式上则为文化。”这样的主张其实并不为所有学者所认同。无数的文化演进证明，是文化决定宗教，而不是宗教决定文化。不应将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

而应将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宗教受整个文化体系的制约，它本身也是文化环境的产物和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

梁启超曾认为“孔教”乃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这一思想影响甚远，推而广之，也有学者认为传统意义上的儒释道乃教化之教，而非宗教之教。其实教化之教和宗教之教并不矛盾，无论是宗教之教还是世俗之教，其宗旨皆是化世导俗，提升质量，让人敦伦尽份，各尽其职。二者是不二的，而非对立的。儒教是教化之教，佛道二教也是教化之教，其核心灵魂是对道德的实施，对信仰的敬畏。

东晋慧远在《沙门不敬王者论》中曾言：“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则同。”其弟子宗炳在《明佛论》中亦说：“孔、老、如来，虽三训殊路，而习善共辙也。”在弘善方面，三教殊途同归。北周释道安更是直接表达：“三教虽殊，劝善义一；涂迹诚异，理会则同。”三教的落脚点都在于对民众的道德教化。“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立于嵩山少林寺的钟鼓楼前，上面有孔子、释迦、老子“三圣合体”像，刻有“佛教见性、道教保命、儒教明伦”“三教一体、九流一源”的碑文。在少室山安阳宫主殿洞内也祀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三尊，门上书：“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并没有严格的三教对立，唐宗密曾言“孔、老、释迦皆是至圣，随时应物，设教殊途，内外相资，共利群庶，策勤万行……三教皆可遵行”。三教合一，是中国人的共识。历史上也曾有这样的概论：“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三教合一”的思想对社会感召力很大，如南北朝时的傅大士就戴“儒冠”，穿“僧衣”，着“道履”，集儒、释、道于一身。这样的行为方式甚至影响到后来的耶稣会传教。1582 年，被誉为“西来孔子”的神父利玛窦来到中国，为了入乡随俗，融入中国社会，不惜身披袈裟，以“番僧”的面貌出现，后来又留发蓄须，儒巾儒服，“傲馆延师读儒书”，“居恒手不释卷，经目能逆顺诵”，以更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儒者身份而活动。

宗教与传统文化的相融相摄性可以表现在许多方面。二者的区隔并不一定要表达在出世与入世的取向上，出世的宗教有其入世性，世俗的文化同样具有其超越性。中国儒家的圣人是“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就像佛教所言，悟道者的境界是“高高山顶立，深深海底行”。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在描述世界历史时提出来一个著名的“轴心时代”理论，轴心时代的理论主旨是“终极关怀的觉醒”和“超越的突破”。中国文化在轴心时代呈现更多的是人文的、实践的理性，所以导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真正意义上的超越精神与终极关怀。梁漱溟先生就认为儒家文化很少讨论彼岸和来世，明确提出中国文化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其实，儒教的神圣化色彩是非常浓烈的，某种意义上并不亚于宗教。学者王晓朝指出：“道德的信仰化与神圣化是道德发挥社会作用和功能的必由之路，道德的归宿是信仰，但宗教信仰不是道德的唯一宿主，因为信仰化与神圣化并不等于宗教化。”圣人神道设教的用心，古代“敬天法祖”的超越性，儒家“三不朽”思想的终极意义，还有民间劝善书中所言“人间私语，天闻若雷；暗室欺心，神目如电”，皆表达着“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象征意向。无论是文献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记述，还是民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的说法，都指向对宇宙因果律的敬畏，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十目所视、十手所指的信念来源于天地良心的敬畏法则。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具超越意义与神圣性的特征。



儒教是教化之教，佛道二教也是教化之教，其核心灵魂是对道德的实施，对信仰的敬畏

同样在传统文化表达超越意义的同时，中国宗教也展现了热切的现实关怀。如对佛教教化之功评点最多的是宋文帝的说法:“若使率土之滨，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何尚之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列举了晋代以来信奉佛教的官僚士族的名字以后，认为佛教有助王化，使民风淳厚，社会安定。他说:“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宇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若持一戒一善，悉计为数者，抑将十有二三矣。夫能行一善，则去一恶；一恶既去，则息一刑。一刑息于家，则万刑息于国……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对佛教维护社会安定秩序的功用给予肯定。梁启超就认为佛教“乃智信而非迷信”“是兼善而非独善”“乃入世而非厌世”。这是今天宗教可以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大有可为的最根本的内在理论依据。

在中国传统的“五常八德”中，爱国忠君可以说是最为重要的德目，可以上升为国家道德的层面。不仅儒者在提倡“君为臣纲”，各大宗教也积极推进这一主题。如东晋名僧慧远“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阙奉王之恭，而不失其敬”的调适，出家人“每烧香咒愿，必先国家”，还有充斥于经典清规中的仁王护国、祝圣祈祷，在在表现了佛教与社会主流文化的合拍。佛经中也总说：不作国贼、不谤国主、不漏国税、不犯国制。

唐朝时，作为基督宗教派别之一的景教传入，曾达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景象。元代的基督宗教派别也里可温教，虽然信众颇多，但最后也销声匿迹。如何解决中国化是其首要问题。20 世纪初基督教界掀起“天主教中国化”自立运动、本色教会运动。爱国主义是道教的一贯精神。早在产生之初，道教就提出了“助国”“保国”主张，而且表现为“佐国扶命”，表达了道教对赖以生存的国土的热爱。近现代道教领袖陈撄宁曾提出现代新仙学，他在《论〈四库提要〉不识道家学术之全体》一文说:“须知信仰道教，即所以保身；弘扬道教，即所以救国。”清真寺也有祝延圣寿的传统，这是伊斯兰教在中国本土化的表现。明清之际，一大批被誉为“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儒书”的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以儒诠经”，通过吸收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资源来阐释伊斯兰教的义理。如明末著名穆斯林学者王岱舆把顺从君主视为人生“三大正事”之一，“人生在世有三大正事，顺主也、顺君也、顺亲也。凡违兹三者，则为不忠、不义、不孝矣”；认为伊斯兰的“真忠正道”是既顺从真主，又忠君孝亲；如果只讲顺主，而不履行忠君孝亲义务，便为“旁门左道”“异端邪说”。清初穆斯林学者刘智强调，“一时不心与君，即为不贤；一事不合于君，即为不忠”。朱元璋赞扬伊斯兰教的《至圣百字赞》被雕刻在全国各地清真寺的显要位置。各地清真寺专门开辟一块地方放置“万岁牌”，上书“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他们在做完每日五次礼拜的同时，不忘祈祷国家太平，为当朝皇帝祝寿延年，可以视为忠君及国

家认同的具体表现。在中国穆斯林中，普遍流传着这样的格言：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

中国是一个家族社会，人伦道德最为重要。唐玄宗为《孝经》注疏曰：“凡为人子，当须遵承圣教，以孝事亲，以忠事君。”佛教《四十二章经》中说：“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孝顺父母胜于敬事天地鬼神。释僧顺专门撰《释三破论》，申明“释氏之训，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备有六睦之美”。中国穆斯林学者以《古兰经》和“圣训”为基础，结合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伦常规范，提出“五典”说。清代穆斯林学者刘智在《天方典礼》中提出“君仁臣忠之道、父慈子孝之道、夫爱妇敬之道、兄弟挚协之道、朋友信义之道”的人道“五典”。他认为：“敬服五功，天道尽矣；敦崇五典，人道尽矣。”在五伦关系上，儒家以“君臣”为首，而伊斯兰教以“夫妇”为首，认为夫妻是人伦纲常之本，“有天地而后万物生，有男女而后人类出，故夫妇为人道之首也”。伊斯兰教设立“五功”（念、礼、斋、课、朝）以完成天道，又立“五典”以完成人道。“人道五典”与“天道五功”并重，天道、人道互为表里，密不可分。认为前者是“穷理尽性之学”，后者是“修齐治平之训”。一般教民把它归纳为：忠君爱国，孝道父母，善待子女，和睦邻里，诚结挚友。

在个人道德修养方面，各宗教的内容更是俯拾皆是。儒家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教说“诸恶莫做，众善奉行”。民间善书说“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基督教教导人：你想让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怎样对待别人。有人向先知穆罕默德请教：“什么是伊玛尼?”先知回答说：“当你做善事感到愉快，做了一件错事感到难受，你就是一个通道者了。”并说：我的使命是完善一切美德。

传统文化非常注重物欲的减少，精神的丰盈。《论语》宣扬“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孔颜乐处，提倡“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的人生观。老子警示：“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佛经也说：“知足之人，虽卧地上，尤为安乐。不知足者，虽处天堂，亦不称意。”中国穆斯林社会盛行“两世吉庆”说，主张适当享受生活，但反对挥霍浪费。《古兰经》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的确不喜欢过分者的。”伊斯兰教反对不正当消费，如饮酒、赌博、嫖娼、吸毒、吃禁食以及导致道德滑坡和精神颓废的活动，并以“今日得闲”警示人们为日常名利的牵绊。这些不同宗教所宣传的教义都在提醒人们要过一种少欲知足的适意生活。

1993 年 9 月，世界宗教会议通过了创始性的《走向全球伦理宣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孔汉思认为宗教作为文化的一种形式，渗透或包容一般文化的各个层面和各种形式，不仅渗透到文化的精神意识层，而且渗透到文化的器物、制度、行为层；不仅包容文学和艺术等文化形式，而且包容其他一切文化形式。由此观照，大至国家，小到家庭，以至个体的修养，中国宗教都包含了浓烈的人文教化，学者万俊人认为宗教是一种重要的道德资源。“以一种宽泛的方式论之，各种宗教都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特殊的伦理，我将之视为信念伦理。”并提出了以宗教作为一种道德资源的充分理由，“从人类早期文化的生成和演化进程来看，宗教至少在两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人类道德的文化母体”，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宗教本身在人类生活中以其独特的方式发挥着某种普泛的“原始道德”的功能；一是从一般宗教的构成要素来看，任何一种健全的宗教体系本身都包含有极强的道德理念或道德要素。这是当前弘扬传统文化最为珍贵的理论宝库。

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就是要做到政治认同、文化融合、社会适应。政治认同，就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维护祖国统一，维护中华民族

大团结，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文化融合，就是将外来宗教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嵌入民族文化的基因。宗教适应社会，就是要不断调整观念、制度、组织等内容，与具体国情相适应，与时代同呼吸、与社会共命运。

画出同心圆：宗教在文化建构中的可为性

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费孝通先生的观点：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即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那么在弘扬传统文化、建设精神家园的历程中，宗教要有怎样的文化自觉，或宗教何为？

杨庆堃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被誉为研究中国宗教的“圣经”。他一反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宗教是“功能性神灵的大杂烩”的说法，通过区分和分析制度性宗教和分散性宗教来说明中国宗教特有的普遍性特征。他认为“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另一方面中国宗教有别于西方宗教，缺乏“显著结构”，缺乏独立的教会组织系统，宗教只能在吸纳世俗道德以图生存发展的同时，又为政治统治提供超自然的依据，这决定了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持续效力。

从此思想进路入手，我们可以从中国制度性建置的五大宗教与非制度的民间宗教两个方面讨论。首先从制度性宗教来说，信众庞大，组织健全，具有较强的社会动员力与信众摄受力。其中有的宗教组织机构网络遍布全球，所以在慈善、环保、救援、文化传播等领域可以大有所为。比如中国宝岛台湾的慈济功德会，其慈善事业的运作不分宗教与国度，遍布 30 多个国家与地区，在台湾拥有四百万会员，在全球有一千多万会员，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庞大的国际性慈善救济组织，涉及慈善、医疗、教育、人文、环保、社区志工、骨髓捐赠、国际赈灾，用慈济的术语来说，就是“四大志业八大法印”。经国务院批准，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于 2010 年 8 月 20 日在江苏省苏州市挂牌成立，成为大陆第一家由境外非营利组织成立的全国性基金会。多年来，中国宗教界发扬服务社会、利益人群的优良传统，积极参与和开展赈灾救灾、扶贫济困、捐资助学、医疗卫生等公益慈善活动，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赞誉。2012 年 2 月 16 日，国家宗教事务局、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六部委专门下发了《关于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意见》，肯定了中国宗教界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方面取得的成绩，强调了鼓励和规范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积极意义，明确提出了对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积极支持、平等对待”的工作要求，择要列出了鼓励宗教界从事公益慈善活动的主要范围、基本形式以及可以享受或者参照享受的扶持和优惠政策，具有鲜明的导向性。慈善恰恰是宗教通向社会的一个视窗，向民众展示中华传统文化中慈悲济世、救人急难的传统美德。2016 年 3 月 16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慈善法》，已于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这对宗教界开展公益慈善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支撑和法律保障。

同时宗教界可利用论坛、讲座等大型活动弘扬传统文化，如连续举办五届的世界佛教论坛、道德经论坛，以及主题为“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的中国基督教圣经事工展，中国伊斯兰教界开展的解经工作，中国佛教界的讲经交流会等。还可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和宗教教节日为时间节点、以寺观教堂为抓手、以宗教文化活动为平台，积极推动宗教文化的深入挖掘整理和继承弘扬。还

有在一些有条件的寺院观堂开展的读书班、书画班、古琴班，都是弘扬传统文化的课堂与场地。这些活动有效地向广大民众展示传统文化中经典、书法、绘画、雕塑、建筑以及茶道、香道、花道等文化艺术形式。同时充分运用现代新媒体手段，借鉴现代科技文明新成果，以一种让当代人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文化传播方式，如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对传统宗教文化的宣传搭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推广平台。尤其在当前“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中国宗教在回归传统、传承经典、实现对话、促进交流方面大有可为。

从非制度性的民间宗教来说，牟钟鉴先生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是由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组成的，雅俗互动，缺一不可。在信仰的层面上，民间宗教是民众的直接创造，又反过来直接满足民众的信仰需求，构成中国信仰文化的基盘。民间宗教是对应正统宗教或主流宗教而言，主要在下层民间流行，在历史上往往受到主流社会和宗教的歧视、排挤甚至打击，但却绵绵不绝，始终拥有众多信众，成为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民间宗教是中华民族信仰文化的丰厚基础。民俗是一种最具大众性和日常性的文化，宗教在民俗中的影响，从一个方面说明“宗教”是文化，而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世界观。学者马西沙指出：“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有特定的位置，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底层群众的笃诚信仰，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在弘扬中华文化的各项活动中，应充分注重民间文化的在地性、亲缘性与生活化，发挥民间宗教维系民间道德、活跃民众文化生活的功能，并将此能量汇入弘扬传统文化的全民工程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下，同宗教界结成统一战线，是我们党处理宗教问题的鲜明特色和政治优势。要坚持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相互尊重，多接触、多谈心、多帮助，以理服人，以情感人，通过解决实际困难吸引人、团结人。要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深刻理解宗教工作的本质是群众工作，善于用群众工作的思路和办法开展工作；深刻理解我国宗教的社会作用，最大限度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最大限度抑制宗教的消极作用；深刻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断提高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广度和深度；深刻理解构建积极健康的宗教关系，使宗教关系和谐真正能落到实处；深刻理解提高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依法正确处理宗教领域各种矛盾和问题，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找到最大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

其实道德危机就是文化危机、信仰危机，而更深层的危机是人们没有精神文化上的共识，因此从民族深层心理和传统精神文化的方向上探索解决之道，应该是一种可行的方法。中国人要建立自己的精神家园，找到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文化根基，构建中国人的文化识别符号。中国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王作安指出：宗教界要积极行动起来，“开展宗教文化建设，既要继承本宗教优秀传统文化，也要把自己放到整个中华文化中去审视。……要有宽广的眼界与胸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不断滋养和丰富自己，并自觉成为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弘扬者，”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供坚强的思想保证、强大的精神力量、丰润的道德滋养。

在当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新时期，要坚定不移地以“五个认同”为指南，构建区域文化新秩序，为经济发展奠定价值基础；创设文化交流机制，为大湾区建设提供平台支撑；打造文化传播品牌，为大湾区文化建设提升宣传效果；优化人才培养路径，为大湾区文化建设提供智力保障。大力弘扬传统文化，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为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认同提供内在驱动。

我在澳门的街头走一走

文 东方莎莎



作者简介

东方莎莎，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东省作家协会《粤海散文》执行主编，广东作家职称评审委员会专家库评委。

澳门的大街小巷很有故事，而且这些故事如同年份久远的存酒，不经意一开盖，香气四溢，醉人心扉。

我经常行走在澳门的长街短巷，我深知这些不起眼儿的石子路上，曾经留下过一些不平凡的脚印，一些看似普通却又伟大的先行者，为澳门点燃了文明曙光，才使得今天的澳门人更知书达礼，秀外慧中。我身在其中，也被文明之光照耀。

我喜欢随意地走，没有特定目的。这不，一抬头，伯多禄局长街到了。一群朝气蓬勃的学生从我身边经过，一阵风袭来，也将他们的青春气息吹来。对学生，我有一种由衷的喜爱，这大概与我自己做过 10 年的大学老师有关，与父亲、姑姑、姑父、大表姐等亲人都是老师有关，与我的祖辈中也有亲戚留洋归来创办过学校有关。

突然，我脑海里闪过一个名字“曹美琼”。她是 19 世纪出生在澳门的女子，是著名教育家陈子褒先生的得意女弟子。她不仅对老师创办的“赞化义学”倾囊相助，且在 1916 年独立创办了澳门第一所女子中学“维德女子中学”，学校就在这条街上，当时叫“白马行街”。这也是澳门第一间规定学生穿统一校服的学校。她自任校长 10 多年，为澳门女子教育的成长和发展不遗余力。曹美琼深受其师的影响，做人为学都以老师为榜样。其师陈子褒自号“妇孺之仆”，是澳门开展妇女儿童教育启蒙的第一人。

据说，江门人陈子褒在乡试中名次还考在康有为之前，可是他敬佩康先生的维新变法思想，甘愿拜在他门下，成为万木草堂一名学子。由于参加了康梁组织的“公车上书”行动，在变法失败后，他只得逃往日本，在那里，他又被明治维新时期最重要的启蒙教育家福泽谕吉的著作所折服。后来，他带着“文明开化”“教育救国”的思想，于 1901 年来

到澳门办学，从妇女儿童入手，开展启蒙教育，创办了灌根学校，赞化义学，自己编写粤语白话教材，如《改良绘画妇孺三字四字五字书》等，把后半生心血都花在对妇女儿童的文化教育启蒙上。老师为人师表很重要，由于陈子褒的表率作用，曹美琼也将自己的千金积蓄奉献给澳门的女子教育。他俩都深信，在一个家庭里，母亲是孩子的启蒙老师，让妇女有了文化，有了见识，有了教养，有了正确的人生观，对培养她们的下一代很有好处。而孩童则是一个家庭的希望、社会的希望、民族的希望。

其实，伯多禄局长街这命名，也是为了纪念为澳门文化教育做出贡献的伯多禄先生而改的。作为第二代土生葡人的伯多禄，有幸成为著名汉学家江沙维弟子们主持的圣若瑟修院的学员，9 年的求学生涯，他不但精通了葡语，也为日后成为汉学家、翻译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的老师们曾参与编撰了五部大字典，他觉得自己应该有一天也能像老师们那样教学和编撰书籍。功夫不负有心人，后来，他翻译了一部巨著《圣谕广训》，让葡萄牙人第一次透彻领悟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精髓。翻译之外，伯多禄还编写了《国文教科书》《葡文与中文的知识课程》等多部书籍，并在五所学校教授中文。他长期致力于中华文化的传播，鼓励澳门的土生葡人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真正地热爱它、融入它。

伯多禄出生于 1842 年，在 1885 年出任澳门第一任华务局局长。1942 年 6 月，澳葡政府为纪念伯多禄 100 周年诞辰，将原来的白马行街改为伯多禄局长街。

这伯多禄局长街，还有其它有分量的历史，比如在 1910 年，同盟会澳门分会租下钓鱼台（现



澳门的长街短巷都很有故事

银座广场处）的一座三层洋楼的二楼，设立濠镜公众阅书报社，实际上是从事革命活动。而1938年广州大学附属中学从广州迁至这条街的37号继续办学。抗战期间迁往澳门的广州培道女子中学，在20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也选址这条街的5号开设分校。1954年浸信中学也正式迁往街内办学。

此时我的耳边响起了琅琅读书声，读书声是世界上最美声音之一，它让我想起先贤们对文化教育的坚守。正是当初先贤们的远见卓识从这条街辐射出去，才让澳门这个曾经的小渔村闪烁着中西文化的光芒。

澳门还是辛亥革命的摇篮，因为孙中山先生不但在这里生活过，还在此酝酿和构建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早期革命思想。作为孙中山先生发动辛亥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澳门的历史记忆中闪烁着星星般久远且无法磨灭的光芒。还记得2011年，当我又走进回归12周年的澳门，走进博物馆参观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多个展览，立即联想到一条与孙中山先生有关的小街——草堆街。

草堆街最早是卖布的，不长，也就300多米，离澳门人说的“喷水池”即议事厅前地很近，是澳门半岛最中心的商业小街。如果你问澳门人最值得逛的澳门街道有哪些，估计他们多半会告诉你来草堆街，它是澳门半岛最早的街道之一。

草堆街最著名的地方非80号莫属，它是一栋百年老建筑，以前底层当店铺，上层住人。建楼具体时间已经不可考，1892年年末，孙中山先生曾向他工作的镜湖医院借了近2000元，在这里开设中西药局，为百姓解病痛，同时进行革命活动。

由于孙中山先生医术高明且体恤民众疾苦，收费低廉甚至不收费，引起一些葡籍医生的嫉妒和仇视，将他状告到法院，理由是他没有获得葡籍医学证书，不具备在澳门行医的资格。这样孙中山先生只有被迫离开澳门，来到广州。

到了201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购买了这里并进行修复，并在孙中山150周年诞辰时在此布展，从此这里作为公共展示空间向市民开放，供大家了解一个伟人和一段历史。

在草堆街上还有一家我喜欢的私人博物馆，那就是“留声岁月音响博物馆”，由澳门本土较具规模的太平电器公司所设立。因为该公司老板是一个音响超级发烧友，他从世界各地淘来各种留声机和音响设备。为了将自己的心水收藏与诸同好共享，于2002年12月4日开放了这间博物馆。

参观这间小型博物馆需要事先电话预约，预约之后第二天，我们来到博物馆，公司专门派了一个熟悉展品和留声机历史的帅哥为我们讲解。

我们在第一层的电力音响设备中看到了投币式点唱机、旋转式球型荧光幕电视机、真空管收音机、原子粒收音机、手摇式电话等。第二层的阁楼上则收藏有古老的手动音响设备，比如第一代滚筒式留声机、世界第一部卡式录音机、二次大战时的录音机、胶木78转唱片、座台式手摇风琴、手摇式音乐盒、播放黑胶唱片的影碟机等。这些古董可以在没有任何电源和光源的情况下，以手动方式运作。记得有个洋娃娃，帅哥说她已经90多岁了，身体里面藏着一个录音机，录有哄小孩子睡觉的歌曲，是当年欧洲人常使用的东西。还有那些夸张得能装下我的大喇叭，既可以播放手摇出的百多年前欧洲合唱团的音乐之声，是当年的录音设备之一。欧洲音响设备从手动发展到电能发动，历经百多年，而我们每人只花了30澳币，就大致了解了世界音响设备发展史，是一件赚翻了的事情。

在澳门街头走一走，我渐渐习惯了它中西文化的交融与包容，接受了它的伟大与平凡，欣赏了它的热闹与雅静。它的多张面孔，都值得我驻足好好凝视与抚摸。

丝路佛教外交

文 学愚（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学系教授）

在2500多年的佛教历史中，无论是印度的阿育王，还是中国的梁武帝，虽然他们虔敬信仰佛教、积极推广佛法，但是仍然未把佛教当成国家宗教。但是，这并不是说佛教与政治无关，或对国家没有产生任何积极影响；相反地，从早期佛教经典得知，佛陀关心政治，常常教授治国理念，国王大臣们听后奉为圣法，依教治国。佛教传播与政治是分不开的，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常与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在世俗政治为主导的中国封建社会，除了个别借用佛教，特别是弥勒信仰事件外，佛教常与国家意志保持一致，并致力为国家服务，其中包括外交。本文以佛教经典和历史文献中的相关资料为线索，分析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佛教外交，然后以近当代中国佛教外交实践为契入，探讨当代中国佛教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服务的可能性。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部分欧美学者创立公共外交理论，并在一些国家得以实践。其实，自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肩负起公共外交工作，其中，玄奘大师是一里程碑。作为一名留学印度17年的中国僧人，他在参学和朝圣过程中，宣传中国文化和大唐政治，推动中印邦交与合作。根据《慈恩传》卷五记载，玄奘大师回国前，曾受到戒日王的礼遇；在与后者的交往中，他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外交能力。戒日王早就听闻唐太宗的文功武略，但不知这位中国皇帝为什么会如此受称扬，玄奘大师为他做了详细描述：“玄奘本土见人怀圣贤之德，能为百姓除凶剪暴、覆润群生者，则歌而咏之。上备宗庙之乐，下入闾里之讴。秦王者，即支那国今之天子也。未登皇极之前，封为秦王。是时天地版荡，苍生乏主，原野积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



妖星夜聚，沴气朝凝，三河苦封豕之贪，四海困长蛇之毒。王以帝子之亲，应天策之命，奋戎振旅，扑剪鲸鲵，杖钺麾戈，肃清海县，重安宇宙，再耀三光。六合怀恩，故有兹咏。”玄奘大师的这一番话，充满赞美之意，乃至夸张之词，但作为外交手段，无疑增加了外国国王对中国皇帝的敬佩和对中国的向往；更何况，它出自一位倍受敬佩的佛教高僧之口。戒日王听后，赞叹不已，曰：“知此之人，乃天所以遣为物主也。”正是由于玄奘这样的宣传，戒日王随后派使臣来华，唐王朝随后派使臣回访，由此开启了中印两国的友好往来。《续高僧传·玄奘传》卷四云：“戒日及僧各遣中使，赍诸经宝，远献东夏。是则天竺信命，自奘而通，宣述皇猷之所致也。使既西返，又敕王玄策等二十余人随往大夏。并赠绫帛千有余段，王及僧等数各有差。并就菩提寺僧召石密匠。乃遣匠二人、僧八人，俱到东夏。寻敕往越州，就甘蔗造之，皆得成就。”佛教开启的中印交流，不但打开了两国邦交友好的大门，同时亦增强了中印两国文化和经贸往来，为中国带来了印度的造糖技术及文化产品。沈丹森以玄奘为例，分析了以佛教为中心的中印文化交流、商贸往来以及邦交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得到两国政府的支持，有效地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及在中国的发展。季羡林因此称玄奘大师为“促成中印两个世界大国第一次建交的第一人”，他说：“在沟通中印信息，特别是在两国统治者之间的信息上，玄奘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印两国正式外交关系的首次建立，应该归功于他。”玄奘大师及其印度之行为中国佛教外交树立了典范。

佛教外交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南北朝，乃至东晋时代。经过三个多世纪的传播和发展后，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结合，生根、开花、结果，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逐渐影响中国文化、社会和政治，中国开始成为一个佛教国家。东晋以降，得力于汉文化南移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进一步开发，以南京为中心的中国佛教深入社会各个阶层。佛教从依附政治开始影响政治，参与国家和社会建设。在许多来华的外国人的心目中，中国已然成为人间“佛国”，吸引南海诸国，特别是佛教国家人民的向往。据《梁书》卷五四记载，晋义熙年初，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国王听闻东晋孝武帝（373—396）信奉佛教，便派沙门昙摩由海上丝路，行程十余年，护送一尊玉佛像至中国南京，呈送中国皇帝。大通元年（527），狮

敦煌鸣沙山



子国国王伽叶伽罗诃黎耶，再派使臣致书中国皇帝，愿与大梁共弘佛法。另又据《宋书》卷九七记载：刘宋元嘉五年（428），狮子国国王摩诃南奉表刘宋朝廷，云：“我先王以来，唯以修德为正，不严而治，道济天下，欣人为善，庆若在己，欲与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难化。故托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台像以为信誓。信还，愿垂音告。”在当时，狮子国和中国都是佛教徒心目中的“佛国”，共同的佛教信仰建构了两国人民的友情、促成了两国间的邦交友好。

南北朝时期，林邑国、扶南国、盘盘国、丹丹国、干陁利国、狼牙脩国、婆利国、中天竺国等国国王，亦纷纷派史者前来中国，联络感情、缔结友好、奉献珍宝以及佛经佛像等。公元 428 年，天竺国迦毗黎国国王月爱遣使刘宋，盛赞中国国泰民安、繁荣富乐。迦毗黎国国王在给中国皇帝的信中表示，他的国民亦深受佛教文化熏陶、具足佛教信仰，“率皆修善，诸国来集，共遵道法，诸寺舍子，皆七宝形像，众妙供具，如先王法”。如果国王信仰佛教，以正法治国，那么“臣自修检，不犯道禁”，就会国安民乐。迦毗黎国认为，共同的佛教信仰和文化，以及相似的正法治国、慈悲爱民理念，可以成为两国永结同好的基础，虽然“出海遐隔，无由朝觐”，但“宗仰之至”，故“遣使下承”，以示友好。刘宋元嘉十二年（435），阇婆婆达国王师黎婆达陁阿罗跋摩遣使至南京。在其奉表中，国王首先概述了佛陀降魔、成道、度生、涅槃等事迹。他说，佛陀涅槃后，其舍利、经典、佛法僧三宝流布至中国，中国因此成为像忉利天宫一样的净土，中国皇帝“安处其中，绍继先王，以四海之水，普饮一切”。因此，师黎婆达陁阿罗跋摩表示：“我虽在远，亦沾灵润，是以虽隔巨海，常遥臣属，愿照至诚，垂哀纳受。”从这些国王的信表中，人们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的友好、对中国皇帝的尊重，不是出于任何军事或经贸压力，而是他们认为，中国皇帝信奉佛教、以法治国，故而成就了两国友好往来的基础。

从南北朝时期的史书中可以发现，当时海上丝路上的南海诸国都认为，中国国家富强、社会繁荣、人民安乐，这些都归功于中国皇帝信奉和推广佛教、正法治国的实践。梁武帝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自称菩萨皇帝，晚年致力于护持佛教、弘扬佛法，曾三次舍身同泰寺，王公大臣施金奉赎；同时他亦精通佛法、提倡佛教义学。梁武帝尊佛崇法之名远播海外，得到其他国家国王的敬重，许多国王慕名派遣使者至南京结交，中国因此成为诸多国家人民心目中的理想王国。根据《梁书 • 诸夷传》卷五四的记载，南朝梁天监元年（502）的一天夜里，干陁利国国王做了一个梦。在梦中，他听到一位僧人大赞梁朝盛况。国王不信，该僧人便带他来到中国实地观察，并拜见梁武帝。醒后，国王大为感动，命艺人画梁武帝像供奉于王宫。南朝梁天监十七年（518），其子毗邪跋摩继位，即派长史毗员跋摩至南京，奉表赞叹佛陀神威、中华佛国的庄严及其人民的幸福，曰：“于诸国土，殊胜第一，是名震旦。大梁扬都天子，仁荫四海，德合天心，虽人是天，降生护世，功德宝藏，救世大悲，为我尊生，威仪具足。是故至诚敬礼天子足下，稽首问讯。奉献金芙蓉、杂香药等，愿垂纳受。”

一位远在他方的异国国王，梦见中国皇帝，于王宫画像供奉，其子派使臣专程到中国朝供，除了可能的经济利益因素外，佛教信仰，以及对中国皇帝正法治国的敬仰亦至关重要。后人无法知道，这一记载是否是历史事实，但至少透露出一点讯息，即信奉佛教的中国和中国皇帝在外国国王心目中的地位，以及他们以佛教为桥梁与中国友好往来的期望。罗香林说：“梁武帝兴佛，推动了梁与海南佛教世界的交往和交流，当时与海南诸国交换的物品中有不少是佛事用品，如扶南进贡珊瑚像，天竺进贡旃檀佛像、婆罗树叶

等。”共同的佛教信仰打破了国家民族界限，缩短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建立了联络中外两国人民，特别是佛教徒感情的桥梁。在这座桥梁上，外国国王把各国佛教文化和佛教礼品，其中包括各种佛陀舍利、佛像、佛经、佛塔、檀香、菩提树叶、杂香药等，传送到中国。当然，中国皇帝在接受了这些外国礼品后，免不了礼尚往来，回赠中国特产如丝绸，以及其他佛教礼品，或派使者回访。

唐初著名密宗三大师之一的不空三藏（705—774），出身于狮子国，天资聪明、幼而慕道出家。14 岁时，于阇婆国遇拜金刚智大师，后一同前来中国洛阳，受到唐朝帝王的隆重接待和恭敬供养。公元 741 年，经唐玄宗恩准，金刚智计划返回天竺，求取密宗经典，但未久不幸圆寂。公元 742 年，唐玄宗诏令不空代师出使狮子国。不空带着唐玄宗给狮子国国王的国书，率弟子含光、惠辩等 37 人从广州出发，经诃陵国（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中部），抵狮子国，受到国王的热情欢迎，招待住佛牙寺。在狮子国期间，不空一行拜访了当时狮子国著名密宗大师普贤阿阇黎，受五部灌顶，求得十八会金刚顶瑜伽法门和毗卢遮那大悲胎藏。离开狮子国前，国王尸罗迷伽托献宝物及密藏经典。随后，不空等又游历天竺各地，搜集梵本经典，并于公元 746 年返回长安，翻译经典、建宗立说、传授密法。公元 765 年，唐代宗授不空法师特进试鸿胪卿，号大广智三藏，堪称唐朝“外交部部长”。公元 774 年 6 月 15 日，不空圆寂，追赠“司空”，谥“大辨正”。不空三藏的师子国及印度之行既是奉旨出使，又是遵师遗嘱，集佛事和国事于一身，为唐王朝佛教文化和外交事业做出过重大贡献。

佛教外交功能不但表现在中国僧人前往印度或锡兰（斯里兰卡的古称）等佛国求法方面，同时亦表现于印度僧人到中国传教，以及中国佛教向海外传播的过程中。佛教初传中国时，为了接待外国来华僧侣，朝廷或地方政府为他们提供居住、翻译、传教、办道的场所或佛寺。寺原是官署名称，汉武帝时，设有大鸿胪寺，北齐时更名为“鸿胪寺”，是中国封建社会官署九寺之一，主要职务有二：一、负责重大仪式活动、接待外国使臣等；二、左、右街僧录司，掌管国内寺院僧尼账籍及僧官补授等事。早期前来中国弘法的西域或天竺僧人，作为外国客人，常寄居于鸿胪寺。据《释氏稽古略》卷一记载，东汉永平十年（67），“摩腾入阙献经像，帝大悦，馆于鸿胪寺，兰亦间行而后至。帝于城西雍门外别立一寺，腾兰居之，以白马驮经而来遂名白马寺”。隋唐时期，中国佛教快速发展，鸿胪寺佛教外交功能进一步扩大，不但接待前来中国传教的外国僧侣，而且亦成为外国人学习中国文化和佛教的场所。根据《续高僧传》的记载，净名（卷十二）、静藏（卷十三）、灵润（卷十五）和神迥（卷十三）等高僧曾在鸿胪寺教授蕃僧以及东蕃和三韩的求法者。隋唐时期，许多新罗和日本僧人随其国家使节，如遣隋使、遣唐使等来到中国，参访佛教名山大川，学习中国佛教，迎请佛经和舍利回国供养。他们大多寄居于佛教寺院，跟随中国僧人研习佛法，寺院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场所。赵宋早期，许多狮子国僧人前往中国，如佛护及其 5 位弟子（北宋淳化二年，991 年），觉喜（北宋淳化四年，993 年），觅得啰（北宋咸平三年，1000 年），以及妙德（北宋大中祥符九年，1016 年）等。他们或带佛教经典，或佛舍利、菩提树、佛像等来到中国，受到宋王朝的礼遇，或住鸿胪寺，或住佛教寺院，为中斯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唐宋以后，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的变迁，特别是明代推行海上锁国政策以后，中外交通和佛教交流减少，寺院很少再现前来中国传教或求法的外国僧人，佛教外交功能亦逐渐淡化。但值得注意的是，明代佛教在郑和下西洋，特别是到访狮子国的活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无论是在传统

佛教还是学术界，郑和下西洋与佛教的关系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传统和历史文献一般都认为，郑和是一回教徒，他的南洋之行不可能与佛教有关联。但是，近数十年以来，学术界对此有了新的认识，部分学者综合多方新的可信史料和考古发现，一致认为郑和曾是一佛弟子，郑和下西洋与明成祖的佛教怀远政策有很大关系。

郑和曾 7 次下西洋，其中，两次登陆狮子国（斯里兰卡的古称）。1405 年至 1407 年，郑和第一次登上狮子国，到达康提。有关此行，传统史料有两种不同记载：一、康提国王维拉阿拉卡斯维拉抛弃正统的佛教信仰，郑和力劝他归信佛教，放弃异教信仰和实践；二、郑和试图带走国宝佛牙舍利回中国供养。1409—1411 年间，郑和率领中国商队第三次下西洋，带着大量的商品和礼物，再次到访狮子国。他们在歌尔港登陆，并在那里举办大型交易会，展销从中国带来的物品，如金银、丝绸、青花瓷、棉布，以及佛经和香炉等。1409 年 2 月 15 日，郑和等举行供奉礼式，向当地佛教寺院布施从中国带来的礼品，祭奉佛陀。供奉事毕，郑和等立布施碑纪念。1411 年，商队回国途中经停狮子国，但受到康提国王亚烈苦奈儿军队的围攻和掠夺。有关这次事件，《明史》云：“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两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这位亚烈苦奈儿国王，就是前面提到、郑和劝说其归信佛教的维拉阿拉卡斯维拉。

对于郑和第三次下西洋及其发生在狮子国的事，中外学者有不同的解读和看法，但一般都承认和赞叹郑和平等宽容、互利互惠、礼尚往来的精神。这与后来欧洲人入侵锡兰形成鲜明的对比。Lorna Dewaraja 认为，16 世纪，葡萄牙军队打败狮子国，占领部分岛国，随即采取极端而严厉的镇压手段，要求僧伽罗人改变他们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相比而言，郑和及其商队表现得相当包容和友善。虽然把不信佛教、胆敢掠夺船队的国王及大臣俘虏至中国，但并没有迫害他们，亦没有胁迫他们改变宗教信仰，相反地给予他们丰富的礼品，甚至还帮助他们选出德慧兼备的国王，护送所有被俘之人，包括新旧国王回到自己的国家。这种现象，除了可从当时中国外交和商贸往来方面进行考察，亦可综合当时明成祖佛教怀远政策、郑和佛教身份来加以分析，发觉其中的佛教外交因素。

郑和布施碑于 1911 年被重新发现。在同碑上刻有 3 种不同文字，另外两种分别是波斯文和泰米尔文。3 种碑文内容相似，所不同的是，波斯文碑供奉的对象是阿拉或“伊斯兰之光”，泰米尔文碑供奉的对象是毗瑟奴。对于这种现象，当代一些学者给予的解释是：在郑和庞大的商队中，有佛教徒、穆斯林、印度教教徒，不同宗教的信仰者根据自己的信仰供奉不同的崇拜对象。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也从侧面说明，郑和可能不是回教徒。郑和作为领袖人物，如果是回教徒的话，根据伊斯兰教教义，除了礼敬阿拉外，他是不可以公开崇拜或供奉其他神佛的。相反，对于一个佛教徒，特别是传统中国佛教徒来说，尊敬、供养其他宗教神明或上帝是没有问题的；郑和把佛陀当成保护神来祭奉，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没有任何逻辑或线索说明郑和信仰印度教。因此，纪念碑及其碑文基本上对应了当前学界对郑和佛教身份的确认。郑和的狮子国之行，一方面可以被理解为国家外交和经贸往来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亦可以被认为是佛学平等思想和佛教包容精神的展现，以及佛教外交的表现，是当时明成祖佛教怀远策略的一部分。

如果说，郑和的狮子国之行有佛教外交意

义，那么，这就要先确认他的佛教身份。郑和通达佛教，曾受菩萨戒，其佛学思想和佛教精神深受其菩萨戒师道衍的影响。《明史》卷一四五：姚广孝（1335—1418），法名道衍，本医家子，14 岁出家，是明成祖主要谋士之一，曾参与乃至主导了“靖难之乱”，“战守事机，皆决于道衍。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永乐二年四月，拜资善大人，太子少师，复其姓，赐名广孝。命畜发不肯，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仍缁衣”。另又根据《姚氏族谱》(1931) 的记载，道衍曾参与了郑和的第三次西洋之行，“法名道衍，字师道，师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读书学道兼通兵机。友人宗泐举公往燕合赞襄靖难之师……(永乐）七年，合同中贵（指郑和）驾巨舰自福建之五虎门航大海西南抵达林邑（今越南南部），又自林邑正南行八昼夜抵满利加（马来西亚），由是而达西洋古里大国”。虽然族谱中没有明文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道衍此次航行中途到过狮子国，并且指导乃至主导了郑和在该国的活动。因此，道衍的参与乃至指导本身就体现了郑和下西洋的佛教外交性质。道衍虽有僧俗双重身份，传统称他为“黑衣宰相”。在历史上，他既是一位有学问、有修持、护持正法的佛教大德，同时又是一位军事家、政治家，深刻影响乃至主导了明成祖时代的政治、外交及佛教政策。因此，对道衍来说，借用佛教为明王朝服务，或以政治保护佛教应是不二的，并与明成祖佛教怀远政策关系密切。

郑和下西洋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中外经贸往来和外交的壮举，其中佛教扮演的角色亦不应被忽视，这种角色不但可以从郑和及其狮子国之行中发现，同时也应从明成祖整体佛教怀远政策中找到佐证。明成祖对佛教的态度深受其父朱元璋的影响，对佛法义理有较深刻的理解和信奉，同时亦对佛教加以有效的控制和利用。“因其俗尚，用僧徒化导为善。”即位后不久，他就开始借用佛教实行怀远政策，联络信仰佛教之异域，多次派郑和、智光等往谕西域、乌斯藏等地，以及日韩、南洋等信奉佛教的国家招谕入贡。当这些国家的使臣或僧侣带着佛教经像以及其他珍宝来到中国，明成祖往往以数倍价值的财物、佛经、度牒、图书护敕以及佛像回赠。有鉴于此，我们亦可以这么认为，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亦有佛教怀远之意。另外，有学者认为，明成祖一生都在利用佛教为其政治服务。但是，即便如此，人们亦不应因此而否认他对佛教的信仰以及弘扬佛教的努力。其实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很大程度上二者是相通的。宣传佛教与利用佛教治理国家之间并非非此即彼，二者可以相辅相成。郑和下西洋是明成祖怀远政策的一部分，他的狮子国之行即明成祖和道衍佛教怀远努力的一部分，为当时的中外往来和国家建设做出了一定的贡献。明末思想家李贽说：“我国家二百余年以来，休养生息，遂至于今。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与姚少师之力也。”佛教怀远政策或佛教外交正是当时休养生息的一部分，给中国的建设和发展带来一个安宁和友好的国际环境。

佛教外交内容和形式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而改变，但无论怎样变化，佛教为国家服务的性质没有变。近代以降，佛教外交功能随着中外交流的中断而停止，直至 20 世纪 30 年代才又开始恢复。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佛教徒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开展佛教外交，协助中国的抗战运动。1937 年，抗战爆发后，太虚大师等努力寻求建立国际反侵略联盟，在国内与其他宗教徒一道，积极参加抗战活动，在国际社会中开展佛教外交，呼吁国际佛教界共同抵抗日本侵略。1939 年 11 月，经国民政府同意，太虚率中国佛教代表团从云南出发前往缅甸。在随后的 5 个多月的时间中，太虚一行访问了缅甸、印度、锡兰以及越南等国，受到当地政府、佛教界、文化界的欢迎。他们利用所有机会向所在国家的政府和人民

介绍中国佛教，说明中国佛教徒抗日情况，呼吁全世界佛教徒联合起来，支持中国政府、共同反对侵略战争、实现人类和平。

1949 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夺取了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外交和军事封锁，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末，中苏交恶，中国在国际舞台更为孤立。为了摆脱这样的处境，中国政府一方面强化“国家外交”，另一方面又鼓励和支持非官方、半官方或民间外交，其中包括佛教外交。1953 年 6 月，中国佛教协会在北京成立，其宗旨是：“团结全国佛教徒，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参加爱护祖国及保卫世界和平运动；协助人民政府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并联系各地佛教徒，发扬佛教优良传统。”佛教外交成为其主要实践内容之一。在赵朴初先生的领导下，中国佛教协会积极配合政府，充分利用佛教在国际社会，特别是东亚、东南亚各国社会政治中的地位开展佛教外交；邀请海外佛教团体和友人访问中国大陆，或派佛教代表团出访其他国家，宣传国家的民族宗教政策，或与他国佛教界共同举办古代高僧大德，如玄奘、法显、鉴真等纪念法会，以及护送佛牙舍利至缅甸、斯里兰卡等国巡展等。佛教外交为当时的中国打开了一扇大门，为同周边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做出了特有的贡献。当然，佛教在为国家服务的同时，亦为自己建构了生存和活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一些佛教寺院之所以能够保存至 20 世纪 80 年代，正是因为佛教外交的需要。

在中外佛教文化交流中，出现了许多为法忘身的高僧大德，他们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脊梁。在当时看来，他们的行为可能被认为是宗教或文化活动，但是数百年以后，他们的事迹或成为佛教外交的典范。法显法师就是这样一位把中斯友好历史与现在连在一起的人物。在当今斯里兰卡，法显法师可谓家喻户晓，他曾经居住过的村庄，现已更名为“法显村”。在近当代中斯两国政治、外交、文化，乃至贸易往来中，人们常常会听到法显法师的名字，乃至看到他的身影。1992 年 6 月，中斯两国共建的法显文化纪念馆落成，时任斯里兰卡总统拉纳辛哈 • 普雷马达萨、总理维杰杜哥及其内阁部长等，以及当时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张量女士出席了开幕典礼。法显法师俨然成为中斯佛教交流和两国友好往来的“永久大使”。

在国际关系中，国与国之间很少有完全相同的文化理念和完全一致的政治利益。不同的文化理念和政治利益往往把不同国家和人民分裂开来，乃至对立起来，构成形式多样的民族 / 国族主义。但是，具有缘起性空、慈悲平等、自利利他思想的佛教，可以帮助人们淡化对国家、民族、种姓理念的执着，打破人为的藩篱，促进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共同的佛教信仰，不但可以在行为上，而且可以从思想上、感情上，把个人、团体或国家联合起来，促进国家之间的平等相处、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佛教的这一精神和特色，在海上丝路和中国历史上得以充分体现。中外僧人或乘商船，或乘官船，往返于中印及沿途各国之间。他们既是佛教的传播者，同时亦是国家友好往来的使者，肩负起公共外交的使命。

在 2500 多年的传播中，佛教没有因传播而发动战争，堪任国际友好往来和世界和平的使者。同样地，没有任何一个佛教国家试图通过暴力把佛教信仰强加于另外一个国家。在以佛教平等、尚和、缘起、共生的思想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佛教外交实践中，国家与国家可以达至同体共生、相互合作、友好往来的目的。中国在隋、唐、宋、明、清曾是世界超级强国，或许正是受到佛教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一直善待邻国、包容异己。近 30 年来，随着佛教寺院经济不断壮大，佛教文化多元发展，佛教外交又赋予时代新意和使命。协助中外友好、共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或许正是这一使命的具体实践。

以检验检疫一体化助推广州国际航空枢纽建设

文 程海（广州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局长） 赖俊锋（广州机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副局长）

2017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标志着继京津冀、长江经济带之后，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正式成为又一个国家大战略。粤港澳大湾区拥有全世界客货吞吐量最大的空港群，国际航线全面覆盖东盟、中东、欧洲等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城市，要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经济大发展新引擎的驱动作用，共建大湾区政策的互联互通尤为重要。本文以检验检疫一体化服务广州国际航空枢纽建设为例，探索如何构建检验检疫一体化，公共服务的标准化，从而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检验检疫政策的互联互通。

一、粤港澳大湾区战略及其对公共政策互联互通的要求

2017 年 7 月 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以下简称“《协会》”）签署仪式，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全面启动。《协议》提出了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进一步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构建协同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国际合作新优势、支持重大合作平台建设等五大合作重点领域；五大合作原则：开放引领，创新驱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市场主导，政府推动；先行先试，重点突破；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及三大体制机制安排，包括完善协调机制，健全实施机制和扩大公众参与。

作为中国首个国家层面确认的“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雄厚，区位优势明显。其涵括“二区九市”（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和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中山、东莞、惠州、江门、肇庆共珠三角 9 个城市），不仅可以带动整个泛珠三角地区的发展，而且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如：2016 年粤港澳大湾区以不足全国 1% 的土地面积，不足全国 5% 的人口创造了 12.6% 国内生产总值。相比起京津冀和长江经济带，粤港澳大湾区要向世界级湾区对标，将更重于“对外开放”的功能。当前世界政治格局和经济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全球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有利于打破现有行政地域壁垒，实现更为便利的要素流动、更为开放的经济模式、更为理想的产业分工、更为优美的人居环境，从而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成为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支点。

粤港澳大湾区物流和辐射资源优势明显，陆海空交通物流网络十分发达，拥有全球最大的港口群和全球最大的机场群，已形成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立体式交通物流网络，陆海空多式联运初具规模；对内形成了国内“一带一路”城市交通基础设施深度一体化的格局，对外连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已成为中国乃至全球最大的物流门户和枢纽。相比起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因政策（包括检验检疫、海关通关政策）“边界化”和各地行政区域体制机制等原因，粤港澳大湾区物流聚合力相对较弱，有一些“分量”相当差距不大的城市、港口和空港呈现出“多极”的均衡化态势，珠三角地区内部港口和机场还存在同质化竞争，货站物流及供应链等管理水平国际化经验不足、冷链等基础配套设施不足、物联网智能化和信息化平台建设落后等问题，导致通关成本和效率还无法满足现代物流需要，不少物流和金融业务被新加坡、日本韩国等周边地区、国家的机场港口分流。如何充分借鉴港澳发展基础，进一步优化通关便利化环境，是当前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白云空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作用分析

一是建设大物流枢纽、要素交易和供应链金融中心的需要。大枢纽大物流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国务院关于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将广州定位为国际综合交通枢纽，广州市委市政府明确提出立足白云机场建设国际航空枢纽，进一步发挥自贸区和白云空港的优势，打造国际性的战略枢纽平台，使之成为“一带一路”物流和供应链管理的中心和枢纽。白云空港现已聚集了顺丰速运、联邦快递亚太转运中心、南方航空等民航业内或关联密切产业的知名企业，机场周边地区形成了以白云机场综合保税区、中澳新自由贸易园区、敦豪、中远、中外运等新物流产业。从近几年来全球航空货运数据来看，亚太地区客运量和货运量均居全球首位，有专家预测中国将成为亚太增长的“发动机”，而珠三角地区（不含香港）的航空货运量占到全国总量的1/6，其中白云机场占21%左右。白云机场每天有1000多个航班通达全球五大洲200多个城市，2017年的旅客吞吐量达到6600万人次，与国内、东南亚主要城市形成了“4小时航空交通圈”，与全球主要城市形成“12小时航空交通圈”；未来五年随着其T2和T3航站楼的落成，将迎来国际进出口和中转货物量的高速提升，白云机场的航空运量会大幅增长。大枢纽大物流的航空运输对通关效率提出了高效便捷的要求，需要检验检疫跨区域、跨国境加强合作和风险分析。近年来，机场检验检疫局先后与首都机场、上海机场、天津机场、成都机场等8个机场检验检疫机构建立起协作机制，加强口岸检疫、联合监管中转货物和旅客行李，为各大航空公司中转提供便捷高效的服务。

二是临空经济成为创新驱动重要增长极的需要。广州空港于2016年经国家发改委、民航总局批准设立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广州空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广州空港的战略定位为：全球综合航空枢纽、亚洲物流集散中心之一、中国重要的临空经济中心、航空经济示范区、华南地区重要的发展引擎和增长极。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产业结构调整的深入，不断增多的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对航空货运将有较大需求。高新技术产品进出口量的增加，不仅使航空货运量加大，还可为机场带来空地和空海联运、包装、分拣、报关、信息传递等高附加值的物流服务项目。当前，基于白云机场（中国三大国际枢纽机场）和南方航空（亚洲最大航空公司）及周边全方位的铁路、公路、海运等交通枢纽优势，广州空港经济区已初步建成富有潜在发展趋

势的临空产业基地，包括位居全球前列的飞机维修基地、富有创新性的飞机融资租赁业务、全产业链条的跨境电商业务等；航材分拨、生物医药、生鲜冷链、离岸金融、名品保税展示等产业发展迅速。广州机场检验检疫局主动深化改革，对接广州空港国际航空枢纽和国家级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近年来创新监管模式，实施进出境航空器材“直报免检”、进境鲜活货物“落地验放”、进境生物材料“直报转检”、进境汽车配件“集报统查”等监管方式，实现了货物口岸“零滞留”。经统计，2017 年 1 月至 9 月，白云机场货运量增幅同比超过 23%；其中经机场检验检疫局监管出入境航材货值达 32.58 亿美元，同比增长 3.82 倍；跨境电商进口量近 5 亿美元，连续 2 年位居全国前列；进口食用水生动物产品达 7 亿多美元，澳洲进口货物同比增长超过 70%。

三是国际航空枢纽是大湾区各大城市优势互补、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和通道。大湾区经济实质是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其中机场群分工定位是区域社会经济分工的延续，机场群与经济的紧密结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粤港澳大湾区拥有香港国际机场、广州白云机场、深圳宝安机场为中心的 3 个国际化空港，配套澳门机场、惠州机场、珠海机场和佛山机场等。建设广州国际航空枢纽，有利于发挥引领作用，加快构建开放、先导型经济体系，推动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加快航空运输、物流、维修、制造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创新发展，带动珠三角地区在更高层次和更宽领域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推动地区经济进入全球产业链高端环节，探索航空经济带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的新路径；有利于加快配套设施建设和完善服务体系，构建辐射“一带一路”和全球的航线网络，提升全球航空枢纽的国际竞争力；有利于优化发展环境，搭建高效的合作平台，吸引高端生产要素集聚，增强与港澳乃至全球的产业协作和文化交流，推进粤港澳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机场检验检疫局主动服务广州空港经济发展，围绕促进航空物流、航空维修、航空制造、商贸会展四大主导产业发展，出台了包括提升空港综保区贸易便利化水平、创新空港检验检疫监管机制、服务空港产业发展、支持建设国际航空物流转运中心和优化空港营商环境等五个方面 20 条措施，受到广大企业好评和地方主要领导充分肯定。

三、以检验检疫一体化全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更好地促进白云空港国际航空枢纽发挥优势作用

国家正对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进行顶层设计，将会进一步明确大湾区物流枢纽在国家和区域战略中的定位，建立共同推进大湾区物流枢纽建设的具体协作机制，实现各种运输方式的衔接和资源整合，并对优化口岸通关服务环境等提出新的要求。时任广东检验检疫局党组书记、局长施宗伟指出，共建粤港澳大湾区，推动三地经济融合关键在于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检验检疫要通过优化 e-CIQ 主干系统下的检验检疫一体化模式，完善供港鲜活产品等特殊商品通关规则体系，全面实现进口直通、出口直放。

一是要实现检验检疫一体化，为空港枢纽物流畅通打造便捷高效通关大环境。要在粤深珠三地检验检疫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上，全国检验检疫机构全面实施以“三通”“四放”“五统一”为主要内容的检验检疫一体化新模式。“三通”：即通报、通检、通放，企业可以自由选择申报地点、办理放行手续、检验检测结果互认；“四放”：即申报放行、验证放行、抽样放行、监管放行，加快口岸放行速度，探索实施“一线放开”、“二线安全高效管住”贸易监管制度，实现政策创

新和流程再造。“五统一”：即统一审单规则、统一业务规范、统一风险防控、统一信用管理、统一统计规则。同时统筹考虑区域内检验检疫资源，实现检验检疫资源重新配置和优化，实现业务和资源合理匹配，效率和效能最大结合，实现口岸内地均衡发展。大力建设以“ECIQ 主干系统”为基础的全国检验检疫系统一体化业务平台，实现数据互联互通、信息共享共用；并对接地方政府“电子口岸”，统筹检验检疫指令，实现检验检疫和口岸作业系统、物流系统的实时连接，实现关检“共用电子闸口”、共同放行。

二是要强化粤港澳三地检验检疫部门监管互认，建立服务空港群协调发展的良好合作机制。打通“9+2”区域行政边界限制，以通关一体化和便利化促进卡车航班、虚拟航班等空港群之间的多式联运，更好地促进各机场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建立须在口岸实施检验检疫的货物清单，清单外的货物企业可选择出口直放和进口直通；建立“一码通检、全系风控”的科学高效监管体系，在口岸风险有效防控的前提下，依托信息化监管手段，取消或最大程度简化港澳与内地货物往来的贸易管制措施，拓展现有“粤港跨境货栈”进境和“国际中转”等通关模式，减少通关环节，降低通关成本。通过清单管理和合格假定，在风险管理、分类管理和信用管理的基础上，利用信息技术手段建设五大平台（集中审单平台、风险预警平台、企业信用平台、检验检测平台和数据交换平台），实现信息互换、监管互认、执法互助，实现出入境货物跨口岸、跨区域检验检疫一体化作业，达到通关便捷，执法高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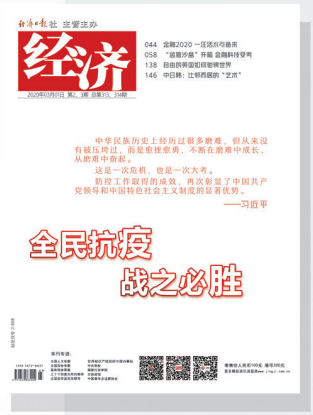
三是要实现公共服务标准化，促进粤港澳公共政策的互联互通。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一体化已是水到渠成，但不少专家均指出还需要跨越制度性障碍。探索建立粤港澳大湾区公共服务标准化管理机制，全面贯彻国务院“放管服”和实施“标准化 +”战略的要求，积极推进建立大湾区检验检疫公共服务标准化先进体系，并以此为示范引领，拓展范围涵盖至整个物流环节，学习借鉴港澳先进的物流管理经验，对整个通关流程包括装卸、运输、仓储、通关等方方面面的工作，形成统一、协调的通关时长和优质服务的标准，通过公共服务标准化促进各环节的有效衔接，简化、优化各项工作流程，降低物流成本，提升物流效率。国家质检总局在广州机场检验检疫局试点创建全国检验检疫公共服务标准化示范基地取得较好成效，在全国率先成立了检验检疫公共服务标准化委员会，委员包括了粤港澳三地检验检疫机构、机场以及航空公司等相关的专家和负责人；要充分利用好这个标委会的统筹协调作用，为推进三地检验检疫公共服务标准化，制定推出更多完善的可复制可操作的公共服务标准。

四是要加强战略研究和工作对接，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借鉴港澳检验检疫方面的先进经验，加强广州自由贸易港区建设政策研究和先行先试，系统研究广州空港作为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的战略定位、发展方向和政策诉求，及时转发政研成果。进一步完善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不断提高“互联网＋政务服务”和“物联网＋科学监管”水平，实施宽松的检验检疫管制政策，探索实施有限重点检查，对区内企业运作实施“隐形、精准、自由”监管新模式。深化关检“三互”合作，利用白云机场综保区红线调整的机会，加快建立集约监管模式和一体化监管信息系统，推动集中查验平台建设，实现口岸通关放行全流程的无纸化、智能化，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和效率。大力扶持跨境电商与保税展贸融合发展，探索建立“前店后仓、现场提货”下的快速通关政策，探索第一次抽检合格的同类商品第二次进口不再抽检或可不定期抽检的可行性。

经济

经济日报 主管主办

中央级媒体 国家级网站 智库型平台



经济杂志1999年1月创刊，是经济日报社（集团）主管主办的政经类新闻杂志，是党和国家指导经济工作的舆论阵地，传播发布经济方面政策信息的重要渠道。

经济网：国家级新闻网站 http://www.jingji.com.cn/

微信公众号：日阅读量5000+ 粉丝量：100000+

微博：日阅读量 42000 粉丝量：25595

学习强国号：《经济》杂志学习强国号于2020年1月正式上线

内容：报道政经新闻，预告政策信息，诠释经济政策，解读制度变迁，前瞻时局趋势。

受众：政府界、产业界、金融界、学术界的主流人群。

专送：中南海、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工信部、科技部、农业农村部、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国资委、国务院政研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20多个部委司局以上领导；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京西宾馆；省、市、县党政领导。





邮发代号：2-858

国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5199/F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2号楼5层

邮编：100054 **电话：**010-58393736

广东发展中心联系人：冷成银 **联系电话：**19875988916

二维码：

ECONOMY

国士无双：钟南山在春天里的七个瞬间

文 李楠楠（《人之初》杂志副总编辑）

1910 年年底，中国东北发生鼠疫，31 岁的广东台山人伍连德临危受命，出任东三省防疫总指挥，这位出生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剑桥博士仅用半年时间，就将席卷半个中国的大瘟疫扼制住。

那一役，国人记住了伍连德，他首次提出肺鼠疫分型，有针对性阻断飞沫传播，实施集中收治……5 年后，伍连德筹办中华医学会并出任首任会长，又十年后，另一位早已是全民偶像的人物写下极其不寻常的一段话：“科学输入垂五十年，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界相见者，伍星联（即伍连德）博士一人而已！”写这段话的人叫梁启超，他让后人记住了四个字“国士无双”。

历史总是惊人相似。2020 年冬春之交，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突袭武汉，并随春运的人潮悄声却又迅猛播至全国。

又是一名广东医生挺身而出，敏锐的钟南山明显闻到一丝异常，同样担任过中华医学会会长的“抗疫老将”连夜驰赴武汉，拉响全国警报，第一次提出“病毒肯定人传人”，这场阻击战由此进入具有转折意义的新阶段。

某种意义上讲，钟南山与一百年前的伍连德一样，是疫情防控的“关键先生”，在专业领域里更是民众的信任担当。“钟南山让我动我才动”，网友戏谑的一句话，反映出国人对一位医生最崇高的信任。

在这个戴着口罩的春天，我们细数了钟南山院士的七个瞬间，讲述他与新冠肺炎的抗争史。

第一个瞬间：武广高铁餐车

“我总的看法，就是没有特殊的情况，不要去武汉。”钟

钟南山：

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呼吸病学专家，中国抗击非典型肺炎的领军人物，长期从事呼吸内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工作。现任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国家健康科普专家，曾任广州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广州市呼吸疾病研究所所长、广州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中华医学会会长。

2020 年 1 月 21 日，新型冠状病毒联防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钟南山任组长。


广医附一院
钟南山
教授
呼吸内科
0036

南山略显疲惫，但面对镜头依然一贯眼神坚毅。

然而，1 月 18 日周六晚，说这话的人却坐在赶往武汉的高铁上。显然，他遇到了“特殊情况”。

当天中午，钟南山正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参加会议，突然接到一纸急令，要马上赶往武汉。年廿五正是春运高峰时刻，往武汉方向的飞机和高铁都一票难求。助手苏越明回家收拾了东西，又匆忙赶到会场与钟南山集合，挤上了傍晚 5 点 45 分从广州南站开往武汉的高铁。

临时上车的两人被安排在餐车一角，甫坐定，钟南山就拿出了文件细细研读起来。或许是开了一天的会议，院士中途靠着座椅眯了一眼，坐在斜对面的苏越明偷偷用手机记录下这一瞬间，画面中钟南山仰着脸，面前摆放着刚看完的文件。

这张构图明显不完美的照片，经媒体报道后在网上迅速传播，有心疼的网友，“这么大牌的院士怎么舍得委屈在餐车里”“别人回家过年，老院士却还在奔赴一线”，更多人是安心，“武汉疫情比想象中严重，钟南山来了就放心了”。



钟南山院士在武广高铁上

网友不知道的是，短短 72 个小时，钟南山辗转了四座城市。

1 月 17 日，他还在深圳抢救病例，18 日晚从广州抵达武汉后，休息不到 6 个小时，19 日一早他作为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出现在武汉市卫健委，听取报告后到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展开调研，之后再赴武汉市疾控中心。

中午来不及休息，继续开会研判疫情，直至下午 5 点。下一个行程已催着他到北京，落地首都机场时已晚上 8 点。匆忙放下行李，又转场国家卫健委参加会议，直至凌晨 2 时许才回到酒店，和衣而睡。

平时能做 10 个引体向上的老人累到睁不开眼，妻子李少芬看到丈夫的照片有些心疼，“你们能不能给他多睡一会?”但相濡以沫 65 年的她心里太清楚，“劝是劝不住的，因为他太在乎自己的病人了。”

第二个瞬间：肯定人传人

“根据目前的资料，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肯定的人传人。”

1 月 20 日晚上 9 点 30 分，央视《新闻 1+1》节目连线钟南山，面对白岩松的追问，他作了上述这番回答，依据是“在广东有 2 个病例，没去过武汉，但家人去了武汉后染上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现在可以说，肯定的，有人传人现象。”

一瞬间，全国哗然。斩钉截铁的回答让大家想到他非典期间面对中外记者的那次采访：

“按照你们的看法，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了控制?”“什么现在已经控制？根本就没有控制!”

“中国医护人员的防护有没有到位?”“没有!”

除了肯定人传人外，这一次，钟南山带来的回答依然耿直：跟 SARS 有些相似、14 名医

务人员感染、病毒很可能来自野味、有发烧就要警惕……一个个爆点让全国人民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计划无限期搁置，疫情进入科学防控的全新阶段。

实事求是，科学精神，是钟南山这一代学者镌刻在灵魂里的信仰。

2003 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授予钟南山的颁奖词说道：面对突如其来的 SARS 疫情，他冷静、无畏，他以医者的妙手仁心挽救生命，以科学家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应对灾难。他说“在我们这个岗位上，做好防治疾病的工作，就是最大的政治”。

这掷地有声的话语，表现出他的人生准则和职业操守。他以令人景仰的学术勇气、高尚的医德和深入的科学探索给予了人们战胜疫情的力量。

有记者提问钟南山，您理解的科学精神是什么？他分了两段话回答，“我接触过许多搞学术的人士，真正有学问的人，我感到他们有这样的规律，他敢于肯定自己，也敢于否定自己，这是最重要的。”“他有自己的探索和追求，在实践中发现是对的东西，他敢于坚持，但是，经过实践发现是错的东西，他也敢于否定。”

这种理解，是他从基因上继承了父亲严谨的治学态度上得来的。

“我父亲是儿科专家，他一生讲话很少，但每讲一句话，一定都有依据。”钟南山曾回忆，“文革”时父亲写了一本儿科鉴别诊断的书，让他改一下序言，钟南山建议补上几句话跟上当时的形势。“他回了我一句：‘加了干什么?’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钟南山的父亲钟世藩，是我国儿科学的泰斗级人物，国家一级教授，毕业于协和医学院，1949 年受聘于世界卫生组织医学顾问，曾任广州中央医院院长。母亲廖月琴曾被派到美国波士顿学习高级护理，是广东省肿瘤医院（现中山大学肿瘤医院）创始人之一。

第三个瞬间：与总理的握手

就在连线《新闻 1+1》的当天，钟南山还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

1 月 20 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专门邀请钟南山等专家参会并发表意见。议题结束后，总理特意走出常务会会场，与钟南山握手话别。

10 天后的 1 月 30 日，李克强总理在中国疾控中心召开座谈会，就进一步加强科学防控疫情听取专家意见。会议开



李克强再次与钟南山握手（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始前，总理说，本该与大家握手的，但按你们现在的规矩，握手就改拱手了。会议结束后，李克强与专家们告别时，特意对钟南山说："还是握一次手吧！"

摄影师记录下非常时刻的这次握手。政府对专家的信任和依赖，是这次疫情得以控制的一个关键因素。

钟南山披挂上阵，担任的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他还临危受命，出任紧急组建科的科研攻关组组长。

外界经常质疑，尽管非典已经成为历史，但中国的卫生防治体系是否能经得起这次疫情的冲击。钟南山认为，"我不相信会再出现像 SARS 这样的一个情境，SARS 是措手不及，而且没有很认真地做好公共卫生的预防预警与组织工作。自从 SARS 以后对中国是一个非常大的教训，2009 年应对 H1N9 就很好，从政府到海关都行动起来，老百姓也没有很恐慌，应该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强大的预警机制。"

一席话，市民心里有了底，哄抢物资的情况在本次疫情中几乎很少看到。

钟南山也支持政府的重大决策，"我想人们也许会不理解武汉封城和类似的事。但我要说，这样做绝对是必要的，中央政府的决定是正确的。如果再晚几天，将导致遍及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扩散。"

"中国从不怕外界的骂声，这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有信心。只要有这个要素，我们总能走出正确的道路！"2 月 27 日，钟南山院士在广州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的表态，掷地有声。

第四个瞬间：谈武汉时落泪



谈起武汉这座英雄城市，钟南山院士不禁落泪（图片来自新华社）

武汉封城第 5 天，钟南山落泪了。

1 月 28 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他讲了一个细节，有个学生前一天晚上跟他分享一个信息，在武汉的街道上听到老百姓唱起国歌，这让他很感动，"我觉得劲头上来了，很多东西都能解决。"

"全国帮忙，武汉是能够过关的，武汉本来就是一个很英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面对镜头讲完这句话，一向严肃的院士眼里噙着泪光，非典期间广州的经历让他深有体会。他明白，武汉正经历着什么，他更明白，奋战在武汉一线的医务人员经历着什么。

在《钟南山传》中记载着这样一个细节：高中时的钟南山开始着迷阅读苏联文学，来自苏联革命的浪漫主义教育，渗透着钟南山的灵魂。

或许正是如此，才让他对"英雄"这个词有如此深刻的理解——经历苦难，默默付出，永不言败。

2 月 11 日，钟南山在另外一个采访中再次提到"英雄"这个词，谈到因染上新冠肺炎不幸去世的李文亮医生，眼中带泪的钟南山说，绝大多数人把李医生视为"中国的英雄"。"我为他感到骄傲！他在 12 月底把真相告诉了人们。"

这种精神激励着院士团队，素有呼吸领域"国家队"之称的钟南山院士团队是最早开赴湖北的医疗队，1 月 23 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桑岭驰援湖北，作为国家卫健委专家志愿队参与一线救治。团队核心成员、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张挪富则带领医疗队接管了武汉协和医院西院区重症监护室（ICU），院士团队



钟南山院士送别驰援武汉医疗队

在广州、武汉两地形成了危重患者救治的“三个战场”。

广东第 22 批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程远雄医生是武汉人，也是钟南山院士的学生，此前因直播科普防疫知识在网络走红。他坦言，“导师都冲锋陷阵，我更不能畏缩在后”。

“后方有家事、急难事，甚至心事，我们都尽量安排好、解决好。”2 月 22 日下午，钟南山通过远程视频连线广东驰援湖北抗疫前线医务人员，给前线医务人员加油打气，鼓励他们继续以良好的精神状态投入工作。

在许多一线医生心目中，钟南山是一面旗帜，更是定心丸，“看到钟老师，我们心就定了。”

第五个瞬间：问候前线医务人员

时隔 17 年后，依然有人对钟南山当年那句“把重症病人都送到我这里来”心存疑问，揽下这么重的活干嘛?

在一张拍摄于 2003 年 1 月的照片里或许能找到答案，钟南山带领的团队，身穿的还不是正规的防护服，但步履坚决，没有半点迟疑。作为一名医生，疫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病房就是战场。

非典期间，虽然抢救下一个又一个重症和危重症患者，但呼研所团队共有 14 名医务人员被感染击中。医护人员的防护，是钟南山最担心的问题。

他深知，即便把重病人都送过来，团队的收治能力也有限，阻击传播量更广的新冠肺炎，更重要的是发挥各地医护人员的作用。

这一次，他的主战场从病房移到了屏幕上。疫情发生以来，他的助手忘记钟南山究竟进行过多少次远程会诊了，远程会诊一次下来就要两三个小时，“盯着屏幕看，声音不像现场那样清晰，所以比平时开会更耗费精力。”

但正是通过这面屏幕，钟南山把他的经验和智慧贡献给更多一线医护人员：

1 月 29 日下午，广东首次开展新冠肺炎远程会诊，在讨论一名重症患者是否可撤离 ECMO（体外膜肺氧合）时，84 岁的钟南山声如洪钟、条理清晰分析病情，给出了直接意见“还不能撤离 ECMO”“抗病毒药物利巴韦林在 SRAS 中使用的效果不明显，建议不用”“用莫西沙星时需要格外小心”。

2 月 6 日下午，在对 10 例危重症、重症患者的远程会诊上，钟南山提出，相比其他兄弟省市，广东定点收治医院对于住院病患的管理过于



钟南山与湖北荆州的首次远程会诊

严格，对于符合四大项出院标准的还是要让患者尽快出院。

2 月 23 日下午，钟南山首次与广东对口支援湖北荆州医疗队进行了远程会诊，会上透露国家药监局刚刚批了几种药品，这些药品投入使用后，将对新冠患者甄别、诊治起到很好的帮助。最新的防治消息，给前线人员打了强心针。

有时，他也通过屏幕向前方医护人员表示问候“今天是礼拜天了，其实基本没什么礼拜几。就向大家做一个问候，希望疫情走势像我们预料的那样，继续往下一点。”

一名医生告诉笔者，听到被问候那一瞬间，突然想掉泪。

第六个瞬间：发布会上答谢媒体

每当有重大疫情来临，外地媒体经常会羡慕广东，“广东出了钟南山，新闻不怕没线索”。

钟南山和媒体之间，似乎有种彼此的默契。《钟南山传》作者叶依是人民日报社《健康时报》一位资深记者，有一次两会采访时，为绕开围追堵截的记者，钟南山问堵住他的叶依，能不能一起爬楼？钟南山的房间在 18 层，叶依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事后钟南山在公开场合说起：“没想到我上去后她马上就上来了。所以不管你做什么工作，如果有执着追求，有热爱，你常常会成功。”

熟悉他的跑线记者，从钟南山的神情中可以捕获疫情的变化。

1 月 21 日，广东在全国省级第一个召开关于新冠肺炎的新闻发布会，刚从北京赶回的钟南山出现在记者面前，对于目前新型肺炎疫情信息公开透明，他回答“在这个问题处理上，没有任何的保留”，让在场媒体松了口气。但在那场发布会上，他全程严肃，还特别提醒“新型肺炎防控要避免二代传播，医院尤其得注意”。

一个月后的 2 月 18 日，钟南山再次出现在广东省新冠肺炎新闻发布会上。开始前，钟南山在麦克风里小声地说了一句：“把口罩摘了吧！”随后摘下口罩。

发布会最后，钟南山和在场的人聊了几句家常，在场记者却捕捉到一个被网友称为“胜利曙光”的瞬间：他脸上终于露出久违的笑容。

在重大疫情面前，舆情是另外一个重要战场。很多时候，“钟南山”三个字本身就是重大舆情。

1 月 27 日，一张截图在微信群中流传，称当晚 9 时 30 分，央视新闻频道白岩松主持《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专题现场直播，将邀请钟南山院士介绍疫情，请家长朋友们届时观看。事后被证明这是一个谣传，白岩松在回复媒体的短信中写道：“谣言传得如此剧烈，很多人就信以为真，一旦 9 点半没看到结果，就会有各种猜测。”

疫情紧逼，钟南山的每一句话都可能都会衍生出意外的后果。对于媒体，他既开放又慎重。

但这一次，钟南山给了媒体大大的赞。2 月 27 日上午 10 时，在广州医科大学举办的疫情防控专场新闻通气会上他特别提到，感谢媒体如实报道，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战场，“媒体能如实报告情况，现在小道消息太多了，断章取义。”

发布会结束，到场记者对钟南山院士以及科研、医护工作者报以热烈掌声。

关键时刻，疫情和舆情，都是要守住的重要阵地。

第七个瞬间：院士戴上了N95

1903 年，法国驻广州领事馆向清廷租借广州靖海区长堤 224 号（现沿江路 151 号）办起了“中法韬美医院”，开启了今天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百年历史。但不少外地来求医的患者，打的士还是会通俗地直呼“我去钟南山医院”，每次司机总能完美送达。

如今，84 岁的院士依然奋战在一线，在广医一院 30 层的大楼上，有一盏灯光正是从钟南山的办公室照出，办公室隔壁是一间会客室，里面除了书柜外，四壁密密麻麻挂着各种合照、奖杯以及同行、患者送来的祝贺书画。

会客室正中挂着一张他打篮球的照片，上篮瞬间雄姿英发。其



钟南山院士热爱篮球运动



钟南山院士在示范如何正确地戴与脱口罩



网友说，终于看到钟院士戴上N95口罩

实，钟南山在大学时就是一名运动健将，在 1958 年第一届全运会比赛上，他以 54.2 秒的成绩打破了当时 400 米栏全国纪录。在北京大学医学部学生田径记录表上，从 1959 年到 2020 年的 61 年间，他创造的 110 米栏和 400 米栏学院纪录，至今没有后来者能破。

“锻炼就像吃饭一样，是生活的一部分，人最大的成功就是健康地活着。”这是钟南山经常挂在嘴上的话。

除了疫情以外，钟南山更愿意给大众传播科普知识，“尽量减少走亲访友，尽量少去人员密集的场所，出门戴口罩，在室内注意通风，勤洗手，多运动，少熬夜。健康年才是幸福年。”

“这里不是疫区，关键戴好口罩，但脱口罩也同样重要，没脱好反而会污染到。”1 月 28 日下午，在广东省卫生健康委与国家卫生健康委专家远程讨论新冠肺炎治疗用药后，钟南山接受人之初杂志社邀请录制“如何正确戴脱口罩”视频，一分钟不到的短视频，一天内在各大网络平台播放量超过一个亿。

在几乎所有的公众场合，钟南山戴的都是普通口罩。2 月 7 日下午，他从医院赶到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参加疫情研讨后接受媒体采访，谈论疫情拐点问题。但细心的观众和网友却从视频上发现，这次钟南山专门戴了一个医用 N95 口罩，“看到这一幕，真的放心好多”，有网友这样留言。

时间又回溯到 17 年前的春节，第一例危重肺炎病人出现人传人现象。大年初三，钟南山被任命为广东省非典型肺炎医疗救护专家指导小组组长，奔赴那场未知战役的最前沿，那一年，他 67 岁。

“如果下一次 SARS 来临，我们有信心第一时间完成诊断。”2018 年 9 月的一天，在广州举行的一场国际论坛上，钟南山如是说。

如今，下一次“SARS”来了，在 2020 年的春天，我们梳理了钟南山的七个瞬间，回应了一名老将关于这场战役的点滴。

清华重要奠基人：梁诚

文 钟庆才（整理）

清华大学新生入学后的第一课，是参观校史馆。走进展馆里面，最先映入每位学子眼帘的就是梁诚先生的照片。梁诚是何许人？与清华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有如此高的地位？

其实，梁诚与清华的关系十分密切，可以说梁诚直接催生了清华学堂，在此基础上又衍生了清华大学。人们称他是清华重要奠基人，更有人誉他为“清华之父”。作为清华学子一员，我心中一直有个夙愿，把梁诚精彩人生的有关内容整理出来，以怀念这位先贤，希望发掘梁诚的历史文化价值，以期让更多人认识梁诚，了解梁诚。

从广州黄埔村走来

梁诚（1864—1917）是一位地道的广州人，原名丕旭，字义衷，号震东，或镇东、振东。1864 年 11 月 30 日，他出生在如今的广州市海珠区新滘镇黄埔村，这是一个中外驰名的古码头村落。早年的黄埔古港附近的村落规划很有特色，根据“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的古语分为八字堂，梁诚的家就在“洪字堂”中，在出国留学之前，梁诚一直居住在这里。

1872 年，中国发生了“中华创始之举，亦古来未有之事”。这一年，清政府首次向美国派遣官费留学生。1875 年 10 月，未满 12 岁的梁诚便在其族兄梁肇煌推动及家庭的资助下考取第四批留美学生。1878 年，梁诚入读马萨诸塞州安度华的菲利普斯学校，同时在阿默斯特学院补习希腊文。1881 年，梁诚在菲利普斯学校毕业，正准备第二年入读耶鲁大学或阿默斯特学院，但因清政府提前召回留学生而未能完成大学梦。他初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又兼理电讯与记录事，后在大清会典馆任职。期间认识了即将赴任驻美公使的张荫桓，并得到他的欣赏。不久随张荫桓公使赴美，后任使馆参赞，从此开始了他的外交官生涯。

梁诚在体育上的贡献也是可圈可点，使他成为中国近代体育史上的重要体育名人。梁诚是留美学童中最著名的棒球手。求学期间的他曾多次代表学校参加棒球比赛，如 1881 年间，曾参与对额士达（EXETER）争夺锦标一级，他凭其个人技术优势，得获大捷，数十年后仍为当地人士所津津乐道。1903 年他抵美接任伍廷芳任驻美公使，不久，恰逢他的母校举行建校 125 周年纪念活动，他被邀请为贵宾。当时的美国总统问梁诚，在中国留美学生中，有一位“获得好评、蜚声校际的棒球好手究为何人”？梁诚回答“就是我”。从此以后，梁诚在美国“对于交涉事项，一帆风顺，而白宫政员无不刮目相看”。1903 年至 1908 年年初，梁诚以三品卿衔资格出使美国、秘鲁、古巴等国。他不负国家重托，经过反复交涉，争回我国庚子赔款多出部分用于教育，开办了清华大学；争回粤汉铁路筑路权益等。这大概是中国近代史上体育为外交服务的最早案例。

梁诚曾先后任中国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古巴、墨西哥、德国等国公使。任满回国后，曾两次跟随中国特使，先后赴英国和美国，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操和出色的外交才能，博得赞誉。



梁诚

1912年年底，梁诚因身体不适，不再担任公职，回到家乡广州故居，陪伴母亲。大约在1915年举家移居香港。在香港，他一边与病魔做斗争，一边积极参与慈善活动。于1917年1月12日因患癌症，医治无效而去世，享年53岁。

梁诚是一位晚清时期的爱国外交官，一路走来，跌宕起伏，但他那开放的胸襟、包容的态度、低调务实的作风，以及为国家、为民族的利益奋斗、永不松懈的精神，始终激励人们。

巧争庚子赔款

美国向中国退回超额部分的庚子赔款是由梁诚率先提出来的。

清朝末年，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北方部分地区达到高潮，大清帝国和国际列强开战，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紫禁城皇宫。1901年（辛丑年）9月，中国和11个国家达成了屈辱的《解决1900年动乱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并以各国货币汇率结算。美国得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在其后的1903—1905年“付金付银”交涉和1922—1924年的金法郎案交涉中，中国背负的赔款又先后增加了800万两白银和7000万两白银。这笔钱史称“庚子赔款”，西方人称为“拳乱赔款”（Boxer Indemnity）。

1904年，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虚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转变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

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要求美国退回超额索取的赔款。

1905 年，一个转机出现了，美国政府经过调查，发现本国原索赔额度虚高，认为“除确实费用及一切损失赔偿 1165 万美元，所余 1200 余万元其实是多余的赔款”。梁诚闻讯后，抓住机会向美方提出了降低赔款数额的要求，并多次向海约翰交涉提出：“各国若将赔款核减，于我财政殊有补益，贵国如能倡首，义声所播，兴起闻风矣。”海约翰回以“贵大臣所言确有至理，自当极力代谋”来表示了对梁诚倡议的支持。次日，海约翰便让驻华大使柔克义起草了关于退还部分庚子赔款的备忘录，该备忘录指出：“经调查，美国公民在义和团运动时期所遭受的损失以及美国军队的开支并非最初估计的那么多，鉴于这一事实，我建议授权行政部门通知中国政府，此后美国只要求赔款总数的一半。”得到海约翰的首肯后，梁诚遂电告外务部，建议清政府将对美的外交重点放在争取赔款核减上。

事已至此，似乎退还赔款已经顺理成章，可怎料风云突变，中国发生了粤汉铁路收回路权事件和在广东的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美国也同时爆发了排华运动，引发了中国国内声势浩大的抵制美货运动，这使得中美关系急转直下，美方开始以各种理由拖延讨论退还赔款事宜。

眼看退回赔款事宜难以实现，几乎陷入停顿的困局，但梁诚还是积极活动。他频繁地前往美国国务院、国会图书馆等处查阅各种档案。从资料中，他证实了美国在庚子赔款中所提在北京等处所受义和团焚杀劫掠之损失，与事实有很大出入，由此推算出赔款数目确实是虚高的。他还多次走访参与赔款的美国当事官员，查出中国实际应赔付给美国的只有 200 多万美元。

梁诚在美多年，深知美国政治运行模式。他除了游说美国朝野，与美国官方保持沟通之外，还通过民间活动、演说及新闻媒体提出退款之说，通过各种渠道争取美国各界的支持。

他还采取灵活的外交方式，绕过顽固的国务卿鲁特，找到与他关系较好的新任内务部大臣和工商部大臣向时任美国总统老罗斯福陈述重核美国损失的必要。梁诚甚至不惜通过私人关系直接向老罗斯福施压。在安多弗学校的一次毕业典礼上，他将自己与老罗斯福之间的交情特意透露给参加聚会的校友，以期获取更多人对他的支持。

老罗斯福终于让步了。1905 年 5 月 2 日，他正式通知梁诚同意重新对美国的庚子赔款数目进行核实。1908 年 5 月 25 日，美国国会众、参两院联合决议，退款数目最终定为 1196 万余美元，退款将从 1909 年 1 月 1 日起开始实行。

推动兴建清华学堂

始建于 1911 年的清华大学是中国的名校之一，也是中国系统化留美教育的发源地。而这所百年名校的发源，与梁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曾为留美幼童的梁诚对教育事业有着特殊的感情。早在 1903 年他出任美国公使之时，同行学生就有 26 人，他亲自将其中 7 人选送至阿姆赫斯特读预科。此后，他多次出席美国东部中国学生会大会，向中国留学生讲述他早年在美国的留学经历。这些经历在他心里种下了兴办教育的种子。

在争讨庚子赔款的过程中，他致力教育的赤诚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1905 年 4 月，梁诚与即将赴中国的驻华大使柔克义商讨退款数额，柔克义就曾以美国总统的名义询问中国将如何使用这笔退款。梁诚回曰：“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其实，在谈判前，梁诚就已预判到美国会有意刁难，提早建议外务部做好应对之策，并提出对庚子赔款用途的想法：办学堂、派遣留学生。

从 1895 年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引发了国人深深的思考。一直到 1905 年科举制被

正式废除。至此，出国留学成为很多中国青年救国图存的一条重要途径，赴日留学人数激增，从 1896 年清政府第一次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至辛亥革命时，留日学生总数竟超过了 2.2 万人。梁诚敏锐地观察到 20 世纪初中国海外留学人数将与日俱增，在历史关节点上，用美国退回多余的庚款作为广设学堂、派学生赴美国留学经费，美国政府必然“喜得归款之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且对我国有利、对民族有利。

果不其然，梁诚的这一提议迅速被美国政界所接受。

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因为美国精英阶层，包括柔克义也认为“庚款兴学”可以缓和中美间的矛盾，改变中国人对美国人的印象。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斯在 1906 年给老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认识到，面对当时大批中国学生去日本和欧洲留学的趋势，他担心中国将会仿效欧洲、日本，而不是美国。鉴于此，他进一步建议美国政府，把交回中国的钱，用于教育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他的建议，正是适应了 20 世纪初美国对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对中国渗透的战略需要，因而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老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咨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他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

1908 年 5 月 25 日，美国国会通过老罗斯福的咨文。同年 7 月 11 日，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1908 年 10 月 28 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 4 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 100 人。如果到第 4 年就派足了 400 人，则自第 5 年起，



清华园

每年至少要派 50 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

由此可见，美国的“庚款兴学”是作为一项长远的对华战略提出来的，是为了美国的长远利益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无论“退款”也好，“兴学”也好，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需要，都是在当时情况下，为抵制中国人民的反美情绪，缓和与中国人民的矛盾所做出的“重要之举”。

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为选派赴美留学生，清政府于 1909 年 6 月在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

1909 年 8 月，在北京西郊设立游美肄业馆，并定咸丰时期的“清华园”为游美肄业馆馆址，学校的建设费用几乎全部来自梁诚努力争取而来的庚款退款。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 630 名考生中，录取了 47 人于赴美留学。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10 年 8 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 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 70 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有成就的大有人在，如大名鼎鼎的胡适先生，他当年考了第 55 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1911 年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 10 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 1000 多人。游美肄业馆创立之后，留美教育逐渐系统化。1911 年 2 月，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设中等、高等科，每科学制为四年。1912 年，清华学堂改由外交部主管，教育部不再参与，留学色彩更趋浓厚，学堂本身则直接听命于美国驻华使馆，由美国对董事会及校务进行控制。同年，清华学堂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 年，又再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1933 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考取庚子赔款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 12 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

清华明天更美好

梁诚通过高超的外交技巧，为清华的建设提供了资金，从而使系统化、大规模的留学教育成为可能，为中国近代教育开辟了一片新天地。今天的清华人才辈出，屹立世界教育之林的塔尖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清华大学逐步确立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长远目标，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新时期。学校先后恢复或新建了理科、经济、管理和文科类学科，并成立了研究生院和继续教育学院。1999 年，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合并成立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2 年，原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并入，成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国家和社会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实施“211 工程”“985 工程”，开展“双一流”建设，清华大学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国际合作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进展。目前，清华大学共设 20 个学院、59 个系，已成为一所具有理学、工学、文学、艺术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管理学、法学、教育学和医学等 11 个学科门类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清华大学作为国际国内顶尖学府，在多次世界上综合排名中还是相对靠前的。在 2019 年 10 月 22 日，四大权威高校排行榜［US news、上海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RWU）、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之一的 US News 发布的 2020 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清华大学排名有了显著提升，排在 20 位左右。

明天的清华，前景光明。

怀念外公杨力宇

文 文钦梅（广州市作家协会会员）

岁月流逝，世事沧变。2019 年 8 月 17 日晚 21 点 15 分（北京时间），国际知名政治学者杨力宇教授永远定格在历史中。几天后，国务院台办在《人民日报》（海外版）深表哀悼：“先生虽去，风范长存。”追思会上，中国驻美大使馆特命全权大使崔天凯敬献了花圈，公使徐学渊向杨老家人转交并宣读国台办、国侨办及驻美大使馆唁电。

我虽在隔海相望的中国，但消息传播很快，外公杨力宇辞世当晚，玛丽姨婆告知我：“我哥在美国与世长辞。”顿时，我感到一阵心酸，怅然若失。记得 2017 年元月，我前往美国弗吉尼亚里士满拜见他时，他身体状况已不太好。人固有一死，或坦然地走不留遗恨，或急促地走落下了未竟之事，而他，是安静地走，心里却留着遗憾。

外公一生致力于两岸关系，主张国家和平统一，为促进两岸关系不辞辛劳，不畏谤言。他多年的呼吁和奔波受到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的重视，1983 年 6 月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我见过外公两次，通过几次电话，他的学者风度、不凡人格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生恰遇时局多变，中更蹉跌，却以超强的意志成为世人瞩目的中国问题专家。

流落台湾

外公于 1933 年出生在南京，祖籍是江西宁冈柏露，其父杨祖诒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官费留学生，在日本学习期间，耳闻目睹日军图谋侵略中国的野心，怀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信念，参与组织留日学生闹学潮，抗议日本出兵中国。济南事变后，日军加紧侵略步伐，杨祖诒与两同学冒着生命危险秘密送信归国报告情况。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了，正值杨祖诒学成毕业，他毅然决然放弃日本给予的优渥待遇，归国报效祖国，来到南京国民中央政府工作。卢沟桥事变后，抗战全面爆发，他跟随郭沫若厅长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战宣传工作。日军来势凶猛，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仅一个月，日军迅速从北平打到上海，上海国军坚守三个月后沦陷了，南京唇亡齿寒。国民中央政府决定迁都，外公随父来到重庆。重庆是个山城，易守难攻，日军誓不罢休，调动大量飞机炮轰重庆，时间长达五年半！外公的童年便是在日军轰炸中度过的。

抗战胜利后，他与父亲随国民中央政府返回南京，就读金陵中学，以为从此可以过平安日子，但国民政府倒行逆施，拉开了内战的序幕。国军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失利，大势已去，南京国民政府官员纷纷逃离大陆前往台湾。杨祖诒恋着自己的故国家园，他说：“偌大的大陆共产党都能拿下，小小的台湾迟早也能拿下。”他想，原本离开日本，就是回来抗日救国，如今赶走了侵略者，难道自己又要离开中国？他无法接受。他相信共产党能坐定天下，相信自己

没有对不起人民的地方，愿向人民政府投诚，决定继续留在大陆，但他担心儿子的学业和前途，委托亲戚带儿子去台湾读书。

从此，外公离开了大陆，离开了家人，一个人在台湾岛过着漂泊的生活。那年他才15岁，心中常念家乡父母和亲人，思乡情断肠，望断天涯无归途。他谨记父亲的嘱托，要做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要为祖国做贡献。他生活没经济来源，自己坚持勤工俭学，以超常的天赋在学校年年稳拿优等生，终以优异成绩考进了台湾第一学府台湾大学。由于心中有个无法释怀的心结，牵挂隔海相望的大陆亲人，他选择了读中国历史专业，他总怀想着有朝一日能回到祖国怀抱，见到大陆亲人。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杨力宇

寄籍美国

台湾大学是个才子扎堆的学校，不少同学把目光投向太平洋彼岸的发达国家美国留学深造，外公心向往之，但囊中羞涩，不得不花费一些时间为“稻粱谋”奔波。皇天不负有心人，他终于得到好朋友的资助，筹得留学启动资金。他立刻备战台湾大学公费留美考试，终以名列前茅的优势申请到了斯坦福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奖学金，如愿以偿地踏上了赴美留学之路。

斯坦福大学的学术氛围浓厚，他如饥似渴地阅读，潜心研究中国古代魏、蜀、吴三国之间的微妙关系，时而针尖对麦芒，时而心平气和。他希望通过他的研究，找到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促进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

为达成这个心愿，他又着手研究中国革命史，认定新中国走的道路是正确的，并公开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但惹起台湾当局的不满，被冠名为“投匪学人”。

他不顾台湾当局的威慑，坚持做自己的研究，直到取得博士学位。他仍然感到前路茫茫、生如浮萍，大陆回不去，台湾不回也罢，于是先在加州州立大学任教，后来去了新泽西州西东大学亚洲系任教，并定居美国。对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人来说，能取得世界名校的博士学位，能在发达的美国定居，该是心满意足的事，但外公却不一样，他并没有把美国当成安乐窝，他心中常感“有家难返，报国无门”。

中国改革开放后，他终于回到了祖国，见到日思夜想的亲人，他深情地对乡亲说：“我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自己的祖国和家乡亲人，因为我是个中国人，美国只是我的寄籍国，有人说外国的月亮圆，依我看中国的月亮最圆、最明亮，唐代大诗人杜甫说‘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一段话，把长期积压在心里的感情如火山爆发般释放出来，他兴奋得满脸发光，做梦也没想到在海外漂泊三十多年后，如今真的回来了。晚上，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会见杨力宇（左四）时与全体参会人员合影

家乡招待他观看影片《海外赤子》，他触景生情，像孩子一般泪洒衣襟。

针锋对局

外公到西东大学后，坚持边教学边做研究，渐渐地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领域中崭露头角。

他研究中国国家领导人时，对邓小平在经济建设上主张“求实路线”，以及在中共“八大”会议上提出的反对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大的学术兴趣，他查阅的西方国家出版的几部中共党史著作，都认为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已经结束。他不甘心，又查询了中国方面的资料，终于发现一个问题，没有见过哪篇文章公开、正式点评邓小平，看来对邓小平是留有余地，那就有复出的可能，于是决定为邓小平写一个传记。

那时候邓小平正被打倒，在政治上还抬不起头。在他着手写作时，几个中国问题专家得知，把他当成傻博士，一起劝他：“杨博士，邓小平已被打倒，你要看准行市啊，别埋头做了无用功，浪费时间啦。”

外公不理会，继续他的写作，从1972年起，他开始搜集邓小平的资料，先后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内查看了数万卷有关中共在江西红军时代的史料缩微胶卷，涉足苏联列宁格勒图书馆、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哈佛大学图书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等，还多次到中国香港、日本收集资料。凡有可能的地方他都去找，为了找寻有关邓小平更可靠、更具体的资料，他还专访了曾经同邓小平多次接触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法国总统蓬

皮杜等，并同 10 多个国家元首及外交部部长通信。

1973 年，外公的预言兑现，邓小平复出了。《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的出版商都闻风而来，与他约稿出版邓小平传记。

然而，他刚把传记写完，1976 年春邓小平又被革职了，第二次被打倒，中国疯狂批邓几乎轰动了全美国。两部百科全书主编纷纷告诉他邓已失去了政治意义，稿件不要了，并向他表示歉意："稿费我们照付，传记不刊登了。"因为按照美国出版界的法律条文规定，已预约的稿子，如由预约者单方面取消，要赔偿作者的损失。当时，他们允诺以十倍甚至百倍的稿费赔偿给他，但稿子不能刊用。

外公不答应，针锋相对，坚决抗争，明确表示："稿费我可以分文不取，但文章一定要按约刊登。"

仅仅过了一年，邓小平又奇迹般复职了，两部百科全书的出版商又跑来，问他要稿出版，他拿起写好的一沓原稿，风趣地说："邓小平复职，我写的传记也'复职'啦!"他的《邓小平传》终于在《大英百科全书》和《美国百科全书》1978 年年鉴中顺利刊发。

外公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他目光犀利，政治敏锐性强，对形势的分析异常准确。

中美桥梁

《邓小平传》的出版引起西方新闻界、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外公对邓小平的见解得到美国政界的重视。他们没想到，一个文静清秀的书生，未曾踏入政界圈从政，竟然有如此深远的政治眼光，对中国政治形势料事如神。

新泽西州参议院议长和众议院议长竞相聘外公为特别顾问，凡涉及中美关系问题，都邀请他出席发言。他引经据典，赢得议长和议员们频频点头。

1970 年，外公成为中美关系友好协会五个华人委员之一，他除在西东大学任教授，上少量课外，其余时间积极地从事中美关系的转变工作。

在中美正式建交前，由于外公的大陆背景、台湾背景，他被选入美国卡特总统班底的中国事务顾问，常年往返于华盛顿与台北之间，为中美建交铺路搭桥，并参与邓小平访问美国时的中国事务会谈。

外公还以中美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身份，多次向美国政府负责对华关系的高级官员建议，以推动中美之间的州省姐妹关系及高等教育学府的姐妹关系，为中美正式建交牵线。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建交联合公报》正式生效后，外公已按捺不住对祖国的思念，他立即踏上了归国考察之路。12 日，他受到副总理方毅的接见，第二天，《人民日报》刊载了方毅接见照片，促成了一段寻亲佳话，他终于找到家乡亲人。次年 6 月，他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当他看到新中国发生的变化，看到亲人们生活美满，心里充满喜悦，返美后，他夜以继日，奋笔疾书，用中英文双语撰写文章发表，又在西方讲坛演讲，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人民为国家建设和统一而努力的确切消息，消除了国外人士对中国的疑虑和误解，扩大了中国的对外影响。

外公向西东大学校长墨菲建议派一代表团访华及设立一个中美教育学术交流委员会，获得赞同后，他亲自担任了主任委员，主持交流工作安排，联系中国各省大专院校。

外公浑身洋溢着热情和力量，先后十几次回国返乡访问、探亲。每次访华，他都带着任务，沟通两国省州之间的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科技和人才交流。

他曾诙谐地对记者说："我每次访华返美，还没有发现自己有交'白卷'的时候!"在他的努力下，完成了浙江省与新泽西州结成姐妹省州，

武汉大学、北京语言学院、北京外贸学院与西东大学结成姐妹学府，他高兴地称之为中美关系四大“杰作”。人们称赞他是“中美之间的桥梁”“新泽西州的基辛格博士”。

情牵“一国两制”

1983 年 6 月下旬，外公受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邀请，再次来到北京讲学。授课后他回到下榻宾馆，准备第二天上午返美。晚上，一名不速之客来到他房间，千叮咛万叮嘱他次日在宾馆等候，有人来找他。

他很纳闷，以为自己讲课时说错话，犯忌了。谁知，第二天早晨，中国社科院副院长马洪先生来了，用红旗牌轿车接他去人民大会堂，说邓小平要见他，他才如释重负。

见面时，邓小平对外公在美国旧金山举办“中国统一之展望”讨论会给予高度的赞扬，说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那时，有关中国统一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外公不顾外界压力，不仅担任了这次研讨会主席，还邀请了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学者、美籍华人学者和新闻记者约 400 人参会。这是第一次在国外就中国统一问题召开研讨会，无疑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创举。

在接见会谈中，邓小平和他谈到了台湾问题，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设想，首次提出了“一国两制”的可行性，及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六条主张”（即“邓六条”），谈话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他们相互交换意见，气氛非常热烈。第二天，《人民日报》《新华日报》等各大报纸头版刊登了接见简讯和照片；一个月后，《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载了谈话的要点，即后来入选《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中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设想》全文。这次会谈如大海泛起了朵朵浪花，让两岸人民看到了希望，两岸“三通”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毕竟“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从此，外公把毕生的精力投入到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之中，成为两岸关系的重要发言人，西方各大媒体竞相刊登他的观点，他经常接受记者采访，不辞劳苦地奔波于美国和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之间，发表演讲，多次组织国际学术研讨会，撰写并发表了大量论文。

为了保持独立人格，能在各党派之间自由发表见解，以超越政党的阻碍，来客观探讨海峡两岸之间的问题，他公然提出：自己坚持海外无党派独立学人身份，不加入任何党派。

他极力主张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如投枪匕首般与“台独”势力斗争。20 世纪 90 年代，他与台湾大学老同学邱宏达教授在纽约合作创办《独立评论》，发表很多反对“台独”及倡导两岸统一的文章，在西方世界引起很大反响。

2004 年台湾地区大选，连战决意参选，他全力以赴支持连战，日夜伏案，写下《打造新台湾　开创新纪元：连战的奉献与承诺》，为连战参选大张旗鼓地宣传。他相信连战，寄希望于连战，只要他竞选成功，祖国统一将走上新的日程，但事不如愿，本来高票的连战，被陈水扁苦肉计破坏，在竞选中落败。

陈水扁下台，邱宏达的“高足”马英九上台。马英九起初积极推动两岸交流，甚至有意促进两岸高层会面，让外公再次燃起希望，但马英九在位多年，坚持“不统、不独、不武”。

现实不如人意，年岁已高的外公慢慢淡出了政治，离开纽约，退居里士满，但他心中无不挂念。他每每深情地说：“无论是大陆还是台湾，我都很爱，我一直希望两岸能够实现和平统一。”如今，他已离去，但精神永存，海峡两岸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从非洲空运而来的“大爱”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2020 年的春节，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寂静。对所有中国人来说，每日新增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人数和死亡人数都是那样的触目惊心，以至于社交媒体上，再也不见人们晒美食、晒出游、秀恩爱，取而代之的是从不同渠道转发的有关防疫的各种信息。

然而，就在 2 月初，一个短短的视频在朋友圈刷屏了。视频中，镜头缓缓扫过一架飞机的客舱，而目之所见的所有座位上没有一位乘客，反而整齐地摆放着海外侨胞捐献给中国的一箱箱医用口罩。这一幕，震撼了无数人。

这架南方航空 CZ634 航班于当地时间 2 月 3 日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飞往广州。5000 多箱医用物资被装进了飞机，由于货仓已满，工作人员紧急将客舱前舱清空，将捐助给国内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物资放在客舱运送回国。而在这背后，则是许许多多海外侨胞的共同努力。

对于大部分中国人来说，肯尼亚是个太过遥远的国度，很多人许是从 2018 年春晚小品上亮相的蒙内铁路首批乘务员才开始了解这个东非国家的。肯尼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2017 年 5 月 31 日，由中国路桥公司承建的东非最大港口蒙巴萨—内罗毕标轨铁路（蒙内铁路）正式开通，肯尼亚人民盼望已久的百年铁路梦照进现实。同一年，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成立，其主要目的是为在肯尼亚的中小型中资企业服务。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常务副会长李昌洪是促成这次“口罩航班”的参与者之一。2020 年 1 月 20 日，他回到中国，打算与家人共度春节。他尚未开始感受团圆的喜悦，就发现国内的疫情似乎比想象中更严重：当天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连线时明确指出，新冠病毒肯定有人传人，武汉卫健委当日通报两日内共计有 136 例新增确诊，且已经有 14 名医护人员被感染。人们的情绪渐渐变得紧张起来，市面上的 N95 口罩已经卖到脱销。

一场没有硝烟的大战即将来临，而国内的防护物资如口罩、防护衣等愈发紧缺，甚至于为人民健康坚守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也面临着缺少“战斗”所需的“子弹”和“盔甲”的窘境。李昌洪立刻想到，何不从海外购买紧缺物资运回中国呢？这个想法，与不少海外侨胞不谋而合。1 月 23 日晚，农历腊月廿九，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在商会微信群发出的《倡议书》中写道：“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肯尼亚华侨华人身在海外，心系祖国。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现向在肯侨胞发起捐款倡议，用于购买医疗物资，驰援武汉。”会长卓武带头捐出了 5000 美元，李昌洪也捐出了 3000 美元，其后，他在其他商会也捐赠了款项。一时间，在肯华侨华人纷纷响应，10 万肯尼亚先令、2000 元、768 元……虽然捐款金额有大有小，但那颗火热的爱祖（籍）国之心是一样的，不少人甚至不肯留下自己的姓名，只是说：“实在要留，就写‘旅肯中国人’吧!”截至 2 月 2 日，商会累计收到 135 笔捐款，合计 51.65 万元人民币。

接下来，肯尼亚中华商会（以下简称“商



肯尼亚上海商会和肯尼亚中华总商会联合捐赠的医疗物资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捐赠的医疗物资已整装待发

会”）的工作人员开始分头采购各种抗疫物资，包括 N95 口罩、医用外科口罩、医用手套、防护服、体温仪、采血管等。然而，作为非洲的一个发展中国家，肯尼亚的医疗物资货源也并不十分充足。由于华侨华人的大量采购，当地 N95 口罩的价格每天都在上涨，有些地区即使用 5 倍的价格也难以买到 N95 口罩，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尼亚周边国家乌干达、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相关医疗物资也被采购一空。因此，华侨华人们在采购时必须冒着风险背着大量现金，以便及时支付，立刻拿货。还有些华侨华人跑到了偏僻的乡村药店去采购。不少肯尼亚人见此情形，也纷纷伸出援手，他们向华侨华人推荐了不少医疗物资供货商。通过当地的朋友，卓武偶然得知，肯尼亚当地一家大型非营利性机构 MEDS 正好有一批口罩和防护服，但因为系统审核至少需要一周时间等因素，几经协调，对方仍拒绝出售。1 月 28 日，卓武直奔 MEDS 总部与其负责人沟通，对方经过内部紧急会议，终于同意为中国开通绿色通道。于是，商会一次性购得了 490 个 N95 口罩、5300 个医用外科口罩、84 套全身防护服、500 个一次性医用帽、600 件一次性手术衣等。

在采购物资的同时，商会也在忙着联系航空公司，预定舱位和履行报关手续。为了配合疫情防控，直航中国的肯尼亚航空公司已经停航了，如何尽快将大量医疗物资运回中国？商会想到了中国南方航空公司，因为早在 2015 年 8 月，南方航空公司就开通了内罗毕航线，每周两班，由广州至内罗毕直达往返。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内罗毕营业部领导在了解到情况后，为所有捐赠物资提供了免费运输服务。1 月 31 日，商会将首批 118 箱援汉医疗物资送上了中国南方航空的班机。2 月 3 日，这批医疗物资已交付湖北省慈善总会并转交给指定医院。同日，商会又向安徽省淮北市定向发运 101 箱医用物资……

2 月 3 日，由于物资实在太多，货舱无法完全容纳，南航给数十名南航明珠经济舱乘客免费办理了升舱，腾出的客舱用于装载援助物资。南航的机长、空姐也齐齐上阵，帮忙搬运物资，虽然航班因此延误了数小时，但所有乘客均无怨言。



工作人员将肯尼亚侨胞的援助物资运上南航航班



肯尼亚侨胞援助的医疗物资运到了武汉市江夏区第一人民医院

陆陆续续，一批批满载旅肯华侨华人爱心的抗疫物资驰援祖国。然而，到了 2 月 5 日早晨 7 点，商会在办理报关手续时却被“卡”住了。肯尼亚海关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要求：商会要运输到中国的口罩原本是由湖北生产的，因此商会应该向肯尼亚海关提供当初进口时的相关单据。而由于这批口罩是商会由不同药店采购而来，自然无法提供所谓的“进口凭证”。紧接着，2 月 6 日，出于防疫的考虑，肯尼亚政府开始禁止医疗物资出口。眼看着一大批物资无法运出去，商会的工作人员都急了。他们纷纷行动起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肯尼亚共和国大使馆联系，取得大使馆的支持，并与肯尼亚政府、海关反复沟通协调等。最终，肯尼亚政府同意放行，出口禁令往后延迟。2 月 7 日，满载着援助物资的南航航班起飞了，并于 2 月 14 日情人节这一天，辗转送到了一线医护人员手中。

截至 2 月 14 日，肯尼亚中华总商会已先后运送了十批援助物资到中国，这些物资定向捐献给了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武汉市江夏区人民医院、武汉市蔡甸区人民医院、湖北省襄阳第一人民医院、安徽省援汉医疗队、安徽省淮北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办公室、四川省成都市妇幼保健院、安徽省马鞍山会慧医院、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侨联等。事实上，除了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以外，肯尼亚江苏商会、肯尼亚上海商会、肯尼亚河北商会、肯尼亚中资企业等也捐赠了不少抗疫物资，这些从非洲大陆空运过来的爱心，为中国抗疫第一线提供了有力地支持。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休戚相关，命运与共。2 月底，中国的疫情爆发速度明显下降，而从 2 月 17 日开始，海外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增长，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变得严重，许多城市开始实施封锁措施，日本“钻石公主号”游轮上的确诊数量也与日俱增。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更能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深刻内涵。在感谢海外侨胞对中国抗疫的大力支持的同时，也希望海外侨胞们在此特殊时期各自珍重，让我们一起期待疫情的结束！

海外粤籍华人社团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文 张应龙

在世界华侨华人中，粤籍华侨华人人数最多。遍布世界的粤籍华侨华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组织了数量众多、宗旨不同的社团。通过社团这个平台，粤籍侨胞得到互相关照，精神得到慰藉，权益得到维护；借助这个平台，粤侨与其他省籍侨胞互相支持，配合行动，共同传承中华文化；立足这个平台，粤侨与当地族群友好交往，融入当地社会，发展多元文化。不同类型不同宗旨的社团使粤籍侨胞在自愿的原则上追求和实现共同的意愿，虽然它们之间因为旨趣不同有联合也有对立，但它们就像细胞一样在海外建构了粤籍华侨华人社会。社团，不但使海外粤籍华侨华人实现了组织化，而且使粤籍华侨华人在社团组织这个平台上结成了命运共同体。

海外粤籍华人社团的特点

1. 地区发展不平衡

由于历史与现实的不同，五大洲粤籍华人社团的发展状况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从相对的角度简单概括不同地区粤籍社团的发展状况，则东南亚地区还是传统社团占主导地位，传统社团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实力上都大大超过新成立的社团。未来，东南亚粤籍华人社团数量将处于稳定的状态。在北美地区，如果是在唐人街，传统社团依然占主导地位，在非唐人街地方，新移民社团有一定的影响力。由于新移民源源不断地进入，北美地区的粤籍社团会有所增加。北美地区的粤籍社团，新与老、中与西的碰撞最为明显。澳大利亚也有类似的现象。拉丁美洲是新移民群体在新老社团中发挥作用，新移民除了在传统社团中担任重要或主要职务之外，还成立新的社团，活跃在当地侨社，如秘鲁通惠总局和智利中华会馆的主席和领导层基本上是新移民。老移民由于融入当地社会的程度较深，他们在华人社团组织方面起的作用不是很大。欧洲的粤籍社团则是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移民以及七十年代的印支移民在支撑，新移民人数较少，力量还是较弱，在英国成立了一些新社团。大洋洲老侨团的影响力有所下降，而新移民社团活力十足，后劲十足。非洲的粤籍老社团多数不是很活跃，新移民社团由于人口流动性大，数量不多，活力也起伏较大。简言之，目前海外粤籍侨团的分布态势，与过去相比尚未发生根本的变化。

2. 新老社团各有千秋

海外粤籍华人社团新老社团都有自己的优势，都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些能够开展正常活动的老社团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关系与社会地位、一定的经济基础和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当地

华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大多数国家，在当地华社中起到核心作用的社团是传统社团。在泰国，潮州会馆以其宏大的会所、雄厚的资金、充沛的人力、尊崇的社会地位在当地侨社中具有不可动摇的影响力，泰国潮州会馆的地位即使在世界华人社团中也是出类拔萃的。在美国和加拿大，传统社团始终是华社的核心力量。从总体上看，海外粤籍华人社团还是东南亚、北美的粤籍传统华人社团力量最强。这些地区的传统粤籍侨团虽然有的在发展中衰落下去，但有的在继续发展。一个社团要在社会上获得好声誉，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努力。运作正常的老侨团经过长时期的努力，一般在当地都建立起了良好的声望。

社团的数量和类别与华人人数多少和文化层次有密切的关系。美洲、大洋洲由于新移民和专业人才较多，因此新成立的社团也较多。在澳新、拉丁美洲、欧洲和非洲的部分国家，新移民社团具有较大影响力和较高社会地位。新移民社团的作用与当地新移民人数多少是成正比的。但是，新移民社团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空”和“小”等，即社团的名称很大但人员很少，社团的名称很强但实力很弱。新移民社团有由底层劳工建立的社团，也有由专业技术人员建立的社团，差别很大，并不是新移民成立的社团必然就“高大上”。同时，许多新移民设立的社团无固定会所、无固定经费来源、无固定会员，他们即使豪情万丈企图有所作为也是有心无力。当然，也有新社团非常活跃和有号召力与执行力。许多论述把老侨团说成没有生机，把新社团说成朝气蓬勃，认为新社团制度完善，充满活力，深受主流社会的接纳和肯定。这是一厢情愿的说法，不是客观的表述。

3. 类型不同但初心不变

近三十年来，海外粤籍华人社团的数量明显增



作者简介

张应龙，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广东华侨史》编修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广东华侨史》主编，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华侨历史学会会长，《华侨华人文献学刊》名誉主编。长期从事华侨华人史研究、侨务政策与侨务工作研究、侨乡研究。近几年主编的著作有《华侨华人与新中国》《海外华侨与辛亥革命》《海外潮团发展报告（2015）》《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发展报告（2018）》《中外侨务研究》等。



秘鲁通惠总局



新西兰东增会馆

加。新增加的粤籍华人社团主要分为地缘性、业缘性和综合性的社团，宗亲会馆较少。印尼是新增社团最多的国家，这当然有其特殊性，其中广府、潮州、客家三大方言群的社团增加很快，仅广肇会馆就增加了几十个。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新社团也增加不少。但是，无论粤籍华人社团在历史中如何演变，无论粤籍华人社团分为多少种类型，粤籍华人社团为侨服务的初心始终不变，始终将团结互助、扶贫济困、维护权益、传承文化作为基本的使命。

不过，新老社团还是有一些不同。粤籍华人社团以前的主要任务是联谊、祭祀、维权、慈善、文化教育等，现在的社团章程规定的任务也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的社团任务有所增减。首先，从中国大陆出去的新移民建立的社团和专业技术协会一般少了祭祀这项内容，他们的会所没有佛堂也没有另建庙宇，没有义山。而对于传统社团，祭祀是非常重要的任务，是要用心去做的工作。例外的是，从印度支那再移民到欧美、澳新的华人，他们一般都会建立寺庙或者佛堂，并将祭祀作为重要的工作。其次，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大部分没有能力撑起华文教育，独立开办华文学校。开办

华文学校只有少数有实力的社团能做到，更多的社团组织是以颁发奖教奖学金的方式支持华文教育。但不管是老社团还是新社团，对于支持和发展华文教育的态度是一致的、积极的。第三，以前社团调节会员纠纷、协调涉外冲突的功能现在基本没有了，也不需要了。因此，联谊、维权、慈善是大多数社团的日常工作。对于一般社团来说，联谊、接待访客、组织旅游差不多是社团的基本任务。虽然社团章程都表示“共谋发展”，但实际上都达不到这个鼓舞人心的目标。

4. 社团与社区共生共荣

随着华人聚居区的建立，华人社团逐步建立起来，或者说随着社团的建立，华人聚居区慢慢发展起来。在早期，华人社团不会孤零零立于华人聚居区之外，现在则可以在某个没有华人的大楼里买或者租一间房子作为社团办事场所。所以，老侨团一般位于唐人街，与华人社区共生共荣，新侨团则以设于唐人街以外地方较多。对于族群社团来说，与自己族群在一起对开展社团活动是非常有利的。唐人街是华人聚居区，过去的特点是就业与居住一体，现在向着观光化和多元化文化橱窗方向发展，故在唐人街开店做生意的不少是其他本地人。海外唐人街以北美、欧洲、澳新的唐人街为典型，在唐人街内，商铺林立、会馆林立。虽然现在许多华人居民撤出唐人街，平时少有人到会馆，但会馆没有撤出，会馆利用唐人街的商业优势，将部分面积出租，用租金补充会馆运营经费，让会馆在艰难的情况下继续延续下来。在重大节假日和华团开展重大活动时，侨团与唐人街依存关系表现得淋漓尽致，每年春节唐人街的大游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5. 融入当地社会，构建和谐社会

社团是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平台。粤籍华人社团在开展活动时十分注意与当地政府和社会团体的沟通，邀请当地社会名人一起出席活动。但凡社团举行就职典礼、庆祝会庆等活动，多数会邀请相关地方官员出席主礼。华人社团在举行联谊大会等活动时，更是会邀请所在国国家领导人参加大会和发表演讲。如巴西广东商会甚至将揭牌仪式直接放在圣保罗州议会举行。与当地政府高层保持接触和交流，是粤籍华人社团非常重视的工作。

社会责任是社团融入当地社会的重要表现。慈善事业是华人社团主要的活动内容，大多数社团都设有福利部门，专门从事慈善事业。大的华人社团慈善部门通常都是面向全社会，不只是限于华人族群。每当所在国遇到天灾人祸，华人社团都会行动起来，筹集资金物资予以救援。东南亚一些粤籍华人社团还专门设有医疗救护队、救火队等为当地社会服务。印尼的粤籍社团连续多年举办义务献血活动，贡献华人的爱心。泰国的华侨报德善堂更是泰国非常重要的慈善机构。通过慈善活动，粤籍华人社团拉近了与当地社会的距离，加深了与民众的心灵沟通，促进了华社融入当地社会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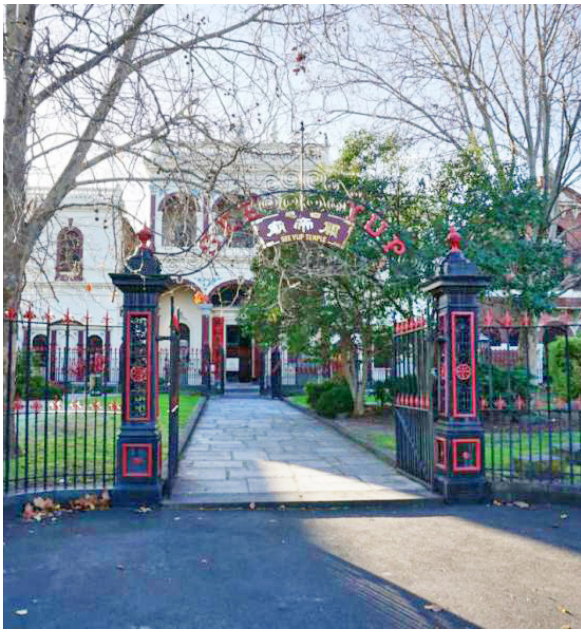
建设多元文化是华团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在欧美国家，举办大型民俗文艺游行是华人社团营造良好外部环境和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在海外许多著名的唐人街，如英国伦敦，每年的春节巡游都会邀请英国政府官员参加。海外粤籍华人社团一直都注意处理好与当地民族的关系，以建立一个内外都和谐的社会环境。在马来西亚南部的柔佛新山，中国农历新年的柔佛古庙大巡游已经成为当地的“嘉年华”，参加人数多达几十万人，连苏丹都亲临现场。当前，凡是发展得好的社团通常在融入当地社会、为当地民众服务方面都做得很好。

6. 华人参政的重要后盾

海外华人的参政离不开民众的支持。近些年



加拿大温哥华禺山总公所



澳大利亚墨尔本四邑会馆

来，在北美、澳新和西欧地区，粤籍华人参政有所增加。在美国现有的民选和委任的华裔议员、官员中，粤籍华人占了大多数。美国华人州长吴仙标坦言，“大多数华裔竞选者的经费，都是从华裔社会里捐来的”。粤籍华人参政人士在参政活动中得到粤籍华人社团的支持，粤籍华人社团除了发动选民投票支持外，还帮忙为参政人士筹款，华人社团已经成为华人参政的重要支持力量。华人政治人物也与华人社团形成密切的互动关系，经常参加华团活动，为华团站台，而华团在关键时刻则出手相助，成为华人参政的重要后盾。

7. 社团活动国际化

粤籍华人社团的国际化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不断扩大，主要有世界广东同乡联谊大会、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国际潮团联谊年会、世界广府人恳亲大会、世界中山同乡恳亲大会、世界顺德联谊总会、世界会宁联谊大会、世界河婆同乡联谊大会、国际深圳社团大会、世界东莞社团大会、世界惠州同乡恳亲大会、世界台山宁阳会馆同乡会联谊大会、世界赤溪联谊会、世界海晏都同乡联谊恳亲大会、世界丰顺同乡联谊大会、世界大埔同乡联谊大会、世界鹤山乡亲联谊大会、世界南海联谊总会恳亲大会等，这些恳亲大会、联谊大会轮流在世界各地举行。近十年来，粤籍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向更多的地域拓展，以在中国举办恳亲大会为例，不再限于在祖籍地举行，像北京、开封、武汉等都举办过粤籍华人社团的恳亲大会。同时，对国际化的步伐有了更为理性的认识，注意调整召开会议的节奏，有的由每两年召开一次改为三年一次。广东一些财力比较雄厚的侨乡，如深圳、东莞、顺德、中山、惠州等地方政府对推动海外社团的国际化发挥了作用，地方政府部门深度介入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活动，例如协助筹办世界恳亲大会等，但对社团日常活动则不过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海外粤籍华人社会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机遇，为华



法国广东会馆

人社团的国际化提供了新动力。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开展，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活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更加突出，所产生的国际影响力将更加重要。粤籍华人社团组织的各种论坛纷纷登场，议题更加聚焦实际问题，会议更加注重内在的实效，粤籍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水平因此不断提高。

8. 与广东互动密切

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社团与广东侨乡的互动十分密切，其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请进来、走出去”是这种关系的生动写照。江门地区各级侨联组织从 1979 年至 2000 年接待来访华侨华人港澳同胞 768097 次，组团出访 148 个国家和地区、3532 人次。华人社团与侨乡密切互动关系的形成，一方面是华人社团主动加强与侨乡联系，包括组团回国访问、捐资捐物、支援侨乡建设。在国际上为中国出声，配合中国的大事如反独促统活动等，在海外开展宣传活动。另一方面，广东侨乡主动加强与华人社团的联系。当海外社团举行庆典时，有条件的侨乡政府会派出代表团前往庆贺，或者采取更加积极的支持。例如，2017 年 2 月巴拿马花县（花都）同乡会成立 100 周年大庆时，作为祖籍地政府——花都区人民政府、海外联谊会、统战部、宣传部、侨办、侨联、政协经济港澳侨外事办都作为庆典的协办单位。不是发发贺信、派派代表到场那么简单了。在中外交流不断扩大的背景下，粤籍华人传统社团承担着繁重的接待来访中国代表团的责任。如秘鲁利马通惠总局，从 2016 年至 2017 年间，接待来自中国的各种代表团 25 次，从中央到省、地市级的都有，有政府代表团、经济代表团、文化代表团、教育代表团等。一些侨乡政府对海外社团的设立予以有力的支持。如 2014 年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顺德商会成立时，顺德区政府、乐从镇政府各赞助了 10 万元。侨力为国，国力为侨，相辅相成。

粤籍华人社团的发展趋势

1. 社团总量相对稳定

社团的新老代谢是必然的趋势，一些老社团因为没有会员而日渐萎缩，逐步走进历史，一些新的社团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而不断成立起来。新移民人数的增加，中国对外经济辐射力的增强，会导致海外华人产生创办新社团的冲动。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广东新移民也会增加，这是产生新社团的基础。但新移民不会出现井喷式增长，新的社团增加不会太快太多。与此同时，有的老社团和新社团会消失，因此，粤籍华人社团总量上保持相对稳定的状态。新社团一是指新增加的社团，二是指新型的社团。从目前情况来看，同乡会之类的地缘社团以及商会、协会、联合会之类的社团组织还是新社团的主要组织形式。由于各地侨情不同，有的地方会以同乡会组织形式多些，有的地方以商会、协会、联合会组织形式多些。如阿联酋广东商会、捷克广东商会、英中商旅文化交流协会、奥地利两广同乡会等。



美国旧金山肇庆会馆

2. 立足同侨，面向全社会

粤籍华人社团不论是什么类型，都立足于“粤籍”这个概念，否则就不能称之为粤籍华人社团。有些粤籍华侨华人组建或者参加不是以粤籍为定义的社团，自然被排除在“粤籍”之外。海外广东新移民的精英人士所组建的专业团体因为不是限定“粤籍”的，便不被纳入“粤籍社团”的范围。粤籍华人社团之所以姓“粤”，当然其社团会员是“粤人”。可是，如果将所有活动和服务对象狭隘地只是限于粤人的范围，也已不符合历史的潮流。如今，粤籍华人社团一方面立足服务同侨，一方面面向全社会，打开大门，服务大众，包括非华人的社群，不

会完全将社团活动限制于“粤人同侨”的范围。这种立足同侨、面向社会的趋势会继续发展下去。

3. 重视传承中华文化

社团历来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平台。近几十年来，粤籍华人社团在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方面一是坚持开展重大中国传统节日的联谊和祭祀活动，举行春节民俗游行、清明节扫墓活动等；二是坚持开展华文教育活动；三是组织寻根团、夏令营回广东侨乡，培养下一代对祖籍地文化的认同。在开展重大中国传统节日的联谊和祭祀活动方面，绝大多数粤籍社团都能做到长期坚持，即使平时不活动的社团，到了这个时候也出来举行活动。有的社团则体现了中外文化的融合。如秘鲁中山隆镇隆善社，每年 11 月 1 日的秘鲁清明节便组织侨胞去坟场为先辈扫墓，传统的祭祖活动则放到清明节后的第一个星期日，通常分为上午到教堂弥撒，下午在会所焚香祭拜，中西结合。年初的春茗、清明节的义山祭祀是粤籍社团最重要最基本的活动内容，体现了岭南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在伦敦、旧金山、纽约、温哥华、悉尼、墨尔本等地的唐人街，新年期间举行的中国民俗巡游成为当地一件盛事，当地的粤籍社团在此起到重要的作用。例如在加拿大温哥华，自 1979 年以来，每年农历新年中华会馆联合中华文化中心、华埠商会、中侨互助会、洪门机构和铁城崇义总会及近百个侨团参与的春节庆会，搞文艺演出、大游行、千人宴等，温哥华市市长每年都宣布春节前后的一个星期为“中国农历新年周”，到 2017 年已经举办了 44 届。一些社团自己组织了粤剧社、潮乐团、客家山歌团，传承家乡文化。一些社团在召开恳亲大会时，顺便举办地方特色文化和美食节，等等。在华文教育方面，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海外华文教育事业不断发展。海外粤籍华人社团十分重视华文教育，



毛里求斯仁和会馆



泰国潮州会馆

因地制宜开展活动：有的直接开办华文学校，有的通过设立奖教奖学金支持华文教育，颁发奖教奖学金成为社团每年的重大活动内容。至于组织寻根团，组织华裔青年夏令营是各地有代表性社团的工作。在历史长河中，有的粤籍华人社团由于本身不能坚守中华传统文化而变成“一般社团”，粤籍华人社团认识到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华社的需要也是社团本身的需要，因此自觉地将传承中华文化当作社团的中心任务。

4. 协作与联合成为重要取向

海外粤籍华人社团的组织形式，从纵向上看包括了从基层到高层的塔形架构：有地方的“同乡会”，有省州一级同乡“联合会”，有全国的“联合总会”，似乎是一个严密完善的组织架构，实际上，上下级之间是松散的联盟关系。从横向看，包括多种类型的社团，如社会、经济、教育、体育、文艺、慈善、宗教等，互相之间的服务对象和工作目标差别蛮大。虽然到处有联合会、总会之类的社团，但它们往往只是名称上的“总会”，并非真实的“总会”。粤籍华人社团一方面是总量增长，一方面是个体实力减弱，现实的需要推动粤籍华人社团寻求更大范围的协作，联合开展活动，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加拿大温哥华中华会馆下属的社团有中华文化中心、中侨互助会、华埠商会及亲缘、地缘、教育、艺术、武术等近 80 多个社团，但在发起大型活动时，如庆祝国庆、庆祝港澳回归、迎接政要访问等大型活动时，都有上百个社团参与。对于许多社团来说，人数不多、年龄老化、经费缺乏、人才短缺等问题导致他们难有多大作为，只有走协作联合之路才有可能做好事情。而时不时发生诋毁华人形象、侵犯华人权益的言论行为和政策，促使华人社团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争，因此，协作、联合将继续是粤籍华人社团的重要取向。

5. 发挥纽带桥梁作用，与中国的关系稳定密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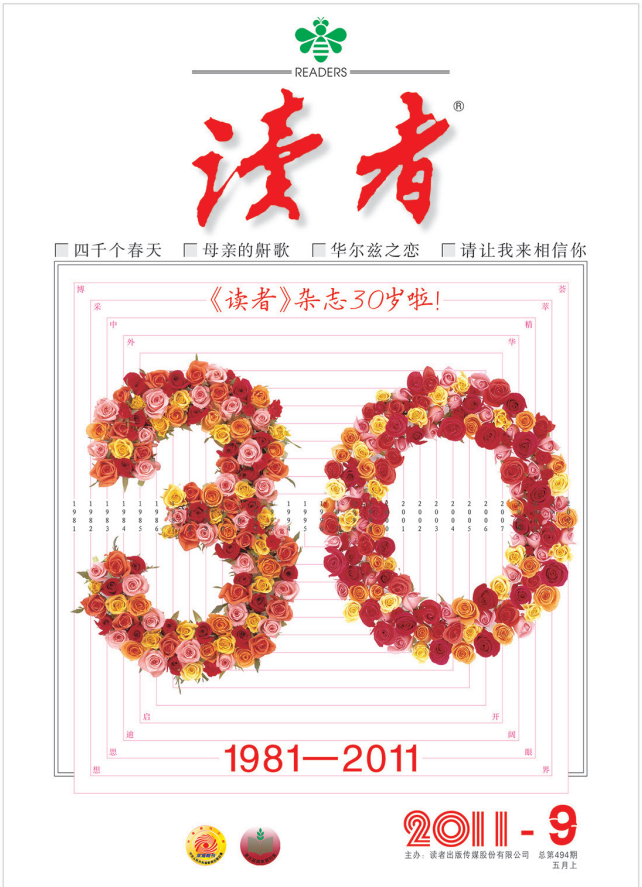
粤籍华人社团是中外合作交流的纽带和桥梁。改革开放初期，粤籍华人社团冲破时代藩篱，建立和发展与祖籍国的关系，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改革开放以来，粤籍华人社团成为加强中国与世界友好关系的坚韧纽带，经受了国际上各种风波的考验。粤籍华人社团作为促进中外交流的桥梁，在海外和在中国举办规模宏大的恳亲大会、联谊大会，参加者除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胞之外，还有所在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社会贤达，产生了重大的国际影响。恳亲大会、联谊大会超出粤籍同胞恳亲联谊的意义。在中国综合国力不断上升、“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的背景下，粤籍华人社团与中国的关系会进一步深化，尤其在经贸关系、文化交流方面更是如此。以泰国中华总商会为例，在 2015 年 5 月至 2016 年 11 月之间，到访泰国中华总商会的中国代表团有 58 团，平均每月 3 个代表团。在这些中国代表团中，来自广东的占三分之一。广东的代表团有政府代表团，有经贸代表团、文化代表团和联谊会等。而世界各地的粤籍华人社团来广东访问的就更多，有的社团甚至在广东设立代表处，以建立更加稳定和密切的关系。粤籍华人社团以新的方式加强与中国的关系，尤其当前中国推行科技创新、双一流计划，海外粤籍华人高科技类的协会可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即使是传统社团，他们也已从捐赠支援侨乡发展的模式走出来，例如，成立于光绪十六年（1880）的澳洲要明鸿福堂同乡会，自 2006 年以来，多次赞助在广东侨乡开展“光明之行”眼科义诊活动，造福侨乡人民。在同圆共享中国梦的时代背景下，海外粤籍社区与中国、与广东的关系会稳定而密切。

选择《读者》 成就你我

《读者》杂志创刊于1981年，是全球范围内发行量最大的中文期刊之一，具有『中国人的心灵读本，全家人的精神纽带』之美誉。为了更好的服务于团体客户和广告客户，《读者》现在已经开办了团体客户形象刊业务和全国、省级广告业务，服务热线 18201020917







广东侨联纪事

文 《华夏》记者 林辅毫

1月 January

1月5日 曹堪宏秘书长赴惠来县鳌江镇山栗村出席“聚焦产业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惠来县首届冬瓜王大赛活动。

1月5日至6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

1月7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统战部举办的“学习贯彻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暨2019年工作总结和2020年工作部署专题会议”。

1月10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委“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总结会议。

1月11日至12日 黎静主席，戴文威、谢惠蓉副主席，曹堪宏秘书长赴北京出席中国侨联十届三次全委会议。

1月13日至15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

1月16日 黎静主席在广州参加全省统战部部长会议。

1月18日 中国农林水利气象工会党组书记、主席蔡毅德和中国侨联基层建设部副部长刘景春率全国总工会、中国侨联联合慰问组到清远英德英红华侨茶场、清远华侨农场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曹堪宏秘书长参加慰问活动。

1月20日 中国侨联副主席李卓彬率中国侨联慰问组到湛江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黎静主席参加慰问活动。

1月20日 戴文威、邵瑾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十二届省纪委五次全会。

1月21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参加广东省春节团拜会。

1月上中旬 由省侨联领导分别带队，组成6个慰问组深入全省各地开展“送温暖、献爱心”活动。此次活动，共投入慰问金48.35万元，主要慰问全省21个华侨农场、省侨联直属企业的困难归侨侨眷及部分城乡散居归难侨家庭。

1月下旬以来 省侨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切实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广泛动员海内外侨胞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奉献爱心。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月29日，广东海内外侨界（46个国家及港澳地区）捐赠款物44571.748959万元，

其中捐款达 32283.33134 万元，捐赠抗疫防护用品价值 13161.5793 万元。医用口罩 1402.9498 万只、N95 口罩 49.0822 万只；防护服 12.0302 万套、防护眼镜 4.3096 万件、手套 131.1471 万只，12613 支体温计（枪）；新型冠状病毒快速检测仪 2 套、测温仪 10 台，化学发光测定仪 8 台，及配套的肺支肺衣检测试剂 3000 人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 4 万人份，以及救护车 1 辆、板房 2 座、货运车 8 辆、电视机（病房用）1100 台、红外线感应自动皂液机 100 台、全面呼吸防护器 12 个，消毒液、酒精、护面屏、抹手清洁纸、牛奶、盐焗鸡（广东农产品驰援湖北抗疫一线）等。

2月 *February*

2 月 3 日

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黄宁生到省侨联检查指导我省侨联系统疫情防控工作，对省侨联积极动员组织我省侨界为支援疫情防控所做的工作及成果给予充分肯定，并代表省委向广大粤籍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为支持国家及广东家乡疫情防控的善心善举表示衷心的感谢。黄宁生指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广大粤籍海外侨胞、归侨侨眷迅速反应，广泛发动所在社团会员踊跃捐款，同时竭尽所能寻找国内紧缺抗疫防护用品海外采购渠道、积极捐赠国内紧缺物资，再次彰显了海内外侨胞血浓于水，始终与祖国同呼吸、共命运，爱国爱乡的赤子情怀。黄宁生强调，全省各级侨联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主动协助党委政府抓好疫情防控作为当前最重要最紧迫的工作，依法科学有序有力有效抓好防控措施落实，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进一步贡献侨界智慧和力量。

2 月 28 日

戴文威副主席在广州出席广东粤港澳大湾区国家纳米科技创新研究院向火神山医院、雷神山医院捐赠口罩仪式。

汉字根族大系（总序）

文 顾作义

汉字是中华民族的标志之一。语言、文字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典型代表。汉字和汉语是中华民族子民的“母语”和思想、情感的表达工具，汉字是中国民族文化的基因、核心载体和代表符号。

汉字，是远古时代中华文明的活化石，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国学大师饶宗颐说：“造就中国文化核心的是汉字，而且成为中国精神文明的旗帜。”著名学者陈寅恪说：“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世界汉语教学学会会长许嘉璐说：“一个汉字就是一个故事。千百年来的风俗礼仪、社会结构、伦理道德、哲学思想、审美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几乎都隐藏在一个个汉字对所要反映的事物的摩画、概括和美化之中。”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说：“我们博大精深、灿烂无比的文化是建立在汉字的基础上的，离开了汉字，我们民族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汉字是我们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和“底气”存在。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来自中华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来自中华民族独特的文化价值，来自中华文化的包容力、融合力，而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其基石——汉字。

汉字本身就是魅力无限的文化样式。一个汉字就是一部历史、一首诗词、一个故事。千百年来的哲学思考、科学思维、伦理道德、心理状态、科学知识、审美情趣、民俗礼仪等都包含其中。一沙一世界，一字一乾坤。作为高度发达的表意文字，每个汉字都是有思想、有温度、有情趣、有内涵的“精灵”。

汉字是增强国家认同、文化认同的基石。从秦代开始，秦始皇推行“书同文，车同轨”，汉字成为国家统一的文化纽带。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方言多样，如果没有统一的文字，思想文化交流必然有障碍，必然导致缺乏共同的价值追求。正是有了统一的文字，并经过历史的积淀，汉字作为一种书写形式，深入每一个人的血脉之中，形成独特的价值观、文化观、历史观，成为一个国家认同的基础。

汉字是中国人学习知识、传承文化、提高文化修养的起点。说话、识字是一个人求知的基础。一个人认识三千多个常用字，一般的阅读和表达就足够了，假如能认一万个字，许多古代经典就可以读通、读懂了，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文化人。汉字是一个人学习经典、传承国学的基础。汉字是我们阅读的媒介，思想交流的工具，也是工作、生活的基本技能之一。

作者简介

顾作义，广东省志愿者联合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传统文化和汉字文化研究，著有中国经典现代解读丛书，《汉字美学》《汉字心学》《字说易经》等。

古代的儿童教育，是从“认字明理”开始，先教许慎的“六书”，先系统地学习构字理解，了解造字的方法，再读“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可惜，今天的小学语文教育，已经丢掉了这一传统，没有专门讲解汉字的字源和造字原理的课程。我们学习汉字，是从笔画开始的，老师只是教你如何写、如何读，这个字是怎样演变而来的，有什么含义，往往不求甚解，这样的学习枯燥无味，毫无兴趣，这样的学习不仅慢，而且效果也不理想。我们只是学到汉字的皮毛，即所谓知识，而没有学到汉字的精华，即思维、智慧。假如我们回到“造字法”，从汉字的造字规律中去学习汉字，从字根延伸到族群，系统地学习汉字，那么，学习过程会是很轻松、很快乐、很有趣、也很便捷的。不但学到知识，更重要的是陶冶了性情、升华了境界。目前，对汉字研究普及的书籍多如牛毛，有些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枯燥无味，有的通俗读物，又缺乏学理的支撑，如何做到既“上天”又能“下地”，既遵循造字规律，又具普及性、实用性，且易于传播，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字根，是组成汉字的基本零件，是一类有物象场景支持，可以表达基础概念，构建汉字最基本意义的符号。《说文解字》第十五章说：“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三字。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仓颉开始创制文字时，大抵按照物类描画其形状，所以叫作文；后来形旁声旁互相组合增益，就叫作字。文，是事物形象的本来面貌；字，则是由它滋生出来，逐渐增多。刻在竹简帛卷上的叫作书。书，就是如同事物的形状。”“文”是指独体的象形字，是汉字的主要构件，也可以看作是汉字的字报；“字”指合作的会意字和形声字，是由“文”派生出来的。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字以族群。同形同音，音意相通，分科成族，触类旁通。为此，学习汉字要从“文”入手，解释“字”，联系到“辟”，这种系统的学习方法，溯源寻找，解字释义，广泛联想，可以举一反三，增加十倍、二十倍的识字量，并熟练地掌握其意义。

《汉字根族大系》是对传统语文教学的一次“革新”，其特点在于：

一、从造字法到识字法。以字源学为指导，从字源出发，看汉字是如何造出来的，是如何演变的，去认识字的形音义，目察其形，口诵其音，心通其义，遵循造字的规律去学习汉字。

二、从孤立到族群。族是字谱学，群是字系学，运用联系的、系统的、整体的方法，从字根延伸到一个族群，到一个大系把文字考古、考释、探秘、破译一以贯之，融形、音、义、例、训于一体，突出了系统观，易记、易忆、易用。

三、从源流到内涵。每一个字从起源讲起，讲清起源、流变、内涵，是一种全方位的语文学习方法。

四、从枯燥到有趣。丛书开辟了“趣味汉字”的栏目，用娱乐性的文字游戏，激发人的学习的兴趣，如谜语、绕口令、宝塔诗、回文诗、成语接龙、填字填词等，寓学习于娱乐之中。

《说文解字》：“叙曰：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视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易》八卦，以垂宪象。”仓颉造字也是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汉字的字根大致上也分为两大类：一是由“身”派生的，一是由“物”派生出来的。故《汉字根族大系》分为六大类：人体里的汉字、天文里的汉字、地貌里的汉字、动物里的汉字、植物里的汉字、器物里的汉字。这是汉字的六大系，在这个六大系中，又可分成若干个族群。这就是丛书的结构。

由于汉字学博大精深，本人学薄识浅，可能有错漏，祈望读者给予指正。

赣南红土地的文学守望者

文 杨璐临



作者简介

杨璐临，毕业于暨南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文学硕士，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红军阿哥你慢慢走嘞，小心路上有石头……”中国作家协会新会员培训班上，一曲高亢悠扬、深情款款的歌声吸引了众人的目光，牵动着大家的思绪。演唱者不是专业歌手，而是一位用四十春秋踏遍赣南、记述和传扬红色故事的红军后代、知名作家，也是本次培训班应邀授课老师之一——江西省中国革命历史题材文艺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卜利民。

融在血液里的红色基因

卜利民出生在赣南一个红军家庭，父亲、两个伯父、姑父，岳父以及岳父的两个哥哥都参加了红军。父亲、岳父和伯父参加了长征，父亲曾任中央警卫团机枪连连长，岳父曾任陈云的警卫员，伯父任朱德的马夫。对于从小听着红军故事长大的卜利民来说，红色革命基因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他生命的营养，如血液般地滋养他的身体、滋润他的灵魂。“红军”二字，总能让他血流加快，瞬间升腾出一股激情和力量。他说：“我的生命源自这片土地，我的红色情结是与生俱来的。”

“家家当红军，户户出烈士”是赣南原中央苏区的真实写照。卜利民的妻子也出生于红军之家。相近的家庭背景、相同的文学爱好，使两个年轻的生命走到一起。后来，卜利民和妻子双双调到县里工作。卜利民在广播局任编辑兼记者，妻子则在博物馆担任革命历史文物组组长。那时起，他们便利用接触历史资料的条件，着手开展“少共国际师”（中国工农红军少共国际师）的研究，携手开启了研究红色文学之路。

敲开红色文学创作的大门

天有不测风云。1981 年，卜利民的妻子被诊断出胃癌。在长达 8 个月的治疗期间，卜利民一直寸步不离陪伴在妻子身边。但，年轻的生命终抵不住病魔的无情摧残，正值芳华的妻子不幸病逝，留下两个孩子：一个 4 岁，一个 2 岁。

突来的变故，让原本温馨的小家瞬间崩塌。一向热情开朗的卜利民也骤然间变成另外一个人：经常沉默不语，有时自言自语，有时独自坐在小河边，看河水静静地流淌。但生活就是这样，它有着自己的节奏，既不会因为你的悲伤而加快流逝，也不会因为你的欢乐而裹足不前。卜利民既要忙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孩子，常常焦头烂额，手足无措。那段日子，后来被卜利民称为“人生的黑暗期”，历时足足八年之久。

有一回，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放学回家，到家门口时发现钥匙弄丢了，便靠坐在门前歇息。恰巧卜利民的一位朋友来访，发现在地上睡着了的孩子，问明缘由后，带孩子去吃饭，照顾了他一宿。第二天下午，见到从乡镇采访回来的卜利民，孩子激动地扑向他的怀抱，“爸爸！爸爸！”孩子哭喊声里饱含的委屈，让这个七尺男儿再也控制不住情感，泪流满面。



卜利民

这天，他又来到亡妻的坟前，望着袅袅香火，仰天自问：生命是如此脆弱和短暂，我将如何度过？自己也有一天会终老病死，那生命的意义又何在？这时，红色血液奔涌撞击，一个书名跳出脑海——《少共国际师》。这是妻子生前未了的心愿，也是临终前的嘱托。于是，帮助妻子完成未尽的愿望，像一支烛光，照亮了他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之路。

池妈妈的第三个儿子

在卜利民采访的红军故事里，有不少让他记忆深刻、感怀至深，红军遗孀池煜华老人的动人事迹便是其一。每当提起这位“母亲”，卜利民都忍不住热泪盈眶。

池煜华的丈夫是原红军高级将领、少共中央苏区分局书记、中央苏区分局委员李才莲，在战斗中不幸牺牲。因生养的儿子不幸去世，为了让红军后继有人，池煜华帮李才莲过继了一个养子，并用多年积蓄给养子娶了媳妇。由于养子天生有点智障，日子过得很艰苦，80 多岁的池煜华独居在一个残破的牛栏里，每天要走 20 多里的山路，上山砍柴、担柴、卖柴谋生，却常常连饭都吃不饱。池煜华老人的生活状况让卜利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采访之余，他经常为老人送去温暖。长期的交流相处，让两人的感情如母子般深厚。

有一次，采访结束，池煜华坚持留卜利民吃饭，无奈家里只剩一个鸡蛋，她便让养子跑了四五里路去买了一包方便面。原来，她曾听别人讲，方便面是一种十分美味又有营养的食物。这碗不寻常的方便面，装满了一位母亲的慈爱。此后，卜利民定期回来看望池煜华时都会给她捎上一箱方便面。点点滴滴的关爱温暖着池煜华的心，她骄傲地向村里人说，卜利民是她的“第三个儿子”。

岁月无情，老人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三天粒米未进。卜利民接到口信，再次辗转 200 多里，走进那个潮湿阴暗的房间，池煜华躺在黑黝黝的床上摸索许久，把珍藏 80 多年的三块银圆掏了出来，郑重地交给卜利民。卜利民不肯要，老人生气了：“我的时日不多了，这是李才莲留下来的，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我再没有别的亲人了。”

2005 年 4 月，卜利民接到池煜华去世的消息时，泪如雨下。他邀上曾一块多次采访过老人的伙伴为老人奔丧。卜利民特意选择了一床大红缎子被面，给池煜华的棺木盖上。大红缎子被面上写着“永远的池煜华妈妈”，落款：您的儿女。

泥土里的芬芳

卜利民说，作家就是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就像蚯蚓一样，深入泥土里寻找芬芳！

采访是脑力活，更是体力活。卜利民没有导师，也没有助手，每次采访都是自己带着行囊就

出发了。由于采访对象大都居住在赣南山区，跋山涉水成了家常饭。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的卜利民，右腿比正常的左腿要瘦小一圈，长期艰辛的跋涉，使他原本瘦弱的右腿越发孱弱，有时连站立的力气都不够了，只能瘫趴在泥泞的山路上。就这样，卜利民用这双腿踏遍了赣南、闽西、湘南等几乎所有的红军战斗之地，走过宁都县 26 个乡村，赣州 365 个乡镇，有些乡村甚至走过几十遍。四十年间，卜利民采访了 100 多位女红军、女苏干及红军留下的女儿，并将其中数十位女人的故事收录撰写了长篇纪实《红军留下的女人们》。在这些真诚坚守的故事里，他既是聆听者、记录者，也是见证者、分享者。卜利民说，“那可亲可敬，又有些可怜的女人，她们的苦情、她们的坚韧、她们的信念精神，像血液一般，流淌在我的体内、我的作品里，我要和所有有缘人一起分享，让身处浮华的心灵得到纯净，生命得到升华”。

2017 年，卜利民率十几名作家、记者组成“最后的红军”口述史抢救性记录工程采访组，对仍健在的 60 位赣南籍红军人员进行采访。为了这些不可再生的精神资源，卜利民又一个人对其中红军人员进行了重点补充采访。2018 年再次对赣南 134 位开国将军逐一进行大量“抢救性”采访，为中国文学、为中国近现代革命历史留下了大量极为珍贵的档案资料。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文学创作有一种高度的“文献”自觉，通过他独特而深入的跟踪采访，拨开了不少历史迷雾，还原了历史人物细节，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红军感人故事。

红色之路越走越宽广

2011 年，在中国作协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卜利民作为赣南老区的作家代表参会。与来自全国的优秀代表分享自己的创作体会，对一位作家来说是非常荣光的事。分组讨论期间，当讲起赣南的红军故事和文学创作时，卜利民抑制不住激动的情绪，思绪像脱了缰的野马纵横驰骋，原定每人 8 分钟的发言时间，根本容纳不下他丰富的内容。他的讲述举座感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也被曲折动人的红军故事深深吸引。在大家的鼓励下，卜利民足足讲了 30 多分钟。

讨论结束后，铁凝动容地握着卜利民的手合影，说：“你讲得很好，很令人感动。”想起赣南老区的创作现状和肩负的文学职责与使命，卜利民当即邀请铁凝有空到赣南走走。铁凝欣然应允，“以后我一定会来”。事后，卜利民专程记录了和铁凝的那次相遇，并将之形容为“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让卜利民更惊喜的是，那次交谈过后，铁凝就即刻将赣南之行提上议程。时隔 4 年，铁凝亲自率队来到江西调研，先后走访于都、瑞金、南昌、婺源、鄱阳、景德镇等地，深入革命老区与基层作家进行座谈交流，并就如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加强红军题材创作扶持，创办革命历史题材创作基地等事宜深入考察，为赣南文学创作带来光明与温暖。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文艺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要虚心向人民学习、向生活学习，从人民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中汲取营养。卜利民用 40 多年的时间深扎赣南这片红土地，创作发表了约 400 万字的红色题材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少共国际师》，中篇、短篇小说合集《神窑》，长篇影视小说《曾山与苏维埃》，长篇纪实文学《红军留下的女人们》《走歌的红妹子》《为毛泽覃守灵的红军妹》《红军妹子》等。正如他所言，“我采访了数百名老红军、老苏干，这些红军人员渐行渐远，把传承的希冀作为遗嘱留给我。我活着，也是延续着他们的生命。要坚持用一生做这件事，就是把红色历史采访好、写作好，争取写出精品、写出经典”。

演唱新时代主旋律歌曲的实践与探索

陈彦



作者简介

陈彦（陈筱棠），广东歌舞剧院独唱演员。

摘要：主旋律歌曲是宣传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在社会教育和审美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新时代主旋律歌曲综合吸纳了西方古典音乐元素和流行音乐元素的优点，呈现出全新的审美理念，要求演唱者具有娴熟的演唱技能，较高的思想境界，既要深刻领悟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还需了解和把握新时代国家思想方针，不断对自己的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适当作出调整，全情投入情感，这样才能全方位彰显主旋律歌曲中所表达的爱国情感、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

关键词：演唱；新时代；主旋律

歌诗合为事而作。顾名思义，主旋律歌曲指的是能发出时代强音、与时代同频共振、直击人心的歌曲。先秦《乐记》有言，“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声音之道，与政通矣”，因而优秀的主旋律歌曲往往以声乐艺术的经典形式，奏响时代号角、唱响人民心声。作为中国音乐文化的优秀资源，主旋律歌曲历来在社会教育和审美教育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宣传革命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和集体主义精神的重要载体。当今的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伟大变革时代，时代精神和价值观需要被传扬，人民的心声需要被传唱，主旋律歌曲往往是时代的最强音，能够及时地传达出时代的精神，表现人民群众为美好生活积极奋斗的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到：“一切优秀文艺工作者的艺术生命都源于人民，一切优秀文艺创作都为了人民。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表达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立志创作出在人民中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要始终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



一名优秀的歌唱者，会在主旋律歌曲演唱中全情投入，全方位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人民的喜怒哀乐倾注在自己的笔端，讴歌奋斗人生，刻画最美人物。要对生活素材进行判断，弘扬正能量，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引导人们提升思想认识、文化修养、审美水准、道德水平，激励人们永葆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和进取精神。”这不只是针对新时代文艺人才的思想方针，更是对创作和演唱主旋律歌曲的工作者提出了新要求，指明了新方向。

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民生活水平及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主旋律歌曲有了更高的审美诉求，流行文化的兴起和西方文化思潮的大量涌现推动主旋律歌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由此出现了大批优秀歌曲。它们大多“洋为中用”，把西方古典元素植入中国传统音乐元素之中，实现中西合璧的创作理念，还与时尚元素相互辉映，让观众有了耳目一新的全新感受：原来主旋律歌曲竟也能如此紧跟当下流行步伐，不仅起到宣传国家文化方针和引领思想热潮的作用，还能贴近百姓生活，让原本高高在上、充满革命色彩的主旋律歌曲呈现出平易近人和大众化的特点。

作为一名专业的歌唱演员，我在过往的十余年舞台表演中演唱了许多观众们耳熟能详且不乏创新色彩的主旋律歌曲，在日复一日的歌唱实践中越来越深地体会到：要演唱好新时代主旋律歌曲，除了深刻领悟作品的创作背景和作者所要表达的主旨外，还需了解和把握新时代国家思想方针；随着人民精神文化审美水平的不断提高，还应对自己的演唱技巧和情感表达适当作出调整。因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乎时序”，任何文艺活动的发生和发展，都是一个时代人们思想感情和精神风貌的具体体现，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都具有相应的文化内涵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演唱者只有深刻地领悟歌曲中蕴含的思想感情、呈现的时代风貌，才能更准确地演绎好一首歌曲。比如近年出现的《在希望的田野上》《我们都是追梦人》《走进新时代》《和祖国在一起》《青春跃起来》等优秀的主旋律歌曲，如果歌唱者不了解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历史背景，不能体会歌曲中热火朝天、动人心魄的光明前景，不能体会人民对于美好生活、实现中国梦的热切憧憬，便很难将这些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众。

一名优秀的歌唱者，会在主旋律歌曲演唱中全情投入情感，全方位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这不单是作词、作曲者所追求的思想性，也是一名演唱者不断提高技能所应达到

的精神境界和自觉意识。唱歌，须唱出一首歌的魂。许多优秀的主旋律作品所具有的人民性和正义性，都需要通过演唱者来演绎和表达。这些歌曲产生于人民的劳动、斗争、生活和娱乐之中，真实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讴歌了祖国，讴歌了党，讴歌了人民，叙事抒情洋溢着感人的力量，是人民群众真情实感的表达，歌词明畅优美，旋律激昂动听，感人肺腑，催人奋进，这对演唱者的唱功和文化素养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演唱者必须在日常的演唱训练和舞台表演中，一次次锤炼，才能把握其独特的艺术感染力，从而达到较高的演唱水准。比如，在很多主旋律作品里，我们不难看到大多歌曲的韵律以交响乐演奏为配乐，在歌唱技巧方面更讲究声音层次的分明，情感方面则要求张弛有度，以较为宽广的音域为主。方方面面，都体现着作曲者的创作情怀，体现着新时代主旋律歌曲的思想高度：在对观众的听觉熏陶中，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扬新时代创新精神，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该歌曲由秦咏诚作曲，张藜作词。起初，《我和我的祖国》是秦咏诚写的小提琴协奏曲《海滨音诗》的主旋律，直到1984年中秋节，张藜与张家界的一次邂逅，才成就了这首传唱至今的经典之作。当时，张家界的景色令张藜震撼不已，也激起了他心中对祖国、对大好河山深沉的爱。至今三十余年间，这首歌传唱不衰，唱出了中国人民代代相传的爱国热情。“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出一首赞歌。我歌唱每一座高山，我歌唱每一条河，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一道辙……”字字句句，韵韵声声，生动地展现了创作者和歌唱者的爱国情怀，简洁朴实地诉说和表达了人民心中最真实的声音，令听者激情澎湃、深有同感。歌词形象地描绘了锦绣河山的壮丽，演唱起来很有画面感，仿佛身临其中。这首歌的原唱是李谷一，后来也被许多歌手翻唱过。对于这首经典歌曲，曾有不同风格的演绎形式，如民歌唱法、美声唱法、通俗唱法等，但歌曲里温暖动人的山河画面、始终不变的爱国情怀，以及脍炙人口的优美旋律，一直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经久传唱，有力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便是文化自信的突出表现形式，《我和我的祖国》堪称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优秀主旋律歌曲。

“千年的广东千年的繁华，我一生下来就在这长大，虽然走了世界一圈圈，最想念还是我的广东我的家。”这是《我的广东我的家》里的几句歌词，朴实无华地道出了无数广东人民的心声。我最初的创作理念，是想通过歌声思情寄义，表达对出生地广东的热爱及感怀之情。在演唱技巧上，通过副歌的通俗民谣式唱法，连串起主歌的民美唱腔，以欢快愉悦的节奏反映当下生活的美好；用饱含深情及极具穿透力和感染力的音色，以别样的听觉反差，创造出丰富独特的感情色彩。为体现广东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源远流长的历史底蕴、包容万象的人文情怀，诉说开放包容、自由平等的广东精神，要求歌唱者演绎出一代代广东人热血奋发、独立自强的精神。《我的广东我的家》，从演唱音色的转变及歌唱技巧，到歌词，都充分实现了“洋为中用”的创作理念，通过表达对家乡的爱，述说我们生在好时代、长在好时代里的幸福声音。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胸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旋律。时代，在歌声中前进；歌声，在时代中创新。今天，虽然各种新媒体技术为我们带来了更开阔多样的综合感官体验，但我们依然需要歌曲这种传统的媒介，需要主旋律歌曲这种经典的音乐形式，结合西方元素和流行文化，以情带声、以梦为马，以演唱诉说情怀，向山河致敬，为奋斗高歌，为人民发声，为民族喝彩，为实现文化自信，唱响唱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时间是生命的感觉

文 王晓娜（羊城晚报出版社编辑，书评人）



郭小东小说中的时间，无不具有生命的征象，在小说中的所有物象包括人物身上，都能够看到时间的痕迹

《论语》有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写孔子感慨时间如流水般匆匆而逝，日夜不停。罗马思想家马克·奥勒留也说：“时间好像一条由发生的事情构成的河流，因为刚刚看见了一个事物，它就被带走了，而另一个事物又来代替它，而这个也将被带走。”可见，时间的流逝是最令人无可奈何的事情，它看不到，摸不着，万事万物却因它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对于人和其他有生命的物体来说，因时间的流逝所带来的死亡事实，又是不可逃避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咿呀学舌的婴儿成长为戴眼镜的少年，青丝及腰的妙龄少女苍老成满头白发的老妇，昔日追逐诗意的文艺青年，也挺起了发福的肚腩，再也套不上当年的白衬衫……每一分每一秒时间的流逝，都预示着我们愈来愈逼近死亡的坟墓。看到婴孩一天天长大，我们喜悦；看到自己眼角的皱纹，我们苦叹；看到长辈们垂垂老矣，我们难过。“岁月如飞刀，刀刀催人老”，时间的流逝所带给我们的喜怒哀乐，是最刻骨铭心又最无奈无助的生命体验，这生命的尽头便是死亡。当时间的经验和死亡的命题相连，则开启了时间具有生命征象的哲学思考：时间的河流，即生命的河流，时间的流逝，也即生命的流逝。

时间和生命一样，具有不可逆转的属性。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每一瞬的时间也仅有一次，失去的永远不会再回来。在文学和艺术领域

里，吟咏和表现这种时间观和生命观的例子比比皆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表示时间的珍贵无价；“白发皓然生，新年又五日”，书写时间流逝之快；“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嗟叹良辰不再的怅然若失心情；而宋代词人蒋捷《虞美人·听雨》一词中“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壮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的经典词句，被誉为人生听雨的三境界，其实这三种不同的境界便是生命在时间之河流逝的过程中，所带给人的最直观最强烈的时间感。时间不同，生命所处的阶段不同，一切便都不同了，而这种变化又是任何人都无法左右的。人终有一死，是自古至今的人类所无法跨越的难题。为了逃避死亡和保持青春，古有多位帝王迷恋于炼制“仙药”，今有无数美女不惜借助各种手术来整容，就连《西游记》里，作者也借着各路妖精争抢“唐僧肉”以求长生不死的“噱头”，建构了“八十一难”这一叙事伦理的内在冲突。显然，读者和观众对这一叙事逻辑的接受毫无违和感，因为这击中了人类个体精神领域里共同的隐痛——死亡，契合了每个人对死亡的逃避意识，对长生不死的生命之向往。想要拥有青春永驻、长生不死的生命，就预示着时间必须停滞下来，而时间一旦停滞，生命的意义也将变得虚无。虽然我们难以接受死亡的不可抗性，可一成不变、始终如一的生命状态又该是多么乏味！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认为，世界的运动性本质决定了世间不存在静止不变的事物，因为连静止本身也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运动。就如同“我们永远不可能跨进同一条河流”那样，所谓“始终如一”的爱情誓言都是童话里的谎言。当恋人双方或一方信誓旦旦地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他们当然不愿意接受爱情的悲剧性本质，更是“主动”忽略了爱情这一生理和精神性产物在时间流逝中将会出现的各种可能。生命依附于时间而存在，看不到这一点的人，在无常的人生际遇面前，往往会措手不及。

郭小东小说中的时间，无不具有生命的征象，在小说中的所有物象包括人物身上，都能够看到时间的痕迹。作家书写时间，就意味着书写生命的感觉，时间的过程就是生命的成长过程，一切均与时间粘连。《罪恶》的引子里写到主人公丘博文（乳名丘大）与哑巴丁二的匆匆一瞥。“那天上午丘大行刑时，经过地铁口，哑巴正在那儿乞讨。他看见了囚车呼啸而过，却没有看见囚车里五花大绑着的丘大。而丘大看见了地铁口的乞丐。他绝对没有想到那就是哑巴。丘大与哑巴从此阴阳相隔。”在这短短的一瞬里，映照的其实是二人经历相异又相仿的漫长一生。多年过去，丘大变成了丘博文，从一个城市打工者摇身成为一家考研机构的大老板，而丁二依旧是那个生活在最底层、受尽侮辱和嘲弄的哑巴丁二，在一次巨大的泥石流吞没了村子后，不得不到城市里乞讨。他们共同的贫贱出身、粗悍的家教和乡村童年经历，以及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都在这特殊的一瞥里得到了意味深长的暗示：一个“阶下囚”和一个“阶下乞”的目光在“不经意”间碰撞，碰出的是一袭以生命形式作为晦暗背景的巨浪，浪花卷起的是二人一动一静的人生经历。郭小东在创作中，惯于用这种方式，将发生在主要人物身上的重大细节，和另一些看似毫无关联的“小人物”的命运联结在一起。看起来轻描淡写，实际上颇有深意，折射出的是处在两种不同阶层和不同精神领域的人物，在同样的时间河流中，他们的生命底色。如果读者悟到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丘博文为何会去欺骗和意淫出身高贵、美丽优雅的梦中女神静娴，为何会犯下滔天的杀人罪行，为何会编造出一个不存在的“红庐”。故事里的“红庐”，“大门是一扇沉重的推拉门，生铁铸成，推拉时要费很大的力气。看得出这个地方在鼎盛时期，是相当辉煌的，现在废弃了，

依然有一种霸道的大气，在空气中暗自流荡”，分明就是一个破旧的厂房，在静娴那里，却被丘博文描述成了一个古典的城堡，而他是城堡里的绅士。前者是坚硬的现代化工业遗迹，后者却是温雅的贵族精神的凝聚地，时间在这两种物事上的不同呈现方式，是两种完全相异的生命绽放和打开历程。丘博文临死前对乞丐丁二的一瞥，瞥见的似乎正是昔日里不愿面对的自己，和自己敏感自卑的内心，以及那灵魂深处的隐秘：这隐秘是无意识并且疼痛的，关乎他的基因和出身，是任由时间和死亡也改变不了的客观事实，是不随死亡戛然而止的永恒之殇。

《罪恶》中的另外一个人物林永兵，时间在他身上仿佛停滞了。林永兵是1979年知青请愿运动时的领袖，曾带领几十名知青上京请愿，把一个中央知青慰问团的慰问大会，当场变成了一场五万人参加的知青请愿会，亲手把那场违背人性的知青运动推进了历史的坟堆。然而，林永兵能够走过壮怀激烈、气吞山河的风云岁月，却跨不过当下现实的困顿。“青砖老屋已风烛残年，从爷爷那一辈人起就已历经风霜雨雪，靠修修补补勉强度过多雨的时节。现在漏雨漏得更厉害了。日日听得见儿子的怨恨之声。儿子的吉他潮得变了音。”残破的青砖老屋像一个为时间发言的无言者，目睹了时局的无常和动荡，和林家几代人的成长和命运变迁，也见证了林永兵舍己为人的大义。不可否认，作为知青领袖的林永兵，当年做下的壮举，是令人钦佩的，可是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林永兵，又是令人失望的。通过丘博文的视角，读者看到的是一个和野地几无差异的家庭环境，“几只林永兵从云南扛回来的粗重木箱，看得出木质优良但做工粗糙。它们笨重地匍匐在墙角，两张床分靠在墙边，蚊帐乌黑，随随便便地挂在那儿。木箱上有一台29寸的电视机，这种电视机在城里已经很平常，千把元一台”，这便是林永兵一家三口全部的家当了（电视机还是一个来看望他的知青朋友送的）。妻子靠卖混沌艰难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儿子初中毕业后辍学在家，每天混迹于街市，他们在对林永兵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失望和抱怨中麻木度日。这个依然怀抱格瓦拉理想的大男人，执着地沉迷于过去的革命岁月，仿佛永远活在了1979年，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除了容颜苍老之外，时间似乎从未流逝。他每天所做的，就是对别人宣讲那一套一套的革命理论和理想主义，慨叹现在的青年们没有信仰，幻想着某一天能够再次振臂一呼，东山再起。郭小东对这个人物的感情是极为复杂的，同为知青，他同情和理解他的行为，深知一个被时代抛弃了的人是多么无辜，同时又为他的错谬担当深感无奈和痛心。可是，林永兵说到底是那场错误的政治运动的牺牲品之一，他的悲剧、他的深入骨髓的知青情结均是时代造成的，正如郭小东在其评论集《文学的锣鼓》中《南北方的痉挛——〈中国知青部落·自序〉一章里所写：“我们没有理由将这群曾经迷途的羔羊，为了利他而迷途的羔羊，视作受伤的狼。即使知青情结将受到包括知青作家在内的任何贬损，我还是固执地宣称，在所有人的群体中，这一群集体地受难而又始终承受着时代不幸的人们，他们是最值得人们去深深理解与体恤的。……从大的社会学评判上说，他们唯一有罪的是，时代生活注定了，裁决了他们不配有更好的命运。”故事的结尾，在丘博文事发、考研机构解散之后，林永兵依然在“期待有人打电话来，约请出去聚聚，散散心说说话”，依然天真地以为，“革命人坦坦荡荡，何须东躲西藏”，他始终没有明白，他和丘博文们已经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人生观和价值观有着天壤之别。他用革命的眼光看待丘博文们的“事业”，而丘博文只是利用他的鼓动性言辞来赚学生的钱。做着同一件事情的两个人，却隔了整整一个时代的距离，时间河流以一种极为荒诞的形式交集在他们的生命轨迹里。

干老的干和老
——读《王干文集》有感

文 刘根勤（中山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副教授）

为一位传奇级的评论家写评论，类似于将一位大厨的绝活组合成一道杂烩，味道还不能太差。这个难度，不可思议。

不过，也可能因为“传主”过于威武，他的文章太多，写他的文章也太多，为了刻意追求“不落窠臼”，只能如此了。

被称为“干老”而又出了文集的，文坛上除了王干，没有第二人。

我一直记得王干在许多场合的自我介绍：王干，本名，非本名。

我曾说过，王干之于当代文坛，类似于古龙笔下的陆小凤，陆小凤偶尔行侠仗义，平时喜好一切美食美酒美文美女。

最近一次见王干，是在 2019 年 7 月初，在广州。他是应大湾区文学研讨会邀请而来，会议规格很高。

第一天晚上，广州青年作家刘迪生召集酒聚。迪生是《华夏》杂志总编辑，交游广泛。当晚同席的都是南北文学名家，比如《小说选刊》前任主编，比如香港的罗光萍女士、深圳的吴君女士，还有广东文学院院长熊育群先生。王干是主角，他拉我前往。我也没把自己当外人，直接前往。我也没经他同意，代邀了他早年教中学时期的学生、在广州国企工作的宽哥。宽哥夫妇都是他的学生。师生阔别多年，各自安好，甫一见面，万分惊喜。

同席者都是智者，但对干老十分尊重，毕竟他资历极深，人缘极好。席上气氛热烈，我们共同的故乡、江苏小城兴化，也格外受到大家的好评。文人的单纯、真诚与热情，于此可见一斑。

关于文学，有一句台词说得烂大街了：文学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我始终觉得，文学永远高不出生活，如同人永远高不出自然。

王干与他的文学，还有文学批评，就是自然与生活的一部分。

他字里行间的温度、人性、人民性、中国气质、时代特色、个人风格，全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如假包换的。

他说汪曾祺是“讲好中国故事”的代表，他自己何尝不是?

他是一个标本性的存在，他的青春与改革开放同步，他是这四十年中国文学的见证者、参与者与推动者。

他更是一个鲜活的人。他的博闻、他的有趣，都是让人过目不忘的。

文学史上的王干：王干的能干

王干是年轻的。

他的成名，几乎是伴随他的成年。也就是说，他在 18 周岁前后就已经成名。

大家叫他“干老”，实际上他是 60 后。现在算起来，也还是“中青年学者或作家”。更何

况他的精神面貌，永远是容光焕发笑意盎然。作家徐坤说他是“南方的帅哥才子”，学者丁帆说他是“一见面却是一个大眼睛滴溜溜转的小年轻”，够形象。

王干的成名史，专业人士都耳熟能详。不过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简要复述。

1985 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与《文学评论》编辑部在昌平开办第一期文学评论研修班——这个班后来被戏称为“黄埔一期”，丁帆担任班长，王干是班里同学。王干小他 8 岁，当时还在高邮党史办工作，青春靓丽，却在外界人心中留下了一副“老者”的形象。当时，王干是研修班里听课最认真、读书最勤奋、写作最频繁的，这些都是他的核心竞争力。他挑灯夜读贾平凹的《商州》，为熄灯问题几乎跟同学翻脸。

当年他站在王蒙家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脸阳光灿烂，如同北方暖冬里一株小树般极力向上挺拔的青春情景而言。几年的时间过去，王蒙家的院子里依旧有两棵树，一株，是枣树，另一株，还是枣树。

据可靠资料记载，王蒙跟王干进行十次对话的日子，具体应是在 1988 年至 1989 年之交。其时，王干也就是 28 岁左右。

用批评家蒋原伦的话说，王干 28 岁时的这一部《对话》，已经作为“《新时期十年文学大观》的简写本”，当之无愧地载入中国 20 世纪末文学批评史。

王蒙是作家，也是官员，王干与他对话，建立了自己的专业地位。在此之前，他的人文底蕴与人脉已经十分深厚了。

他的家乡兴化，以及他所工作过的毗邻的高邮，人文荟萃。历史上出过词人秦少游，小说家施耐庵，“扬州八怪”代表人物郑板桥，朴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当代则有继承光大高邮文脉而被王干戏称为“等于文学”的汪曾祺。

《王干文集》11 本，涉及的中外作家上百，各种国籍性别年龄，但核心还是江苏男性作家。这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现象级事件。

到南京后，他先是在《钟山》杂志做编辑，后到省作协创作室当领导，管理专业作家。10 多年后他调到北京，任《中华文学选刊》与《小说选刊》等全国名刊主要负责人，更是胸怀全国放眼世界。用他的好朋友赵本夫的话说，他不大像个领导，更像全中国作家的朋友和秘书。

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钟山》曾先后首倡“新写实”“新状态”小说，王干是主要的策划者之一，“新状态”的概念就是由他提出来的。这两个概念，都催生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引起当时文学界的轰动。当然，也引来很大争议。但王干的厉害在于“轴”，认定一个理就走到底，他不介意外界的批评和争议。他认识到作为一家在全国有影响的大型文学期刊，在新时期文学蜕变、发展过程中，不应当是被动的，应当有自己的声音，有所观察，有所思考，有所梳理，有所倡导，有所展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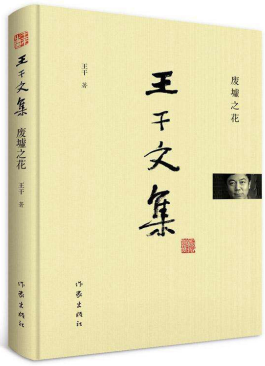
后来，他又策划了“联网四重奏”活动，由《钟山》《大家》《作家》《山花》四家有名的刊物共同拿出版面，推介文学新人，这个活动持续了几年，成为文学界引人瞩目的事件。很多活跃在当今文坛的青年作家，都得到过王干的热情帮助。

作为批评家的王干，更为耀眼。在当今中国文学界，王干更多是以批评家的身份出场的。王干过人的才华、聪明、敏锐，是大家公认的，他的视野之开阔，视角之独特，行文之机智，都是独树一帜的。和他在编辑岗位上一样，他时刻关注着那些著名作家的创作动向，因为他们对文学的思考和实践，常常代表了当时文学的高峰，研究他们和他们的作品，研究他们的创作思想、创作感悟，无疑可以站在文学的制高点上，对整个文坛起到启蒙、引领和推动作用。

王干的文学批评是真正的、独立的文学批

评，他并不一味肯定和褒扬，他只肯定那些他认为应当肯定的作品，对一些他认为不那么好的名家之作，也毫不客气地指出作品的缺陷和问题。在关注著名作家的同时，王干还关注那些不知名的作者。他的批评富于洞察力而又不失公允与温和，对所批评的作家，无论他们处于什么地位，都能得到应有的提升。

在《钟山》期间，王干从个人写作与社会活动，极深地介入了文学。他关注的范围很广，是那个时代真正具有全局眼光的为数不多的批评家之一。与此同时，南京本地一大批青年作家接连冒出来形成蔚为壮观的“南京青年作家群”。这个群落在全国作家队伍中旗帜鲜明、风格独特，将来的文学史绝对应该大书特书。王干是该作家群的重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因此可以说，他早已进入当代文学史。



《王干文集》

作　者：王干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小说界有这么一个说法：“一个地区有一个像王干那样的批评家特别重要，要不咋能那样快推出一大批文学新人来呢?”还有一句话说，“王干就像一只头羊，率领着江苏的群羊，一拨一拨地冲向中国文坛牧场。”“咱们《××文学》怎么就不能像南京《钟山》那样往外推新人呢？你看王干，推出多少江苏新人出来?”

他有本集子，30多年间集中于江苏作家，一共30余人。从老一辈作家高晓声开始，到中年的赵本夫、周梅森、苏童、叶兆言、范小青、朱苏进，再到后来的“断裂”作家群，以及更晚一辈成名的作家，江苏知名作家基本上被“一网打尽”。

几十年来，江苏文坛，尤其是南京文坛，还有他最熟悉的兴化与高邮文坛，新人辈出，除了跟这些人的自身努力，跟苏童、叶兆言等榜样力量的鼓舞，跟江苏成批文学杂志社的编辑们的栽培分不开，还跟全国各地文学界一批同是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正值年富力强有朝气有才干的年轻男编辑同志们的辛勤培育分不开。他们共同在为推举新人、为中国的当代文学建设进行着无声无言实实在在的努力。

从南京到北京，王干不但担负着文学评论家的身份，还有一代名编的头衔。他奖掖新人、炮制概念、开拓阵地，他推波助澜、奔走相告、张弛有度，他的大嗓门、好酒量，都指向四个字：“成人之美”。

一代作家的成长，总是与一代批评家、编辑的成长密不可分。比起那些“述而不作”或“著而不述”者，再或者是那些喜欢在年轻人的头上打一棒，专事“解构”与“颠覆”，然后建构自身者，以王干为代表的批评家、编辑的劳动应该说更有意义，也更应该得到广泛的认同和尊重。

差不多40年的文学批评实践，王干已经建立起一种新型的批评写作文体：南方的文体。用他自己的话说，“南方的文体不是一个流派，也不是一个‘主义’，更没有宣言，他是评论的一种状态，一种犹如蝉之脱壳之后的新状态。南方的文体是一种作家的文体，是一种与河流和湖泊相对应的文体……”

王干用这样一种方式给自己的批评定位，足见他的智慧。是文体而不是体系，这样既避免了打正面的遭遇战，免受一切所谓“正统”学人的诘难，同时又聪明地给自己确立了从边缘向中心突进的某种可能。实际上已经不是“可能”，而是一种既定的事实，他用他40年创作批评的实

绩，赫然矗立在中心的位置上。

“南方”的概念，并不学术，而属于一种“文化”或者“文学”的感性称谓。

美国学者王德威的名作《南方的堕落与诱惑》，是研究苏童的代表作。他说，苏童的笔下，喷薄着南方的衰落、腐朽、阴郁、淫靡与绮丽，构成了世界文学史上的“南方”景象的一部分。

王德威的学院派背景不言而喻，尽管他的观察不乏深刻与准确。但他显然没有注意到“南方”的庞大内涵。不要说广东与香港才是真正的南方，苏童代表的是江南。即便是江南，上海与南京也大不相同。而王干，这位来自苏中平原的壮硕男子，用他独有的质朴与聪慧，“重构”了文学与文学批评中的“南方”。

“南方”的王干，元气淋漓，既无京派的高蹈，又无海派的柔靡，与当下南京的平实，倒有几分天然的渊源，而他的阳光，也是当今文坛独一份。他不是学院派，却在体制内，而且占据了主流的地位，嚣张跋扈，而又中规中矩，他以这份奇崛而又温厚的姿态，行走了数十年，声势浩大，从未衰减。

王干身上的动物性，或许接近传说中的北方人。不过故里江淮，本来也是南北交汇地带。说实在话，就现在他这年龄，还有这精气神，气血鼓鼓，别说文学界，军界恐怕也不多见。老天爷让他超人的精力倾注到文学中，这是文学的福缘。但他又不是心胸狭隘的自了汉，闭门造车，专门利己，而是众乐乐，美美与共，与大家一起享受一起成长。

王干热爱生活，迷恋家乡，崇拜前辈，欣赏才华，尽力培育扶持一切美好。他虽然从事评论，却从未认真思考过自己的价值与意义。王干还有那么多写他的人，最多说王干是个好人。王干的境界，远不止如此，他是文学界的君子，是传统意义上的儒生，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虽然他和他的朋友们，笔下很少出现这些词汇。

文学界、文学研究界，不能故步自封。用陈平原先生的话说，要有“文”，还要有“学”。

这个“学”，也不是学院派的那种学术，而是要跟中国的道统接续起来。

王干做到了。

表面上看，他大鸣大放。实际上，他默默耕耘。二者毫不违和，完美统一。

文本中的王干：王干的才干

王干的立身之本，是文字。

用丁帆的话说，王干的聪慧和大度，洋溢在字里行间。倘若王干只是这一种气质，那也没什么可看的了。毕竟那么多经典放在那里。我感兴趣的是，读完《王干文集》，你不但认识了一个“完整”的“全须全尾”的王干，从虎头虎脑的小毛孩到笑意盎然的干老，是一个漫长的庞大的多维的温暖的存在，偶尔有变化，但更多的是稳定，40 年风风雨雨，他对生活，以及作为生活一部分的文学的热爱，水位线始终居高不下。因此，读完这 11 本书，你就收获了一部真实、鲜活、口感独特回味隽永的“王记”当代文学史。

诗人远心说：从 4G 到 5G，我们已进入到读屏时代。“一屏万卷”，是电子阅读打开的大千世界；而读《王干文集》呈现的“文学屏”，竟然可与此类比，仿佛打开了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40 年来的文学史。这是一个人的文学史，也是 40 年文学史在一个人笔下的镜像。

由于天性，王干的笔下，既少那些喋喋不休的西方文论家的概念，也少刻意雕琢的一些语词，学院派与美文爱好者可能不容易满意。另外，他由于工作需要，不放过每一位当红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因为底蕴、阅历各种原因，难以走远，甚至跑偏，也就连带王干的部分作品不能“迭代”受到认可了。

王干的文字，犹如他的其他爱好，围棋或者

足球。单看某一篇或者某一步，不觉其妙，但关注越久，越能感受到他的气韵。说到底，他不规范，但真诚、准确、有料，他不精深，但新颖、活泼、连贯。这点，颇似金庸笔下的独孤九剑，有的剑招精微奥妙，有的剑招笨拙丑陋，但效果是无敌的。

这部文集，很好地满足了“干粉”的需求。

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与研究，一大弊病，就是“文学史”课程。这门课程里，也有“作家作品”内容的罗列，但绝对是蜻蜓点水，绝少文本解读。研究与追捧作家，一定要读文集，乃至全集。王干作为一代文论奇才，他的文集，自然具有独特的案例价值。

王干的文章，总带着个人对文坛的最新观察，很少炒冷饭，或者做一些远离文学与世务的空言高论。很多人爱和王干聊天，因为信息量大，真知灼见随处可见。片刻倾谈，胜过看一大堆沉闷无趣的专业论文。

批评家吴子林将人文学科研究分为 3 类：职业的、事业的、趣味的。所谓趣味的研究是自由的个体性工作，“任天而动，触事兴感，见微知著，因文为题，纵谈古今，纡徐不迫，讲论自乐；有细密处，有奔放处，豁朗深邃，不拘一格，极具创造性和生命力。此类研究完全不从事功上着想，亦无体系性之考量，其价值与意义却甚为重大”。……趣味的研究，不为事功，机心全无，挥洒自若。因为完全按照个人的喜好摸索而得，有一种体系之外的率性与轻盈、放达与犀利，而在萧散随意之中，蕴藏大量深思洞见，读者唯有“以心会心”方有所得。

环顾文学界与批评界，没有人比王干更符合这种描述了。

他的大部头理论、评论文章，是奠定江湖地位的，如同饭店包厢里的秘制大餐。而他那些众多短平快似乎并不十分用力的点穴式文章，如同大厅里的餐前小食与餐后甜点，更受欢迎。那些文章直抒胸臆，摆脱理论纠缠，与读者一起“还原”语境，触摸“内核”，近距离感知当下文学的脉动。

在《灌水时代·自序》中，王干把南方批评比作水中之鱼，本质始终在文学之中，犹如鱼离不开水。他进一步说，这种鱼水关系并不意味着批评绝对依赖文学创作；相对于生活，创作也是鱼。批评既在文学的小河游泳，更在生活的长江大海翻腾。文学的功能，批评一样都不能少。王干是里下河丰富水系孕育出来的一条虎头鲨，欢快地游弋于中国文学的江湖之中、江海之上、江山之间。

在专业批评中，王干关注过几乎所有中外著名作家，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关注苏童最多。苏童并不姓苏，他长期生活在苏州。但这位高大的男性作家，却是典型的“南方”文学代表，他有点儿蔫不拉叽，但文笔绚烂，有点像男版的张爱玲。王干是个顽童加糙哥，对他情有独钟，貌似理所当然。

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王干都体现出苏童情结，因为他的评论最适合对苏童作品做出最优质化的呈现与再造，无论是出于对苏童作品，还是出于他本人对苏童笔下那种遥远而逼真的江南生活，他都是真心的热爱，王干倾力为之赞叹，这一部分是王干批评中最精彩，也是最出彩的篇章。

看看王干的这段文字：“苏童在先锋派作家中，以其语言丝绸般的柔和和光滑独具一格，他小说的语言时常可以自成一体，不必指向叙事。在《河岸》里，苏童始终保持这种语词的飞翔感觉，并时不时地向人物读者进行俯冲。《河流之声》那个章节里，能看出孙甘露式的语言修辞的天赋，但又没有脱离人物和小说的具体情境，结合得近乎完美。”王干多处提及苏童语词的“飞翔感觉”，只这四个字，就高度凝练而准确地概括出了苏童的语言风格，让人感觉到一种超越理性的准确性。

从这点上看，王干既是研究者，更是创作

者，他充分展示了他的审美能力与表达能力。

古往今来，批评家无非两个标准：一是建构自己特色语言，二是推广作品作家。这两点，王干都是当之无愧的批评界第一人。

这条里下河出来的虎头鲨，一路摇头摆尾，从兴化到高邮到北京到南京再到北京，到处高歌猛进，留下了自己欢快的身影与独特的文字。



王干

王干的批评文字多与文化有关，他的文集中，无所不包，俨然一个时代文化的“小宇宙”。但王干并没有给自己贴上“文化研究”的标签。在他眼里，文学本来就和文化息息相关，或者干脆就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文学而文化，或者由文化而文学，十分自然，不用特别强调。他一边谈文学，一边谈围棋，谈足球，谈无厘头电影，谈切·格瓦拉，谈武侠，谈麻将，谈中国电影的“人妖”现象，谈女权主义和女性文学，谈犹太复国主义，谈“赵薇的大眼睛”——后来张颐武疑似受此启发又“升级”到章子怡超越孔子这样的言论——这些文章看不到“文化研究”的虚张声势，只有文学批评家王干一贯的机智、热情和随意喷射的修辞才思。在曾经的文学低潮期，这对他无疑是一种解放，一种精力才华的保存与转移。王干还有《静夜思》《青春的忧郁》和《另一种心情》等可读性很强的散文随笔，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他和文学无时无刻不在对话，甚至可以说，他就是行走的文学与文学批评。

王干的随笔《向王蒙学习宽容》《向老舍学习说话》《向汪曾祺学习生活》《向鲁迅学习爱》，是典型的人生智慧。他谈这些前辈，也是谈自己，谈自己伴随中国文学成长的历史。王干的文学评论、文化批评和散文随笔，主题有侧重，文体有分工，但彼此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在语言方式和智慧形态上相通之处甚多，算是广义的杂文。王干正是以这种不断变化拓展的文体实践贴紧脚下的生活。

王干是批评家，还是作家，作家不能不写散文，尤其不能不写自己。王干的专业文章重要，但喜欢不喜欢，就因人而异了。但他的散文，相信没有人不喜欢。

王干是汪老的忘年交。汪老的散文，还有他笔下的苏北、云南与北京，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绝美风景。

王干比汪老小了40岁。他所处的时代，更壮阔、更多变、更热烈。

因为时代的进步，尤其是交通与通讯的进步，王干的视野，比前辈更宽广。所以他写生活、写故乡、写居住与游历过的城市，可谓最好的人文纪录。

他写魂牵梦萦的故乡泰州，写念兹在兹的江南古城，写高屋建瓴的大国首都，都别有风味。

《泰州是谁的故乡》《泰州有条凤城河》《关于泰州美食的记忆》《个园假山》《江南三鲜》《明前茶、雨前茶与青春毒药》《闲话南京》《北京的春（夏秋冬）》《在怀柔观山》《小二、点五、涮羊肉》《男人居住北京的十一条理由》《如何进入重庆》《过桥米线和菜泡饭》。

这些文章，光看标题就知道内容。但是真看进去，欲罢不能。因为王干的观察与体验能力，的确不同寻常。

他说男人居住北京的十一条理由，颇有可观之处，关键是结尾来了一句“北京有我”，令人忍俊不禁。

的确如此，“我”是世界的中心，“我”要不

在北京了，北京再好，也只是回忆，而不是鲜活的“这一个”。

令人感佩的是，王干笔下的故乡，如同母亲的体温，如同启蒙老师的声音，如同初恋情人的眼神，是他对这个世界的起点，也将是归宿。

百年来，文人对故乡，几乎是一边倒的“批判”，“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现在的网络上，每到过年，都是一批学者文人如此。似乎不如此不足以显示自己的孤高与冷傲。他们仿佛寓言故事中的某种人，总想提着自己的头发，让自己离开大地。

王干不然，他才名早著，游遍四海，从京城到老家，从达官贵人到贩夫走卒，他无不倾心接纳。

王干笔下的故乡，有情有义，活色生香，流光溢彩。

做过泰州市委书记现在是南京市市长的韩立明女士写了《泰州的海》，王干为之呼应，写了《泰州的河》。两篇文章，写出了泰州人灵魂中的诗意、灵性与豪情。可谓闻弦歌而知雅意。

这篇文章发表在《泰州日报》上，国家级的《新华文摘》闻风而来，收录了这篇文章。

王干对家乡的深情，获得了充分的认可。

几十年风风雨雨过去了，文学的命运几经变迁，文化人更是大浪淘沙。对文学的真情、对人的真情，只有时间才能验证。“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王干用他的汗水、泪水与血水，淘到了文学的真金。历史也几度轮回，淘到了他这块真金。

生活中的王干：王干的干劲

王干有很多符号与标签，他知识面广，信息量大，阅历丰富，见过太多名人高人大人物，当然他本身就是名人。他真诚、热情、乐于助人，不折不扣的好人。

不过这些都流于表面。

我向大家推荐王干的文集，更推荐这个人。

一句话，好玩。

你很难想象，文学界，有这样好玩的人，更别说遇到了。

王干贪玩是出了名的，他也会玩。

他跟汪老谈吃，谈做菜品菜，可谓人间至味，美食背后是浓浓的乡情与亲情。

文学于他，其实就是玩之一种。

王干有太多的才华，太多的精力，他感兴趣的东西实在太多。比如社会上的诸多文化现象，比如关于繁体字的讨论，比如关于城市建设，比如关于足球，他都是一个热心的参与者，都能说出一些独特的特点。

现在小孩学的钢琴与芭蕾舞，我们这代人基本不会，王干估计也不例外。我们会的，基本王干都会。足球篮球不说了，他还会围棋。

多年前，江苏作家曾成立一个足球队，和高校、新闻界打过一些比赛，这支足球队就是由王干牵头组织的。当时，不知他从哪里给每人弄来一身阿迪达斯的行头，那双球鞋，作家赵本夫至今还常穿上锻炼身体。据他的球友说，他的球风如文风，勇猛而灵活，更善于协调与配合。他还爱打篮球，球风也类似，不过相对于足球，他的身高限制了他的发挥，投篮被人盖帽或者扇掉是免不了的。王干还是一个围棋爱好者，文集里收录了不少他和常昊、邵炜刚、罗洗河等围棋国手的对话录。用老朋友的话说，王干棋下得不怎么样，对话录却高屋建瓴，一派大家气象。据说他还和常昊、古力下过棋，有点儿伪国手的味道了。

江苏文学界向来棋风很盛，其中最厉害的要数储福金了，他是业余六段高手，在全国文学界稳坐第一把交椅。有人说他成了一位作家，却少了一个国手。大家常找储福金下棋，当然没谁是他的对手。偶尔会听说，谁谁昨天把储福金赢了，但被让了几个子却闭口不谈。但是这样的氛围还是提高了大家的棋艺。王干属于那种才子棋，有时一步棋很臭，有时一步棋却异想天开，天马行

空行云流水，这点类似金庸笔下的速成派高手，随机交锋，总能让一步一个脚印的正派人士吃瘪。

不过这些都属于“小众语言”，中国人，当然包括中国文人，最大公约数，还是酒。王干的酒量大，江苏的梦之蓝，目测他不低于一斤。考虑到他的年龄，这已经难能可贵了。

酒量只是基础，酒风才是主题。他喝酒如行云流水，从无滞涩之感，几乎是来者不拒，不考虑对方的性别、年龄与身份。在酒桌上，一是人少而熟，一是有酒助兴，他谈锋极健，他固然高兴，受益的却是其他人。

有一次他来广州参加大湾区文学研讨会，是9位嘉宾之一。会间有青年作家请他喝酒，他拉我前往。

我经常处于不胜负荷的状态，正在纠结中。王干说了一句，你不想听听我在北京的见闻吗？我怦然心动。于是不顾礼仪，拉了我的朋友、广东某国企的负责人夫妇前往，这对夫妇都是他早年在乡镇上的学生。到了现场，他格外惊喜。人不多，却有香港、广州、深圳三地文学界领导，这些都是豪迈且阅历丰富之人，但桌上的主题却是兴化这个小县城，让人感叹缘分之妙。

王干有次跟一群作家喝酒，有人说江苏男人不爽快。他大怒，爆了粗口，拿酒杯砸向对方，所幸未中。第二天却和对方成了好朋友。

兴化与泰州，有许多岳飞岳王爷抗金的遗址。岳王爷千古武圣，忠义齐天，他塑造了中国人的性格。而他的文学造诣，也是青史留名。若非至情至性之人，怎么能同时立德、立功、立言？

泰州有一位施亚康先生，是苏中文坛与政界的长者。2000年时我认识施老，他许我以忘年之交。此前我已经认识了王干，跟施老提及王干，他说王干当年说过，要成为施亚康这样的人。差不多20年过去，我在酒桌上遇到王干，提到施老，王干满脸诚恳地说：施老对我有恩。有次在一个高规格的场合，省部级领导众多，他看到了施老，便穿过人群，来到施老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这个礼节，知情人都知道，他极少使用。更多的，是中青年文人对他使用。

王干与汪老、王蒙的故事，是文坛的陈年掌故。而他与施老的交往，更是新时期文坛，还有江苏这一独特的人文舞台上的生动图景。

王干的朋友称他为“文学顽童”。我觉得差强人意。王干好——第四声——玩，也好——第三声——玩，但顽童是表面的，骨子里是真诚，真人，赤子。

“顽童”一词，容易让人想到金庸笔下的周伯通，此人可谓好玩，但极其不负责任，别说侠义心肠，连基本的做人原则与责任心都没有，“白瞎”了他的高超武功。他是武痴，但正如他师兄、偶像王重阳真人所说，没有济世救人的心肠，始终到不了绝顶。

王干与周伯通大相径庭。他头脑冷静，却热心热血，跟朋友要玩、要做事，还要相互成就。

王干的文章，既有“为文艺而文艺”的专注与迷恋，又无处不见对世道人心的洞察与执着。

这就是“文以载道”。

这才是真正的好玩。用文学的语言说，有魅力！

体用不二，人文合一，这就是王干，王干的干和老。

四十年，对一个人而言，太久，对历史而言，太短。长短不重要，难得的是此志不渝，是不忘初心。王干崇文之初心不变，阅世之火候老成，可喜可贺。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这样结语：“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

愿华夏文明与天无极与地无疆，愿中国文学、南京作家、兴化文人再接再厉永创辉煌，愿王干健康长寿，笔耕不辍，硕果不断，愿王干与他的朋友、粉丝，常来常往兴致勃勃干劲绵绵！

拥抱世界的港湾
连接天下的彩虹

《华夏》杂志创刊于1985年2月，由广东省侨联主管主办。《华夏》面向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发行量最大时超过30万册。《华夏》为双月刊，2018年入选广东省第五届优秀期刊。

广东拥有3000多万海外侨胞，3000多万归侨侨眷，广东省侨联永远是侨胞的温馨家园。《华夏》站在东西方文明的高地上看世界、看中国、看广东，围绕“拥抱世界的港湾，连接天下的彩虹”的办刊宗旨，以“侨”为中心坐标与纽带桥梁，藉由“侨”的眼界和语境，以“人文”为主线，承载家国情怀、弘扬中华文化、记录侨海风云以及探索东西方文明交融。



国内统一刊号 CN44-1771/ D
国际标准刊号 ISSN1003-7373

社址：广州市天河区体育东路140-148号广东侨联大厦6楼
邮编：510620 **电话：**020-38879808 **邮箱：**gdqlhx@163.com

梁启超的“新民”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逻辑

文 郑焕钊（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文艺学教研室主任）

中国现代的文化和文学启蒙，其“启蒙”观念尽管采纳自欧洲，尤其标榜以法国启蒙运动为旗帜，但从其本质内涵而言却是中国传统“启蒙”教化观念的现代演绎。西方启蒙思想重视理性的批判精神，而中国传统启蒙教育重视教化引导，后者相比于前者更突显了文字通俗教育的作用。因此，对于西方“Enlightenment”观念的误读，遂使得“文学”——这一深受传统“文以载道”观念影响的思想传播载体，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构成文学在中国现代文化启蒙过程中的突出地位。

由于中国传统“启蒙”教化观念中预设着先知的“启蒙者”和后觉的“被启蒙对象”，两者之间地位身份、学识思想的差异，构成了启蒙思想的精英化和启蒙方式的通俗化，于是文学的变革就成为启蒙思想传播成功与否的根本前提。如何以最通俗的方式获得话语的力量，成为中国近代以来文学启蒙的内在目标，文学因之成为一个话语争夺的场域，而其论争焦点就在于文体的守护与变革。从晚清梁启超与严复等人的文体争战，到“五四”时期胡适与林纾等的语体之争，再到20世纪30年代文艺的大众化运动等，使得文学启蒙在现代中国获得了在其他国家所难以看到的景象：以文学为主体的文艺运动，为不同时期不同文化话语主体所操纵，成为塑造不同话语主体、传播不同话语内涵的主要力量。由于“启蒙”的思想传播性、方式的教化性和主体的塑造性，遂使得中国文学“启蒙”的意指十分含混，传统“启蒙”思想的作用也就使得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与主流意识形态之间，形成一种相当暧昧的关系，20世纪中国文学轰轰烈烈的运动与争战，正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逻辑密切相关。而这一逻辑的建立者，正是发出“国民”观念，并以“新民”震撼全国的梁启超。尽管梁启超没有直接发表关于“启蒙”的看法，但是他的“新民”思想的逻辑实际上正构成中国现代文化启蒙逻辑的话语形式。

由于受到日本民权思想的影响，并借助日本的中介，梁启超在流亡日本后至1902年间大量阅读西方启蒙运动时期以来的政治理论译著。其中福泽谕吉、中村正直和中江兆民等人所阐发和翻译的民权思想，都对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产生重要的影响，使梁启超意识到“国民”对于国家强大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近世民族的竞争是“人人争自存”的“国民竞争”，而中国由于长期的专制思想和愚民政策，导致“国民”意识的薄弱，在近世“国民竞争”中屡屡败绩。因此只有培养“国民”意识，使“国民”意识从过去被专制思想所遮蔽的蒙昧状态中清醒过来，并自觉行使和履行“国民”的权利和义务，才能使“国民”强大，在当今民族竞争中获得存在的地位。梁启超国民性改造的主旨，就在于培育“国民”意识，兴发“国民”权利。

《新民说》集中呈现了梁启超的“国民”思想以及“国民”改造的思路。其基本目标在培育国民的“公德”，包括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义务思想等内容。在他看来，国家落后的本质在于“国民”意识的冥

暗，但“国民”意识的冥暗并不像法国启蒙思想家那样导向对庶民的“绝望感”，相反导致“国民”意识冥暗的根本原因是专制统治和愚民政策，而不是庶民本身。因此，传统“性本善”的人性论，而不是“原罪”的人性论意识，导致了梁启超与西方启蒙思想家对庶民的不同态度。在梁启超这里，通过“新民”教育，庶民是可以获得改造的。摩罗将梁启超对“国民”的这种乐观意识喻为“朗照的太阳”，这种以西方的公德来照亮国民的冥暗的意识，正是中国现代“启蒙”的要义所在，而对“民”的如此重视，正是基于晚清以来历次精英变革的失败，导致了梁启超对于精英的失望，以及对于精英与大众脱离的后果的意识。

由此显示了《新民说》在中国现代思想和文化启蒙上的地位和意义：其一，它打破晚清洋务运动以来从器械、制度上变革中国的不足，着力于从思想和文化上来学习西方；其二，打破梁启超晚清以来的精英启蒙，而意识到中国的落后是广大国民的落后，试图对国民全体进行改造。

梁氏的这种国民启蒙由于其深刻的士人精英情结，使得启蒙本身也带上了强烈的精英色彩，并未脱离其之前士绅启蒙的基本路径。在《新民说》中，梁启超非常明确而具体地指出，以今日的民德、民智、民力，即使有贤君相，“亦无以善其后也”，认为倘若国民意识不能建立，彼此责任相互推诿，则中国仍然无力面对内政外交等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只有国民都意识到自身的责任，自我更新，才能拯救民族的危机。他指出，“新民云者，非新者一人，而新之者又一人也，则在吾民之各自新而已。”

“新民”一语来自朱熹的《大学章句》。朱熹将《大学》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亲民”修改为“新民”，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也。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盖必其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宋儒以佛入儒，重视心性的复归。朱子改“亲”为“新”，此“新”即为使人回复本性之意。

梁启超的“新民”思想受到朱子的影响，重视“新”的“革旧”之义。在《释新民之义》中，他指出，“新民云者，非欲吾民尽弃其旧以从人也。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先哲之立教也，不外因材而笃与变化气质之两途，斯即吾淬厉所固有采补其所本无之说也。”虽然他多处强调不怕外来文化之输入，而害怕中国文化之丢失，但他的“新民”思想却主要还是在于“采补其本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人所本来缺乏的“国民”意识，在“列国并立、弱肉强食、优胜劣败之时代”，如果没有这种国民意识则“决无以自立于天壤”。因此“新民”之“新”，又不完全等同于朱子的“回复本性”之义，而是必须向列国学习，“采补其本无以新我民”。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实际上也就回应了朱子“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的思想，因为对中国所缺乏的“国民”资格的学习，在民智未开的中国，正是需要像法国的伏尔泰、日本的福泽谕吉和俄国的托尔斯泰这样以“以其诚恳之气，清高之思，美妙之文”来“运他国文明新思想”以“移植于本国”的人。梁氏一生不断自比这三人，自甘以输入西方文明思想为使命，实际上自觉地充当着以西方文明思想来“启蒙”国民的角色。因此，梁氏虽然以“自新”作为“新民”的素质，但是由于“新”的内涵是中国人本来所不具有的，需要向外“采补”的，这就导致这种“新”无法靠自我来完成，而是需要通过“他人”/“他国文明”来启蒙。

由于中国自身国民的智慧长期处于禁锢状态，这种启蒙因此需要一部分“豪杰”“英雄”来完成。在梁启超看来，英雄既是造时势之英雄，英雄又是由时势所造出。一方面，英雄是“人间世之造物主也。人间世之大事业，皆英雄心中所蕴藉而发现者”。比如有路德然后有新教、有哥伦布然后又新大陆，有华盛顿然后有美国独立等；但另一方面英雄又是由人群所孕育出来，它是“以其所受于人群之利益而还付之”。因此英雄与时势之间互为因果，显示出主体与历史之间共生的关系。英雄虽是时代的产物，却又是时代的代表，“舍豪杰则无世界”，“一国虽大，其同时并生之豪杰，不过数十人乃至数百人止矣。其余四万万人，皆随此数十人若数百人之风潮而转移奔走趋附者也”。豪杰之所以具有此种能力，就在于他们有“服公理”“达时势”的“公脑”，尽管性情和遭际不一，却能因共同的目标而云合雾集，成就天下的事业。然而，英雄要成就事业还需要无数无名之英雄来助其实现，“今日中国之所以不振，患在无英雄，此义人人能知之能言之，而所以无英雄之故，患在无无名之英雄”。只要天下都是无名之英雄，则有名之英雄也就自然产生。“助将帅之成功者兵卒也，而训练此兵卒使能为我助者，又在将帅也。”将帅与兵卒之间这种共生关系，意味着欲成为英雄者必须首先“造出此无名之英雄”，而这就是梁氏“新民”程序的关键环节。

“新民”正是为了“有名之英雄”的诞生，而“有名之英雄”又因其造时势的能力，来领导国民自强的实现，就像匈牙利的噶苏士、意大利三杰玛志尼、加富尔还有法国的罗兰夫人。他们正是梁氏心目中能够领导民族自强运动，实现民族振兴的英雄和豪杰。从中可以见出梁氏“新民”思想的真实意图，而这可以从其后来的反思中得以印证。1915 年历经政治挫折的他终于放弃政党政治的努力，对自己此前的启蒙思想进行反思，“吾亦尝欲借言论以造成一种人物，然所欲成者，则吾理想中之政治人物也”。这一“政治人物”实际上也就是“新民”思想的实质。事实上，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对此已经具有明确的表述，他说“今日谈救国者，宜莫如养成国民能力之为急矣。虽然，国民者其说养之客体也，而必更有其能养之主体……主体何在？不在强有力之当道，不在大多数之小民，而在既有思想之中等社会”。区分出启蒙之主体和客体，并将重心落实在中层社会的启蒙主体上，这就形成梁启超启蒙逻辑的核心内涵。

由此，在“国民”话语的主导下，梁启超既重视了“国民”的根本性地位，同时由于“国民”长期的被遮蔽状态，需要传统士阶层的启蒙，但是传统士阶层却由于近代的社会文化危机而显示出其乏力之处，这种乏力之处反过来又是“国民”重要性意识萌发的基础，这种循环的关系，正是梁启超建立其中国现代文化启蒙的基本逻辑的基本立场：“士”既重要，又不重要，这种“重要”建立在他们负有启蒙民众的作用上，但是这种“不重要”又需要士阶层自身的提高。在“士”与“民”的这一纠结中，梁启超建立了现代文化启蒙的基本逻辑：第一，启蒙资源的西方性使得启蒙者需要向西方学习以塑造自我；第二，启蒙是中层主体对于底层大众的启蒙，从而建构起“教导者”与“被教导者”的关系。这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话语的影响体现在：

首先，为了适应时势的需要，士人主体的自我改造面临着“因应时势”的现实诉求，并因之确立自身“经世”的价值，不惜以此放弃自身作为规范知识的制定者而甘心作为专业知识的“工人”。反映到文学上，就要求建立文学与社会现实之间的直接关系，从“言志”走向“写实”，从抒个人情怀到书写家国情势，由此确立现代诗学面向现实的取向。诗歌作为中国传统文士阶层最具有公共性（相比于词的私人性而言）的表意形式，其变革正显示出士人主体自我革新的努

力。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到梁启超在“诗界革命”中所提出的“新语句，新意境与旧风格”的“三长”结合，就可以显示出士人抒发表达方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并不在于诗人的这种自由抒写上——在古老的诗学传统中，这种自由抒写几乎是所有诗学变革的一个重要内涵——而在于由书写内涵的变化要求着书写形式的解放。这种以内容决定形式的思维，意味着革新的士人已经意识到存在着与其传统诗学世界不同的新的世界，这一世界充满着现代文明的冲击、现代性的体验与现代历史的流变。这种“写实”所要表现的正是士人主体面对这些时内心的真实状态，包括各种难以掩饰的震惊体验，各种由此激发的情绪反应，以及对于现代文明的具体感知——即使以生硬的文字和术语来传达这种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被允许。在《饮冰室诗话》中，梁启超将黄遵宪书写中国历史灾变的篇章接连摘刊并给予极高的评价，正是这种写实心态的体现。

20 世纪中国文学启蒙话语中的“真实”，实际上正糅合着客观性和主观性的双重内涵，既是创作主体所面对的客观现实，又是创作主体面对这种现实的内心“真实”的感受。只不过这种“真实”的感受受制于创作者的士人情结——那种参与现实、建构现实的“经世”情怀——呈现出以社会、人生为导向的价值向度，从而使得这种主观的真实性仍然带上了社会性的面纱。从“文学为人生”到“文学为工农兵服务”，主体那种自我真诚的改造，正是这种主观真实的体现。而这种主观的真实也在相反的意义上构成对于客观的真实的限制，在最为极端的时候，甚至现实的客观性被概念化，诸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而由于士人主体甘愿转型的意识，也成就了 20 世纪中国文学启蒙话语中作家向“工人”、“农民”和“士兵”的“学习”与“自我改造”。这种情形显示出“四民社会”秩序的倒转。

在作为“小说界革命”宣言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梁启超初步建立了知识分子自我改造的文论话语。该文指出小说与学艺、政治、道德、人格等的关系，认为只有先新小说才能革新后面的一切。接着通过对小说两种“境界”——现实境界与理想境界——和四种“力”（熏、浸、提、刺）的论述，突出小说所具有的艺术审美效果，并指出这才是小说之所以吸引人的原因，而不是像以前所认为的依靠“乐而多趣”和“语言浅俗”。然而，由于知识分子轻视鄙弃小说，导致小说创作被华士商贾所占领，小说中充满着诲淫诲盗的思想和佳人侠盗的情节，而由于小说所具有的艺术效果，这种恶劣的思想深入地影响着中国社会，是造成群治腐败的总根源。接着通过对欧洲政治小说所起到的巨大的社会改良效果的借鉴，梁启超提出让知识人重新抢夺被华士商贾占领的文化市场，而这就需要知识人投身小说创作。既然欧洲和日本的小说家都身兼政治家身份，而小说所探讨的又是政治的内涵，而小说所能起到的改良群治的作用又如此显著，那么知识人也就不应该有鄙视小说创作的障碍。知识人通过自我观念的转变，从事小说创作以启蒙和提高大众，也就构成梁启超此文的基本逻辑。

如果我们将此文与毛泽东于 1942 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其逻辑的相似性。《讲话》首先确立了文化和军事两条战线，以此树立起文艺作为“阶级斗争”的有效武器，并将如何抢夺大众的文艺战争视为文艺战争的根本任务。然而由于座谈会面对的是文艺工作者，所以要解决的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从文艺战线的抢夺转移到文艺工作者自身的问题，很显然遵循着梁启超小说论从群治腐败到士人投身创作需要观念转变的逻辑。文艺工作者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露敌人的罪恶，鼓舞和团结人民大众，其关键就在于要转变自身对工农兵的“不

熟（悉）”，改变对于工农兵语言的“不懂”，与群众“打成一片”，才能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喜爱。在这里毛泽东举出自己的例子，要求文艺工作者也改变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而转变到无产阶级上来，“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在“结论”部分，毛泽东将问题集中为两个方面，“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前者关涉文艺的立场问题，而后者是文艺的手段：普及还是提高。而无论是普及还是提高，都需要用工农兵所需要的方式，需要先让工农兵学习。“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最后《讲话》还提及“文艺服从于政治”，高举政治第一、艺术第二的标准。归结起来，《讲话》的基本逻辑就是文艺工作者为了占领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的阵地，联合人民群众取得革命的胜利，就需要转变自身的阶级情感，投入到无产阶级队伍，向群众学习，通过群众所需要的方式普及和提高群众的水平，而这些，必须坚持政治标准高于文艺标准。这一逻辑中的三个关键的地方：文化阵地的争夺；创作主体的自我改造；以政治作为中心。这三点事实上正与梁启超的小说论的重心相重合，都体现中国知识人自我改造以适应现实功利诉求的话语模式。只不过在梁启超的阶段，群众或者国民的文化形式——小说需要进行一个价值认定，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立场使得群众艺术形式在其逻辑中已经具有了前提上的合法性。

其次，主体与底层关系的建立，意味着士人需要面向底层、联合底层，并以其文学形式启蒙底层。这就需要突破传统士人阶层的文化趣味，尤其是其扬雅抑俗的意识。趣味具有“区隔”的能力，是士人阶层身份的标志。它同时也是一种障碍，阻碍着士人与底层之间的联系。只有突破这种限制才能其直接面对底层并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这就产生了近代士人传统的审美趣味和价值导向的重构的问题。其突出表现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文体争辩。从晚期梁启超的报章文体变革，到“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再到20世纪30年代文艺大众化运动中的大众语问题，延续半个世纪的语体和文体的争论，围绕的重心正是启蒙的有效性，而其背后根源则是汉语书面语的“雅”的本性。

梁启超的报章启蒙试图以平易流畅的浅俗语言，以极端震荡的文体特征，以外来术语入文来传播启蒙思想，这种文体相对于古奥雅洁的文言文而言显得通俗，但是却触犯了当时文化守旧分子的集体攻击，显示出汉语文体背后的深刻的文化身份问题。梁启超在当时显得通俗的半文半白的“报章体”，在“五四”知识人看来又是文言阵营的守阵者，胡适就抨击任公们的语言还是在维护着“我们”与“他们”的边界。然而胡适以白话文写现代思想的运动，又遭受到报刊学衡派等的反攻，尽管被视为中国现代语言的巨大变革，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大众化运动中，却又被视为“五四式的新士大夫”的新式文言，并被认为建立了“等级的对立”：“中国人的文艺生活显然划分着两个等级，中间隔着一堵万里长城，无论如何都不相混杂的。第一个等级是‘五四式’的白话文学和诗古文词——学士大夫和欧化青年的文艺生活。第二个等级是章回体的白话文学——市侩小百姓的文艺生活。”普罗文学所要摒弃的正是“五四”新式文言。所谓“历史轮流转”，中国现代文学的雅俗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正由启蒙主体与启蒙对象之间的这种启蒙关系所决定。启蒙主体需要不断转变自身来实现启蒙的效果，但由于中国现代文学启蒙这种“教化式”模式，使得士人主体思想处于思想和趣味的高位，通俗是化雅为俗的通俗，而其目的是化俗为雅。因此，即使是向工农兵学习，最后也还是为了提高工农兵的水平，而思想和趣味的高位从根本上影响着文体的形态，这就导致这种启蒙模式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雅俗之争。

“宗教中国化”的三个命题

文 张志刚（北京大学教授）

自 2015 年、2016 年相继召开中央统战工作会议和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以来，“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便成为中国政界、教界与学界的热议话题。笔者立意“敦本务实”，略论三个命题，以期抛砖引玉，深入研讨“宗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

一、关于“宗教中国化”的重要性

关于这一点，笔者所要论证的命题是：唯有立足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方能深刻理解“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重要性。

在笔者看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并非一句简单的政治口号，而是深含“三重学理根据”，这就是中国宗教要真正融入“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特别是当今中国社会”。这里所讲的“三重融入暨学理根据”，其理论内涵就是国际学术界在全球化时代所关注的“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在中国文化背景下，“中华民族认同”亦即“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从这三个认同的内在关系来看，“文化认同”又被国际理论界视为“最高的认同”或“根本的认同”。这也就是说，如果不从根本上树立“文化认同”，便无法形成“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等。

众所周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经济一体化与文化多元化”的趋势与张力日渐凸显，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格局重组，世界政治的多极化、全球经济发展的不平衡，部分国家或地区的矛盾与冲突的日趋激化甚至愈演愈烈，使得“认同问题”成为一个“全球问题”。归根究底，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且复杂的巨变，整个人类正处于又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新态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所有的文明、民族、国家和社会形态都不得不“重新认识自我”、重新思考“我是谁”这一根本且永恒的哲学问题。

从国内外理论界的晚近研讨动态来看，可以说“认同问题”现已成为一大研讨热点与论争焦点，其理论话语分量绝不可低估。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的两本名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和《我们是谁？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面临的挑战》，便可视为这场“认同问题”大讨论的“西方版代表作”。前一本书站在西方文明立场，从“文化认同”问题入手，提出了“文明冲突论与国际秩序观”；后一本书则从美国利益出发，从“盎格鲁—基督教文化传统”说起，阐释了“何谓美国国家认同与社会认同”。同样，中国理论界近些年来关于中华文化传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和平发展观等多方面的深入研

讨，也充分表明了“文化认同”、“民族认同”、“国家认同”和“社会认同”问题的重大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通过前述学理探讨，我们可以深刻地认识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的确是一个国内外新形势下的新判断，其主旨即在于“为中国宗教明确发展方向与前进道路”。不言而喻，若无明确的方向、正确的道路，何谈中国宗教的生存、发展与进步？中华文化传统是中华民族、中国社会的“根与魂”。“真正融入中华文化”暨“真正认同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乃是“真正融入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根本要求。正因为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是根基于中华文化传统的，现实存在于中华民族与中国社会的各种宗教，无疑也要扎根于中华文化的深厚土壤，发扬光大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做出积极的贡献。正如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7 月在考察宁夏银川新城清真寺时深切地指出：我国宗教无论是本土宗教还是外来宗教，都深深嵌入拥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深深融入我们的社会生活。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我国的各民族和各宗教是在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孕育发展起来的，只有落地生根才能生生不息。

二、关于“宗教中国化”的必然性

关于这一点，笔者力求论证的命题是：务须着眼世界宗教史揭示的生存发展规律，方能客观认识“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必然性。

无论从事宗教研究、管理宗教事务还是加强宗教自身建设，无疑都要认识并遵循宗教生存与发展的客观规律。从世界宗教史来看，千百年来几大世界性宗教之所以能够广为传播，其首要条件或基本前提即在于，它们均能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和社会境遇，以不同的方式来实现各自的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

国际著名的比较宗教学家斯马特指出：一旦我们遨游于世界宗教，就不能狭隘地理解或界定宗教，而应当抱以跨文化交流的探索精神。因而，当我们考察诸多宗教传统时，像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等，切莫忘记它们的多样性或多元化。以基督教为例，尽管人们可以用“一个标签”，可事实上，世界上的基督宗教是形形色色的，只要列举部分宗派就足以印证：天主教、东正教、科普特教派、聂斯脱利教派、阿明尼乌教派、马多马教派、路德宗、加尔文宗、殉道宗、浸礼宗、一位论派、门诺派、公理会，等等。斯马特以世界第一大教——基督教作为典型，力求阐明如下普遍现象与客观规律：世界上所有的宗教传统实际上都是五光十色、纷纭复杂的，我们可以发现，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与社会都为诸种宗教传统增添了特色，譬如，德国的基督教不同于美国的，乌克兰的天主教不同于爱尔兰的，希腊的东正教不同于俄罗斯的……由此可见，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宗教史，其实就是现存的诸多宗教不断适应不同的文化、民族、国家与社会而得以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的历史过程。

中国宗教史是世界宗教史的组成部分。世界宗教史所证实的上述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的普遍现象与客观规律，具体就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而论，就是意指“宗教中国化”。现有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是一个兼容并蓄多种宗教的大国，在漫长的中国宗教史上，既有土生土长的道教、多种民族宗教和大量民间信仰，又有国外传入的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还曾传入过犹太教、摩尼教、琐罗亚斯德教等。因而，就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而言，中国宗教史上有十分丰富的历史经验教训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加以总结。

例如，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历经“比附”（汉代）、“磨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创宗”（隋唐时期）、“合流”（宋元明清时期）、“转型”（近现代）等阶段，逐渐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相适应，在教义、宗派、仪轨和修行等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下了中国文化烙印，形成了鲜明的民族性、地域性、时代性等特征，乃至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又如，伊斯兰教自唐朝传入中国后，也历经了一个长达千余年的民族化、地方化、本土化过程，有学者从信仰主体的考察视角，把这一转变过程概括为“从外来侨民到本土国民”，这种历史阐释是颇有见地的，目前中国伊斯兰教已扎根于回、东乡、撒拉、保安、维吾尔、哈萨克、乌孜别克、柯尔克孜、塔里克、塔塔尔共 10 个少数民族。再如，基督教得以落足于中国大地，经过了“曲折的四传”，即唐朝“景教”的传入，元朝“也里可温”的传入，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鸦片战争前后天主教、东正教和基督教的传入。这一曲折的传入过程，其复杂原因至今仍令国内外专家深思不已。对于后两次传入，著名天主教神哲学家汉斯·昆（又译孔汉思）尖锐地指出：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利玛窦等人，采取了适应中国国情的传教策略，试图与儒家思想进行对话，得到了一些士大夫的认同；但在洗礼问题上，他们却要求中国信徒与过去一刀两断，放弃儒释道信仰，烧毁祖先牌位，这对中国人来说是不可理喻的。19 世纪上半叶，随着欧洲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极度膨胀，基督教在华传教活动达到高潮，无论天主教还是基督教都把传教活动纳入了欧洲列强的扩张计划。就这一时期可以说，“殖民化等于基督教化，反之亦然”！这段历史告诫人们，只有扎根中国文化土壤，适应中国社会处境，中国基督宗教才有前途，而这一切理应由自养、自治、自传的中国教会来实现。

以上历史考察可使我们的思路承上启下，既能证实“宗教中国化”是符合世界宗教史所揭示的本土化、民族化与处境化的客观规律的，又能促使我们的思想认识更进一步，“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也是合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

三、关于“宗教中国化”的实践性

关于这一点，笔者接着论证的命题是：只有致力于“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方能真正落实“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宗教政策的黄金时期”。这一看法近些年来已成为大多数国内外专家的基本共识。全面回顾一下改革开放以来陆续出台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下列逐步递进的积极主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充分发挥宗教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要充分发挥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众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宗教关系是当前我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必须处理好的五大关系之一；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从上述一系列大政方针的逻辑联系来看，“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不但在实践探索上是前后呼应的，而且在理论思考上是逐步深化的。这就需要我们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具体、更深入地探讨“何以真正落实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

如前所述，“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是合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的。这也就是说，我们要立足当今中国国情，从现实的社会出发来认识中国宗教现象，管理中国宗教事务，维护中国宗教正常发展，构筑积极健康的中国宗教关系。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从哲学的观点来看，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现实社会中的宗教现象与宗教问题也是错综复杂、充满矛盾的，既包含正面的、积极的成分，也包含负面的、消极的成分；既内含和谐的因素，又内含冲突的因素。正因如此，诸种宗教的社会作用才会具有两重性。这就要求我们高度重视宗教问题，善用辩证的方法来深刻认识、正确应对宗教社会作用的两重性。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召开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指出：宗教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必须处理好的重大问题，宗教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域中具有特殊重要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关系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系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关系国家安全和祖国统一。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最大限度地抑制消极作用。这里讲的“两个最大限度”，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深入研究。按照笔者的理解，“两个最大限度”首先强调的是“发挥积极作用”，因为若不如此，就无法“抑制消极作用”；而要切实做到“两个最大限度”，关键在于“积极引导相适应”。

为什么这样理解呢？实事求是的辩证方法启发我们，事物总是发展变化的，要有全域或整体观念，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看事物的主流与趋势，要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要更注重事物变化的内因等。因而，宗教的社会作用并非一成不变的，宗教作用的发挥与其所处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从本质、主流与趋势来看，我们无疑应该肯定，我国宗教的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我国诸种宗教的千百万信众是爱国爱教的，他们作为国家公民与人民群众，是能够在政治团结、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慈善公益、道德伦理等方面做出正面而积极的重要贡献的。正是根据以上基本判断，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和政府一向主张“积极引导我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近些年来一再强调“宗教工作本质上是群众工作”，此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又进一步明确：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要最大限度把广大信教和不信教群众团结起来；全面提高宗教工作水平，就是要更好地凝聚广大信教群众同全国人民一道，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就是要引导广大信教群众热爱祖国，维护中华民族大团结，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从服务于国家最高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

当然，从实事求是的辩证方法来看，要想“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必须“最大限度地抑制消极作用”，这本是同一道理的两个方面。毋庸讳言，随着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宗教领域也出现了不少新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呈蔓延态势。例如，境外宗教渗透活动加剧，宗教极端主义势力抬头，恐怖暴力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宗教存在商业化倾向，有的宗教尚待加强中国神学思想建设，有的宗教出现“去中国化”，“逆中国化”“逆社会化”或“泛宗教化”等苗头。因此，“两个最大限度”同时并举，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可谓解决如此种种问题的治本举措。

经过近几年的广泛讨论，中国政界、教界与学界均已认识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过程，“宗教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也是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就研讨现状而言，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课题就是，全面领会全国宗教工作会议精神，深刻理解“两个最大限度”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辩证关系。显然，这是一个艰巨且复杂的课题，要靠各方群策群力，结合中国各宗教与各地区的实际问题来展开更具体、更深入的探讨，取得更多更好的理论与实践成果。这是笔者所热切期待的。

广东侨联工作 经济科技品牌

侨创南粤

汇集侨资侨才侨智，凝聚侨情侨心侨力，共享机遇，共创多赢，服务经济建设，推进社会发展。





我的合水情缘

文 顾涧清



作者简介

顾涧清，广州市政协常委、经济委主任，广东省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史学院院长，广东省记协副主席，广州日报社原社长。

我的籍贯是江苏水乡，第一份工却在广东省兴宁市合水镇，1974 年 10 月那年那月，我从兴宁一中高中毕业后即作为知青赴合水农场上山下乡。我想也许真的是与水有缘，上善若水，人生之道，莫过于此。那段时间虽然算不得长，但确实是我人生中难忘的一段岁月，是我工作中最初始的一段经历。生活的意义、人生的价值、凝聚的情感，确实是不能简单地用时间长短、工作得失、职务高低来衡量的。

兴宁位于粤东地区，扼东江、韩江上游，境内四周山岭绵亘，中部为断陷盆地，地形地貌就像似在绿色海洋中的一叶大舟。合水水库建于 1957 年，主坝横卧在绿水青山之间，水库是宁江水网枢纽工程，四周峰峦叠翠，库区碧波荡漾，小岛亭塔散布，水面轻舟点点。在 2016 年 1 月 24 日《广州日报》老照片版的大篇幅报道中，我在定稿时就用了“知青合水泛舟，激情燃烧岁月”的大标题，“知青合水泛舟”，主要是取自兴宁地形地貌的大舟和合水水库水面上的轻舟的“舟”，当然也有南宋大家朱熹名诗中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尽情表述的“泛”。可见，这里的“知青合水泛舟”，不仅是指在合水水库上行船，而且还有合水水合、相互宽容、理解宽泛、自由畅想的意思。

合水足迹、知青情缘，对我来说，似乎都溶在那些年的蹉跎望碑情里了。我在合水农场四管区望碑知青点这段时间最大的感受，就是客家人吃苦耐劳、不屈不挠的客家精神，即客家先民在扎根山区、艰苦创业中，历尽千辛万苦和艰难险阻，锻炼了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精神并世代相传。大概也是受到了客家精神的影响，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在望碑干挑水和买米买菜的活了，当时知青点没有自来水，连个水泵都没有，半山腰上的两个水池需要每天从水库里挑上几十担甚至上百担水才能勉强够知青们的用餐和洗澡用；买米买菜则需要划上小船到主坝的粮店和步行几十里的龙田圩购买，当时的工作也没什么

车辆可言，上下船只能靠肩挑背扛。现在想来，正是有了客家精神的诚实刻苦，加上幸亏有了水和轻舟，我们才能坚持下来，这正如《道德经》中所指出的，“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即水善于滋润万物却不与万物相争，“水往低处流”，总是处于众人所不愿待的地方，所以它最接近于“道”。水性仁爱，滋润万物，生生不息；水性坚韧，水滴石穿，百折不回；水性柔和，顺势而为，随物赋形；水性豁达，虚怀若谷，包容一切。可以说，水的辩证法无处不在，轻舟总是要过“万重山”的。

“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水既是柔弱的，又是强大而有风骨的。虽然我们的知青处在社会的最基层，但我们每时每刻都保持着向上向善的初心。记得在望碑知青点的那段日子里，我能坚持记日记、出墙报、写通讯、学理论，不管白天的劳动有多累，还要练举重、到水库游泳，并一起学习讨论问题，如晓弘发来的我俩当年看书学习交谈的照片，正是那时这种情形的写照。这也让我理解了为什么水的“柔弱”是有生命力的、水的力量是可以柔克刚的。因而也就有了水滴石穿之说，只有柔性的东西才有这么强的渗透性；因而也就有了“抽刀断水水更流”之道，以刀斩水，水好像断了，抽刀回来，水又合起来了，水因其团结一心、凝聚力强而彰显威力。有时候，貌似平静的水面下亦有激流涌动，这就是静水流深的深刻含义，水的潜能确实是很大的。所以有唐诗云：“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水，尤其是水合在一起就能产生这样梦幻神奇、富有魅力的力量。

水能千古恒常，水为万物所需。在我所认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各种体验，似乎早已与这包容万物、滋养生命、情韵流动的水融在一起了。与同年知青们的感受一样，我们与合水水库同年，再多一些感受就是，1957 年出生于广州流花湖畔的我，1978 年全国恢复统考后考进了江苏师大，后来无论是从事市委机关工作、社科研究工作，还是从事新闻舆论工作、政协经济工作，我所工作过的城市都不缺水、并与大江大海拥抱。为此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始，我的名就改用了同音字，由建青改为涧清，显然将自己的命运与水多连在一起了。我的感悟是，人生一旦以水为镜，一切皆可映鉴。水之明则光明坦荡，水之善则淡泊名利，水之静则心态平和，水之洁则玉宇澄清。

芳草青青涧边生，海阔天空舟自横。这些年来，我在《广州日报》《城市观察》等报刊，以“青舟”为笔名发表的言论、卷首语就有百篇以上，省政府文史研究馆为我公开出版了馆员文库《青舟集》。更让我感慨的是，赵朴初先生 1982 年题写的海上丝绸路早开、及见流沙白马来的诗句，竟然让我对海上丝路的学习与研究执着坚持了 30 多年，我撰写这方面的专著、合著有《论连云港与海上丝绸之路》《沿海开放经济简论》《论海州湾的综合开发》《广东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哥德堡号访问广州全纪录》《海上丝路史话》《跨越大洋》等，策划、组织翻译了《哥德堡号再度扬帆》《中国皇后号》两本国外著作，策划拍摄了《穿越海上丝绸之路》《广州与哥德堡：跨越四个世纪的航程》《瑞船连广船》等多部电视纪录片，直接参与策划建造了广州亚运会开幕式的领航船“南海神 • 广州日报号”仿古广船。我参与撰写的理论文章和图书获得了第七届、第八届全国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两次都是由兴宁走出的黄华华老省长亲自为我颁奖。浮想联翩、感慨万千，仿佛就是在给我们合水知青颁奖。我的工作成果似乎大多是依水而生、因水润泽，兴宁合水仿佛就是初心开启、源头活水。回首往事，更懂未来，这真是：合水水库一鉴开，珠江帆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春风吹来稻谷香

文 罗学华 冯创志

2020 年是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质量怎么样、小康成色如何，很大程度上要看“三农”工作成效。

新年刚过，国务院扶贫办首次对深度贫困地区挂牌督战。贫困人口超过 1 万或贫困发生率超过 5% 的县、贫困人口超过 1000 或贫困发生率超过 10% 的行政村，以及尚未退出贫困序列的县、村都是督战对象。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在广东恩平市丝苗米产业园主力企业之一的中农蓝（广东）农业有限公司，也正在为脱贫攻坚战奋斗。

中农蓝（广东）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农蓝”）担负着发展大农业的战略任务。中农蓝成立于 2018 年，总部设在恩平，成立一年多以来，在粤港澳大湾区西南腹地恩平描绘着扶贫和乡村振兴的蓝图。

中农蓝的核心试验示范基地位于恩平牛江镇的南兴、葵园里、七堡里、向东村一带。那里青山若黛，西坑水库源头之水清澈长流，没有都市城郊的沙尘滚滚，中农蓝在这片生机盎然的沃土上，与当地乡民共同耕耘“致富梦”。

一年多以来，中农蓝在恩平推广种植丝苗米，能否帮助当地乡民脱贫？

马龙塘村委会党支书冯文佐用数据为我们解疑。马龙塘村有 6 户贫困户加入中农蓝丝苗米产业园的“大合唱”，均以每亩每年 750 元流转给中农蓝，且每三年递增 3%，去年纯收入就比其他农户高。比如七堡里村贫困户何振多一家四口，出租 6.7 亩给中农蓝，年仅收入租金达 5025 元。何振多说，过去因缺技术和劳力，吃饱饭都成问题，需政府救济，如今仅田地租金收入就是过去自耕收入的两三倍。据查，当地农田租价一般在 400 元至 500 元 / 亩左右，而中农蓝以每亩高出 250 元的租价向村民租地。中农蓝总经理沈育斌解释说，在农村发展农业，在讲企业利益的同时，要兼顾农民利益，向农民让利才能在农村扎下根。农民放心耕田，安心在农村，乡村振兴才有动力。

除流转土地价格向农民倾斜外，中农蓝还带来了优良的水稻种子、专业的种植技术。

2019 年，中农蓝抓住机遇，通过下属公司中核恒通成功竞拍获得“华航 48 号”品种 10 年使用权，为恩平丝苗米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同时，中农蓝邀请华南农业大学水稻专家对基地周边农户举行标准化水稻技术培讲座。

中农蓝还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与恩平市水楼恩春水稻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联手，实行更大规模的惠农助农活动。水楼恩春水稻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位于沙湖镇水楼村，离中农蓝试验示范区不远。合作社成立于 2015 年 1 月 8 日，法人代表曾召海，社员主要种植水稻、马铃薯、少量蔬菜。合作社帮助农户获取优良种苗、优惠团购农资、协助农户农产品销售、提供农业服务、组织农户与相关公司合作种植等工作。几年来，合作社及农户虽有发展，但也饱尝从事农业种植的风险和艰难，未能发展致富。

恩平市政府启动恩平市丝苗米产业园项目后，合作社抓住机遇，与中农蓝合作。

三方合作种植模式是：公司方负责订立绿色种植生产管理标准，邀请水稻专家给予农民技术培训并派技术人员进行田间指导；公司提供优良品种种子、有机无机肥料、植保服务；收成后公司回收稻谷（湿谷），支付相应费用给农户，并给予合作社一定奖励，以支持合作社的运营。合作社方负责组织和协助，宣导公司要求，监督和指导农户工作。农户方最为轻松，只是提供田地及负责耕种的具体工作即可，无须承担风险与费用。

2019 年 6 月底，与水楼恩春水稻马铃薯种植专业合作社签订协议后，中农蓝迅速提供相应物资及服务，并邀请了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给农户们做技术讲座，且多次派出技术人员到田间从育秧、插秧、施肥、病虫草害防治等多方面指导农户；联合有关金融机构为农户提供惠农贷款及便利的金融服务。

据了解，2019 年与中农蓝合作种植晚造水稻约 2000 亩，合作种植大户 37 人（田地以沙湖、牛江为主，涉及基层农户约 400 户），当年晚造丝苗米获得空前丰收。合作农户平均产量较其他非合作农户产量大约提高 15%，中农蓝的回收价格比市面价格高出 20%，合作农户晚稻收入比其他农户收入要高 35% 左右。而且，通过这种合作种植，优良品种得到推广，培养了农户的绿色种植观念，大幅减少了农户投入，降低了农民风险，从而提高了农户收入。

为了把公司打造成足以抵抗风险、稳健致远的“农业航母”，中农蓝还制订了宏伟的目标，瞄准粤港澳大湾区对水稻农业标准化生产的产品——优质无公害绿色“放心米”。“放心米”有着广阔市场前景，中农蓝对如何确保生产真正的“放心米”并推向市场，已做足了“功课”。

2019 年，中农蓝先后与各大相关院校和研究机构签订合作：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研究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与华南农业大学国家植物航天育种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签署水稻种子知识产权及科技成果转化协议；与华南农业大学数学与信息学院、广东省现代农业技术应用与信息服务中心签署联手共建恩平丝苗米产业园暨智慧农业项目战略合作协议；与广东省农科院水稻研究所签署共建“水稻科技示范与产学研合作基地”协议并挂牌；与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和亿园区开发（深圳）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如今，中农蓝的“妙米”及“乡间稻”品牌已问世，颇受市场欢迎。



中农蓝公司所在的牛江镇马龙塘村委会，稻田与村庄相映成辉

众所周知，现代农业标准化生产对农产品的市场而言，产品的“一产”成功，种植出优质的稻谷，只是走出了第一步，大米的干燥、加工、储藏、运输、销售等环节都影响与决定着大米产品的品质。中农蓝在“一产”初战告捷前后，就着手部署大米的干燥、加工、储藏、运输、销售工作。目前，中农蓝建设的冷链储藏库、冷加工车间即将投入使用，将实现以低温干燥代替传统干燥方式，让大米的质量得到更大的提升。

春风吹来稻谷香，中农蓝发挥自身优势，对区域农业产业调整、绿色发展、农村改革、乡村振兴起到引领作用，惠及更广的农民群众，带动农民脱贫致富，展现出企业的社会担当。

2020福建宁德行

文/摄 钟小敏



作者简介

钟小敏，90后，广东惠州人。图书（期刊）编辑，《嘉应文学》主编助理。

霞浦·东壁

2020年1月19日，厦门北往霞浦。乘务员检完票后，开始往车窗上贴红色的“福”字，透明的窗玻璃被红色装点，染上了春节的喜庆，看得人的心情也变得明亮起来。

在车上打了个盹儿，半睡半醒间，耳畔充斥着孩子的嬉闹声——一个冬令营，是泉州某图书馆开展的活动，目的地是福州。领队的是馆长，姓吴。闲谈间，吴馆长说：“我们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的确，古时交通慢、书有限（好书更甚），能量密度低，自然是行万里路不如读万卷书。在这个快时代，如果有条件和机会，应该多走出去看看、听听，看看没见过的风景，听听不一样的声音。“世界这么大，慢慢走”。看着那些小小的男孩子女孩子排着队摇摇晃晃走向前，真好啊。

出了霞浦站就有往三沙镇的专线。面包车师傅说，我们今天来是最好的，霞浦已经阴天好几天了，今天刚放晴，气温也开始回升。

我一边听师傅说话，一边往右手边的车窗望出去，可以看到海。茫茫大海像落满了沙，一眼望去尽是浑浊的泥色。霞浦的海，好像都是这个颜色，一眼望去一点儿美感都没有，但总让人想念。我对大海有一种难言的好感，每次看见海的那一份惊喜和兴奋都像是平生第一次。

预定的民宿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面包车师傅说这是当地最早开起来的一家民宿，有八九个年头了。老板娘是当地有名的沙滩模特……聊着聊着，就到了。隔着车窗就看见站在路边嗑着瓜子冲我们热情大笑的雪香阿姨。

安置好行李，我舍不得这日光，背起相机和三脚架就出

门了。

在门口遇到雪香阿姨，她热情地带我去后山的观景台。一路上跟我讲她养的鸡——跟那里的猫相处得很好，晚上还会跳到树枝上睡觉。还没走到观景台，就有几只猫从山间跃出，半坐着望着你的样子，煞是喜人。

站在观景台上，雪香阿姨跟我说起她的模特人生——她掏出手机翻开相册，一张一张地跟我说起那些照片背后的故事：这张是我在退潮了的沙滩上走，一个小时 300 块；这张拍的是我在补渔网，那天好大雨哦，一个小时我挣了 700……雪香阿姨在霞浦当沙滩模特已经有 15 年了，最多的时候一天有 2000 多名摄影师同时拍她。遇上旅游旺季，她不仅要在饭馆掌勺，还要下沙滩当模特，因为时间紧迫，一次不小心在炒菜时将手烫伤，“好辛苦哦”……但从她的笑眼里，我知道，她乐得这份忙碌。10 多年来，雪香阿姨对拍摄角度和拍摄用光也有了自己的理解和经验，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地位”岿然不动……

永远有人比她年轻、比她貌美，但是不会有人如她般长留在人心中。

雪香阿姨回去后，我开始支脚架。海风用力地吹开我的外套，吹得我鼻涕狂流。我站在观景台上，被远处的紫菜架和渔舟吸引得挪不开眼。这时已经涨潮，没能看到滩头沃口那条弯弯曲曲的水道沙滩。虽然没有夕阳，甚至没有日光，阴天下的东壁海滩显得有些萧瑟冷清，可是当面朝大海，听着远处传来的风声和渔舟的鸣笛，看着海面随风轻轻漾动，白色海鸥在海面环飞不止……我只是呆站着，忘了呼吸——你知道，有些风物，仅仅是静静看着就觉得美好。

往滨海栈道去。走在空无一人的岗尾大桥上，寒冷来得更刺骨。但很奇怪，在寒冷的



阴天下的东壁海滩



榕枫公园里的榕树群

天气，人的快乐总是来得莫名简单和纯粹。两个人走在路上，明明冷得直发抖，却不可自抑地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将路边的白鹡鸰惊得落荒而逃。

晚上回到民宿，彼时才留意到挂满墙壁的摄影作品。拍摄者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摄影师，照片中那个小小的身影就是雪香阿姨。她说起往事，嘴角总是上扬着。看着她，我禁不住想，自己到她这个年纪时会是什么样呢？是不是也能像她这般乐观爱笑？

雪香阿姨还做得一手好菜。当天的晚餐是海鲜面、清明草糯米粄、闽南糊，美味至极。尤其是开咬清明草糯米粄的第一口，那份香软脆，真真难忘。

清明草糯米粄是用清明草、白糖、红糖、盐、糯米和成团后用油煎成饼状做成的，粄的边沿被煎得松软香脆，往里咬就能吃到糖的甜味还有盐的微咸，阿姨说，放盐是为了不那么热气，糖和盐的分量要把握得刚刚好，否则就会太甜或太咸。和糯米团的清明草是叔叔去水库里摘的，一年可能就只有那么一次采摘的机会，许多人来这儿就是奔着它来的。

离开东壁的前一天晚上，雪香阿姨带着我逛夜晚的东壁。

村子里的马路干干净净、冷冷清清，没有一个人。街道上空挂着的红灯笼随着夜风飘呀飘的，在我的眼睛里晃呀晃。新年真的很近了。

雪香阿姨说她常常像这样走长长的路——来采风的摄影师经常让她陪着走去三沙镇，“好几公里路呢，但是说说笑笑也就到了。”两个人聊着聊着，友情就是这样产生的。我看着她神采飞扬的侧脸，笑意满盈。马上要离开了，最舍不得的，就是雪香阿姨，当然，还有她做的闽南糊和清明草糯米粄。这些人情，总是很容易就刻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心里。今后每一次想起，都会感觉到难言的温暖和怀念。

霞浦·杨家溪+小皓海滩

1 月 20 日，吃完早餐走到街上等车，清晨的街道没几个人，怪冷清的。8 点，约好的车到了。

从东壁到杨家溪，得先坐车到牙城镇汽车站，然后再转车（如果是要去看那棵网红榕树，记得在“渡头”站下）。刚好剩两个座位，小红坐车头，我坐车尾。位置还没坐暖，陆续有叔叔阿姨上车，我给一个阿姨让了座，另一个阿姨扯了扯我的衣角，为我挪了半个位置，示意我坐下。盛情难却（实在也是因为“鸡同鸭讲”的窘迫），我不舍得再拒绝——这两天，遇到许多当地居民，或许听不懂他们的语言，但是他们脸上展露的笑容和展现出来的纯朴与善良一次又一次打动我。

相信许多人都曾看过那张照片：晨光从遮天蔽日的榕树群倾泻而下，出现数十条光亮的“通路”，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老农肩扛锄头、手牵水牛，在晨雾缭绕的榕树群下穿行而过……若想“复刻”这个场景，可以雇人牵牛、赶鹅，付钱就行，听说要两三百元。而让我心心念念的，却是那棵有着 800 多年树龄的大榕树——我想看看那近千年的生命如何生生不息。

榕树群在渡头村里的榕枫公园（又名“榕枫林景区”），“千年古榕，万株红枫”是其典型特征。魁梧伟岸的古榕树，顶天立地，枝繁叶茂，属红皮小叶榕，是全球纬度最北的榕树群。最大者 800 多岁，最小者 140 多岁，呈现热带板状根的特色。这儿的枫树属于三角枫，都说霞浦自古出美女，这儿的枫树因而被称为“美人枫”。

由于是阴天，所以没能看到榕树群最美的时刻，但也并无遗憾。况且，在渡头村里走走逛逛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村子很难让人不生好感，光是那面红砖墙上的仙人掌群就够我停留好久。

下午的行程是游览小皓海滩。在东壁时曾问起雪香阿姨什么是滩涂，她的解释是：“滩涂是海水退潮过后的海滩。”然后，今天就看到了小皓海滩的滩涂。我们顾不得脚下的泥泞，经过搁浅的渔船，踩在那些像大雁展开的翅膀形状的滩涂，一路向前。这里的潮水呈“S”形，跟我之前看过的海滩都不一样。阳光躲在乌云后面，只短暂地出现了 10 分钟，我看着闪闪发光的海面，快不能呼吸。唯一遗憾的是，不能离那片海再近一些——下午三四点，海水已经开始涨潮了。潮水涨得很快，不知不觉就蔓延到脚边。我抱着相机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跑向岸边。

福鼎·嵛山岛

1 月 21 日，依然是早起的一天，即将离开东壁前往嵛山岛。坐上一辆旧蓝色的公交车前往三沙镇古镇村，公交车师傅幽默地说，这个古镇不是古老的镇，而是一个村子。我们说，遇到的霞浦人都特别热情好客，他不住地说“还行”“还行”，像雪香阿姨的口头禅“蛮好”“蛮好”，海边居民的心态总是那么积极阳光。

到了大古镇渡口，往售票处走去，近处的海上有一个男人久久地望着海面，四周是搁浅的渔船。那个画面，就像是电影的场景。面对茫茫大海，他在想些什么呢？忽见大雁成群结队地从码头上空飞过，一会儿呈“一”字形，一会儿呈“人”字形，一会儿又没有形地一阵抱团乱飞，总有那么三两只落在队伍的最后面，笨笨呆呆的，蛮可爱。

嵛山岛的往返船票是 100 元，返程时可以不回到上船的码头，且船票可以隔天用。我们是在三沙码头（大古镇渡口）上的嵛山岛，第二天从嵛山岛坐船到另一个码头——渔井码头。

一下船就在候船大厅看到“中国最美的十大海岛”的字样。嵛山岛上有 5 个村子，分别是马祖村、芦竹村、东角村、鱼鸟村和灶澳村，这些名字，听起来就让人心动。

嵛山岛的游览门票是 55 元，30 分钟左右的车程。那是一段险峻的环山公路，师父车技了得，不仅开得一手好车，还从容地跟我们介绍起嵛山岛：嵛山岛有三个湖，分别是日湖（嵛山岛饮用水来源）、月湖（即“大天湖”）、星湖（即“小天湖”）。游人对这个纯天然海岛存在着两极观感：要么享受这里的纯天然，要么嫌弃这里“一无所有”和“落后”……

大天湖的湖水静谧，随风漾起一层又一层水纹。目光所及的绿色都是冷清的，除此之外就是一片枯黄。游客服务中心看起来破破旧旧的，没什么人，前面的草地上停着三两只白鹡鸰，一点儿不怕人，悠闲自在地在草地上啄食，然后轻巧地飞开。

我转过身，看了看来时的路——这里就是嵛山岛啊，山、湖、草、海在这里浓缩，地处东南，却有西北高山草甸的风光；身处海岛，更有天湖清澈如镜。

嵛山岛的草场集中生长在日湖和月湖边平缓的坡地上，茂盛而绵柔，远远望去，草场一片枯黄。由绿变黄，它们已经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春天、夏天和秋天，海风吹拂，黄色的牧草连波起伏，看着它们随风飘动的身子。穿行于枯黄色的万亩草场间，我感受到这座南方海岛可与北疆媲美的辽阔。

当登上高处，迎风而立，脚下的黄色草场悠扬飘荡，远处有方位不明的羊群在“咩咩”地叫，似在寻找这世上不曾听过的鸣叫、不曾见过的生物。阳光暖暖地披在身上，舒服极了。

1 月 22 日，早起，一个人去看海。

潮水、林木、风，飞鸟、鸡、羊、人……万物皆醒的早晨。

走在路上，不时听见栖息在树枝上鸟儿的鸣叫，似乎在跟我打招呼。抬头一看，绿色芒草之上的电线上，停着几只熟悉的白鹡鸰，鸣叫的声音越来越大，像是在向我挑衅，挑衅我这个早起孤单的行路人。

隔着沿路的青葱林木，那片海滩在我眼中变换着样子，海中间的那艘渔船一下隐没在枯枝间，一下夹在两片叶子中间……构成全然不同的画面。那个撒网捞作的渔民一下距离我很近，一下又距离我很远。站在小小渔船上的他，与他身后的一片紫菜构成了一幅美好的画面。

隐隐听见羊的鸣叫，感到一种召唤。那一瞬间，真的就像刘亮程在《龟兹驴志》里写到的那样：“散乱的人群需要一个共同的心灵居所，无论它是上天的神圣召唤，还是一头小黑毛驴的天真鸣叫。人听到了，都会前往，全身心地奔赴。”

我向那声音寻去，看见两只被圈养的黑色山羊。它们埋头吃着草，吃累了吃够了就停下来看看眼前的大海，听听海浪的声音。但它们和在海上劳作的渔民多么相像，周围还有白鹡鸰为伴，如果它们语言相通，应该也能产生难得的友谊吧。我回头，太阳从我身后的阶梯上升起，穿过路边林木，绿得晃眼，可是真好看。

我开始往回走。阳光穿过叶子留下一地斑驳，越过群山洒向海面留下一片星辰，劳作的渔舟已经收网返航。

我没有直接回去，而是往大使岙沙滩走去。嵛山岛日湖的淡水从山上流经这儿入海，咸淡海水交汇在这里形成一小片湿地，因而有很多海鸟在这里觅食和栖息。我就见过白鹡鸰和海鸥在这里成群飞起。我蹲在沙滩边的碎石上，四野悄寂，海浪、溪水和风的声音如此清晰。走过一堆枯叶，双脚踩在上面，发出“沙沙”的声音。我加重了脚力，直至气喘吁吁。我知道它们不会生我的气——它们终要腐坏，滋养这片土地。

收拾好行李，临近中午，山庄老板开着观光车送我们出去。途中，又见那片海，我看见早晨没有见到的那小片湿地，像是茫茫大海间的一座孤岛——退潮了。

福鼎·太姥山

太姥山是世界地质公园、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国家自然遗产，秀拔于东海之滨，号称“中国海边最美的山”，传说东海诛仙经常聚会于此，又有“海上仙山”的美誉。太姥山旧称“才山”，黄帝的老师容成子曾在此炼丹。相传尧时古越人始祖母种蓝（蓝草，其汁色蓝，榨之以染布帛）于山中，用白茶为百姓治病，后得道成仙，封“太母娘娘”，为闽地第一位女神，改称“太母山”。汉武帝时被册封为“天下三十六名山”之首，改“母”为“姥”，定名“太姥山”。

太姥山是典型的花岗岩峰丛石蛋地貌，以“石奇、洞趣、峰险、雾幻”为“四绝”，有五十四峰、一百零八洞、三百六十处象形石景和佛、道、儒、摩尼四教胜迹、摩崖石刻、白茶祖地等人文景观。融山海大观、地质画廊于一体，既可玩山、观海，体验看石、探洞之乐趣，又能感受云雾之变幻、日出云海之壮美，此外，周边还有崱山岛、九鲤溪、翠郊古民居和牛郎岗、小白鹭海滨等景区，是理想的旅游观光、休闲度假胜地。

太姥山景区共分为玉湖游览区、国兴寺游览区、迎仙台游览区、一片瓦游览区、乌龙岗游览区、白云摩霄游览区、香山寺游览区共七大游览区，我们本着就近原则，决定先游览迎仙台。

上山一路往高处走，层层叠叠的绿色映入眼帘，绿得这么有层次，绿得这么好看。沿途奇峰怪石，绚丽多姿，真可谓：

太姥无俗石，个个似神工。
随人意所识，万象在胸中。
上天有穹洞，入地多幽窿。
胜景无穷致，游人思来重。

下山时走的是观海栈道。这一段从葫芦洞口至一线天出口的路，全长 1000 米，就像一条巨



国兴寺

龙穿行于山峰之间，沿途花岗岩石蛋、石瀑、岩脉等地质特征十分典型，有“地质画廊”之称。站在栈道上，还可远眺晴川海湾、崮山列岛，领会“山增海阔，海添山雄”的意境。

1 月 23 日，早起登山——国兴寺游览区，主要有楞伽宝塔、国兴寺、萨公岭、龙潭湖、三岗并峙、观雾岗等景观。

国兴寺，俗称“下寺”，始建于唐干符四年（877），当时寺庙规模宏大，有石柱 360 根，柱础栏楯遍镂人物鸟兽花卉。宋淳祐甲辰年间（1244）被大火烧毁，废墟上还立着 7 根石柱以及散卧着众多的石雕、石井、石槽等珍贵文物，是研究唐宋佛教文化的重要资料。2000 年考古挖掘时，发现该寺在北宋时复建的雏形，出土的主殿须弥座在国内极为罕见。目前所看到的寺院建筑，为 1992 年所建。

国兴寺前有潭，潭边生长着的塔柏和松树的轮廓倒映在潭水中，给人一种不真实感。寺院前横七竖八的石柱，像极了圆明园遗址。给人一样的凄惶感。

“啊太姥山，太姥山，请到天下名山打转……”的歌声响起，回荡在晨光初照的太姥山。

登山的石阶被晨露打湿，我小心地抱着相机，走起路来颤颤巍巍，三步一喘气，五步一歇息，像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阳光穿过树林照在石阶上，阶梯上一片跳跃的金光。这一刻如此让人心动。

独自一人走在杳无人迹的山上，没有人的动静，害怕；有人的动静，也怕。一路上只听见山间繁盛的树叶被风吹动的声音，与山间的流水相和。真希望它们也能和我说说话。但我知道，有些路，总是要强忍着畏惧向前走。就好像，再贫瘠的土壤里，依然有不知名的花草生生不息地拔节向上。

渐渐地，孩子撒娇要下山的声音、大人间的交谈声……被风吹走，又飘到我耳边。我的心跳逐渐回落到正常的频率。

在半山腰上的一个亭子前停下了脚步。穿过那亭子再往前，是一块空旷的大石头，我小心翼翼地站在上面，感受这阵晨风。往回走时不经意间瞥见躲在石缝间的狗牙花。准确地说那只是几株花苞，上面沾满清晨的寒露。我蹲下身久久地望着它，不能言语——为这“造物者之无尽藏”。

想到那日那时，那个蹲在花前静默无言的我，苏轼的“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又浮上心头。那样一个人的时光，如此可贵，如此难得。

上山的时候阳光普照，下山的时候烟波浩渺、云雾缭绕。走回山脚，再回到国兴寺，那些云雾一点点将我缠绕，不知不觉，我置身于这座海上仙山中，这是最好的时候。在景区入口处，偶遇五六位穿着黄棕色（土色）袈裟的年轻僧人，他们向我迎面走来，背后是氤氲四散的雾气，那个场景，像是一幅画，又仿佛置身仙境之中。

霞浦·北歧

1 月 24 日，大年三十，北歧。

村道上空挂满彩色旗子，家家户户在做最后的大扫除，已经陆续有人家开始贴门联了。事先订好的民宿，一顿好找。

放好行李，马不停蹄往北岐滩涂走去，沿途所见，由近及远依次是浮标竹竿、渔排房屋、岛屿帆影。移步换景，简直挪不动步子。

郁郁群岚之下，茫茫大海之间，一个小小的身影吸引了我的目光。偌大的天地之间，只有他一个人。海风吹向他、海浪涌向他、雨点砸向他，他轻易就被淹没在海面星散的渔网标记中。

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我原想往回走，但站在悬崖边看着那个瘦瘦小小孤独的身影，哪怕除了海鸥还有海风、海浪、紫菜以及他身边那些渔



下山途中偶遇的僧人

网标记与他相伴，那个小小的身影依然像一块小石子，在我心里某个阴冷的角落激起了一层又一层涟漪。我像是穿过了那片忘我的深海，突然看见了自己。那一刻，我决定奔向他。

向海边去才知道自己走了一段多么危险且可怕的路。那段路像是要往树林深处去，除了满眼的葱郁，就只剩脚下那条碎石铺就的小路。那些块状的石头将我的脚板硌得生疼，可我却有种自虐的快感。当双脚踏上海滩上柔软的沙子，那种兴奋无法言说。

我尽可能地向那个身影靠近，努力要看清楚他在干什么——辛勤地补渔网。他用自己的身躯跟海上的风浪角力，用力地拽住手中的那张网，用力地拽牢他手中的生活。我们相距数百米，但我真的可以看见他双手的那股子劲儿。幸而，海上有翻飞不停的白色海鸥默默与他做伴。我想，他心中一定有歌响起。

有那么一瞬，他抬头望向我，我放下手中的相机，嘴角微微上扬，和他四目相望。明明只是这一辈子仅此一次的一场“相遇”，此刻我们甚至看不清彼此的表情，但我从未感觉与一个陌生人如此靠近。

再回到最初的悬崖边，往下俯瞰，海面上的雾气越来越重，重得快要看不清那些紫菜架了。我听着自己不停止的喘气声，站在原地疯了一样傻笑——走这么远的路，只为了给自己一个微笑。

如今，寒冬过去，春天又来了，接下来的日子，亦会如此，满目尽如诗。

一场失控的网络战

文 何尚

童年的迷思

上小学的时候，我忽然迷上了一部电视剧。在剧中，我喜欢的那对情侣最终以男方被仇敌杀死，女方远走他方的悲剧告终，这无疑使小小的我既郁闷又伤心。于是我开始脑洞大开：如果这个男人没有死，故事的结局会变成什么样？这个问题在我的脑子里不断打转，演变成成千上万种可能性。

彼时内向的我一直以为这样的脑洞只是自己的怪癖，不敢跟身边任何一个人讨论，只好不停地在网络上搜索这部剧的相关信息。最终，我终于在百度贴吧里找到了知己——一群跟我一样看过这部剧，并喜欢同一对情侣的女孩子们，怀着对故事结局无尽的遗憾之情，开始互相分享脑洞，并将各自的脑洞写成或长或短的文章。当时，我们简单地称之为“续”，往往以《如果某某没死……》《某某续》等一目了然的文字作为题目。

小学尚未毕业的我也加入了这个群体，开始用幼稚的笔触书写自己的脑洞，并意外地获得了不少同好的支持和鼓励，成为我童年时期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这部电视剧从来没有大红大紫过，我喜欢的这对情侣的饰演者后来一个默默无闻，另一个转行当了导演，也不甚成功。然而我们这群默默的支持者“黏性”挺高。贴吧里的人来了又走，走了又来，十多年来活跃度始终不低，因为我们热爱的已经不是这部如今看来制作颇为粗糙的电视剧，而是彼此那些奇妙的脑洞和饱含爱意的文字。

直到上了大学，我才知道这样的文字有一个统称——同人文，它是影视作品或小说、动漫的衍生物，是粉丝出于喜爱的再创作，而像我这样因为“意难平”而提笔创作的人则数不胜数，且女性作者占多数比例。是的，“意难平”正是大部分同人文创作者的创作动机，而给予原创人物一个更美好的结局，弥补原创人物的遗憾，则是大多数同人文创作者的共同目标。在微博上，曾有人问：“同人文的意义是什么？”无数同人文作者给出了看似不同却又一致的回答：

“是《哈利波特》中邓布利多和斯内普没有死，小天狼星陪着哈利长大。”

“是《复仇者联盟4》中钢铁侠没有打响指，黑寡妇没有跳下悬崖。”

“是《盗墓笔记》里的张起灵不再孤独，铁三角永远不分离。”

“是《火影忍者》中野原琳没有死，水门班平安长大。”

“是《甄嬛传》里沈眉庄没有死，陪着甄嬛到白头。”

……

同人文，在作者心中是另一个平行宇宙，另一种可能性——在这个平行宇宙里，所有的遗憾得以弥补，所有的“意难平”得到了抚慰。

也许有人会觉得，同人文不过是一小部分女性的意淫，是无聊的幻想，然而事实上同人文由来已久，且并非是女性的独特爱好。比如：清朝高鹗续写的《红楼梦》后四十回，显然是《红楼梦》的同人文；明代著名小说《金瓶梅》是从《水浒传》中截选出西门庆、潘金莲、武松等原创人

物和基本设定，创作出全新的故事和思想主题，可以将其视为《水浒传》的同人；日本著名作家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山鹬》是关于托尔斯泰和屠格涅夫的同人文；19 世纪阿瑟·柯南·道尔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血字的研究》，引发大量读者创作同人作品，其中，2004 年英国作家尼尔·盖曼凭借同人作品《绿字的研究》，获得了雨果奖的最佳短篇奖。曾经风靡全国的《盗墓笔记》的作者南派三叔是《鬼吹灯》的书迷，最初的连载正是刊登在鬼吹灯贴吧里，书中也沿用了《鬼吹灯》的部分人物和情节设定，所以《盗墓笔记》可以看作是《鬼吹灯》的同人文。

由此可见，同人创作与现在很多人不屑一顾的“腐女的意淫爽文”并不能画等号。

同人文与娱乐圈卖腐

说到“腐女”，有必要解释一下，这是指“喜欢男性之间的爱情的女性”。2003 年，中国大陆著名的女性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创立，耽美向（指男男同性恋）同人文很快登上了晋江文学城点击量榜首。“腐女经济”也迅速成为了热门话题。

南派三叔曾说：“关于盗墓笔记同人和腐女粉丝的争论，早就已经存在在业内……因为腐女粉丝往往是粉丝中传播形成最旺盛的，一个腐女百万兵，得腐女得天下，早就是商家的共同觉悟。”这句话，也是现在娱乐圈的真实写照。由于除了传统的影视剧和书中人物以外，部分腐女也喜欢“真人 CP（指人物配对）”，即现实生活中真实存在的男性之间的 CP，尤以男明星为主，炒 CP、主动卖腐，已经成为不少男明星的营业技巧。比如：有些男明星会在节目或影视剧中说一些暧昧的话，举止亲密，然后在新闻通稿中特意点出两人的“兄弟情”，或一个男明星在生日、节日等重要节点发关于另一个男明星的微博等，这些行为被腐女粉丝们称为“发糖”。2019 年，肖战和王一博因主演电视剧《陈情令》爆红，两人组成的“博君一肖”CP 也吸引了大批粉丝，关于这两位男明星“发糖”的视频在 B 站数不胜数。五年前，由于频频合作拍摄影视剧，胡歌和霍建华也曾经是娱乐圈大热的 CP，女演员唐嫣曾经在微博中转发胡霍两人的亲密合影，并配文称：“你俩赶紧的吧，别墨迹!”，公开支持粉丝粉 CP。再往前数，20 世纪 70 年代，狄龙和姜大卫是香港影坛最闪耀的双子星，由于两人主演了大量讲述男性之间友谊的影视剧，他们成了当时香港最红的 CP。

在国外，韩国男子组合 Super Junior 成员金希澈曾经在综艺节目中爆料自己曾以成员们为主人公写同人文；《哈利波特》马尔福的饰演者汤姆·费尔顿称自己曾经看过粉丝们写的同人文，甚至透露他的哥哥还把一张“德哈”照片（马尔福和哈利波特的同人图片）设置成了手机锁屏。当然，也有些男明星对于同人文持保留态度，英国演员汤姆·希德勒斯顿就明确表示自己不会看关于自己的同人文，并且不会在网络上搜索关于自己的相关信息。

与影视剧、小说的同人文不一样的是，涉及真人的同人文往往会引起比较多的争议。因为这样的同人文可能会侵犯名誉权，也可能涉嫌违法犯罪。也正因此，当你阅读任何一篇真人 CP 同人文，往往都会在文章的第一行看到作者声明：“请勿上升正主”，意思是“请不要把文中情节上升到真人本人身上，这个故事与他 / 她本人无关”。

肖战事件

2020 年 2 月 24 日下午，肖战的 CP 粉 @ 迪迪出逃记在微博发布了“博君一肖”CP 同人小说《下坠》最新一章的连载，并注明了小说在 AO3 网站、Lofter 网站上的链接。在《下坠》一

文中，肖战的身份是一个有性别认知障碍的发廊性工作者，这惹怒了肖战的“唯粉”（指只喜欢肖战一人的粉丝），她们认为这是对肖战的侮辱。2月26日，肖战唯粉打着“保护未成年人上网的环境”的口号，对AO3、B站、Lofter等网站进行无差别举报和攻击，同时，她们还人肉了@迪迪出逃记，要求其学校给予处分。2月27日晚，AO3百度贴吧被封，包括同人圈在内的各路网友开始联合抵制肖战及其粉丝，此事因此被称为“227大团结”。2月29日，由于肖战唯粉大量举报，导致国内用户从该日起无法正常访问AO3网站。至此，事情开始变得不可控制。同人圈及相关圈子的人们聚集起来，仅在微博“227历史时刻超话”中，就聚集了30多万反对肖战及其粉丝的人。这些反对者们奋起反击，不仅给《庆余年》《陈情令》等肖战出演的作品评分刷“一星”差评，而且重点打击肖战的商务代言——她们抵制购买肖战代言的所有品牌。曾经购买过这些品牌产品的反对者们，也纷纷向品牌方要求开发票。有人戏称，开发票是反对者们写给品牌方的“分手信”——我曾经爱过你，证据就是这一张张发票，但只要你不换代言人，我就再也不是你的客户了。

为什么一篇文章被举报，会引起如此剧烈的反应？这里涉及到两个网站：AO3和Lofter。

2007年，美国著名同人文作者Astolat（她的真实身份是小说家Naomi Novik）提出：“资本会停止为同人创作者敞开大门，除非我们站起来建立自己的园地……我们需要自己的中央文档，一个不会被谷歌屏蔽，不会对公众隐瞒的地方。”同年，她和其他志愿者成立了非营利组织The Organization for Transfomative Works（简称：OTW），该组织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致力于保存粉丝创作和粉丝文化历史的AO3网站，全称是Archive of Our Own（意即“我们自己的档案馆”）。这是一个非营利且开源的同人小说数据库网站，站内的文章由网站上的用户所贡献。该网站于2009年正式开始使用，目前，AO3是全球最大的同人作品网站，各个国家的同人爱好者都会在此发表和阅读作品。2019年7月，该网站上的作品超过500万篇，同年8月，AO3网站被授予雨果奖“最佳相关作品奖”。

根据AO3网站的要求，所有作者在发布作品时都有义务进行详细分级预警。事实上，@迪迪出逃记在AO3网站发表《下坠》时，也提示了该文“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

而Lofter则是网易公司旗下的轻博客，是国内的文画作者聚集地，很多同人作者的作品都发布在这个App上。同时，lofter也汇聚了很多绘画圈、摄影圈、科幻小说圈等不关心粉圈也不看同人文的小众爱好者。

因此，这两个网站被举报，事实上惹怒了国内的亚文化圈和不少小众爱好者，因为这在不少人看来，实质上是粉丝利用公权力来讨伐自己不喜欢的东西，其他小众圈子由此产生了“物伤其类”的感觉，因此纷纷加入抵制肖战的行列。有网友形容肖战唯粉的举报行为就像是“明明不吃辣，还非要跑去川菜馆吃饭，然后向工商局举报川菜馆里有蟑螂。自己不吃，也不给别人吃的机会。”也有网友认为：“举报是赋予公民社会监督权，是为了让公民有在相关法律未完善的领域里能够向上表达的机会，不是给予你们党同伐异、清除异己的权力。”更有人指出，如果说《下坠》一文涉嫌侵犯肖战的姓名权、名誉权等，那么进行维权的只能是肖战本人，而不是肖战的粉丝。

我不是法律专业人士，无法判断《下坠》是否侵犯了肖战的相关权利。作为一个普通的同人文爱好者，阅读和创作同人作品是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我曾频繁使用AO3网站和Lofter，AO3无法正常访问，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我衷心地希望国内能够为同人作品提供一个稳定、健康的平台，并设立相应的等级制度和维权机制，让同人文作者可以安心地写作和交流。

南华时刊

NAN HUA TIME

聚焦全球华人的智商、财商、情商

欢迎订阅2020年《南华时刊》

邮发代号：84—8

每期铜版纸彩色精印 每月15元 全年180元

近期精彩文章

海外留学安全报告

马东，玩转说话这门“生意”

海归女孩和她的“花厨”

天涯海角热起来

全世界都在说中国话

地产大佬的海南往事

杨安泽：我的目标是美国总统

海南有个咖啡谷

侨批故事

二公子李泽楷

豪门之女杨元宁



垂询热线：0898-66275563 QQ:2567629307

茶无国界：如是为外国友人泡茶

文 徐永胜（企业家）

说起来奇怪，茶叶原产于中国，但中国在国际茶叶市场所占的份额微不足道。原因主要在于鬼佬（外国人）的脑子比较简单，把茶叶泡茶这种因人而异的复杂事情做了最大限度的抽象和简单，形成了为大众接受的统一标准，而中国的茶企还在孜孜不倦地追求差异化、高端化。想当年，英国财政支出的10%用以进口中国的茶叶，到如今一个英国立顿的销售量超过中国所有茶企的总和。

大道至简，大多数时候简单可以超越复杂。老子的三个法宝之一，就是“俭”。老子说：“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但追求简单，也不等于不喜欢复杂。

同庆号掌门人邓雅然精通做茶的方方面面，绝对是科班出身的大师级茶人。她亲自布茶，优雅淡然从容，难得的是人茶合一，就像人剑合一的武林高手风清扬，分不清人泡茶，还是茶泡人，气场与茶气茵蕴。同庆号出品的茶被当作国礼赠送外国政要，曾接待过外国的大型团组。雅然董事长曾经兴致盎然地讲起接待世界小姐选美大赛代表团的趣事，上百人的团组要同时展示茶艺，茶怎么泡？哪找那么多茶艺师？用什么茶具？都是令人头疼的事情，最后只能根据酒店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打破常规用大壶泡茶，由雅然董事长亲自指挥一众服务生，统一投茶量和浸泡时间，统一使用高脚玻璃杯，靓茶靓汤与靓丽的佳丽相映成趣，获得满堂彩声。

茶虽然源自中国，但到了西方从工艺的茶艺、礼仪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般都会切成极细的碎末，制成茶包，典型的英国下午茶会加奶，加糖，并配甜点。

有个印度的合作伙伴，曾经赠送了一盒斯里兰卡红茶，号称是世界上最好的红茶。细沙般的茶末，看不出茶叶痕迹，但茶香穿透力极强，浓香扑鼻，汤色透亮，奶香浓郁，耐泡回甘快，确实是好茶。可惜茶叶太细了，怎么滤都滤不干净，有碍观瞻。

中国也有不少有名的红茶，如祁门红茶、英红9号、武夷山金骏眉，但我喝过的最好的当属云南的古树普洱红茶。纯料古茶树雨前春茶鲜叶当然不可能拿来制作红茶，但是即便是雨水茶或秋茶鲜叶制作的红茶也弥足珍贵。

在维也纳一个古堡的巨大地下酒窖，我自告奋勇为主人冲泡中国正德古树红茶，一个七十多岁的绅士。我对老人家说，这应该是他喝过的最好的红茶。唤人取来两个茶壶，一空壶，一壶装满开水，空壶放入大把茶叶，注满开水，清空开水壶当公道杯，冲入茶汤，分茶、洗杯、空杯，请老人闻香，他竟然满脸陶醉地说：“闻到了青苔的味道。”典雅的西式茶具白瓷白杯，衬托汤色透亮的古树红茶，空气中飘着淡淡的兰花蜜香，宾主品茶言欢，互道珍重珍惜。

我一直认为，能够分辨香水的细微差别和品鉴红酒优劣的西方人，对茶有天然的鉴别力。

茶本无界，超越国界，超越语言，超越时间与空间。茶本自清净，本自具足，能生万法，能生万象，一叶落而万象生。

好闻好看好喝，是谓好茶。诚于中形于外，如恶恶嗅，如好好色。

精神与灵性的圆满

文 黄月（美国亚洲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

我始终坚信，绘画艺术最重要的价值在于不断地的创新和重构精神，在于前无古人，而不是师承。灵魂代表着精神与价值，代表着生命力，艺术家必须有自己的灵魂。

中国古代绘画颜料有着悠久的历史，秦汉时期壁画已有大红、朱红、黑、褐、石青和石绿等。秦始皇兵马俑的彩绘颜料中有朱砂、铅丹、炭黑和铅白等颜料。敦煌壁画使用的颜料有朱砂、红土、雄黄、红丹、铁红、胭脂和银朱等种类达四十多种。唐朝张彦远在其《历代名画记》中详细注明了颜色的产地和加工方法。遗憾的是，中国绘画颜料的生产一直保持着作坊式和画家自行加工的方式，直到 1919 年，在西画东渐的大环境下，几个实业家和画家合作在上海创立了马利工艺厂并开始生产马头牌水彩画和广告颜料。1933 年，上海金城工艺厂研制生产了第一批国产鹰牌油画颜料。

中国传统绘画依附于笔墨和线条的关系，注重笔墨变化，认为墨即是色，墨分五色，将墨上升到与色彩具有同样的功用。我的彩墨花鸟绘画没有遵循中国传统的笔墨，我不用墨，我在宣纸上以色彩的独立表现来绘画。我的绘画讲究色彩的语言表现，同样注重画面的“位置经营”、趣味和品格。

花鸟画是中国绘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此种分类为中国所独有。中国花鸟画的产生与春秋时期诸子百家的文化思想有关，从“得其数”、“得其志”到“得其为人”，这个过程是抽象的，思维也是抽象的。老、庄讲究处事自由自在，不受限制，在政治上是“无为而治”的思想，文人赋诗作画所追求的超凡于尘世之上的精神境界，大概也只有“托物言志”可以意会的花鸟画所能表达了。有了诸子文化，才有中国独特的文人，才有了魏晋南北朝的艺术风度，经过几百年的战争、王朝的更迭，“厌世”与“避世”，到唐代花鸟画的分科独立已是必然。现在能看到有具体记载的花鸟画家有五代的黄筌、徐熙等人。

黄筌是宫廷画院的画师，多画宫中奇花怪石、珍禽异兽，采用勾线着重彩的设色方法，形成“黄家富贵”的画风。黄筌是工笔重彩而徐熙是墨线为主。金碧辉煌的工笔重彩与水墨淡彩体现了“宫廷”与“在野”在美学观点上的分歧，这种分歧对以后的中国绘画的色彩应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宋朝第八位皇帝宋徽宗赵佶（1082—1135）是历史上唯一位真正拥有很高的艺术涵养和绘画才能的皇帝画家。他在花鸟画上的艺术成就，主要体现在物象意念安排的独特性，和写实技巧求形神并。传说宋徽宗画翎毛多以生漆点睛，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宋徽宗的花鸟画经常有御制诗题、款识、签押、印章。全图开合有序，诗发画未尽之意，画也因诗更显圆满。“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宋元文人画的兴起，水墨写意画法在花鸟画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明末徐渭的泼墨大写意画，清初“八大山人”的水墨没骨画，清末以郑板桥为首的“扬州八怪”，历经各朝各代的画家不断创造与发展，水墨写意花鸟画的技



《翠碧枝头》
黄月/作

法和表现已达到了近乎完美的程度。20 世纪初，以“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蔡元培等人以提升民族文化与精神素质，对传统中国画进行了激进的“美术革命”。蔡元培的美学思想来源于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纯粹美感”，如康德所说的，人类精神生活的最终目标是：理性。一个民族的历史只能按最高的精神价值来估价，而艺术远比政治、经济有价值。他提出应该由审美教育来代替宗教，强调艺术与审美在人类精神发展与文明演进过程中的独特作用。也正是在这一特定时期的变革，中国绘画开始呈现出丰富多彩的局面。

我喜欢花鸟这一绘画题材，在二重境界的荷塘中可以从精神层面体悟人与自然的真谛。

中国有记载的最早表现荷花的绘画是南朝梁元帝的《芙蓉醮鼎图》。东汉时期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至唐代佛教造像的兴盛，荷花在也成为中国古代至今最为常见的绘画题材。中国文化的传承特点在荷花文化身上的延续和发展可以说表

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对荷花的厚爱，对荷花文化的意念和诗意的延伸并没有因屈原沉江而消亡，而是更趋于走向多重的含义，蕴涵着传统文化的厚重。

历经一千多年的传承，中国花鸟画已建立起近乎完善的理论体系和笔墨程式，凝聚着千百年来世世代代花鸟画家的经验和创造性，这种笔墨程式的完善和代代的承袭，也使传统花鸟画的表现形式渐变成一种僵硬的标准和模式。

中国文化是在多种民族文化的交融中形成的，主旨是中庸。中庸文化并不排斥外来文化，而是对外来文化的一种融汇、融合。

我的彩墨花鸟绘画不是传统的，虽然同样在生宣纸上绘画，且工具和材料都是传统的，但我不用墨，而是用色彩画花鸟，笔法是为了加强色彩的表现，落笔后随机应变，随形而定，随心而发，不受传统十二法的束缚，唯一不变的就是不断地改变。我的追求首先是能走出传统绘画的束缚，进而超越时代性的好恶，最终提升到跨时空的共感价值的层次。宋代词人苏轼认为：“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重新结构自然，打破自然物象的原有结构，重新创造。绘画语言的价值体现在原创性上，我注重笔法与色彩表现的关系，色彩与色彩的关系，色彩的空间关系；我追求色彩在宣纸上晕染和叠加形成的机理和变化；我注重色彩的抽象性、主观性，令其不受制于物象造型的原则，同时我也注重局部的具象表现，与抽象的色彩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张力。画家的天赋和智慧的表现是对形、色、境的感觉与悟性。传统的没骨画法并未跳出随类赋彩和平光固有色的局限，这也正是古人留给当代画家的空间。再现物象的色彩，表达物象的质感，已不是我在绘画中色彩表现的最终目的，我追求色彩充分的表现力和相对的独立性，不受光的约束，注重主观色彩的表现，强化心理色彩和色彩的象征性。中国绘画素来有南北之分，审美价值取向上也有差异，自解为地理环境影响所致，我所努力的方向不仅仅是南北兼容以去一隅之局限，更重要的是走出地域，在所谓中西绘画的大格局中独一无二。

绘画艺术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着积极推动的作用。艺术家在绘画中以直接、象征或内涵的观念，体现着时代的精神。我强调艺术的神圣精神，与一切软弱的、病态的、腐败的、保守的文化观念相对立，我试图以自己的绘画来建立起崇高的、健康的精神文化的模式，一种理性的新文明的精神。靓丽的色彩、抽、具象的融合，全新的视感图示和心理感受，等等，从各个不同点向着“新文明的主体精神”汇合。

绘画的形式风格语言是十分重要的，艺术家是通过唯我的艺术语言来表达的他的理念的，代表着艺术家的指导思想。

人的第一感觉就是视觉，对视觉影响最大的是色彩。色彩赋予感情，作用于人的感官，刺激人的神经，进而在情绪心理上产生影响。色彩的心理效应发生在不同层次中，直接的刺激，间接的联想，在更高层次的则关系到人的观念、信仰。色彩与形状是绘画中满足视觉的两个典型因素。色彩不仅具有物质属性，还承载着精神因素，具有丰厚的文化性。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颜色感觉联想的物质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复杂。

我关注色彩在宣纸上的表现，不再关注古人的笔墨。艺术的发展是确认自身并解体自身的过程，是内容的不断转换和形式的不断演化，艺术演化的根本动因在于自我观念的转变。艺术创作需要思维的自由，没有思维的自由就谈不上艺术的创新。我是自由的，我的绘画艺术创作不被任何已存在的形式语言所束缚，更不会被传统的绘画观念所左右。我在一个无比自由的空间里构建属于我自己的形式绘画语言。绘画材料只是绘画的载体，了解材料的特点才能强调材料赋予的特

性，从而突破材料的限制。宣纸的渗透性能让各层的色彩相互映衬，笔触的实虚安排和笔触的叠加可以产生令人意外的肌理效果；不确定的表面和模糊的边界都是可控的；偶然中的偶然是宣纸的其中一个特点，色块之间相互融合在宣纸上的作用会产生新的气韵和视感；色彩的变化包含着色相、明度的变化，可以创造出千变万化的视觉效果，暖色与冷色的相互作用，形成空间与动感。我用颜色表达思想，选择色彩的象征意义来表现主观精神的内涵。绘画的语言和形式是根据我要表现的东西而产生的，作为艺术家，我必须知道我生活的年代，我的人生信仰是什么，人类永恒的精神需求是什么，我必须创作出我独有的、鲜明的绘画语言来加以表现。

色彩是视觉艺术中最具感情化的因素，有着瞬间唤醒视觉注意和感情共鸣的效果，也是表现内在情感和冲动，或表现抽象精神的最具象的一种形式。色彩关乎人类的精神世界，比形象更具备抽象性。康定斯基把绘画分为两种，“一种是为物质的，一种是为精神的。物质绘画是通过视觉的神经刺激来感动观者，这是外在的；精神的绘画是通过心灵的激荡所产生的内心共鸣，他把前者归于写实艺术的特点，把后者看作抽象艺术的核心”。

法国印象派画家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说：“以光学的调色代替颜料的调色。这种方法意味着把调子分解成它的构成因素，因为这种光学调色法的类型和那些以颜料调色法所创作的画相比较，它所显示的光度更为强烈。”

艳丽是一种精神象征。艳丽不等同于艳俗，审美和文化内涵也截然不同。大红大绿如村女涂脂是艳俗，是对色彩搭配和协调的无知；陋俗乡野掩映不去的是陶渊明的风雅光辉，如梦如幻的色彩一定是素质与品位的诠释；素色更多的是代表着限戒和隔断尘凡；精神境界崇高的人在黑暗中看到的是光明，颓败的人在阳光下只能看到肮脏。无法辨别雅俗的人一定是附庸之人，缺乏文化的修养。

色彩是一种复杂的语言，对人有着潜意识的影响，不仅刺激人的神经，还对人的情绪在心理上产生作用。比较而言，形和色两者当中，色彩比形更能吸引人的目光。尽管在年代、地域、信仰、种族和文化的差异有所不同，但人类具有共性的生理机体是基本一致的。不同色彩被人类文明赋予了不同内在的含义，色彩的语言也在文明的发展中不断的融合和发展，影响着人类的精神世界。

红、黄、绿、蓝加上白和黑，是对人类心理产生影响的六种基本色彩。人们对颜色的感受很大程度上受心理因素的影响，形成心理颜色视觉。色彩透过视觉到心理，其反应与变化是极为复杂的。我的彩墨绘画极为关注色彩的应用，我重视色彩从视觉到心理的因果关系的研究。对于色彩元素的掌控除了本身的表层自然属性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层的表意性色彩通过眼睛、大脑，经验所产生的视觉感受。我通过色彩的布局和构成，视觉气氛的渲染，画面构图的经营等赋予不同意义的象征。一般情况下，暖色调是欢乐和积极的基础，冷色调则是宁静和肃穆的营造。对于色彩元素的掌控除了本身的表层自然属性外，更重要的是其深层的表意性色彩是通过眼睛、大脑，经验所产生的一种对光的视觉效应。我根据所表现内容的不同来设计和安排画面不同的色彩和色彩组合，并以一种纯主观的色彩来实现我的创作思想。

我喜欢艳丽的色彩和纯净的灵魂。在一片浮躁和恶搞的氛围中，我的彩墨花鸟画追求以内涵深厚的艳丽色彩带给人干净、超然和脱俗的感受。

我从不给我的画限定传达的内容和思想，绘画应该像音乐一样，有着无限的遐想。人与人的审美差异很大，自我的视角，自我强烈的主观色彩，在思想观念和情感上是无法统一的。一切皆

在变化中存在，我希望我的绘画能带给不同心境的人不同的内心感受，带给人精神的慰藉。我的画没有“真像”，观者的感受没有错或对，真理在每一个观赏者的心里。我创作时把我的主观感受和抽象的精神用我的绘画方式表现出来，而作品给人的感受可能因人而异。我认为，绘画作品的深刻性就在于能提供多样性的解释。

在彩墨绘画中，我喜欢用蓝色做主色表现，蓝色是充满梦幻的色彩，给人清新淡雅和浪漫的感觉；蓝色被赋予智慧的内涵，是永恒的象征；蓝色在宁静与深邃中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是人的灵魂可以寄托的一种纯净的色彩；带给人圣洁的启示，吉祥的祝福。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喜爱莲花，认为它是清净、尊贵、具有正面光明和高尚品德的象征。莲花出淤泥而不染，赋予人一种脱俗拔尘的意境，从尘世到净界，从诸恶到尽善，从凡俗到成佛。蓝色（blue）在西方文化中的象征着高贵、高远、深沉，如 blue blood （名门望族），blue



《凉秋》
黄月/作

ribbon（最高荣誉的标志），关于莲花，古希腊传说中有所谓的“食莲人”，人吃下这种莲子后，就会忘却一切烦忧。

蓝色也被视为一种渴望，象征乌托邦式的梦想。

我用蓝色为主色调来表现莲花，把颜色的象征意义与莲花的文化内涵融合在一起，这是一种纯主观的，“以不同的表现手段来追求最美的色彩和谐”，以一种“积极且鲜明”的视感，赋予人精神的慰藉。

鸟是灵性的象征，也是我的绘画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我对客观的花鸟形象进行主观上的处理，形和色彩都是高度概括的，不仅有别于客观的客体物象，也有别于任何人的艺术表现，体现出我笔下意味的鸟的特征和辨识度。

绘画的最高境界是人性与神性的融合，一种自在境界，人、神因灵性而统一。从大彻大悟的佛陀、上下求索的老子等，都是以个体生命的彻悟来解证人神的统一。而伟大的哲学家也是以个体生命深刻的哲学实践，不断升华人性的光辉，其深邃的思想本质所折射出的神性智慧，影响着千百万人。

西方绘画的色彩观具有科学性的一面，中国绘画的色彩观从建立之初就跨越了对自然的模仿，而进入绘画本体语言的表现之中。在人类绘画发展历程中，东、西方绘画因文化背景的差异在色彩观上各具特色，也都有明显的局限性。我的绘画强调精神的价值和艺术对人的神圣性，不仅仅是表现艺术家的主观心灵，追求风格鲜明的个人绘画语言，我是一切艺术表现，来自于对人的生存、人的生存环境的关注；关注人在精神领域对美好生活与“美”的构想。

在绘画语言具体的表现上，我注重几个方面，第一，追求笔触、色彩在宣纸上的表现力，多以蓝色为主体象征，辅以不同的斑块色彩，寻求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第二，注重色与水与纸性的融合发生的微妙变化和多重表现，在晕染、色块和笔触中寻找节奏，并与画中的多种元素（飞禽水鸟、昆虫、佛等）构成和谐统一；第三，运用艳丽明快的色彩组合在作品内涵上不断地充实和遭变，在不断偶然的结果中加强绘画语言的特征；第四，诗书画印签名作为平衡画面的元素。

水与色彩在宣纸上的交融、相互作用所产生的肌理效果是其他绘画材料所没有的，带给人不同的视觉感受。借助材料特点进行的艺术表现，所呈现出的特殊的视觉语言是我的彩墨绘画的艺术特点之一；偶得的物象效果可以使画面呈现多样性和不可复制性，给模仿带来难度是我的彩墨绘画的另一个艺术特点。

绘画语言的发展从来都不是在成功模式上的重复。语言的形式和价值体现在原创性上，体现在时代精神上。

所有的元素都是为了表达我的思想和观念，绘画中的意识是无限多变的一种精神状态，由不和谐的元素组成和谐的秩序体现着艺术家的智慧和修养。色彩的冷暖，色彩的善恶，色彩是在冲突和层层渗透的融合中建立起和谐的。色彩意图在色相与纯度上的转换、组合，冷暖色的运用，虚与实、具象与抽象、笔触形成的肌理效果，以及留白的设置等多种表现构成了画面整体的表征和思想内涵，也构成了鲜明的个人绘画风格。除了作品可供直观的意味，隐喻是在色彩语言和色彩象征性的背后建立的。有意味的形式和抽象的表达，以及瞬间意识的作用等共同结构了作品的直接外观主题和画外的主题。

我的花鸟彩墨绘画是借助花鸟这一绘画题材，把主观世界中非直接现实性的抽象精神以具象的纯主观色彩来体现出超乎理性的神性境界。

我所追求的色彩观是一种超越精神层次的境界，蕴含着宇宙和谐的本质，体现着色彩的真正价值；一种内在心性的圆满——精神与灵性的圆满。

艺术的本质不是自然，而是精神的创造。

我跳舞，因为我悲伤

文 冯秋子



作者简介

冯秋子，内蒙古人，中国新散文代表作家，曾担任六届鲁迅文学奖评委。出版有《生长的和埋藏的》《圣山下》《塞上》《舞蹈的皱褶》等数十种散文集，获冰心散文奖、在场散文奖、三毛散文奖。多次应邀参加国际艺术节、舞蹈节、戏剧节，赴欧美亚国家舞蹈中心或剧场表演舞蹈剧场作品。

1998 年 7 月，北京最热那几天，我进入文慧的生活舞蹈工作室。文慧说我练习的时候特别投入。不过，投入只是个人的惯常状态，并不说明我真的适合做这件事，能做好这件事。我对自己能不能坚持、能坚持多长时间没有把握。

参加练习的人有的是做纪录片、做自由戏剧的，有的画画，有的从事行为艺术，还有就是我，文学编辑、作家。一群人很难到齐，很多时候只来一两个人。我每星期坚持着，没有中断。深冬的一天，文慧约我到歌德学院，那儿要举办一个关于德国现代舞的讲座。我找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一侧那座歌德学院的小楼，没急着见文慧，想独自感受一下现代舞最为辉煌的发生地德国，究竟在做些什么。讲座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之后放映影像和图片资料，我看得手心直出汗。我牢牢记住了德国现代舞大师皮娜·鲍什的一句话：我跳舞，因为我悲伤。这是埋藏在我心底的话，是我一辈子也说不出来的话。从那一刻开始，我与现代舞像是有了更深、更真实的联结。皮娜·鲍什朴质的光，在这一天照进了我的房子。我听到了许多年来最打动我的一句话，说不出心里有多宽敞。

我是一个比较沉默的人，过去在戈壁草原和围绕着它的大山里，一直很少说话。我表达高兴，就是拼命奔跑，或者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皱着眼睛和脸瞭望远方，我心里的动静，就在那个时间里慢慢流淌。而我的忧伤，是黑天里野生黄牛的眼睛，无论睁开还是闭上，悄无声息，连自己也说不上来为什么幸福、为什么悲伤。半大不小的时候，我被大街上一匹惊脱的马拉的大板车碰倒，腿上碾过一只马车轱辘，也没有出过声。后来我

常盯着马路看，想知道一个人倒在车底下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偏爱过去那种大轱辘牛板车和解放牌大卡车，它们的底盘高出去一截，倒在车底下的人有可能还生。我的全部生活就是这样，和跳舞不沾一点边。

我们那里一年四季刮风。无风的日子我就快乐得翻天覆地那么旋转身体，我会爬上房顶，测一测是不是真的没风，然后像房顶上堆起的麦秸垛，我在心里垛起这一天要做的事情……我能看见开败的蒲公英的小毛毛漫天飞舞，看见它们在太阳底下乱翻跟头，看见戈壁草原上的一堆堆牛粪，把那些纤细的小毛毛一根根吸进牛粪洞里，看见吸附了碎毛毛的干牛粪被人塞进炉火里，飞溅出灿烂的火星。

“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听过多少遍只有两句歌词的这支歌，还是百听不厌。我常去米德格的杂货店，听她奶奶——那个没力气睁开眼睛的老女人哼唱这两句歌。一边听歌，一边帮米德格干活儿。待停下手，就背着米德格的女儿出去玩耍，对那个没有父亲的两岁女孩说话。后来女孩长大了，跟一个乌兰牧骑跳雄鹰舞的男孩跑没影儿了。

那个女孩长到四岁还说不清楚话，不叫我“姑姑”叫我“嘟嘟”。米德格说：“你教她吧。”我拿一根树棍在土里写“赵钱孙李……”，她写“孙李钱”，写了好几年，终于能把字写得全乎一点了。只是“赵”字，写了几年以后，仍然缺东少西。我前面写，她紧随后面跟着写，可她不写“赵”，光写“走”，还把那条腿拉得长长的，不给往回收。所以她除了添乱，什么忙也帮不上。米德格的奶奶死的那天，我正好在杂货店。老女人唱着唱着突然睡下了，米德格喊我去看看她奶奶怎么样了，那个小女孩拉扯着不让我走开，等我摆脱那个小东西，跑过去翻转米德格奶奶的身体，问她：“你怎么啦?”老女人已经死了。米德格跑过来大喊大叫，老女人这时又睁开眼对她说了一句话。米德格发了半天呆，想起问我她奶奶刚才说了什么。我把听到的告诉给她：“别信你



2004年5月6日，冯秋子（左）与法国戏剧演员艾斯黛拉在北京798艺术中心彩排《时间　空间》

爱的男人。”

那是一个长长的没有男主人出现的故事。

我在一个时间凝固的地方长大。

今年春节我回内蒙古探亲，一高兴跟我母亲说：“我跳现代舞呢。”我母亲说：“你要止痛片?”她挪动困难的身体去那个存放了一些药片的小筐里取。我说：“你不用拿药，我没病。”她说：“你把止痛片带在身上。”她捏着小纸包从一个屋子跟着我进到另一个屋子，看着我，等我接她的小纸包。这是她能给我的唯一的好东西，在她看来这个东西非常神奇，像宝一样，她周身疼痛难耐时，止痛片帮她麻痹了一些知觉。她听不懂“现代舞”。后来她问：“是不是和男子一起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她。

我的事情一般不跟她讲。我确实不爱说话，更不对母亲说什么。从小到大就这样。

我离开家 10 多年以后认识文慧，她的职业是舞蹈编导，与我同岁。在我的朋友中，她是唯一一个专门跳舞、专业从事舞蹈编导的人。要是不和她近距离相处，我确信跟她成不了朋友。我熟悉文慧以后，想到：我母亲一辈子承载别人，不知道她能不能明白，现代舞也是一种承载方式。

我想说说文慧。

20 世纪 90 年代初，文慧开始倾心现代舞，在国内比较早从事现代舞的实践。我觉得，她选择现代舞跟她的心性有关。她是个愿意倾听别人的女子，常会记挂别人的麻烦事情，在以为适当的时候，送上她的问候。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比较讲求情趣，有时候也为一点小事发愁，整个人塌陷进去，一筹莫展。还有，她也会情绪化，偶尔发点怔、发一下浑，是在年纪大了以后，舞蹈剧场越做越有声望，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撑不住就释放一下。更多的时间，文慧自觉自愿自动发光，既和煦、又温暖。2001 年春节前，跟我们一起排演《生育报告》的王亚男回云南老家过年去了，我们聚会，她缺席，文慧打电话叫王亚男的二哥过来，他在北京打工，一个人孤孤单单，生活很清苦。这种情况，文慧比较果断。她的温良和热心肠，使她通明事理，虽说是个感性的人，她看重基本的地方，对人呢，一般情况下能往里看、往深处看，懂得分享他人的欢喜、抚慰别人的悲伤，算一个很在乎别人的人。

是因为能懂得别人更多一些吗？应该是。总之，她在意人的状态，重视人的生存境遇。排练的时候，她着意强调：“别忽略此时此刻的感受。”我们在这样的方向里，做了大量练习。作为编导，文慧腾出时间让大家交流，而国内的专业舞蹈演员，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不习惯做这样的练习，不习惯长时间坐下来讨论、探究、研磨。动作身体，是他们的长项；用语言、用思想、用情感、用心灵，倾听，交流，相互借鉴、互相切磋，启发、鼓励，协助、给予，以致能有愿望去发现和找寻触及人灵魂的肢体语言和表达，不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也没有过被要求这样做，或者是感觉到自我需要去做一些实践、哪怕实验一回，私下里有过个别好友之间三言两句的交流，更多的是顺应一种自上而下的程式和规范系统，或者长此以往的惯性轨迹去完成任务。

再比如，练习在一尺左右的距离对视，舞蹈员们平视对方，安静地体察对方的内容，领会人和人之间也许遗忘日久、也许讳莫如深的东西，在相互凝视的过程，产生疑似了解，甚至理解那样的元素，艰难的心地有一点松动，人们互相间产生出珍惜和信任。然后，做肢体训练——这时，充分利用自发的肢体，传达人的内心。在此进程中，文慧讲求开放式训练和训练中人体的开放质量。几年来，她汲取了自己和大家练习时做出的很小、很生动的生活细节，把它们做进了现代舞，已有《裙子》《现场——裙子和录像》《100 个动词》《同居生活》《与大地一起呼吸》《餐桌上的九七》《脸》等作品，以及 1998 至 1999 年进行了一年半，于 1999 年 12 月初在北京人艺小



在北京排练舞蹈剧场《身体报告》

剧场首演的《生育报告》，这也是我全面参与建设和完善的第一部舞蹈剧场作品。其实，北京、广州，两大城市的现代舞团及团体外专业人士，到目前为止总共不到 100 人，即使加上文慧的非舞蹈者兵马，如我，喜欢并愿意身体力行者，现代舞追随者的总量也未能有 101 的突破，比起这个国家十二三亿人口、几十人的现代舞队伍，真如沧海一粟。但它毕竟存在了，成为偌大一块高粱地里的一杆枪。

现代舞对人、对舞者自身的关注，是它一出现在文慧的言谈中、出现在北京内部或者公开的舞台上，就吸引我的地方，那时我和文慧经常在一起玩儿，有一阵，她差不多一周到我家一回，吃饭、聊天，想来已有八九个年头。文慧的思维急促，闪烁跳跃没有规律，一句话没讲完，就跳到另一句，从一个话题突然跑入另一个话题，从一种语境转脸工夫跳到另一种语境，自己竟浑然不觉。听她说话，我经常是一边听，一边眯着眼睛笑，看着她急匆匆往前奔突的样子，想象她前一爪子后一爪子不失闲那么倒腾，觉着她很像临产前的孕妇，不把肚子里的小孩子生出来，惴惴不安。

不过文慧的直觉和传达能力是出色的。

我看过文慧编导的一些民族舞，像《红帽子》《算盘》，已成为东方歌舞团的保留剧目、经典作品。她是东方歌舞团具有个性的舞蹈编导，曾经被国内影视和大型舞台作品请来请去到处编舞，声名火爆。正值隆盛时刻，她突然转身，把自己收回来，不再奔赴热闹非凡的现场。我们就此交谈过很多。她说感觉到很焦虑，那些深埋于心的东西，日久天长以后，似乎已经酿造成形，她觉得必要通过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了无舞蹈痕迹的方式来表现。她自己越来越想要生活状态里的东西，她意识到，这些正是赋予人到中年的她、她的作品真正具有个性和内涵的东西。

我同意参加她的训练以后，确实感觉到，以往 20 多年跳或者编导民族舞、东方舞的经验，有益的她努力去吸收

进来；多余的，她一感觉到就把它们从自己身上往外剥离。而且她是比较自觉地这样做的。我们每做一种练习，她注意朝自己追求的方向靠拢，有时，她不满意自己或别的专业舞蹈员做的动作，就停下来，直言不讳讲："我们这样不行，太知道肌肉怎么使用了，特别做作。"有时候居然用到"恶心"这种开着玩笑说出的词语。于是重做，反反复复做，连着几天做，直至找到感觉。

她对现代舞的认识和实践相对成熟以后，建立了这支相对稳定的训练基队和工作团队，使用她的方法进行训练。我配合着她，一面投入训练，一面插着空同大家交流。从我自己来说，是把练习之前、当中、之后的交流，当作另一层面的训练，思想的、心灵的、美学观念和精神领域的探讨和体察；当作人和人相互开启心智、激发灵感、鼓励和协作的方式；当作学习和尝试的机会。我也想更多地去认识和理解现代舞蹈，更多地认识和理解在这个现场实验之前不曾经历过的艺术方式。

要完成具体作品的话，我们就转入集中排练。文慧这些年去北美、欧洲和亚洲其他国家学习、排练、演出，身体前所未有地柔韧，筋脉能够打开到从前年轻的时候天天练功也没能达到的程度，她自己觉察到身体的确出现了奇迹。有时文慧很感慨地说起从前，似有深深的不堪回首的隐痛。参加现代舞《生育报告》排练的北京现代舞团的舞蹈员和舞蹈编导王玫说，1996 年，文慧给他们团做练习，她的动作还是硬硬的，很猛，中间和缓的东西不是很多，也持续不了多久，可是现在，文慧的身体里好像要什么有什么。

我第一次观看现代舞，是 1993 年，在北京保利大厦，金星和文慧几个人，演出金星的现代舞专场《半梦》。这是不是新时期以后中国大陆的人第一次在国内演出的现代舞个人作品专场，我不知道，触动我的是，我看到舞蹈员也是有思想的，当然这是基于我对舞蹈完全陌生，知识储备差不多等于零，基于往昔留给我的残酷记忆所造成的心理上的深涸距离。金星和文慧，以各自灵与肉的伸缩，在舞台上创造着时空里的可能性，创造着人的生息和肢体动静，一切混沌如初，是人在梦里才有的感觉。她们的舞蹈把人引向认识的艰难境地，使看舞蹈的人不知不觉地开始思想，感觉到生命在自己的躯体里涌动，而此时，浑脱的人性显现了……一股雨水从你的心里流泻出来，贮满了你的眼睛，恍然觉得舞台上的人就是你自己，你的内心世界和她的，在这个时刻融会贯通。这一切竟是因为舞台上的几个人，她们的头脑与她们的个体一起顽强地生长，你甚至看到，生长本身的与众不同。在整个欣赏过程，因为被舞台上的人们牢牢抓住，因为投入的欣赏，你已经由一名观众成为一名参与者。

喜欢她们的专心致志。我兴奋不已，那天晚上从十条回和平里的家，本来该打车迅速回家，孩子一个人在家睡觉，我担心他有什么麻烦，我们住一个大筒子楼，万一他出去上楼道里的公共厕所，梦里糊里糊涂找不着家、回不了家呢？但是我激动得不想一下子缩短这段路程，就这么度过那段时光。于是在心里为孩子祈祷、祝福，但愿这个美好的、星星躲在黑幕里的夜晚万众吉祥。我走着回去，十来里地的路，在黑夜里，在脚下，我奢望一步一步地走完它。当走进黑洞洞的北京城，发现有那么多窗户，那么多暖洋洋的灯光，那么多人尚未入睡，深夜的北京宁静、安详，都像是我的家，都像是我的家人。真是好，就如那个剧场作品像是你自己创造的一样。

几天后，文慧对我说，我们一起做吧。她说她想做的现代舞，是要非舞蹈者的内涵，要你的质感，要你带着自己的思想跳舞……她说，就是要你的生活本质、状态，要你对生活的理解。冯，你正合适。你是最合适的人选。这是一次令人愉快的谈话，但她的建议，我不能够当真。我离舞蹈实在太遥远了。现代舞对于我，就像我的一个

女友面对她八十几岁的父亲突然和一个年轻女子展开的婚外恋，同样不可思议。我跟舞蹈，那位女友看着年迈的父亲每天寄给浪漫情人一纸誓言，这些事情，中间隔着的距离，和距离产生的荒诞与威严，对我来说，不可逾越、不可捉摸。

文慧鼓励我，说我身上有种特别的东西，天然的、没有后天装饰的，是她希望引入她的排练中的。比如，舞蹈演员经常是往上拔，身体飘惯了沉不下去，她觉得我能够与土地相接，身心是安静有力的。文慧非常想要与大地靠得更近的东西。我说，我想拔拔不上去呢。她说，你别，别丢掉你的东西。她还想要我投入时的状态。可我觉得，我投入时整个看起来像个衰老的人，身心全都陷落进去。过去是忧郁，现在除了忧郁，还有陷落，沉浸之深已经不太容易拔出来了。听别人说话，或者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全是那种样子。幸而讲述者跟我一样也那么投入。于是我想，那时候我们是平等的。倾诉和倾听，都身临其境，心里的感受甚至分不出彼此，一样感同身受，能够传达、能够理解，并且不知不觉中已在承担。我投入时的那个样子，是文慧想要的吗？

不过还是心动了，我想可以试试。这些话，文慧已经说过好几回，1996 年底开始吹风，她说想请我做《生育报告》的编剧，也做舞蹈员。我听取了她讲的希望我承担编剧的职责，至于做舞蹈员的建议并没在意，跟我关系不大。一年后，她从美国回来。多次讲起她想要做的关于《生育报告》的作品，需要对女性、尤其是身为母亲的女性做大量采访，而我是她确定第一个采访的对象。她的生活舞蹈工作室于 1998 年 7 月开始了常规训练，同时为《生育报告》做准备。她告诉我，她还要从我身上发掘东西，我的潜质远远没有出来。以后的日子，她常让我就某一点做练习、做下去，比如，和一面墙发生联结。让我的身体与那面墙以自己的方式去接触，她要从中看我的理解，看我的身体对墙这一物体的实地反应。那一天，我正对墙壁，紧贴在墙壁上，真有点儿像我曾经掉进深水井里的情形。那是 30 多年前，我的两手紧紧扒住井壁，身体绝大部分没在冷水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头顶上的时间像死去了一样，等到比我大两岁的哥哥救我上来时，我已经僵硬地钉在井壁上，他使出全力才把我拽下来……我做这段练习时连自己的呼吸都听不到，也忘了文慧的存在。

我们的练习内容很多，而且每天会有变化，有时会放些音乐，每个人怎么理解那段音乐，就把舞跳成什么样。有时是几个人之间在动作上接受、传导、承接、发展……还有一次，训练间隙，她们利用歇息的时间打电话、接电话，我一个人觉得还有力气，就原地跑步。文慧看见了，说：冯，再做一遍好吗？此后，连着几天，为我增加原地不抬脚跑步。后来文慧见我坐着跑，觉得一种能量蕴藏在相对宁静的情境中，更有表现力，就把我坐着奔跑做进了《生育报告》。坐在原地摆动双臂，速度越来越快，从十几分钟，发展到后来的半个小时，直至耗尽全部力气，并且一边跑，一边叙述，持续不断，像回忆、像报告，语调平稳，声音不大，但很清晰……等我终于停下来，同伴们说，那个过程有一种让人不得不跟着你进入的魅力。而我说不出自己的感受……汗水印在眼睛里，确实生生不息。越往后，我练习时候做出来的很多东西，被她做进舞蹈剧场作品，成为不同作品的一些支点和架构环节。

到今天，我写作这篇文章的 2001 年 4 月，我们的训练场地换过好多次。偶尔没地方排练，我说来我家吧，她没做选择。在这之前，我感觉到因为场地的困扰，给她带来不小的压力，也提议过去我家排练。那是 1998 年冬天，一支二十几人的演员队伍，两个月以后，只剩下文慧和我两个人了，我们住得比较近，在我家训练，对我没有不方便。她说：最好不在家里，在家里人的身体是松懈的，状态不对。她出去找地方，跑过

不下十几家，甚至答应每周去给那里的学员上一次舞蹈课，以换取让我们一周使用半天排练厅。那时，我感到文慧是真爱这件事，即使只有一个队员。一个人真爱一件事，为这件事坚定不移、吃苦耐劳，在北京的寒冬为带领一个队员继续训练做尝试、做努力，这一切在我心里产生了影响。我比较在意了。她说的另一句话，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们每次去排练厅，总看见舞蹈演员用过的排练厅一片狼藉，大家二话不说先打扫卫生，使用完离开时保持排练厅整洁干净。文慧讲，在国外也是这样，芭蕾舞演员还有别的舞蹈演员，对自己的排练厅使用、糟践，不会亲自动手打扫，只有现代舞演员不作践场地。她见过的欧美和亚洲其他国家的现代舞团，都非常自觉地去劳动，人也很朴素，平易近人，不管他们的名声有多大。

我相信，这一切和现代舞的精神实质有关系。所以我风雨无阻地做了这件我爱的事情，全副身心进到里面，并从一次次排练中走过来，带着不同的原创作品，应邀在国内和国外的国际艺术节、舞蹈节、戏剧节，以及欧美亚多国的国家舞蹈中心及大中小城市传统历久的剧场和舞台上，与其他几位专业舞蹈员一起，从容而富有创造性地展开我们的“舞蹈剧场”。

在国内，金星的现代舞与文慧的现代舞不同。金星的舞蹈有更多的肢体挑战，技术含量高，讲求动作幅度和细节、动作的至善尽美；文慧的舞蹈剧场作品比较生活化或者说由外而内化，与舞者的现实处境有关，即带着真实的自己进入，排练和交流具有同等的重量。两位现代舞编导各有千秋，追求的高度难度幅度都比较大，她们是目前国内优秀的现代舞编导。现在，文慧越来越多地倾向做舞蹈剧场，舞蹈、戏剧、电影、装置、音乐等因素综合发展。就她已经完成的舞蹈剧场看，比如《同居生活》《生育报告》等，作品的表述临界于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具有很强的实验性，内部张力的确有点儿蛊惑人心。另一方面，文慧主张的现代舞对演员的素质要求说简单，也确实是这样，你心里有什么可以抒发出来；说苛刻也不为过，排练中，舞蹈员有时会感觉身心疲惫，心被掏空，就要承受不住了，而且，抑制和约束实际上存在于舞蹈员的艺术素养的根本之处，存在于作品的内外时空中。我以为，它不在于演员做了什么动作，而在于为什么身体有了这样的行为，“我”心里边的东西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反过来，为什么非得这样，不这样行不行呢……

就自身情况而言，文慧的舞蹈、舞蹈剧场，方式和传达，与我比较契合。我在舞蹈，也在尝试戏剧的表现可能，还有对于装置艺术出其不意的整饬。而我，本质上是个忧郁的人，愿意在阅读、思考和劳动中生活，心里面比较安静，有时候又比较好动，那是因为小学、中学、大学，充当过学校几种球类运动队的主力队员，真心喜欢体育运动。但文慧觉得，在排练厅，我动的时候，还是有点儿沉默。有好多次，文慧要求舞蹈员发出声音，她总是听不到我的声音，后来她跟大家笑说这件事，说那时“冯的声音小得除了她自己谁也听不见”。于是文慧让我出声，让我唱，甚至让我倒立的时候发声。

于是，我一点点打开自己。在肢体和心灵的修习中，一点点地找寻人原本的意义，存活的意义。

我的过去，就像白天黑夜，没有多少意义。

生活在白天和黑夜的时间太长，我不喜欢。

我说过，我的地方。风呼啸而过，房子外面的东西掀翻上天，挪到了别的地方，我们的心和眼睛也被摘掉，放逐到远方。但是几里以外的房子还是传来睡死的老人长一声短一声的鼾啸。天亮后，我们的眼睛陷进头骨里，我们的门窗陷进黄沙里。我和哥哥妹妹拼命喊，没有人听见。风倒是停了。我们的嗓子沙哑，一动就出血，于是用手抛，或者用铲子挖。高音喇叭的线和电线杆子被刮到蒙古国和苏联，战备防空洞和那些流浪

汉也全部消失，我们的天地死寂一片。我们完全想象不出父母此时此刻怎么样，我们在这边，他们在流放和监禁。风沙埋葬了一座又一座房子，人们常遗弃断墙残壁，拉大扯小，在看不见路的飞沙荒野中行走，想找到一间死了主人的房子。每回沙尘暴过后，沙坝下没有父母的孩子、或者没有孩子的老人，总有冻死饿死的，他们腾出来的房子谁抢占了谁住。后来，沙尘肆虐依旧。我因为放声高唱小常宝的“八年前，风雪夜……”被招进学校文艺宣传队，第二天我交回宣传队老师让填的表格，老师看到我父亲的名字，收回了想吸收我做宣传队员的决定。跟后半晌的风一样，这件事迅速刮过来、一下刮过去，天一亮销声匿迹。以后，我除了呼喊哥哥、叫唤妹妹，没怎么出过声，也没唱过歌曲。那些舞蹈，草原上的什么见到了什么的舞蹈，当时没来得及操练，以后再没往那种美丽方面想。

初中的时候，偶尔从文艺宣传队的教室经过，看到一些切断的动作和笑脸，我在脑子里拼接过这些开怀或者割裂的画面。我能连到一起的是他们的笑。我不太确定宣传队的同学跳舞时一直笑着是什么意思。书上说劳动创造舞蹈。劳动的舞蹈是有欢欣，但专注的基调被抽掉了好像不那么对劲。舞蹈过程立足专注可以避免简单概括、繁华图解，而笑好像帮助遮掩了不少回心不在焉，要不然演员下去以后对谁都是一副横眉冷对的面容如何解释？从头到尾欢笑，指向了单一的方向，昭示了单一的面貌，支撑生活和心灵的真实而集约的因素反而散落不见了，人性复合的血肉、魔魅的质能也被丢失殆尽。不是否认欢笑，欢笑没有什么不好，是说只有欢笑的舞蹈远不足够表达更多的东西，假如只是作为姿态和表情，欢笑也不足以映衬舞蹈。一味欢笑，使舞蹈简单化、表面化、形式化，而且舞蹈格局也有些机械化，再说，一味欢笑也不是舞蹈的全部呵，之所以欢笑的深入的根由应该是在现场，但是，欢笑被规定下来，现场发挥的余地就不大了，有余地的笑意，总能打动人。我想起，我母亲劳动的时候，还有别的人们劳动的时候，不尽是那种咄咄逼人的表情，那种用动作表达态度的模样。据我观察，劳动的人再苦再累，脸上也是平静的，人很专注，比如劳动了一辈子的米德格的奶奶，她唱忧伤的歌，脸上没有忧伤的表情，她爱的男人在她年轻的时候抛下她和他们的儿子远走高飞，但她忘不了，有一次男人喝醉酒抚摸她的脸，他流下了眼泪，因此，米德格的奶奶一生在哼唱一支歌子：“你的泪珠好比珍珠，一颗一颗挂在我心上。”

我不明白，笑那么厉害的舞蹈，是不是好舞蹈。笑，是不是单纯为了舞蹈发笑呢。笑那么厉害的舞蹈者，是不是真的高兴，真的喜欢正起劲表演的舞蹈，真的想那么笑，是从心里自然而然地笑出来，具有诚意和相当的稳定性。当时，我想：你在舞蹈里，怎么能一直笑并不是舞蹈里的东西呢？是不是你担心你的舞蹈不够打动人？不管你把舞蹈跳成什么样，你只管笑？直到 10 多年前，我的思路还停留在这样的地方。我看过一场歌舞晚会。那次，突然感觉到舞蹈演员的笑有时候不那么可靠，他们笑的时候思想和意识是游离动作本身的，那样笑法，感觉上只是想让观众看见演员，争先恐后地表演作为个人谁笑得更好看，而不是专注于自己的舞蹈在做什么，这个舞蹈是什么样的舞蹈，他对舞蹈有什么想法，在这个舞蹈里他想表达什么，他自己给予了舞蹈什么，这些内容基本看不出来。他和舞蹈的关系局限在外部，深入不到舞蹈的实质里面，演员和舞蹈之间没有建立起本质的关联。演员不承担作品的更多意义。

但我不知道，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舞蹈员，并在实践中经受锻炼做了比较自由、宽敞的舞蹈剧场的编创者和表演者，与舞蹈尝试着建立一种积极的实验关系。因由过往粗陋、偏颇的经验，

我差点儿失去体会个人和舞蹈、生活和舞蹈交往磨砺、相互协助、互为促动、萌生创造的机会。其实那些画面在我心里过滤了无数回，因为中间缺少环节去过渡、缺少内容去联结，画面之间思维混乱、沟壑横亘，贯连不到一起。后来我想，如果当初我能从容地站在宣传队的排练教室里面，没准儿以后就能连缀自己的想象？那时候虽然风沙侵蚀，但心里透彻，渴望被阳光浸融。但是阳光没有照到我。

我不知道那年在西藏拉萨跳舞，对我今天去跳现代舞有没有帮助，那是我第一次跳舞。大厅里响动着一支迪斯科舞曲，我肆无忌惮地跳，疯了一般，跳得全场的人都退下去，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掌声突起。在那之前，我和朋友们坐在一个地方，听他们说话、唱歌。有蒙古血统的裕固族青年诗人贺中吟唱了一首流传在西北地区的蒙古民歌，我听了，有点想哭，但又不是完全能够哭出来，心里的东西很简单、透明，源远流长，发不出哭那样的声音。我感到美好，就走进去跳了，跳得有些忘我，不小心摔倒了。摔倒了也是我的节奏和动作，我没有停下，身体在本能的自救运动中重新站立起来，接着跳。那个晚上，在整个舞动过程里有一种和缓而富有弹力的韧性，连接着我的自由。这是没有规范过的伸展，我的内在力气一点一点地贯注到里面，30 多年的力气，几个年代的苍茫律动，从出生时的单声咏诵、哭嚎，成长中心里心外的倒行逆施、惊恐难耐，到今天，悲苦无形地深藏在土地里，人在上面无日无夜地劳动……此时此刻，我在有我和无我之间，没有美丑，没有自信与否，只有投入的美丽。我一直跳，在一个时间突然停顿下来，因为我的心脏快找不着了。



排练舞蹈剧场作品《记忆》（左为文慧，右为冯秋子）

我对文慧说，原来我想，如果自己生的是女孩，不会让我的女儿学习舞蹈，但是现在不这么想，真能生一个女儿的话，一定先经过舞蹈训练。舞蹈也好，音乐也好，绘画也好，文学也好，所有的艺术，都是在心身里完成个体的长大成人过程，建立和生活、和人的良性关系，培育和建设发现的能力，创造性地实践心灵的成长。

但是，我还不能用语言说清楚现代舞。所以每一次排练，我随身携带一个录音机，它帮助我把更多关于现代舞的内容、特质，以及文慧的现代舞不同于别人的地方记录下来，帮助我把每一天的感受，每一种练习，甚至是那些过程里的某一个灵动，聚拢起来。希望有一天，我能比较准确地理解现代舞，可我不知道那是哪一天，那一天何时能够出现。

我想在未来做的事情，一是当编辑，一是写作，一是拍纪录片，再有就是做现代舞。一辈子可能就做这几件事。

这几件事，是我热爱的。但跳舞，确实是因为我悲伤。

图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

冠小兽是谁

2019年末到2020年初，武汉暴发病毒性肺炎疫情，医生们发现了一个攻击人类的新病毒，来势汹汹，态度蛮横，突然间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危险。这个新病毒的名字叫——新型冠状病毒。我们叫它冠小兽。



新型冠状病毒危害很大

危害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病毒有两个特点：
一、致死率高。
二、传染性强。

一旦被它袭击后发展成重度感染者，
人们就有可能失去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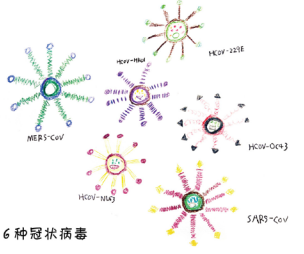


05

冠小兽的“冠”是怎么来的

当我们把冠小兽放在电子显微镜下观察，能看到它外衣上有向四周伸出的小突起，形状像国王的王冠，所以，被叫作冠状病毒。2020年1月20日，国务院已经批准把冠小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乙类传染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管理标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已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命名为COVID-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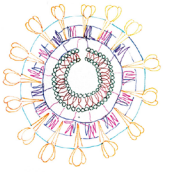
除了武汉发现的新型冠状病毒冠小兽外，还有6种冠状病毒也在危害着人类的健康和生命安全。



6种冠状病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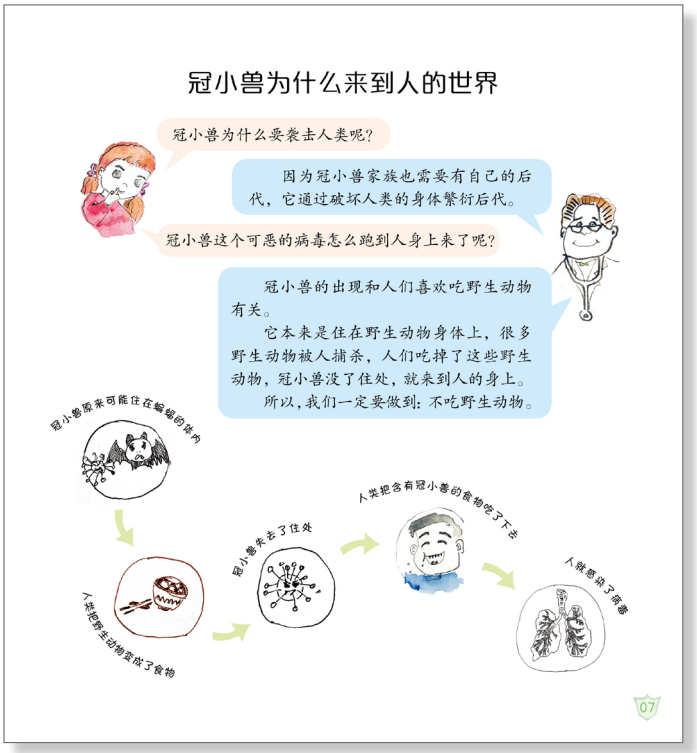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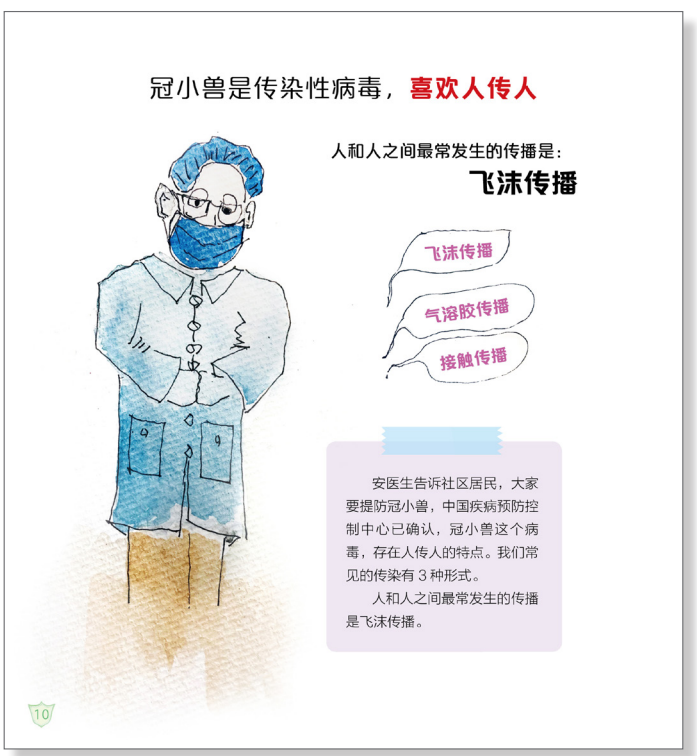
王冠



新型冠状病毒

06


冠小兽为什么来到人的世界
冠小兽为什么要袭击人类呢?
因为冠小兽家族也需要有自己的后代，它通过破坏人类的身体繁衍后代。
冠小兽这个可恶的病毒怎么跑到人身上来了呢?
冠小兽的出现和人们喜欢吃野生动物有关。
它本来是住在野生动物身体上，很多野生动物被人捕杀，人们吃掉了这些野生动物，冠小兽没了住处，就来到人的身上。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到：不吃野生动物。
冠小兽原来可能住在蝙蝠的体内
人类把野生动物变成了食物
冠小兽来到了住处
人类把含有冠小兽的食物吃了下去
人就感染了病毒
07


冠小兽是传染性病毒，喜欢人传人
人和人之间最常发生的传播是：
飞沫传播
飞沫传播
气溶胶传播
接触传播
安医生告诉社区居民，大家要提防冠小兽，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已确认，冠小兽这个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特点。我们常见的传染有 3 种形式。
人和人之间最常发生的传播是飞沫传播。
10

冠小兽最容易传播给 5 类人



第 1 类人 不讲卫生

不爱洗手、不讲卫生、大声咳嗽、随地吐痰。

第 2 类人 不做防护措施

疫情暴发时，没采取有效防护，出门不戴口罩。

第 3 类人 与发病患者有接触

①与发病患者共同居住、学习、工作或其他密切接触；
②诊疗、护理、探视发病患者时未采取有效防护；
③与发病患者乘坐同一交通工具并有近距离接触。

第 4 类人 有基础病或先天免疫力差

第 5 类人 免疫力不成熟的儿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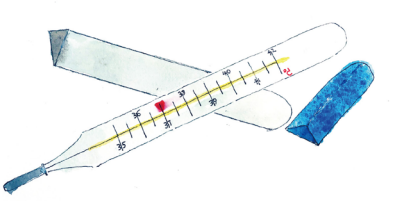
11

感染上冠小兽有什么症状

怎么知道我们被冠小兽袭击了？

人体感染病毒时，自身免疫系统会立刻行动起来对抗这个病毒，对抗的第一个反应就是炎症反应，典型症状是发热。

除了发热，还会有其他症状，这些症状有**轻微**和**严重**之分。



轻微染病的表现

可以有发热或无发热，可能无呼吸急促等症状。

染病严重 4 种表现

肺部发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肾功能衰竭以及死亡。

12

要想不被冠小兽袭击，几个地方不能去

2020 年 1 月份有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人们大规模返乡、走亲访友、参加大型聚会，冠小兽就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这类地方最容易暴发感染。这个时候，有几个地方不能去。

不乘坐公共交通去病毒感染流行区 。

不去封闭、空气不流通的地方，比如电影院、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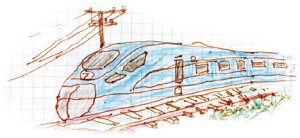
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买食品。



不去人员密集的地方买食物



不去电影院看电影



不去疫区走亲访友

防范冠小兽，注意 3 件事



在阳光小区，安医生告诉大家 3 件事。





第 1 件事：没去过疫区，不代表大家是安全的

冠小兽传染性非常强，有 14 天潜伏期。只要你身边有人近期去过疫情暴发区，你和 TA 有过接触，就可能染上病毒。有以上情况，必须隔离 14 天。

第2件事：出现咳嗽、发热，不一定是感染了冠小兽

很多人出现咳嗽、发热等症状，变得特别紧张。一旦出现咳嗽、发热就是感染冠小兽了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初期和感冒很像，我们如何区分？

如何区分流感、普通感冒、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流感	普通感冒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高热	鼻塞	发热
咳嗽	流鼻涕	乏力
咽喉疼痛	打喷嚏	呼吸困难
肌肉疼痛		干咳
		肺部感染



16

第3件事：4类人需尽快自我隔离

1. 疫情暴发前后去过疫区；
2. 疫情暴发时在外地旅行；
3. 和患者一起参加过重大节日聚会；
4. 密切接触者的家人，尤其是家中老人、儿童、体弱及患病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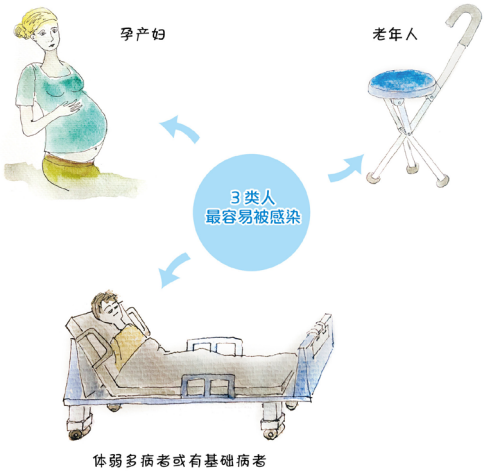


对密切接触者采取严格的医学观察等预防性公共卫生措施很有必要，也是国际社会的通行做法。大家要积极配合，才能联合起来一起战胜冠小兽。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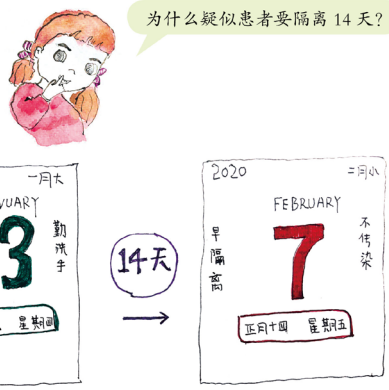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3 类人最易感

目前发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期间，有 3 类人最容易被感染：老年人、孕产妇、体弱多病者或有基础病者。



一旦怀疑被冠小兽袭击，先隔离，再检测

身体发热、乏力、咳嗽、呼吸急促，不要慌。先隔离，14 天后没有持续发热才相对安全。



冠小兽这个病毒，在人体内潜伏期大约两周（14 天），必须过了潜伏期，人不再持续发热，才是相对安全的。

疑似被感染，要做好 4 项自我检测



测体温

看腋下体温是否≥ 37.3℃；



看症状

是否有咳嗽、气促等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



回想近期出行历史

是否近期去过疫区旅行或有短暂居住史；



回想近期接触的人群

发病前 14 天内是否接触过来自疫区并有发热、呼吸道症状的患者。

21

疑似感染冠小兽，认真做好 4 件事



22

打败冠小兽，三是好好护理口罩



疫情发生期间，除了佩戴好口罩，还要护理好口罩。要做到两点：一要，一不要。

要定期更换。外科医用口罩和一次性医用口罩，佩戴不要超过 4 个小时。

不要反复清洗。外科医用口罩和一次性口罩，不能反复清洗使用。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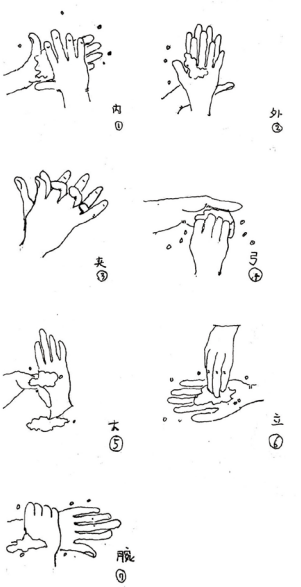
防止感染冠小兽　记住三字歌



23

打败冠小兽，洗手七字诀

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洗手，一定要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用流动的水冲洗，每次洗手不要少于**20秒**，洗干净手后不用污浊的毛巾擦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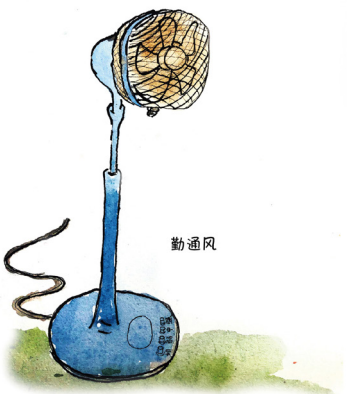
洗手七字诀

1. 内　掌心对掌心
2. 外　掌心搓手背
3. 夹　十指交叉洗
4. 弓　交替洗手指
5. 大　揉洗大拇指
6. 立　立起来洗指尖
7. 腕　交替洗手腕

27

提防冠小兽，勤通风、多消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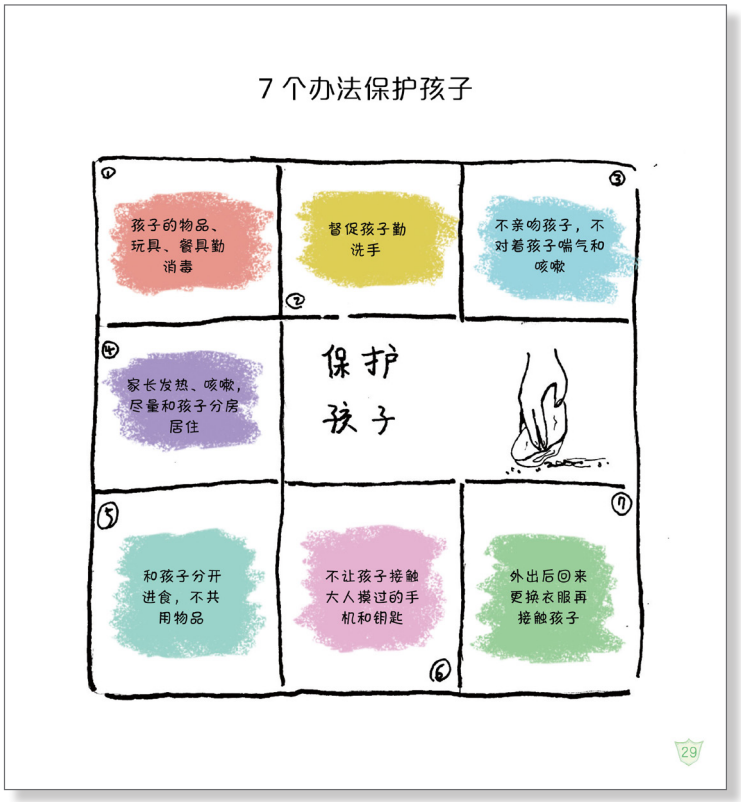
每天多次开窗通风，保证环境清洁和室内空气新鲜。
用消毒用品在家做全面的消毒。


勤通风


75% 家用酒精


家用消毒液

28





摘选自《2020号小火车打怪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护》
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
作者：圈圈

游学台湾

文 房南希



作者简介

房南希，生长在广州，本科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目前就读于台湾清华大学服务科学研究所。

关于台湾初印象，我会想到曾经与朋友一起的台湾环岛行：沉浸在夜市的嘈杂小店中享受热腾腾的香气；在垦丁骑摩托车穿过急风大道，身旁是清蓝的海湾；或是遇到从台湾来的人，他们的言行与我们那么相似却又不同。

正是这些含混不清的台湾印象，使我做出了申请到台湾学校读研究生的决定——潜意识里，我想走近一步去了解它，用更长时间去探探究竟。我在递交读研申请书的自述中写道：台湾印象于我是活泼、友善、人本的，对于不一样的治学氛围，我好奇而向往。

我在台湾就读的是台湾清华大学，和北京清华有着同样的校徽校训，校址在新竹，一个旅客相对稀少、安安静静的城市。在时间迈进秋爽的9月之前，我已抵达那里，开始一段全新的生活旅程。在校期间，我体验到了更细致和琐碎的台湾，体验到了喜怒哀乐感情毕现的台湾。

论及文化的不同之处，语言最易显端倪。众所周知，台湾人惯用繁体字。作为文化的载体，繁体字最直观，可往往给人带来熟稔又相离的感觉——比如，与简体字同样的发音，繁体字经常令人两眼迷糊，认不清脸，下不对手；对同一种事物的不同叫法，也会造成一些有趣而无伤大雅的障碍。和台湾同学聊起这些，他们会辩驳说，简体字，尤其是那些原本“字里有字”的繁体字被

简化后，使意义辨认变得困难。因此，每当我把“遊客”的“遊”字不小心打成了“游”字，同学看到就一定会纠正：“又不是在水里面走路，怎么可能是水部（三点水），应该是走部（走字底）啦！”如此种种，不无道理。仔细想来，的确是自己无视了传统汉字必须遵循的规则呢。

此外，台湾同学多数都使用注音符号打字，这样打出来的字看起来有种“被拆散了”的感觉。它们和汉字一样占两格位置，整齐地排列在一起，清秀醒目。用符号本身来代替一些发音简单的字，用起来省时又有“梗”，这种打字法很受台湾年轻人青睐。如果你看不懂注音打字法，体悟不到其中的精妙之处，那么你对台湾年轻一族的文化体会可能就不到位了。

每逢周末或节假日，我特别爱往台北的创意园区跑：那里有很多有趣的独立品牌小店，也常常有各种类型的主题展览，是假期里必不可少的一大元素。我最喜欢清晨起床先去跑个步，后返回宿舍洗头洗衣服，接着读材料或写报告，逼着自己认真生活，努力工作，比在工作日还有规划。快到中午时，将烘干的衣服叠放整齐，换衣服化妆，迎来真正的周末时刻——这个转折点必须要慢慢过渡，悉心投入，全情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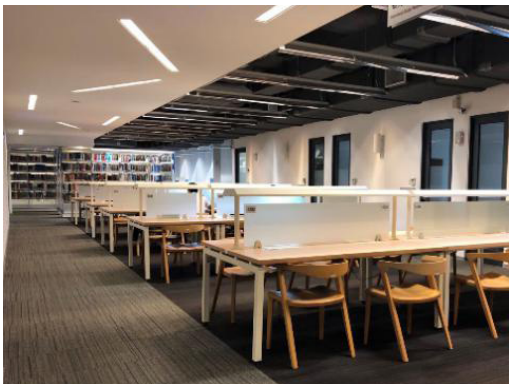
上午的紧张有序就是为了下午的身心放松，整个人无拘无束更自由。

在阳光明媚的天气里，正午出门相当舒服，暖暖的阳光铺在身上，新竹的微风轻拂面庞，温度宜人。去台北坐客车最方便，学校门口就有车，可以刷一卡通或者悠游卡。我登上座位宽敞带有充电口的大巴，插上耳机听着歌，悠闲地看看风景或者干脆睡个午觉，别提多惬意了。一个小时后，在终点的台北客运站下车，转坐捷运，很快就能到达目的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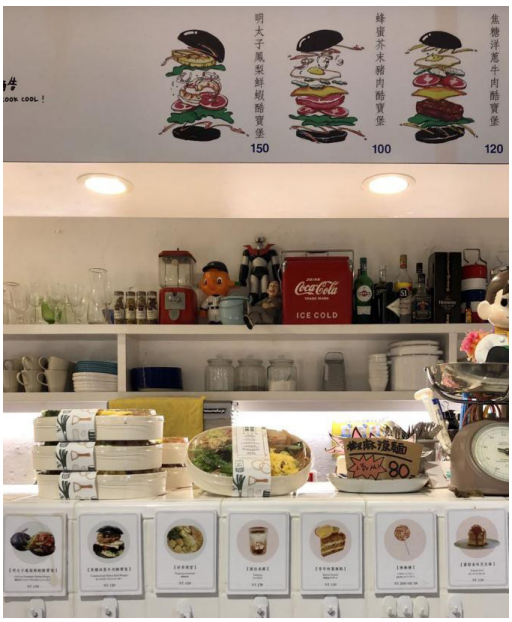
创意园区的建筑风格和文化主题，既保留了国学传统，又在日据时期过后留下了日本的文化踪迹——许多公共设施和标语，或是货架上商品



台湾清华大学台积馆



台湾清华大学图书馆自习区



华山文创园里用手绘插画打招牌的小吃店



好心的孙爷爷指出所在的位置



校园内的晨运老人

的包装，以及散布各处叫不出名字的物品，都展现着这种微妙而和谐的文化共存特征，进而演化和发展出了全新的台湾风格：珍惜和爱护拥有的一切，以热情尽可能地创造出新意。我经常会随着心情而非特定目的去创意园，也是因为这种氛围很浓厚，想在那里多逗留点时间而已。

平日里，台湾人与他人的相处，是更温和亲近些的。即便是走在路上遇到的那些擦肩而过者，我们都会发现，他们的眉间少一分硬感，对起话来也一定多是客气的语调，不太会被冷眼防备。然而有一次，我却被公交车司机不留情面地教训了。台湾公交车只有一个门，这个门同时管着上下车，而我没避让要下车的人就准备迈上去，干扰了公共秩序，当即被公交车司机训斥：“年轻人怎么这么没礼貌！”在台湾，有许多类似上下车秩序的社会规则，都由大家默默地认真遵守着。在这样的环境里，多说一句谢谢，多让他人一下，无须提醒，人人都会践行，已成为潜移默化的习惯。久而久之，我也能融进台湾人的平和生活，优哉游哉地享受其中。

由于参加一场比赛，需要了解银发族老人的运动习惯，我于一个早晨到学校旁的十八尖山做实地考察，因为那里是周边老人运动地点的首选。我在山的入口处迷了路，又急又慌，满眼都是杂乱的植物丛，也对不上地图信号。这时，一位老人从一个草丛岔口朝我这边走过来，他穿着宽松的运动短袖和束脚裤，薄外套系在腰间，戴着耳机，面无表情地盯着前进方向快步走着。本来平日我不太敢在路上和戴着耳机的人搭话，总觉得耳机给本来就难以得到的回应又添了一层难度，更担心向对方问路时因冒昧打扰而被回报以不耐烦的情绪。

但那天，我只能硬着头皮迎上去。老人家听说我要上山，便把耳机摘了挂在脖子上，很干脆地说路有点难找，要亲自带我走一遍。我跟着他，走向他来时的方向，一路上听他聊这座山、聊学校、聊在路上遇到的朋友，对我的诸多发问，他也都认真回答。从遇到这位老人到找到环山路口，也不过六七分钟，但一路对话的感觉像是在和自家亲戚唠嗑。他还沿着环山路走了很远，只是想带我找一个方便点的下山口，途中我对耽误他的时间表示道歉，他没有作答，只和我说走到前面的亭子那里，站在最高一截的楼梯上便可以看到完整的远山山顶。

于是，一个萍水相逢的热心人，令我那个原本要扫兴而归的早晨重生。生活中对他人的善意、对生活本身的关注，以及遇到挫折时开朗和乐观的心态，往往是我们生命中精彩动人的剪影。游学台湾，令我感慨颇多，收获满满。

一个人的九十年代广州志

文 浪子（诗人、作家、独立策展人）

我应该怎样开始，叙述广州这样一座城市？老实说，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无论我如何穷尽一切辞藻，所能说出的亦不过冰山一角，犹如当下年代里的种种碎片。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座不一样的城，概莫能外。

原谅我所写下的仅仅是一己际遇中的一些碎片，而不是它的历史、它的人文、它的传承。

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广州土著，即便在这里我已经生活了二十多年。在心里，我还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位异乡人，大地上的异乡人。有的时候，我算是一个参与者，更多的时候，我只是一个旁观者。我无意证明，它是个人的或普遍的，我只知道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事情，也会发生在所有人身上。

在路上，我所看到的风景、所经历的人事已忘得差不多一干二净了。当初的梦想和雄心壮志，也早已在生活的重压下灰飞烟灭不知何处。而人世总有意外，有那么一些记忆依然存留，抹不掉、挥之不去。

上篇：酒吧志

如同黄大炜在《秋天 1944》里所唱：“你希望我陪你，回到那一年的上海。”现在，让我陪你回到 1994 年的广州——东风东路的红太阳酒吧，进入这座城市的肺。记得它开张的时候，《羊城晚报》报道的标题就叫《东风东升起了红太阳》。

这是我记忆中泡的第一间酒吧。

早期的广州酒吧很有“底层”的色彩，散布于城市的边缘街角，粗糙得颇有质感，几乎收容了全城的精神游荡者。当时还没有二逼青年、文艺青年、普通青年的分野，酒吧就是流浪记者、编辑、广告人、歌手和密谋家、文人、艺术家、妓女以及各种可疑人物出没、接头与聚集之地。在通信工具尚未发达的年月，酒吧的功能与今天酒吧的功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言。我的朋友祥子说，那是广州酒吧的黄金时代，你可以从一个酒桌游荡到另一酒桌，和不相识的人纵情谈论美酒、女人、文学和艺术。一群人试图通过酒来相互取暖，通过短暂的放荡来感受流浪汉般的自由，仿佛抵抗道德民兵的狙击。

红太阳的标志，是进门的那堵墙上，大大的一幅画面里，有一个扎着小辫的黑人。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伟大的 Bob Marley，第三世界的超级巨星、雷鬼音乐的鼻祖。

那时候，红太阳里永远人头攒动，人们挤在拥挤的大厅里，跟着音乐舞蹈，没有空调，只有一台风扇在头上转圈。我记得，High 到高潮，手舞足蹈的外籍 DJ 会把所有的灯关掉，留下一个闪灯在暗夜中闪亮。

我在红太阳酒吧那天，闷热，恰是音乐人张萌萌策划、制作南方第一张摇滚乐唱片《南方大

摇滚》的首发式当晚。捞仔、张全复、毕晓世等一干音乐人及参与填词的、后来成为21报系发行人的沈颢在一旁热烈地喝酒；我和来自鲁迅故里的诗人蒋立波、江城以及一早在音乐圈打转的诗人沈绍裘以及当时在《南方周末》做记者的诗人陈朝华坐一桌。在我叫了两箱大支装老珠江啤酒之后，朝华兄率先不胜酒力，光荣地醉卧在30路公共汽车总站对面的马路边上。

我所认识的泡吧的人里，泡过西部牛仔啤酒牛扒城的音乐人特别多——几乎所有人都在那当过弹唱歌手。也许亦从一个侧面说明，广州的地下音乐是从民谣开始的：王闻、杨一、方辉、曾向华、林羽……更多的人我叫不出名字，只是因为《粤港信息日报·粤港周末》的存在以及音乐公社的集结与四散才知晓的。其实，它是“红太阳”的前奏曲，参与其中的《粤港周末》名记江南藜果，在不多久的后来，创立了水边吧，把许多气息传承了下来。

江南藜果说过：“在广州，我从泡酒吧起，经写酒吧，到开酒吧。无可救药。”为什么自己跑去开酒吧？他说，“我喜欢酒吧。而我从前喜欢的许多酒吧变了，我不喜欢去了，就自己开一间。”

水边吧在天河立交五星级厕所旁的臭水沟边上开张还不到一个月，广东电视台就以“水边吧”为主角做了一个广州文化酒吧的专题报道，不久还上了CCTV。它主打的酒，正是绍兴老酒。在广州温老酒时加话梅煮，可能是藜果兄首创，反正我最早是在水边吧喝的。在里边坐着，常会听到客人吆喝：“掌柜的，温一壶老酒。”况且，店里真有“孔乙己”牌茴香豆供应，还有客人学着鲁迅小说里那老兄的调调，来句“多乎哉，不多也”什么的。

我在水边吧经历过两件忘不了的事情。

一件是，酒吧常客阿俊深夜喝多后与一客人打赌，大冬天的一跃跳下边上好几米高的臭水沟，神奇得一点儿事没有。因何缘由两人打起赌来，已然完全无法记起。

另一件，事涉写过歌曲《十二座光阴的小城》的诗人沈绍裘。有天，他特意跑来广州大道中289号找我要请我吃饭，我由了他去。饭后，我们一同上水边吧喝酒、朗诵诗歌。记得当天没了老珠江啤酒，我付钱让店小二去楼下扛了一箱回来。凌晨2点了，我提议大家散吧、散吧，得上班呵。当时，我在《南方都市报》做记者，天天得跑社会新闻呢。平时因住得远、常早退的老沈很奇怪，还在。到了楼下，我与老沈开玩笑：“变性啦！今天你老人家全陪到底！”老沈避着众人，把我拉到一边说：“浪兄，可否给我20块坐摩托车回去？”我才知道，这老兄是穷尽口袋请我吃的饭。



早期的广州酒吧很有“底层”的色彩

我被感动得一塌糊涂。此后，只要老沈来找我，从不让他埋单！——原因无他，当年他离了婚，一个人带女儿，枯苦。多年后，他还与我们一班共同的朋友说："我赚大了！浪子一辈子都会请我吃饭。"现在，他与一空姐再度成家后又有了一女儿，幸福着呢。偶尔，我们饭聚时他还是会主动结账的。

我带过天南地北许多人光临过水边吧，估计有好几百人。2006 年秋天，我带着去的小妹妹莹，如此描述过她经历的场景：

座中大多数人都兼备表演者与看客双重身份。江南藜果的诗朗诵下来后，坐在我身边、祖籍雷州的王闻接着就走上表演台。王闻成功地掀起了当晚的高潮，他在吉他的伴奏下唱了很多从前流行的改编歌曲，令下面的客人们很 High。每一首歌都令那些中年孩子们欣喜不已，王闻将他们带进了以往的美好回忆。里面最 High 的一个人就是江南藜果了，我听到他对一个人说了不止三次"美国哪有这么好的改编歌曲，连个盗版碟都没有，你还是回广州吧"。

我就只记得其中的一首《你老婆对我说》，听说这是当年暨大艺术团团歌。

王闻之后，可能是到了午夜的缘故吧，这群老男孩们唱的歌曲也开始黄黄的。其中有个叫作彼德的唱的民歌最多，听说他去过贵州与海南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采过风，具体情况我忘记向浪子哥打听了。他今晚唱的歌词都与鱼水之欢甚至男女生殖器有关系。不过因为他演唱时神情严肃，所以艺情远大于色情，听起来也不觉得很尴尬。他的语言天赋忒棒，会唱很多地方的语言，还能用潮汕话跟我进行简单的对话。

有个叫作小李的八十年代后生在彼德下来后抱着吉他上去了，这个人应该是当时最年轻的表演者。小李最初弹奏的《两只小蜜蜂》是喝酒猜拳的酒令，歌词非常简单：两只小蜜蜂呀，飞在花丛中呀，飞呀、飞呀，左飞飞、右飞飞……

歌曲被小李分成 5 段，演绎了从畅饮到醉酒的全过程。第一段非常欢快，似最初的畅饮，接下来那一段声音高亢，并且配合扫、切、滑弦等吉他手法，可见猜拳者喝得甚欢，第三段节奏缓慢，声音也略带苍凉，一段吉他独奏后"人要是这么活就好了"的旁白，道尽醉者心中无限事，令我诧异万分：一为曲子的急转直下，一为小李的创造力。

——到我了！到我来说说，在水边吧的她者描述里说到的各式人物。

王闻，广州第一代民谣歌手，出版过唱片《男人四十》等。当年他有一个心愿，是拥有一个录音棚，像家一样的，他会天天泡在里面，不出来，做他心爱的音乐，让人们了解他的音乐，不为钱。后来这心愿在老家实现了，他录制过许多雷州方言音乐，广泛传唱于当地。2010 年年初，王闻兄回到广州，说是准备重新做一个歌手……最近，王闻兄又出版了新专辑，重又活跃在各种音乐现场。

彼德，广州第一代文艺搞手，咸水歌王，还是个好厨子。他的家，毫不夸张地说，就是城中文艺男女大本营！常宽、黑豹乐队、窦唯……还有王菲还叫王靖雯的时候，以及尚未出名前的徐静蕾，都住过他那儿。2012 年夏天，彼德兄干脆奋身下海，开了间名为"读梦空间"的酒吧。

最后出场的小李来自广东唯一的海岛县南澳岛，后来他在 2008 年组建了一支叫"玩具船长"的乐队，担纲创作、口琴 / 手风琴、吉他和主唱。操着潮汕南澳岛方言歌唱的玩具船长——我认为它是近年广东进步至神速的两支乐队之一，另一支是来自海丰的民谣军阀五条人乐队——它更像是我们现代生活里一本没舍得丢弃的旧相册、一部渔民与大海之间的电影，那些咸咸的一幕再原汁原味还原给我们。2012 年 5 月 25 日，乐队发行了新专辑《大岛小岛，咸咸就好》。

水边吧现在还在营业着，在暨南花园小区一幢居民楼的一楼，这些年来以创作、演出实验吧剧闻名。

作为老板的江南藜果除了与酒吧、与我们一同变老，结了婚，还有了女儿江南穗。现在的水边吧，依然是城中文艺青年的聚集处，每月7号，还有专门的诵诗会。只是当年的酒客，大多变成了路人；如今的来者，是不是理想仅存的年轻男女就不知道了。

说不完的广州，说不完的酒吧。比如枕木，因为木子美的故事暴得大名，但是谁又知道，它还是一道下酒菜的名字？手撕枕木牛肉，酒吧的招牌小吃，据说是正宗丽江师傅的做法：一樽樽有若缩细版枕头的烤牛肉，吃法就是将枕木用手撕开一丝丝，沾少许辣椒粉，入口香脆，味道特别。

最值得一提的，是一间叫“凹凸”的酒吧，它曾经是广州文化人、媒体人扎堆的地方，也是南方城市沙龙的地标性场所。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它被关掉了。香港中文大学有一位博士生，正在以它为主角，写一本记述发生在凹凸酒吧身上的种种事情的书。一间酒吧即将拥有一本传记，我想这已经堪称传奇。

中篇：诗歌志

在中国诗歌界，无论是“70后”“中间代”的横空出世，还是“女性诗歌”的兴旺、“完整性写作”的倡导，都无法绕开黄礼孩这个名字。毫不夸张地说，有黄礼孩这样认真地写作、踏实地做事的诗人，是广州之幸，更是诗歌之福。正是出于主编黄礼孩对诗歌与人之关系的深刻体味，才造就了中国第一诗歌民刊《诗歌与人》。

来广州的诗人，设若没到过沙河顶一带，不是说遗憾，至少也是失色的。《诗歌与人》编辑部，就隐藏在沙河顶广州画院八楼一个简陋的房间里。1999年年底，黄礼孩在这里创办诗歌杂志《诗歌与人》，在10多年后的今天，其重要性已水落石出，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类民刊，这个评价已然获得公认。沙河顶由此而来，成为一处新的“诗歌麦加”。

在此之前，广州的“诗歌麦加”不在这里，而是在老牌诗歌民刊《面影》那儿，在主持它的诗人江城身上。说到广东诗歌，不能不提《面影》；说到《面影》，不能不提江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内诗歌界，《面影》是南方诗坛一面引人瞩目的旗帜，对现代诗歌影响深远的《诗歌报》那些年在提及民刊时肯定要提到《面影》。而江城，是让这面旗帜飘展的那个人。因此，江城和《面影》，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十多年前我就说过：全国各地来的诗人，不管有否见过面，只要是知道对方的名字，到了广州就一定会找江城报到。江城就是天南地北的诗人们的公共汽车（迎来送往）、旅店（住所安排）和酒馆（以酒会友）。写诗的人，没有喝过江城的啤酒，就不算真正来过广州。

在羊城东风中路大石街一个叫郑心发的青年人家里，啸聚着一群被诗歌的烈焰灼红了双眸的诗人。……那是1986年5月，在南方，这该是文学年景的最后一个季节。

《面影》的发起人之一、现供职于《民营经济报》的潘铭萱描述过它最初的时刻。在最初的一群纷纷他去后，《面影》一度沉寂。

1990年，江城的加入使《面影》重新活跃并坚持了下来。在江城的主持和苦心经营下，《面影》成为广东青年诗人们最热心也是最爱护的诗歌阵地，它的活力和影响力不亚于任何一份正规出版的广东报刊，它培养了一大批青年诗人。目前活跃在国内诗坛的数以百计小有名气的广东诗人，大多在《面影》上露过脸或在其中汲取过养分。

况且，《面影》的视野并不只限于广东，与各省区横向交流的广泛与深刻，使它的水面变得更是辽阔，全国诸多优秀诗人的作品都在此亮过相，如陈东东、马永波、肖开愚、翟永明、小海、纪少飞、藏棣、非亚、叶舟、李亚伟、张执浩、秦巴子、海上、阿翔、卢文丽、伊甸等。藏棣的《在埃德加·斯诺墓前》、杨克的《在商品中散步》、马永波的《诗艺》等一批重要作品，更是在《面影》上首发才流播开去的。

在高度商品化的广州，《面影》的存在是令人惊奇的。这个没有纲领性文件、没有统一的美学宣言的散漫的群体，只是为了共同的诗歌理想走到了一起。已经从《南方都市报》副总编辑、总经理任上转往搜狐网任总编辑的诗人陈朝华，早在 1998 年 11 月号的《广州文艺》这样描述过：

他们是诗歌写作的实践者，没有功利目的，不以诗歌为安身立命的手段，只是一种生命的内在需要使他们坚持“内心的写作”，对诗歌怀着一种敬畏的赤诚之心，比那些大肆宣扬自己除了诗歌一无所有的人的“虚假悲壮”更让人觉得自然和可亲。

在这篇散记 20 世纪末广东青年诗坛的文章里，陈朝华把江城喻为“广州青年诗坛的守灵人”，我以为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面影》这个集结和呈现的窗口，散兵游勇的广东青年诗坛相信只会更加无序与零乱。

1997 年年底，江城陷入了一场有心栽花的恋爱。想不到同时沦陷的，还有坚持了整整 11 年、刚刚出版了 10 年纪念专号的《面影》，而当时却没有一点迹象……1999 年 8 月，江城还拉上诗人祥子、陈珂、黄礼孩和我，到散文作家陈小虎在石牌村的家看稿，并编好了新一期的《面影》，记得我们还专门为因车祸早逝的诗人吕庆秋编了个纪念小辑。后来，因为大家生存的压力和由来已久的散漫，也因为主持者江城在忙着告别单身，已编峻的新《面影》胎死腹中。

那年国庆节，海南诗人纪少雄、纪少飞兄弟到广州度假，温远辉、江城、陈小虎和我等一拨人聚集在华师招待所谈文论诗。就在那天晚上，我提议编一本广州诗人的合集，作为 20 世纪的告别。当时我们就拟好了名单和安排了机关事宜：江城、世宾、东荡子、温志峰、巫国明、黄礼孩、浪子，合七人；全书由温远辉统稿并序，陈小虎写后记，广美毕业的雅高负责封面设计。后来，书名几经争持不下，是温远辉定了《如此固执地爱着——广州七诗人诗选》的名字。现在回头想想，我们这群与《面影》颇有渊源的诗人，一次不经意举动，冥冥中竟成了《面影》诗群最后的集结，在新世纪的曙光莅临之前，亲手拉下了《面影》的帷幕。

无心插柳的是，《面影》的结束或多或少催生了黄礼孩去创办目前在诗界有巨大影响的民刊《诗歌与人》；《如此固执地爱着——广州七诗人诗选》则有意无意领了一回潮流——2000 年以来，黑龙江诗人张曙光、桑克、冯晏等结集《九人诗选》；福建诗人康城编《漳州 7 人诗选》；湖南诗人远人编《湖南诗人 6 ＋ 1 诗选》……一大批诗人以地域的名义结集亮相。

几乎在黄礼孩编辑《诗歌与人：中国 70 年代出生的诗人诗展》第一回展、第二回展和《诗歌与人：中国大陆中间代诗人诗选》的同时，2001 年秋我们在广东省作家协会郭玉山、温远辉两位师长的大力支持下，差一点就创办了一本拟名为《南方诗志》的诗刊，并进行了组稿、编辑、排版工作，万事俱备，只缺刊号。后来，因为这样那样的官僚原因，此事不了了之。

当时在澳门留学的广州诗人温志峰听闻此事夭折后，与在澳门大学任教的诗人姚风说起，并通过姚风找到了澳门理工学院院长李向玉博士，

取得了他的支持。李向玉博士响应我们的建议，以该院中西文化研究所的名义、拨备经费与广东省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联合创办一份诗歌刊物，这就是《中西诗歌》的由来。

我设置了《中西诗歌》杂志最初的架构、参与了最初的组稿与编辑，以及承担了此后 3 年的执行编辑工作。后来，我因个人原因选择淡出，是诗人世宾、黄礼孩接手做执行编辑工作。那时，澳门的合作方已由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转到澳门基金会。不过，澳门方面出资金、广东方面编辑出版发行的模式一直没变。到今年，《中西诗歌》已然坚持了 13 个年头，它从半年刊到季刊再到目前的双月刊，对这样的一本半民间性质的诗歌杂志来说，实属不易。

夭折在筹办期间的《南方诗志》留下的唯一成果，是我和世宾、安石榴等人组织的一次对话，旨在梳理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广东诗歌创作状况，后来发表在《中西诗歌》创刊号上。也因此由头，在 2006 年年底出现了 21 世纪以来广东诗歌最重要的集结：完全凭籍民间的力量，我和温志峰、世宾、黄礼孩几人主持策划的《出生地：广东本土青年诗选》《异乡人：广东外省青年诗选》两书，一网打尽近 40 位生活在广东、活跃在当代诗坛的青年诗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至今为止这两本书依然是窥视广东诗歌整体状况最好的选本，别无他选。

而《诗歌与人》在主编黄礼孩的长达 10 多年的坚持与努力下，已由一本单纯的刊物，衍生出“诗歌与人奖”——包括颁奖典礼、朗诵会及诗歌节一系列活动——以及相关书籍、专号的持续出版，使得《诗歌与人》持续对当代诗坛造成全方位的震撼。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谢有顺说：“在一个唯‘物’是从的时代，黄礼孩及其《诗歌与人》的存在，就像是一个神话。”

2010 年 12 月，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明飞龙所著《诗歌的一种演义——〈诗歌与人〉研究》由九州出版社出版。此书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民间诗刊的整体面貌为背景出发，就《诗歌与人》的格局、编辑理念、人文立场、诗学建设、影响力等方面去探讨，试图勾勒出《诗歌与人》的整体面貌。在书中，作者还采访了诗歌界近 100 名诗人，从旁观者的眼中去看《诗歌与人》的内在律动。这是第一本关于民间诗刊的研究专著，它以《诗歌与人》为实体，映照出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整个中国民间诗刊的镜像。

黄礼孩，正如他的名字一样充满孩子的天真和想象，是一位纯粹的诗人，他将生命中最美好的青春奉献给了他热爱的诗歌事业：“在广州，我越来越感觉到编一本民间诗刊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尽管在这一过程中我做了很多努力，可是今天回头看看，它只不过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对于我来说，我编民间诗刊，是对我行将逝去的青春岁月的纪念，是一个人的民间，是一个人对生活梦想的寻找，是一个人生活在广州的一种方式。”

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黄礼孩，至今还单身。难道他完全忘记这个世界还有一种同类叫姑娘？按理说，他也一把年纪了，该找一个女人了。可从身边走过的女人，他没有留下一个。偶尔，我们会取笑他：一个人不能太完美、太出名，要有一点缺陷，这样才会好找女人。

诗歌是一种病，染上了就再也别想离开。不管多少年过去，我想生活在广州这座城市的诗人们的诗歌道路还将继续，而没有停下来的念头……

下篇：搬家志

欧内斯特·海明威《流动的盛宴》的题记这样写下：“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对于广州来说，这样的说法我想也是合适的。

有人说：温和、包容、自由、平等、平民，是广州的城市精神；又有人说：广州市民普遍以广州为荣；还有人说：离香港近，有事没事都可以去透透气；更有人说：离北京远。

爱的理由总是相对的。而我独爱广州的，是它有烟火气！这是人间的、现实的、可以托付的城市。

我在广州这些年，把我对广州的热爱表现在连续的搬迁上面：从这条城中村搬到另一条城中村、从一间公寓搬抵另一间公寓，在不断的搬迁中寻找自己。正如我的朋友安石榴所说："很多人一生都弄不懂自己置身何处，弄不懂自己在那里生存的意义。我也不知道，但我至少到现在还知道寻找！"

当然，这个只是一种体面的说法，而不是事实的全部。搬家，如我这般的异乡闯入者，每个人都有一堆五味杂陈的经历，因由各式各样，甚而千奇百怪，如影随形地与你的人生密切相连。

我最早住进的城中村是广州火车东站旁的林和村，在一场伤筋动骨的感情之后，匆匆忙忙找的一幢民房的一楼，不大的一室一厅但有独立厕卫，最大的特点是阴暗、潮湿，需要 24 小时开着电灯。清楚记得，一卡车的书和 CD 搬进去时 1996 年春节还未来。

稍微整理后，搬家当天就请了几个朋友来吃饭。当时在《作品》杂志做编辑的老哥温远辉带着夫人来了，还带了他们结婚时的嫁妆两张小木板凳来送我，后来有一张坏了而另一张我用到如今；写诗的黄礼孩来了，还带来了写散文的陈小虎；好像做警察的诗人江城亦在。但我现在不能肯定，人到中年之后记忆是靠不住的。

我在林和村住的时间并不长，最初是房东的原因，后来就关涉工作的变动了。因为隔三岔五有朋友来看我，又由于房子没有独立水表，水费是按照一个定额月付的，房东一直没什么好脸色，还当着我朋友的面吵过几次。其实，朋友来亦只是坐坐，吃过饭后都各自离开的，用不了房东什么水。

在我那儿留宿过的，只有跟我一样瘦的陈小虎。他曾这样写道——

浪子住在林和村时，有一个晚上在他那里过夜。我告诉他，8 点钟叫醒我。我起来时，他转过身又睡了。我坐在床沿发了一会儿呆，歪歪斜斜又倒下去，又睡着了。再次醒来，浪子已经把中午饭做好了。他看着我，咬牙切齿地说，以后再也不叫你起床了。他起床时，见我还在床上，又叫我、推我，但我依然像一头猪。

5 月初，我进入《南方都市报》做记者，跑社会新闻，



广州的城中村

天天忙得晕头转向。

因为工作的缘故，那段时间都是早出晚归，当月的房租迟交了两天。房东语气极为恶毒，接连怨念了好些天，我一怒之下决定搬走。但搬哪儿呢？根本就来不及去找。当时，陈小虎一个人住在华南植物园旁边一处单位的房子，知道我如此境况，就建议我暂时搬去与他合住。——于是，我们开始了睡在同一张床上的短暂生活。

那时的景况，陈小虎描述过：

每天下班回去，谁走在前面谁就买菜做饭，后面那个负责洗刷。有时，在从天平架开出的28路车上，我们会相遇。每人手里都是一个装着肉呀、鱼呀、菜呀的袋子，就笑了。

第一次和诗人世宾见面，就在那屋子里，他是陈小虎的师范同学。我们用一个小木箱当成餐桌，就着简单的菜喝酒，谈着各自对诗歌的理解。用陈小虎的说法是，“那时世宾的诗歌写作正在转变，他的观念庞杂，但不失尖锐。浪子的成名要比世宾早。他们两人不知道因为什么就吵起来了。浪子一只手指着世宾，一只手拿着筷子在箱子上敲。筷子就断了。他把筷子往地上一扔，手撩起散掉下来的长发，拿起酒杯，说，喝！仰起头，一口把一杯酒喝下去了。手在嘴角擦了擦，想夹菜，才想起没有筷子。他对着我，大声吆喝：小虎，拿双筷子来。”

那年8月，陈小虎的女朋友从学校毕业分配到植物园旁边的一间中专学校，频频在屋子里进出。我觉得我变成了妨碍他们拍拖的电灯胆，就决定尽快搬走。不久，我向报社申请了一个单间，拎着一点儿衣服就搬出来了。临走，我拍拍陈小虎的肩膀，跟他说了句“兄弟，好好过。”就头也不回地走了。我知道他站在走廊一直看着我，直到我的身影在那扇破旧的铁门消失。但是那天，我没有回头。

后来，我也很少再到植物园去看他。我们在广州的见面，变成了电话的声音，或者餐桌上的举杯。那睡在同一张床上的日子，更是不会再来了。

说到广州最著名的城中村，大概是杨箕村与石牌村了。

杨箕村靠着南方报业，是许多媒体人的长居或暂栖地。更多时候，杨箕村是活在知名专栏写手刘原的文字中的。前《南方体育》主编龚晓跃就这样评价过：刘原混迹于杨箕村，不是大隐隐于市，而是于无声处听惊雷，他抚摸着杨箕村，感知着杨箕村，杨箕村在他的笔下成名。

江南藜果至今仍记得歌手王磊曾这样对他说，即使富了、生活条件好了，他还是愿意住在石牌村。鱼儿离不开水，创作离不开底层生活，他需要在城中村“找感觉”。

这些年我至少搬过10次以上的家，可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住过这两条最著名的城中村。倒是陈小虎，1998年8月与女朋友分手后就搬进了广州城赫赫有名的石牌村，住了整整5年，直到其迁居深圳。不过，陈小虎是对得起石牌村的，他写下的与石牌村相关的文字，就我所读过的，少说亦有20万了吧。不知道石牌村会不会在他的笔下成名？

我最近的一次搬家，是搬到广州大学城一水之隔的小洲村。

小洲村始建于元末明初，是目前广州城区内最具岭南水乡特色的古村落。

搬家时，我动用了3辆卡车，把临时书房、原公寓、原杂志社各处堆放的近万本书运了过来；搬来后，找师傅用掉138根角铁，焊接了六面与墙同高的书架。这一幢三层小楼，使我散落各处的书终于有了安置之地。

现在，我待在这个我命名为“海客堂”的地方，每天品品茶、读读书、会会友、听听音乐，偶尔写下一些什么。

如无意外，我会一直在这个地方好好活着，迎接每一缕新的阳光的到来。

香港散文：在潮流之中与潮流之外

文 钟晓毅



作者简介

钟晓毅，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所长。研究领域涉及文化产业、岭南文化、海洋文化与世界华文文学研究及大中华文学理论等研究。出版学术专著《走进这一方风景》《在南方的阅读》《穿过林子便是海》《金庸传奇》等 8 部；文艺创作《慢慢长大》《红尘有舞》等 3 部，主编《人文新走向》《敢为天下先》《海洋文化创新三十年》《中华美德书》《霭霭停云》等十余部。

一百多年来，香港在风雨中成长，在东方与西方的夹缝中安妥求生存，它的历史就如一段梦的轨迹，奇怪的是，任何来到这里的人，好像都能找到他们的梦，并且往往不想离开，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成就了一个“东方之珠”的神话。

当代的香港散文，早在 20 世纪 40 年代已有相当突出的表现，作为一个交通方便、政治环境特殊的地区，抗日战争期间和战后，香港都集结了一大批知名作家与文化人：鲁迅、郭沫若、茅盾、许地山、萧红、黄谷柳、夏衍、黄药眠、巴金、萧乾、胡适、秦牧、黄宁婴、黄秋耘、叶灵凤、陈芦荻、杜埃、李育中、司马文森、杨奇、楼栖……他们在香港办报刊，写檄文，探讨文学问题，从多方面推动新文学发展。

南来作家在香港创作的作品，主要以反映内地抗日战事的题材为主。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作家把目光盯向了香港社会各阶层和香港市民的生活，“这类作品多是散文、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为数虽然不多，却是不可忽略的一部分创作成果”。

这批粤籍的南下作家，在香港声誉日隆，以他们的作品和工作热情，赢得了读者的支持和喜爱。而他们的创作，也带着“岭南一派的艺术风格和语言特点”，他们都怀着崇高的使命感认真地写作，为求使自己的作品能烛照现实生活的某些方面，成为救世良方。具体到行文布局，更听命于心灵和情感的牵引，语言质朴、情节舒展、有感而发、感情真挚，传统的“务实”加上了现代的“创新”，原先追求的“感觉”汇合了后续的“理性”，于谈天说地中，于平常心形态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完成做人与为文的责任。

这时期，老一辈作家唱了主角，在散文园地里熔铸文辞。由吴其敏主编的《五十人集》《五十又集》二书共收叶灵凤、黄蒙田、吴其敏、舒巷城等 87 人的 100 篇散文，是早期现实主义作家之散文集锦，也堪称香港最早的散文选本。当时曹聚仁和徐吁创办的《幽默》，是一本专登散文小品的杂志，在文化人中也影响颇大。聚集在其周围的同仁斯时笔耕甚勤，出版了一系列的散文集子，大都情采并茂、学养皇然，如徐吁的《思与感》、叶灵凤的《白叶杂记》《忘忧草》、吴其敏的《怀思集》《拾芥集》、何达的《出发》《书与桥》、徐速的《三言两语》、曹聚仁的《鱼龙集》《浮过了生命之海》、慕容羽君的《乔木青青》、司马长风的《段老师的眼泪》、黄蒙田的《湖畔集》等。

游记与报告文学在其中也占了相当的分量，曹聚仁的《万里行记》《北行小语》《北行二语》《北行三语》以及李辉英的《通讯集》，易君左的《西北壮游》，萧铜的《上京记》等，在读者当中都有较大的影响，文名虽不能说远播后世来者，但也班班可考。

20 世纪 50 年代之后，更多的文化人南下香港。一时间，香港文坛人才济济，“众声喧哗”，但这其中不少人，是把居住地视为异乡的，都渴望尽快安稳地回归家乡，在这样的背景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文化界的传统氛围是颇为浓郁的，体现在散文创作上，离乡别井前途未卜的渺茫，经济一时无法解决的困顿，自尊与俗世生活冲突的彷徨，构成了文字表达上的柔弱无奈、苦闷的呓语式文风，由此“《中国学生周报》《人人文学》《海澜》《文坛》《星岛日报》《新生晚报》《香港时报》《文学世界》等刊物报章上，几乎成为‘夜’‘海’‘梦’‘落叶’‘雪’‘故园故乡’‘寂寞’‘无依’题材的园地，写作技巧亦只求顺理成章，不见创新思变。影响所及，年轻一辈，竟也形影模拟，一时满纸‘海’‘夜’。”

这种情形下，反而促进了文史札记、山水游记的兴盛，老一辈文人如叶灵凤、曹聚仁、陈君葆、高贞白、易君左、吴其敏、李辉英、黄蒙田等均在报上专栏内，展示其学养品位；中年作者如司马长风、吴羊璧等亦执笔甚勤，企求在传统经典创造的深厚丰富的散文文化蕴藏中，挖掘到一股绵延不绝的精神，翼盖一代，领袖风骚。而胡菊人的《读书闲笔》《旅游闲笔》，西西的《开麦拉眼》，陆离、戴天、刘方、李英豪合写的《四方谈》，江映兰（谢雨凝）、卓力、陈浩泉、吕达、徐翼、罗漫、郑辛雄（海辛）、艺莎（谭秀牧）、彦火（潘耀明）、甘莎（张君默）、李怡（李心台）、谷旭（林真）等青年一代，或寄情山水、舒展性灵，以此对抗俗世、超迈现实，或取身边事，我手写我思，笔下附丽或所由生发的主要依凭，均是现实的本质面貌。

如果说，老一辈作家的散文多涉掌故与经验的述古谈往，那么，中、青年作者则开始以自觉的价值确认与追求为矢的，他们甫始试笔，已落实于面对社会生活，以“唯有服从真实，善于揭露真实存在的本质面貌，才能显出文艺创作的尊严”为写作定向，试验与技巧是否多元，均非最重要的追求目标。偶有个人感受和苦涩的灰暗色调，也会被批评为“徘徊于生活边缘，抱持旁观者的态度，思想感情跟广大人群之间还摆着一段等待缩短的距离”。故这批青年作者的视点很集中。

正是有这种期待以及由此期待而生发的实践，令这时期的散文创作往本土化的方向迈进，加上斯时无论是什么立场的文化人，为信念也好，为生活也好，多投身于文艺活动中，办杂志、编副刊、写专栏，占据与开拓了众多的文学空间，气氛活跃，产量不寡，间接地对文艺青年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的更是有意识开拓园地，培养新人，形成了一股良好的风气。

渐渐地，青年作者由不自觉的形影模拟转变为独立创新，尤其是 1956 年后创刊的《文艺新

潮》，是不同想法的作者，为求出新，借助西方文艺，引介西方思潮，为青年作者作接引功夫而开办的。《文艺新潮》影响不小，它在呼吁对于现实社会和本土文化的承诺与承担，对于生存境遇的关切注意，对于人生命运的探索与追寻，对于自我生命的真切体验，并试图以现代技巧、多变的文字色彩去表达、去显示出散文的自由所能达到的范围极限，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所以，今天回想起来，许多亲历者都认为这是散文开辟新路的一个重要征兆。

谈到“本土”，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香港散文园地里，还有一种现象值得一提，以三苏等为代表的“三及第”笔调的作品，有意识地以民间俚俗之语和粤语口语入文，流畅而有生趣，讽世刺时，嬉笑怒骂；此种甚具港式风格的杂文怪论（即普通话、文言虚词和广东方言相结合），深受香港读者喜爱。他的“怪论”大都取材于时事新闻或当代各界名流轶事，笔法多为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皮里春秋，文章立论始终站在普通市民的立场上，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高雄（即三苏）是香港市民的代言人，他的各类作品都以普通市民为主要接受对象，尽量迎合市民的欣赏口味和情趣，因而，能赢得众多的读者”。

三苏的影响力还极其深远，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的“哈公（许国）怪论”，明显地受他的影响而续“前缘”，但读者的反应不如“三苏怪论”那么强烈，感觉是优劣参半，褒贬自然不一。

踏进 20 世纪 70 年代，香港经济迅速发展。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自由放任的低税经济政策，大量外资涌入，加上全球经济复苏，一切利好条件促成香港这个经济神话。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不仅成为世界金融中心，本地社会经济亦趋向成熟，市民基本需求达到饱和，渐渐进入消费社会的前期阶段，在这种商业性和开放性的时空中，香港散文的发展与限制同样明显。

园地方面，20 世纪 70 年代的《海洋文艺》《大拇指》《八方》，20 世纪 80 年代的《素叶文学》《文艺季刊》《当代文艺（复刊）》《香港文学》《破土》等，都很重要，有的杂志跨越几个年代，如《中国学生周报》《文艺世纪》《当代文艺》等，一如既往体现了一种担当，影响很大；而报纸的文学副刊，如《香港时报》的《浅水湾》和《文与艺》、《星岛日报》的《星座》《新晚报》的《星海》、《星岛晚报》的《大会堂》等，也为散文的兴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自 20 世纪 70 年代趄起，很多香港报刊在版面上进行了改革，将整个报纸版面划分为若干个小专栏，设立了五花八门的固定栏目，由固定作者负责撰写稿件，“这类专栏文章以散文居多，杂文、随笔、小品等，形式多样。报纸专栏的大量出现，推动香港散文的发展”。而“文学杂志和报纸的文学副刊，是作家发表作品的园地，是文艺青年吸收营养的地方。文学期刊的编辑方针、内容、水准，是当代文风的指标”。这时期的散文，长有长的写，短有短的写，八面临风四方沐雨，指指点点，大都落在风起云涌的社会热闹处，在在显示了香港散文的本土意识。

队伍方面，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散文作家的队伍基本上由三部分组成：一是本土作家，如何紫、阿浓、西西、陆离、小思、亦舒、古苍梧、黄国彬、何福仁、也斯、淮远、陈耀南、林燕妮、钟晓阳等，都是活跃的本土意识颇浓的作家。二是学院作家，因了香港社会较之其他华人社区有更佳的发展条件，吸引了很多人才，其中也包括了学者与作家，尤其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台湾学者、作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来香港的为数不少，如余光中、钟玲等，“余光中之外，他的一些同事如宋淇、思果、陈之藩、金耀基、梁锡华、孙述宇、刘绍铭、小思、朱立、钟玲、黄国彬、黄维梁、潘铭燊等，都是学者而兼擅创作，其作品形成所谓的‘沙田文学’（中文大学位于沙田），若干学院作家，演讲有绣口、挥洒

有彩笔，创作与理论兼之，又经常参与校外的文学活动，担任文学奖评判，因此对青年文学爱好者发挥了影响力”。三是随着内地的政策开放，第三波南下作家的到来，也充实了香港散文创作的力量，他们之中的曾敏之、张文达、陶然、彦火、颜纯钩、王璞、古剑、夏婕等，或专攻散文，或右手写小说、左手写散文，各有特色，蔚然成风。

香港报刊的专栏化，既成全了香港散文也约束了香港散文，至今仍有“框框杂文”是否文学之争，但无论如何，它形成了一个很显著的特色，由此挑起的话题，将会有助于香港散文的发展。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社会因其特殊的社会情状（如“九七情结”），风起云涌，色彩斑斓，给散文创作提供了一个大的发展空间，不仅增加了写作的新题材，而且题旨更为开阔、深刻。数量繁多，佳作常见，曾敏之“笔力雅健”，其散文小品，“世事洞明”“人情练达”，罗孚“忆述香港作家其人其文之篇，有散文的温厚感，有文评的洞察力”，而“辞采生动，引人入胜”，金庸、卜少夫、陆铿、胡菊人、林山木、岑逸飞等，所写社论或时评，每有文采可观，“是文学的一支”。董桥以散文驰名，精致严谨，理趣与情趣兼美，梁锡华、吴羊璧、彦火、陶然、黄国彬等，风神各具，女作者的阵营也颇为壮大，农妇、蒋芸、李碧华、李默、林燕妮、绿骑士、曾慧燕等，都有不少受读者欢迎的作品问世。而香港土生土长的年轻一辈，特别是和“青年文学奖或香港青年作者协会”有渊源的一批青年作家，“如陈德锦、秀实、胡燕青、钟伟民、王良和、洛枫等，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先后崛起，至今仍写作不辍。他们都写诗，抒情咏物，时有深刻独到的作品；也兼写散文和评论”。在世纪初的“文学革命”范围内，继维新的“新文体”之后，现代白话散文（文体）的创作及其文学成就，一直以来都是很突出的。对此，当时便已获得公认，如胡适说：“白话散文很进步了。长篇议论文的进步，那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不论，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朱自清说：“最发达的，要算是小品散文。”曾孟朴说：“第一是小品文字”“第二是短篇小说”“第三是诗”。鲁迅也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香港散文的成就，是可以作为香港文学成功的一种标志的，中国悠久的散文传统和中西交汇的环境与地域意识相互碰撞与交融，使得它们既相承其传统而又有多方革命、全新创造的划时代气象，从而以一种逐渐形成的新的文学品质，在中国散文史上占一席不可或缺的地位。

平淡从来不是香港的特色，所以很多人争着要说香港的故事，也斯就曾如此概括过：

有人用一个渔港来说，有人用一艘帆船来说，有人用高耸的大厦来说。有人用夜晚璀璨的灯光来说。有人用鲤鱼门的雾，有人用兰桂坊的酒吧。这故事好像越说越简单，这故事好像越说越复杂。这故事引向别的故事，这故事结束了又开始，开始了又结束。每次说香港的故事，结果总变成关于别的地方的故事；每次说别的地方的故事，结果又总变成香港的故事。香港的故事，愈说愈长，愈说愈乱。到底该怎样说香港的故事？每个人都在说，说一个不同的故事，到头来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那些不同的故事，不一定告诉我们关于香港的事，而是告诉了我们那个说故事的人，告诉了我们他站在什么位置说话。

滥觞到散文界，“香港的故事”如今也经历了几个阶段，早期的作品中，香港大都是作为“他者”的形象出现，是一个漂浮的能指，很难确定，等待填充与固定，作者们大都“向北回望”，日常生活事物中的片段，例如：花、草、山、海、风、雨、露、日、月、星辰、悲喜、梦

幻等，皆是最佳题材，且以旧时日子、旧日情怀为最好的寄托，张千帆的《绍酒、珠茶、腐乳、香糕——绍兴散记之二》，里面一下子就把绍兴的名产逐一数了遍：从它们的酿造方法、它们的口感、它们的赫赫声名，等等，一一详尽地道来，最后收束的那一段，才来了一个“画龙点睛”：

我们从绍酒、珠茶、腐乳、香糕而联想到山明水秀、物产丰富的水乡绍兴，从醇厚的绍酒中而联想到风景如画的鉴湖，从鉴湖又联想到坐乌篷船（脚划船）到绍兴城外去游览大禹陵、兰亭、东湖等名胜古迹的情趣，从大街小巷的酒馆而联想到大大小小的水街上的许多构造复杂而又形式优美的石桥……只要我们看到这些，或者想到这些，就会在我们的脑海中鲜明地勾画出一幅有浓厚的地方色彩的绍兴轮廓画。

好一幅思乡图，人生有些事就是这样，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继续做的，有些人，你以为明天一定可以见到的，于是，在你暂时放下，或者暂时离别的时候，你心中所有的，只是明天又将继续、又将重聚的希望，有时甚至连丝惆怅都没有。

但是，就会有那么一次。在你一放手、一转身的那一刹那，有的事情就完全改变了。太阳落下去，而在它重新升起以前，有些东西，便永不再回来，譬如童年；有些地方，便长久难以回归，比如故乡。

在本土与异乡的缝隙，在商业与艺术的缝隙，香港的“故事”渐渐地成形，从皇甫光的《房东与我的太太》、易君左的《雾香港》、阿甲（陈凡）的《访友》、羊壁（双翼）的《大房间》《读书难——港居随笔》、黄蒙田的《案头清供》、李辉英的《港居三题》、陆离的《特写海运大厦》、西西（张爱伦）的《港岛，我爱》、黄俊东的《香港的树》、李天命的《树叶都闪着碧油油的粼光》，等等，已可以看出其中的端倪。卢玮銮说得好：

（它们）在以“香港生活为念”，故作品颇带本土色彩。或有暂居者处于困顿，生出不平之鸣；或有久居斯地而情牵故园，遂因景生愁，均可类归香港生活某种真实。年轻一辈，或脚踏实地，审视自身与本土关系，反映人情地缘；或对朦胧触及人生，偶生感叹；亦属都市留情，本土感觉。

到了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都市化进程的高速发展，以及归属感所引发的不安定心绪，散文的创作往往与香港的身份问题相连，本土性更成了香港散文的主题，由舒巷城、海辛等一直到也斯、西西、何福仁、钟晓阳、黄碧云、董启章等，都以拆解、诉说纯粹的香港生活为念，有没有做到十足那不要紧，最主要的是他们一直在努力着，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他们理念的香港脉搏的新音。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是香港人”的主题意念，其实已包括了自我主体与地域空间这两个题目，而态度也和题目同样简单，肯定自我与这个城市的关系，以及毫无疑问的归属感。不仅本土成长的作家是这样，有感于现存的生活经济和文化现状，带出更多的有关文化身份的思考，曾有内地受教育背景的作家同样感同身受，他们的书写，怀旧式地摄存旧影像与创新性地抒写新寓言并置，无非也是为香港图貌存真，虽然还有零散片断的方式，但无疑的，香港的主体性思考是被大大拓展了，而在其中，我们也看到了作品之外的香港文化脉络中存在的希望与问题。

在中国，“散文”作为文类源远流长，而被正式命名，则是晚近的事情，这一名与实之间的缝隙，形成了某种张力。现代散文发轫于揭开中国现代史的“五四”时期，“五四”白话现代散文以其崭新的思想文化内涵、新的形式和有别于文言的白话文字载体，不仅开创了我们民族文化历史的划时代转折，其现代散文的奠基者们还非常

迅速地造就了一个“既可以与古典散文相媲美又足以为后世典范的繁荣期”。

香港散文作为中国现代散文的一支重要分支，不仅有中国古典文学的延续，更有现代散文的滋养与培育。不要说 20 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批很重要的作家如郭沫若、茅盾、许地山、夏衍、萧红、张爱玲等，或先或后在香港居住过，从事文学活动以及留下一大批诗文。“他们既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又‘现身说法’地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传统本身”，就是如上述的那批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由内地留居香港的作家，他们的文学根基也是在内地打下的，甚至在内地已崭露头角，到了香港继续创作，乃至文名远扬。如此的薪火相传，使香港散文即使也有出现断层或延续和断裂交替，或延续之中有断裂的时候，但其血脉却一直一脉相承，取径或有不同，源流却是归一。

因了香港地方的地缘特征和制度之间的差异，散文的传统也有不同的推移和变异，在一个商业性和开放性同样明显的地区，“纯散文”终究是一个很难想象的概念。其实，倘若追溯中国散文的历史，那就会发现，越是前期，散文的“实用性”表现得越显著，为散文而散文的“纯文学”，恐怕是极难存活的，传统确实是一个复合的、多元的，也是处于流动状态的概念。在这种观念下去观照香港散文，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客观的参照系统。

传统中的好散文，不是“史家之绝唱”，就是一种哲理的表述方式，或是一种齐家治国，修身养性地充满了趣味的谈论形态，差别也只在于：“有的是直接表述，有的是借题发挥的缘物抒情；而有的则是极具意味或寓言般地叙述。”在香港作家的笔下，那种诸如有感而发、为事而作、讲求见解、看重风骨及文采之类的传统，还是有例可援的，尤其是在老一辈作家的创作中，他们的文史札记，也许不是一种圈定范围内的“优美的文字舞蹈”，也不全以“美文”概念为准，但在在以“情牵”为考虑先着。

从追源文化积淀，到揭橥现状本质，在思想观念上，除了老调重弹，继续乞灵于往圣先哲之外，还因为活在这现实社会中，难免会魂飞魄



香港街道

散，必须在如翰史籍中，独对天人之际把“魂”给招回来，一卷史书在握，上下 5000 年所面对的无非是自己灵魂深处的困惑与挣扎吧。

易君左的《雾香港》，其中有一段就很有借古讽今的味道，只是笔墨委婉，情致迷人，有化旧为新之功：

住在这个多雾城市的人们，是再不会有画景、诗情和梦境了，你看画家或摄影家，当他设计成就一个“雾晨”的作品时，他是如何忍耐而辛勤地觅取题材，作为描写或摄取的对象。他把画面画得像披着一层翼般的轻纱；或是把光圈故意放大或收缩，在冲晒时运用灵巧的技术，留着淡淡的浮影。诗人呢，从雾里看花，花是那样更媚艳的，从雾里看美人，美人是那样更妖娆的。他细心去写诗，他是旧诗人，必挑选“山市暗，晓城昏”“迷汉殿，舞秦楼”“随雨密，带烟浮”这一类美丽的词藻；他是新诗人，就会造出“我窒息着像一颗发不出芽来的谷粒，等待着今晚的雨点和明天的太阳……”这一类动人的句子。还有那些沉湎于人情世味的，他把一种迷离恍惚游离飘摇的幻影寄托在梦中，也同样寄托在雾里。可是，这些最适宜于雾的画景诗情和梦境，早已使画家和摄影家失去了他们的题材，早已使得诗人失去了他们的一切憧憬和希冀。雾也早已不再是梦境诗情和画景，而只是乌烟瘴气的一团了。

结论就是：这个地方既是殖民地，成为雾城是很自然的，可怕的是，这个地方这个时候的人也如一团雾。

其情也哀，其心也戚戚。把史学和流行的思想分离开来，看作是超过一切意识形态的纯粹的静观，这是一部分传统的散文家的所为：但香港的散文作家倘若以史为鉴，却常常是从现实的角度，还原了历史的作用，使我们终于晓得诸种文化碰撞时的后果；明古的人，往往是会察今的，治学悟道所致，即使是一些看似枯燥的文字里，还是能看出一种人生的激情的。自然，更多的散文是往易于传播的途径上靠的，清除通往已逝岁月上的杂尘，为的是在今日不再茫然地随波逐流，引导人心，传导文化，成就为散文的“风雅颂”。如此，怎样从创作实践上看待传统，也许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传统中有着前人的智慧，但前人的智慧要靠后人的智慧去发现或发挥。香港作家在这方面做了承先启后、筚路蓝缕的工作，要是他们今天的创作也有可能成为传统，那可以断定，在后人所理解的散文传统中，一定会有香港散文的鲜明身影。

香港由一个落后的渔港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之珠，其经济发展的成果众所周知，而在文化、文学方面，诸如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等的交流、融会及一些技术性的经营与具体的操作，都市化进程所引起的“雅”与“俗”的转化与边缘化等，也有着不少成功的经验。

正如刘以鬯所说：“香港文学穿的是英国义父的衣服，喝的是中国母亲的奶汁；衣服可以换，母奶则是身体需要的营养料，因此，香港文学不仅是华文文学的一环，也是中国整体文学的组成部分。”

正是处在两种文化之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渗透与夹攻之下，造成了香港散文的多元与混杂，使得香港散文的实际处境和文化身份其实有亦俗亦雅，雅俗越界的复杂性。

“极都市”的味道在香港散文中体现得尤为明显，都市的变动不居，纷繁复杂，为处在夹缝之中的作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想象空间，而涉及的被正典化和通俗化的争论，则加深着人们对现代城市以及当下都市人的命运的想象。

“故国情思”“乡愁理念”，曾几何时，已如漂泊不定的旅人，渐行渐速，代而之的是“专栏化”的写作，“专栏化”写作被读者接受的原因是攫取读者的心理效应，情绪反应，得到感知共鸣。在这一层面上说，它具有相当强的实用性，

为了适应“消费性”的接受方式，“轻、薄、短、小”愈来愈成为“专栏化”散文的写作策略，而它的实用性在大众的口味的制约下也越发显露出来。实用文字要求资讯快速、运用性强、文字清楚晓畅。如读亦舒、李碧华的作品，除了文章中所述情怀让读者以为是真实人生的再现，连坊间的流行语时尚的趋势，也历历在目，一读之下，马上感受到“效果”；而胡菊人、项庄等人的文章，在考证之内，具传真性，而在考证之外，也有属于当下的道德教示，可资读者借鉴。作品的思绪越来越飘忽，语言越来越短促，行文也越来越跳跃，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即能看出这种变化，如果说，五六十年代曹聚仁、叶灵凤、徐吁、徐速等人的作品还带有“雅致”的“韵味”，充溢着“精雕细凿”的“雅兴”，还需要读者花费心思细心品味才能达至审美的愉悦，那么，到了七八十年代的专栏作家笔下，文章提供的往往只是强烈的“信息”。“信息的长处在于瞬间性，在瞬间中，信息就显得是新的。信息唯独离不开这瞬间性，它必须依附于这种瞬间，而且不能离开时间性，并在时间中展现出来。”带给读者的是瞬间的阅读快感，由此，散文也成了一种“商品”。当然，为了适应不同年代成长的读者的不断变化，加进了各种不同的“信息”，或者说，是社会形态与不同的读者心理，让“专栏化”的散文作者调整他们的写作路向，而更多的并不是出于自己独具个性的精神追求：而读者，也自然参与了选择特定时空的“专栏”框架。让曾辉煌一时的读书人立言载道、博取功名、祈求不朽的“文章”，经过这么一番功能限定及价值重估，几乎已是脱胎换骨，成了一种实用的文学读物。刘以鬯就曾经这样说过：“香港是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大部分读者只要求作品具有趣味性、消闲性和流行性，不重视作品的艺术价值、社会教育与所含纯度……”梁锡华也认为：“香港人无论上、中、下流，大体上是奋力赚钱努力享乐，谁有兴趣钻进高妙或创新的文字里头去开展胸襟、扩大视野、抚时感世、增智添识或培德立品?”作家已经不那么“严肃”地对待创作，读者也已经不那么“认真”地阅读散文，但也由此派生出它们作为“读物”的作用：以现代社会的需要为前提，帮助人们在现代社会中更适宜地生存，这种帮助是多方面的：“它可以是实用性的生活指南，也可以是消闲性的精神消遣。它不乏真知灼见，能令人深思、令人感动，但其最终目标是有利于自身及其对象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

香港的都市散文就曾经历了一个由“精英文化向读物文化转移”的过程，陈思和就曾举例说有不少知识分子如鱼得水地顺应了这一市场机制转换，成为双栖的“弄潮儿”，像李英豪，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作家，在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介绍西方现代主义艺术，写作《批评的视界》，翻译《萨特戏剧选》和卡夫卡的随笔，到八十年代出版了一系列《禅与香港生活》《庄子与香港生活》，谈花论狗，以及感人至深的《给煜煜的信》，作品一纸风行。还有金庸、戴天、亦舒、李碧华、张君默等作家，他们的写作有着引人深思的“边缘性”，既不在纯文学的中心苦思，又不在消费文化的阵营盘桓过久，尝试着去走一绦“中庸之道”——其作品既不严肃得无人问津，又不俗到“走火入魔”，而是熔二者于一炉，不走极端，好处是兼容并蓄，采众家之长雅俗共赏，但往往不容易把握，难以界定，所以，他们的作品本身也有高下之分。

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在南北文化的临界上，在大众文化和纯文学的嫁接以及母体文化和现代文化生产方式的汇合中，香港散文毕竟是像中国散文的，有中国散文的优美，也许外表变了很多，但心还是那一颗存有温润的古典的心，在这卷海外华文文学大系《香港散文卷》中，可以明显地体会与欣赏到上述所述说的一切。

广东侨联工作 仁爱公益品牌

侨爱南粤

爱侨护侨助侨，因应侨界需求，以人为本，以爱润心，引领侨界大众，共建华夏一家。



天使岛见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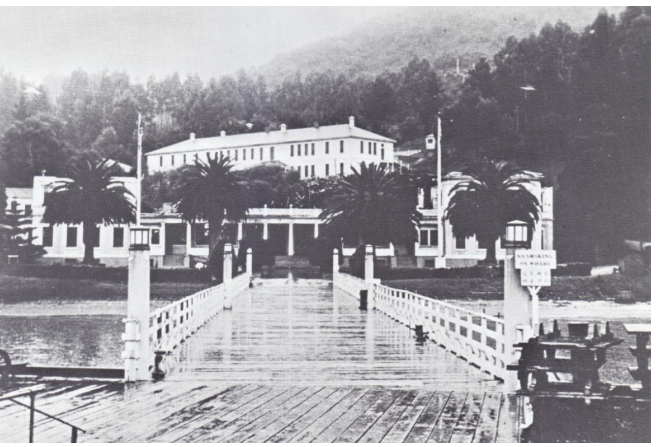
文 李柏达（江门市华侨历史学会理事）

天使岛，一个看似美丽而神秘的名字，对于晚清至民国时期漂洋过海去美国谋生的台山华侨来说，却是一座看似“仙岛”的监牢。一位华侨在天使岛的木屋墙上刻下这样的一首诗：埃仑此地为“仙岛”，山野原来是监牢。既望张网焉投入？只为囊空莫奈何。

“埃仑”是天使岛英文 ISLAND 的台山话译音。这首诗虽没写明作者，但很可能是台山人所作，是天使岛真实历史写照。我收集华侨文献多年，手上有不少的口供纸，详细记录了当年在天使岛审口供的内容。然而，现实中的天使岛到底又如何？因此，很希望有机会到天使岛去看个究竟，揭开那神秘的面纱。

天使岛移民档案

2019 年 9 月初，全美李氏恳亲大会在旧金山唐人街举行，我有幸参加了这次盛会。期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兰尼学院音乐学教授赵彤仪女士的带领下，我们踏上了神秘的天使岛。



天使岛移民羁留所的码头

9 月 3 日早上 9 时 45 分，在旧金山 39 号码头乘上渡轮，往天使岛前进。不到半小时，我们来到了天使岛。只见岛上雾霭重重，凉风习习，气象万千，给人们增添几分神秘的感觉。

上岛后，赵教授购买了车票，我们坐上岛上观光车，往木屋区进发。车子穿越参天古树林区，翻山越岭，在崎岖的山路上蛇行前进，一团团白雾扑面而来，寒气入心，我打了几个寒战，随即拉紧衣襟，振作精神向前。翻越大半个山岭，来到一个山坳，只见山坡上错落分布着木屋、木桌凳、营房和海滩，周边筑起 3.8 米高的铁丝网与外界隔绝，人们无法攀越，这就是“天使岛移民羁留所”，现已改建成一座历史博物馆。进入羁留所，观光车在海边水泥路停下来，海边是一个古码头，海对面是旧金山湾区。1910 年，为了利于严密的监控，美国的移民羁留所从三藩市海边搬到天使岛，与外界隔绝。天使岛代表的不是欢迎，而是歧视、排斥，作为美国西岸的主要入口，这个羁留所是执行《排华法案》以及后来限制“不受欢迎”人群移民的联邦法律。至 1940 年，该羁留所共羁押过 17.5 万中国人，此外还有其他国的人。当年，台山华侨怀揣着发财之梦，横渡太平洋去往旧金山，踏上美国国土的第一步却是通向移民羁留所的码头，顿时，他们陷于不熟悉的环境：陌生的语言和习俗，以及无穷无尽的登记和背景审查（审口供），命运渺茫。更有不

少人还未见到金山，就在天使岛命丧黄泉。以下这首木屋诗，记录了当时凄楚的情形：噩耗传闻实可哀，弔君何日裹尸回？无能瞑目凭谁诉？有识应知悔此来。千古含愁千古恨，思乡空对望乡台。未酬壮志埋坏土，知尔雄心死不灰。

移民码头右侧用黑色花岗岩镶建一壁“IMMIGRANT HERITAGE WALL”（移民的遗产墙）石刻，上面刻着无数个当年被囚禁过的移民名单，其中大部分是中国人，以广东五邑人居多。我细心地寻找，发现一碑上刻有“朱联芳、朱温美爱”的名字，下面还有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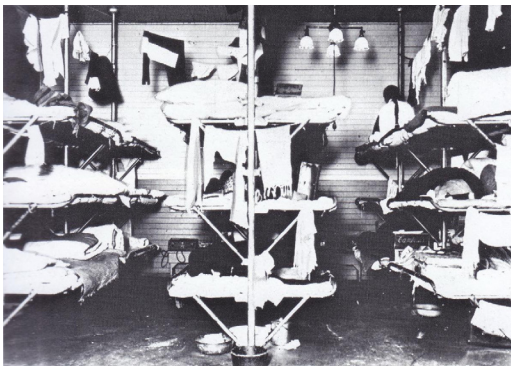
原何离乡背井？慈父心有谁知？
他未提及，子女也没尝探问。
闯荡于异乡美国，
这片与家乡朱洞村那么不一样的天地，
十七岁的台山少年，何所思何所想？
被囚天使岛那般滋味，是彷徨还是焦虑？
熟知，漫长的八个星期过后，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的某天，
朱联芳变成了买仔纸朱信。

谁又能知晓，那里来的勇气让她横渡怒海，
那位身怀六甲，手牵幼子的军人媳妇，
我的母亲朱温美爱，
抵美月余，欢天喜地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美国孩子，
我们只知道，
他们生活在金村，过着丰盛的人生，享受温馨的友情。
把他们美国之旅收获的礼物，送给九名子女，二十名孙子，
以及生生不息的下一代。

经调查，朱联芳是台山台城朱洞村长安村人，朱开有的儿子，他的长子朱柏荣，今年 79 岁，现居美国旧金山。1937 年，17 岁的朱联芳



在天使岛羁留所医院的梯级等候体检的男性移民



移民羁留所的宿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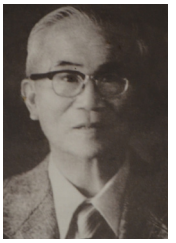
买了“朱信”的出世仔纸去美国，在天使岛羁留了 8 个星期后，进入美国社会。后来他又去当兵，1947 年，他将妻子朱温美爱及儿子办理移民去美国，成为留美一大家族。

在移民遗产墙上，我还找到了台山桂水胜塘村的一家人移民档案：Henry Way Yee 余怀德 1908（S S China）、Hum Wee Fong 谭伟芳 1931（SS President Cleveland）、Paul 杰生 1929、Herbert 杰良 Calvin 杰仁 1931（SS President Cleveland）、

Song 瑞双 May 瑞美 1934（SS President Hoover）。据调查，余怀德自少出洋往美国求学，半工半读，1918 年 6 月 30 日在美国最老牌的著名大学——米西根省立大学领铁路工程学士证书，毕业后在米西根全省总工程部处任职，后来归国服务，是 20 世纪 20 年代台山县工务局卓有成就的工程师，对台城、荻海、新昌的市政及公路建设有较大的贡献，又是余氏《风采月刊》的创办人和第一任副社长。后来又移居美国，事业有成，宅心仁厚，教子有方，其后人杰民、杰生、杰仁等卓有成就。

在另一块石刻上，记录了一位华侨在天使岛被囚禁的详情，一位中山华侨莫景胜这样写道：我出生于中国广东省中山赤水坑村，祖父于 1885 年来美国修建铁路，是我们家族中第一位移民到美国的。父亲于 1919 年来美国从事种菊花生意。我本人则于 1937 年用郑姓的买纸名字来美国，在天使岛停留了十一个月才上埠，当时日子很难过，担心会被遣返中国。1944 年参军前我都是在做一些零工，1947 年回中国和赵容姬结婚，婚后回到美国加州做种菊花生意，育有七名子女。我曾多次返乡推动社区和教育建设，借以改善乡人的生活。我也曾带同子女和孙儿们回去，让他们了解我童年成长的环境，并把祖先的文化传给莫家的下一代。

在羁留所区右前方山坡上，竖立一块高大黑压压的石碑，上刻一副对联概括了当时华人移民的命运：“别井离乡飘流羁木屋，开天辟地创业在金门”。这对联敲响了历史的警钟，告诉人们不要忘记华裔移民被歧视的过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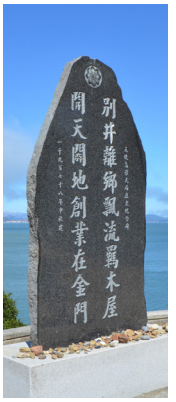
余怀德像



余杰生像



余杰仁像



羁留所区的石碑

我将羁留区内所有的石刻文字拍摄存档，又到木屋区参观。由于当天星期二，是木屋闭馆日，无法进入木屋内参观，给我们留下遗憾。

天使岛走出的音乐世家

正午时分，艳阳高照，一辆观光车驶进羁留所，我们搭上了观光车回去。在回旧金山的游船上，望着逐渐消失在视野中的天使岛，我们陷入了沉思。赵教授讲起了她祖父、父亲被困天使岛的故事：

赵彤仪教授是台山斗山浮石村人，祖父赵镇让 1902 年出生于台山，父亲赵泮纶 1924 年出生。为求生计，1925 年某月，赵镇让挥泪告别已怀孕的爱妻和幼子，远渡重洋去古巴谋生；1926 年，其小女儿赵悦华在台山出生。约 1926 年，赵镇让买了船票，匿藏在一艘船载的棺材里偷渡去美国旧金山，上岸后被困天使岛，好不容易才审查过关进入美国，先后在衣馆、餐馆工作。为了和家人团聚，经过十数年的拼搏，赵镇让将积攒下来的血汗钱买了两张出世仔纸，计划将儿子、女儿办理移民美国，但其妻重男轻女，不同意买纸将女儿移民美国，后来，他将那张出世仔纸卖给他人。1940 年某月，赵泮纶踏上美国国土，被羁押在天使岛，成为天使岛最后一批被囚禁的华人。对于在天使岛囚禁的岁月，赵泮纶常对子女说不堪回首，他加入美国籍后，为妹妹赵悦华办理申请移

民美国，由于排期漫长，到后来批准她来到美国时，父亲赵镇让已经离世。可怜的赵悦华，一生未能见过其父亲一面，孤苦伶仃的凄楚情形无法形容。赵泮纶出生于广东音乐之乡——浮石村，从小喜爱音乐，其父亲常寄钱支持他学音乐，是一位台山民间音乐奇才，移民美国后在三藩市的一间音乐社教音乐。一位漂亮的美国女子喜爱中国音乐，尤其喜爱学打扬琴，在学校学习音乐期间认识了泮纶，后来两人结成终身伴侣。赵彤仪女士就这样出生在音乐世家里，从小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3 岁开始学唱粤剧，又学会一口流利的广州话和台山话，成为一个音乐迷，师从名家学习中国器乐和地方戏曲，器乐中以琵琶技艺最精，戏曲中以粤曲最见功力。其他诸如古琴、钢琴、扬琴、月琴、京剧、昆曲、黄梅戏等无所不会，成为活跃于旧金山文艺领域里的名家，她经常率领她一手创建的“紫竹乐团”到美国各地去演出。她的先生是著名的笙、笛吹奏乐艺术家，夫妇两人志同道合，在海外为传承国乐戏艺，奉献自己的青春和聪明才智。赵老师长期在屋伦兰尼大学音乐系和林肯学校担任音乐教授，培养了一大批音乐和戏曲人才。她的儿子也成了美国大学的音乐教授。她的学生中，除了华裔亚裔，还有白人和黑人，其中不乏出色的成就者。



赵镇让像



赵泮纶像



赵彤仪教授（左二）与笔者（左一）一起到天使岛调研

2018 年年底，赵教授计划将天使岛的故事编成剧本，用音乐将那段惨痛的历史推上大舞台，并将那段历史写进美国的教科书。在一位台山华侨的牵线下与我相识，她专程从美国飞赴台山，我协助她找到了大量的当年的历史资料，从此，我们结下一段跨国的情谊。赵教授说：“要想世界得到和平，就要尊重、了解别人的文化，而我用音乐来做到这一点。”她希望通过音乐宣扬当年华侨的艰辛以及对祖国的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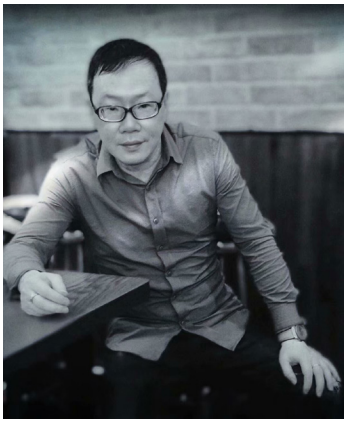
讲完这个故事，她又唱起她与陈松富合作编剧的《两地凄凉》之粤曲——寄调《双星恨》，歌词如下：

木屋里若狂，想我别却家人赴远方，竟有劫祸藏。羁困于樊笼无能脱身空怅望！最是冷月照僻壤，丝丝添怨怅，秋风飒飒更惹得悲戚一场。佢万里崎岖远渡洋，雁燕分飞数月长，未有音书送寒舍上。焦急倍神伤，夜阑静处不禁猜想。波翻声声叩心窗，浪涛伴痛伤，木房自叹想，安得相思寄家乡？千叠恨，恨满腔！只怕音书杳，至亲更彷徨，她掩面凭栏含愁带悲依望。禁不住眼泪滴襟上，点点带伤创，夫君远去瘦削了家中高堂。佢日子里思忆痛味尝，夜里思忆暗断肠，病态恹恹瘦骨样，哀哉怨离殇。我亦然为你悲切分张。唉，我也朝里思，暮里想。遭困羁，恨未央。多番苛审太披猖！致使两心隔绝洋。忽听隆隆炮声响！心惊怕，神欲丧。恐今世，难随唱。惆怅！惆怅！绝唱！绝唱！命中有恨长！只可盼祷梦魂渡远方！

开放与文学

文 顾偕

当我在广东一个远离都市喧嚣的小城镇，得悉日本同仁对此话题感兴趣时，或许因了某种提醒，我对20年来萦绕于周身的事物，骤然有了一些个人的感想。在我尚未谈出这些想法前，首先我要感谢在座的诸位：正是大家对文学的格外关怀，人性于这个世界才没有被淹没和遗忘；正是所有爱好沟通的人们一直以来艰辛的精神努力，人类的生活才不至于如花朵那样枯萎，相反在一种理想的浇灌以及信念的渲染下，于一个新的世纪更显现出了健康和高贵。请允许我用那种诗人不能没有的激情，来谈这些可能属于瞬息万幻的问题；请允许我能与诸位一样，在眼前多姿多彩纷呈着无数形象的年代，暂且不把那些进行中的潮流和一种社会能力的辉煌，单纯地急于看作是今日文学的答案。开放的故事必然会有许多，还会有许多，但每一位作家或者诗人对繁荣的反应，对某一个伟大时期的认识，却永远应是冷静和独立的，它绝不应当被一些鲜丽事物赋予的利益，就这么轻易吞噬掉。任何一种精神产物，倘若仅仅于外在恩惠的沐浴下，很快就丧失心灵的警觉和曾经保持过的独创性，如此，所有的观念将会变得荒谬可笑；所有由享受支撑起的视野的发挥，无疑则会流于短浅或欠缺成熟。当然对于我们来说，对于长期在贫困中已然能够获取不少富裕的中国来说，20年来的开放，兴许还只是序幕的刚刚拉开。因为某些固执的传统，仍需要在新兴的生活中过渡；许多漫长的展望，至今仍未于现实的胜利中完美地形成。虽然我们早已同世界一起在倾听未来，却由于起步稍晚及其他历史原因，一个民族的崛起抑或这个民族在迅速进入整个全球的时代担当起重要角色，恐怕只有在今后的改革中拥有更多的良性循环，方能真正完善这一使命。尽管今天这些开放的背景，为我们一度僵化的文学，明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尽管竞争打破了平静，自由气氛使我们再也感受不到有任何意识的阻力；尽管宽松为我们提供了畅谈思想的园地、井然有序的发展秩序，让我们终于领略到了某种写作优势和实践的尊严；尽管有许许多多我们早年无法预料的昌明的因素，在向今天推移的延续中，很可能还须加大理性的补充，但文学作为一种并非完全的旁观者，在此经济的格局中能否面对影响的挑战，能否直面自身在市场的责任与作用，甚或能否以一种古老的智力水平与高度发展的商业时代成功



作者简介

顾偕，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广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地对话，且不失优美地再能于那些层出不穷的规律里，建立起一种自己所能理解的丰富的结构，这种与开放同样重要的工作，这种永远不会结束的似乎来自一个文学宇宙的另一种新的开始，现在看来不是单靠启蒙或仅凭知觉的回顾，就能一下于倾泻的文字中圆满地完成的。

开放是什么，文学在开放的大环境下，通过对现实连续性的描述和想象的提升，究竟能意味到什么，我觉得进一步弄清那些沉睡的实质，其价值和意义大概绝不会低于任何一部作品完成的本身。过去我们受客观条件和主观立场的制约，受文化的禁锢和某些无谓的道德束缚，很难诚实地面对现实，很难有充足的理由深信自己对事物的判断；过去我们很难在一种真相前，有胆识地表达出所有迫切的追求和愿望，今天那些失落的机遇一一降临了，在多种令人振奋的空间，我们除了心安理得，今天难道不该让所有情绪的审视更从容一点吗？难道不该让创作这神圣的权力，在一切感知的范围内，更多地去接近些本质的东西吗？文学从来就不是对现象的浮光掠影。何况在一个开放且同样有着深沉意味的时代，以什么样的感悟来鉴别一种现代的进步，以怎样的思维魅力去改造一种现状的精神领域，全在于我们首先要有一种独立人格的鼓励，方能把握住灵感的公正；全在于我们拉开眼光与现实的距离，才不至于使理智于激烈的线索中泯灭。作为一名诗人，我之所以在今天这个高明的社会，还愿意掌握一门原始的艺术技能，是因为人类还不欢迎冷漠，是总在超越着什么世界至今仍期望能有一种血液，继续会以那种永恒的韵律，悄悄在一切奔波的时间里流动。

同样，怎样使开放的事物保持平衡，怎样使那些远离的岁月，仍具有一种回忆的亲近，且使火焰不再流露忧郁，且使里程减少彷徨，这都是文学的境界所能为开放的世界，最终必须树立起的人性的标准。

我们庆幸文学仍然能以一种鲜明的姿态，加入到所有开放的行列中。纵然文学的功能难以为整个复杂多样的社会于根本上主导起什么，但它那种每每多于现实的心灵展示，无疑会使人们从中看到一种总与个人命运息息相关的希望，一种永不至于会在时间中衰落的精神权威。任何一部优秀文学作品的诞生，向来都不是对当时生活浓厚的模仿和翔实的记录。它既不会为那些生机勃勃的事件，简单地于文本中排列一种秩序，也不可能将那些源于沉重的思索，有意无意地粉饰成流行的需要。一部深刻的作品，果真得益于一个时代的话，那它同样也应当具有这样一种情感和思想的活力，能在合理的准则下为广大读者开创出一个自己的时代。我喜欢把开放看作是今天又一种文明的盛行。资本的增长、经济的兴起、不断加强的市场福利、各种程度的现代发展神话，等等，一系列日趋完美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有助于我们形成新的写作程序，有助于让我们的接受来进一步说明：由于开放，世界的许多事物，今日都成了人类传统美感来不及选择的意外。矛盾所富有的启迪性意义在开放和变革的密切联系中，再度引导起我们某些颇具古典意味的思维。文学在这种新的环境及其状态下，如何完成一种没有障碍的言说，总体上讲，依然取决于它对一切自然进程，该持有哪种超越的认识。

我个人认为：无论什么样的开放，它都是积极的，甚至是革命性的。因为当今人类的理智，大都已不会在整体的进步中，再度沦为某些负面“幸福”的奴隶。如果说今天的中国文学，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显得较为丰富的话，这种活跃的势头，毫不夸张地讲完全归因于一个社会的全面开放。试想倘若没有政治的清明作为创作的基础，没有能使作家充分利用的外部宽松的多样性条件，来奠定与一部作品相适应的内在的稳定，我们的文学精神，能在那种连起码的自由都丧失的情形下，实现一种较高信仰的目的吗？以往那

种无尽的落后的反思，总在封闭中自我陶醉地揭示着什么。如果我们的社会一直都高踞着这样一种孤独得愈发蒙昧的文学，其文字张力又能为未来带来哪些美好的影响呢？所以说，开放是美好的。总体上来讲是值得人类推崇和提倡的。它使一切文学艺术在一个势不可挡的世界里，相形之下不仅变得更加敏锐，使所有人的天性在得到释放时，还有机会平静地来看待文学于一种现代性的压力下，究竟再能为社会做点什么。因此，曾经荣幸充当过一个时代“代言人”的文学，在一个开放的年代里，它一度甚于其他许多“理解”的话语权，如今不少已被公众更多的要求更换了。这就是说，今天的人们在热衷追求形式的同时，事实上也不无期望文学一样能有一种乐园气息或更刺激的成分，以此来把生活一齐向前愉快地推进。

满足时尚不一定全是坏事。而问题就在于这么做，文学应当基于怎样的一种动机和有哪些较为深沉的考虑。中国历来有“寓教于乐”的说法，文学虽然不是取悦于什么的媚俗工具，但以其独特的色彩机智地参与社会改造，绝不机械地去人文化地提升一个社会的品质，这在今天，依然是我们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任务之一。

17 世纪初，日本德川幕府曾采取锁国政策，以期在闭关自守中保持一种尊严。这种持续了将近两百年的扭曲梦想，如果不是因了明治维新以来真正的开放，今日经济卓越的日本，恐怕仍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中。由此证明，开放对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而言，都是重要的。开放不光能使人类的心灵普遍友善地相通，且使艺术在一个不受限制的世界里，还能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光芒。正如很久以前的日本，借用汉字，形成、发展了自己今日的书写系统；借鉴儒家学说，更改其道德标准，至今仍广泛应用于自己的社会结构。20 世纪的奈良和京都，同样不乏中国唐朝时期的长安遗风。在这些显然也有着你们自己鲜明特征的建筑文化上，我们不无欣慰，一个国度正是由于早期的开放，才有了今天这种理想化事物的反映；正因为人类共同富有一种进取心，最初的高尚道德，至今才没有被种种时代的需求削弱或取代。回到文学的层面，若是一种创作在任何变化的速度面前，不能以内在的和谐与外在的发展达成相应的默契，不能以自身的接触促成一种理性的完成，并使感性关注成为一切的精神力量，那么，所有开放的步伐一旦抛离了黯然失色的文学，且使那样的文学再无保持下去的必要，也就不足为怪和无所谓痛惜了。因此我深感到：文学的使命永远是艰巨的，这不只是因为要面对一个开放的时代，而更须正视的，也许还有那种我们于某种局限中至今未能看到的永恒。

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灿烂文明的古国。在一个极为漫长的时期，农业曾是这古国整个社会的基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节奏，或许因了这种原因，一直以来在诸多无奈中，仿佛只好听任于所有的缓慢。但借以支撑一种庞大生命的任何有利的因素，历来都是有限的。文明的发展有时需要轻装简行，担负重荷的宽厚背脊，如若在五千年后的今天，仍不愿为开放让步，那一切丰富的遗产也只能遗憾地终止成为现代的古董。今天，我们的开放与其说姗姗来迟，倒不如说更合乎时机。在静止中积累，于落后中彻底解放，化不幸为深刻，以明智的反思迎来特殊的剧变。所有冲破耽误的每一种划时代趋向，对同时也赢得了一种透明进而能够丰富阐述什么的文学来讲，无疑也是难得的幸事。

故当今中国作家要做的，是使自己的观念与经济建设，彼此间形成一种同质的联系。因为文学的归途就某种程度而言，与任何社会最终发展的结局，其极限的逻辑应当都是展示某种均衡和对生命的维护。所不同的是，经济建设通过技术外延，来强调一种事物对世界起到的作用；文学则利用意识的内化，让人们间接地都能有机会看

见自己灵魂的力量。二是永远不要把文学看作是与开放隔离的部落，以为其优雅就在于发挥诸多善感的内心，以为拒绝外界的影响才会有更多美好的构成。甚至憎恨财富、排斥先进，偏执地自信只有一成不变，文学在自己的黄金世纪方能显示出孤独的珍贵。实际上创作若是真这般纯粹，那样的作品必然是软弱的、无法进入历史的。今日之中国，可以说是已处在一个有史以来最为繁荣的时代。作家在这样的时代继续需要做些什么、能够做好什么，我想这些问题丝毫不会令文学为难或尴尬。政府不会来干预和垄断精神领域的创造，更不会剥夺谁的写作权利，作家的想象可以不受限制地施展。因为早已没有“奉命文学”的约束，如何能更好地完成一部作品，反倒使作家顿生起种种困惑，这包括在开放的年代里，因看不明白各种差异而由此断然舍弃了创作的那些作家。

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举世瞩目的事业，都还只是一种初级阶段。然而正是这万里长征般的第一步的迈出，已使人民对自身的生存与以往相比，有了截然不同的感受。他们在无数非凡的转变之中，找到了迷失的自我；他们在风和日暖的大地，尽管受着开放的种种滋润，却并没有放弃由此而更需要引导自身的善恶观念。作为同生活有着某种有机关系的文学，如今以其继续关注人类发展的信条，已自觉地问津于各个领域了；一些更为美好的盼望，已在作家们的笔下有了预测；一些前进中的胆怯、沮丧、气馁和怅然若失，也已在许多作品立意弘扬一种光明所塑造的那些人物性格里，逐渐得以克服。我们有信心能用文学这一特殊的综合性反映，来揭示现时社会尚存的某些基本问题。我们乐意被开放召唤，并让文学与之相伴相随，将一切发现更多地付诸到一种完美的文学实践中去。虽然中国文坛有不少冲突的话题至今仍还争论不休，但文学必须遵循的一些根本性原则，则从未有过动摇——即对人类伦理持久的衡量，对黑暗永远的摈弃，对未来的一再敬重，甚或对反叛倾向理解后的宽容。开放全然不会为文学带来任何隔阂。文学在每个时代所占有的永恒的一席之地，因为一直有着自身无尽的开端，有着其浓郁的生命的标志，所以它无论处在人类的哪个时期，都绝不会被一个需要进步的正常社会，无端地从人们的现实与梦想中剥离开来。

如此，一个关于“开放与文学”的适时话题的论证，于文学的本质来说，似乎意义又不是那么大了。但也不能完全认定一种开放与文学的兴衰递嬗，绝无任何值得我们注意的联系。

较之以往，今天的中国文学呈现给读者的内容，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讲，均让人宽慰得多了。社会的每一次新起点、新形态的闯入，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应用裕如的福祉。质量的包装、精巧的制作、边缘艺术的身价、前卫和先锋与传统手法热闹的媲美，乃至令人振奋的诗性的辩护以及绝不耽于形象的哲理小说，凡此种种，这在曾经封锁着梦想的岁月，几乎是谁都不敢设想的。如今，我们懂得怎样以文学来协调人类在开放中的每根古老神经。习俗依然成为惹人注目的故事，只是于一个新世纪，人们对这些故事的要求不再模式化，相反期望有更多更好更高的寄托。

作为一种生活的采集者——文学，究竟能在类似 2000 年这样一个颇多商业循环的时代，还能得到多少能坚持发挥什么的益处，或者说过于被繁华所扰，文学是否就此便降低了自身的品位，这完全取决于一位作家在与开放共存时所抱有的某种价值观。耽搁了将近十年探索的中国文学，不能说它的损失与当时整个民族所遭到的伤害不同样是灾难性的。但正义和顽强，终于使我们走出了无知与黑暗；时代的复兴和文化的正名，毕竟又使中国文学在历史的重要转折关头，迅速恢复和明确了自己的身份。在最初的那些开放时期，正是由于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对社会

的引导，苦难的民众这才立时找到了心灵的安宁；正是文学所耸立起的良知的支柱，邪恶才迅速失去了那种能够诱惑整个世界的魅力。今天，文学在中国，有着全球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比拟的社会地位。这种精神劳动，虽然不能像经济建设那样全方位地服务于社会，但它提供给社会的特殊营养，却依然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欢迎和尊重。

谁都没有对文学失望。包括每一位毕生旨在完成一部传世之作的作家本人。至今谁都愿意这样认为：越是在开放的年代，文学越是必不可少，因为在这个难免充斥着不少无聊信息的眼花缭乱的现今世界，唯有一种淳朴的文学，大概仍然是最为诚实的。

我们还能想象有哪种类型的终极关怀，有比作家们对世界的认识更为善良的吗？我们还能想象有什么比开放的时代更美好的敞开的世纪，能使文学今天可以这般随意地倾诉人性的梦想吗？陈腐的事物在逐渐崩溃，压抑的理性陆续得以释放，付出的代价均能有所收获，作家们在这样一种异乎寻常的前提下重新拥有生活、拥有对人类的爱情，难道他们的作品如今一旦少了不必要的抵触，就再也没有了生命力吗？我想，这个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事情，一直都是相悖的。

让我们一同来想想文学在未来再能够做些什么吧。因为开放已使人类清醒地意识到真理从来都不是免税的。



《紫气东来》
涂鉴明（广州市从化区美术家协会主席）/作

阳光下的风筝

文 杜镕淏



作者简介

杜镕淏，1999 年出生于广州。高中毕业于广东实验中学，本科就读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主修东亚文化研究，曾交换至香港中文大学。

飞机落了地，风筝上了天。

飞出去的留学生，就像放出去的风筝，在天和地之间飘荡，时近时远。

到达美国圣巴巴拉的第一周，阳光猛烈，我竟有种无所遁形的不适。到了开学第一天，却转成浓雾弥漫的阴天。从宿舍出来，那仿佛从海里行进而来的浓雾迷住了我的双眼，看不清远处的路。头顶的云却是一层一层、一朵一朵的分明，如同置身于灰白色的梦境中。刹那间一阵目眩，脚下轻飘飘地，路都走不稳了。这梦境却不尽是美好的——寒气随着这浓重的雾，钻进我的衣裳，贴在我的前胸后背。我不由得打了个寒战，打开手机，收到噩耗。爷爷走了。

其实我心里早有准备。在出国前的一年间，爷爷一直辗转于广州各家医院的住院部。还记得有段日子，我每天放学探望他，给他买晚餐，扶他从被窗帘映成蓝色的病房里走到旁边的小阳台上看风景。记忆中的爷爷似乎就停留在此了。后来爷爷身体状况愈加恶化，再难见到他起身走动了。衰老是自然的规律，是不可违抗的事情。我明白，心里也默默接受了。只是没有想到，它会发生在我在美国开学的第一天，这朦胧的雾里。

现在回想起来，刚开始大学生活时，我也算是有努力地融入：选了当时很笃定的专业，继续我高中开始的合唱生涯，加入了剑道社。只是结果不尽如人意。语言差异让我在传播学课上成了个战战兢兢的哑巴，腼腆的性格让我参加剑道社成为每周例行的公事，我唯一表现优秀的合唱团却让我越离越远——唱的都是教堂歌曲。这时才醒悟，我所喜爱的并不是合唱，而是高中时唱的



杜镕溟（后排右二）获2018—2019日语课卓越奖

色·恩克巴雅尔老师写的民族歌曲。于是我参加竞选加入阿卡贝拉团，在试唱时败下阵来。我至今仍记得试唱结束后的一件荒唐事。在问完一系列个人信息后，领队冷不丁地问了句“你最喜欢什么宝可梦?”我愣住了。宝可梦？我觉得我听错了，可是我实在想不出那还能是个什么词。再说，美国学生社团不问点奇怪的问题才奇怪呢，就老老实实地回答：“皮卡丘。”所有人大笑：“Oh Yeah，皮卡丘!”总之我落选了，而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是否回答正确。

偶然看到学校交换生的宣传，居然有清华北大的项目，遂记下了中国区项目讲座的时间地点。沿着门牌走到了一个陌生的门口，推门一看，是一个狭长的小教室，仅能容十几人，与之前的日本项目讲座教室规模相去甚远，不免有些失望。工作人员噼里啪啦照着 PPT 一通读，我听得意兴索然——清北复交都不允许中国籍学生报名。能理解，否则开放了的话交换过去的就全是“假老外”了。我打了个哈欠，准备悄悄溜走，寥寥几个观众却发出了超出我想象的分贝。定睛一看，天坛、长城、地铁、小吃以及没什么特别的树和景……参加过这个项目的学长学姐在分享他们的经验。学长学姐们都是 ABC。“中国的食物太好吃太便宜了！中国的公交太方便太便宜了！中国的景色太美了！中国的学生太聪明了!”看着学长学姐一个个在座位上眉飞色舞，对许多我司空见惯的东西大放赞美之词，我的眼眶不争气地有些发热。怕被人发现这不合时宜的

情绪，我不敢再望向任何一人，默默地望向窗外，加州的阳光、树和鸟鸣。

后来在种种机缘巧合之下，选了两节课。当时只是抱着“上着玩玩儿”的心态选的，后来却奠定了我做出选择专业的决定。

其一是道教课。教授是在台湾待过的加拿大人，翻译了《抱朴子》一书。课程要求读《道德经》和《庄子》。我对庄子那自由豁达的哲学一见如故。那时候我对向外国老师学中国文化这件事儿还感到很新鲜，看到课件上有繁体的中文字，或是认识的地名人名，定要把它念出来，然后自己激动一番。美国同学们倒是一个个冷静得很，只是一涉及某些特别的话题，他们就全部振奋起来，不停地提问，问一些很美国的问题。比如，提到房中术，他们就想到同性恋，“同性恋怎么练习呢”；采阴补阳也唤醒了他们的学术精神，打破砂锅问到底；讲到炼内丹会缩阳入腹，就发出“喔喔”的怪声。

上这课什么都好，就是手要受罪。教授为了确保出勤，不分享课件，要学生上课认真抄笔记。可是每节课的容量颇大，他讲课速度也快，我们时常跟不上他的速度。有一回，和我一同上课的东北同学正抄到酣处，抬头一看，课件已经切到下一张，情不自禁，大喝一声：“操”，清脆响亮、字正腔圆、头鼻胸三腔共鸣饱满，在所有人奋笔疾书的安静教室里格外突出。我连忙拉住他：“干啥？这老师听得懂中文。”同学也知道自己闯祸了，脸涨得通红。老师倒是哈哈一乐，“要不要倒回前一页?”如此尴尬的场面还出现过一次。老师放了一段某法国人拍的福建某村宗教仪式的视频。被选中的少年坐在一张竹椅子上，被轿夫上下左右来回甩，脚下背后还绑着刀片，看得人胆战心惊。在如此紧张的环境中，镜头一转，对准一个小孩儿。小孩指着镜头大叫：“洋鬼子!”哄堂大笑。同学打趣：“完了完了，咱们走不出这教室了。”

另一节是日本电影课，算是我的电影启蒙课了。无论是小津安二郎的《晚春》《东京故事》中代表性的日本物哀美学，还是给了我极大启示的黑泽明的《生之欲》，都影响并构成了我的认知和审美。但那些都是归于日常的学习，真正让我感触的，是这节课的助教李老师。李老师是中国人，在本校读博。在美国读博的国人很多，所以中国助教也很多，本来是不足为奇的。可是她是我遇到的第一位坦荡荡展示自己是中国人的助教。我们要看许多电影，但学校版权不全，在美国的网站上租看需要一笔不菲的开销，李老师竟向满屋子美国人推荐了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看着这些熟悉的图标和界面出现在课堂屏幕上，还真是挺意外的——身边的中国学生尚且偏爱美国的 YouTube，现在情况逆转过来，还是多亏老师的建议。

学期中恰逢中国的春节，大年初一，食堂装饰得红彤彤的，墙上贴着红色的纸，写着“Lunar New Year”。我满心期待，每每食堂被特别装饰的时候，准是某个主题日，供应应节的美食。我关心的是在这一天，总能吃到点儿正宗的中国菜了吧。环绕食堂一周，唯一与平时不同的是多出来的“中国新年饼干”。这倒是个新鲜玩意儿，我一个中国人都没听说过中国人过年吃饼干。拿了一块，放进嘴里一咬，超标的糖分在嘴里肆虐，典型的美式甜点。从食堂出来就去上李老师的课。她还卖了个关子：“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并指挥一屋子不同肤色的人一同说“新年快乐”。在他乡听到来自不相熟的人说“新年快乐”，那种格外真诚而复古的美和喜悦，却是回家过年无法体会的。

升大二时，大一时的中国舍友拉我合租，我嫌远，他就答应接送我上学。于是我、他和他女朋友合租了一套两卧的公寓。回来一看，他买了一辆两座的敞篷跑车。我只好每天坐着半小时一班的公交车上学。

我总坐在靠窗的位置，车上的 40 分钟有清风与我做伴。上学的路上有矜持的薄雾和明媚的晨曦，返程有金黄的夕阳和红紫的晚霞。一天傍晚，我坐在常坐的窗边位上出神。加州的夕阳依然灿烂，金黄而泛着温暖的橘红色的夕阳洒满这寻常的日子，公路、汽车、天空中拍翅的鸟，都是金黄色的，闪耀着光辉。一切都是那样的平常而宁静，像一部流金的默片。一段弦乐响在我脑海，给这默片配乐。我侧着脑袋仔细摸索、回想，赫然正是高中下午第一节课的下课铃。它是马斯卡尼的歌剧《乡间骑士》的节奏。我最爱这曲子的尾句，它收在了一个高的调性中心，像一朵酝酿了许久的烟花，最后一刻绽放开来，壮烈、辉煌、可歌可泣、转瞬即逝，渲染了一种终结的美。不知是夕阳给这曲子增添了色彩，还是曲子的灵魂充实了眼前的景象，再听这首曲子，眼前总出现一片金色的阳光。

大二刚开学，偶然在微信群看到学校华人足球队招新。虽然我的水平停留在市里初中的班级水平，但抱着认识新朋友开始新生活的心态，穿了件恒大球衣去踢了一场训练赛。一同加入的新人大多是大一新生。有一个小学弟特别可爱。他皮肤黝黑，上身穿着曼联的球衣，看起来跟我身上这件一样，有些年头了，而且像是地摊货。下身穿着条普普通通的运动裤，不成套，颜色也搭配得不协调，不是个在穿上讲究的人。他不爱说话，一直沉默着，只是回应队友时“嗯”得格外有力。他的踢法也跟他的形象一样，硬朗、愣头闯，朝着流星般飞落的球就是一大脚，面对对手的拦截就是闷着头带球冲锋，没有花招。中场休息，只见他从书包里掏出手机，飞快地点了几下，就把手机放在耳旁，朝着傍晚普照刺眼光芒的斜阳踱步。他的声音却不是硬汉的低沉嗓音，全然不同，甚至与他的形象反差很大。那是奶声奶气的声音，和奶声奶气的语调。他应该是四川人，听着像是四川话，“今天上了地理课，老师很好……”我只能依稀辨出几个词，但是称呼我还是能听出的。不仅能听出，还觉得很好玩。他连叫了好几声“妈”，每一声都拖了一下，有一个向上提的尾音，听起来怪委屈的。我看着刚刚还在球场上碰撞的硬汉跟妈妈撒娇，偷偷地笑得合不拢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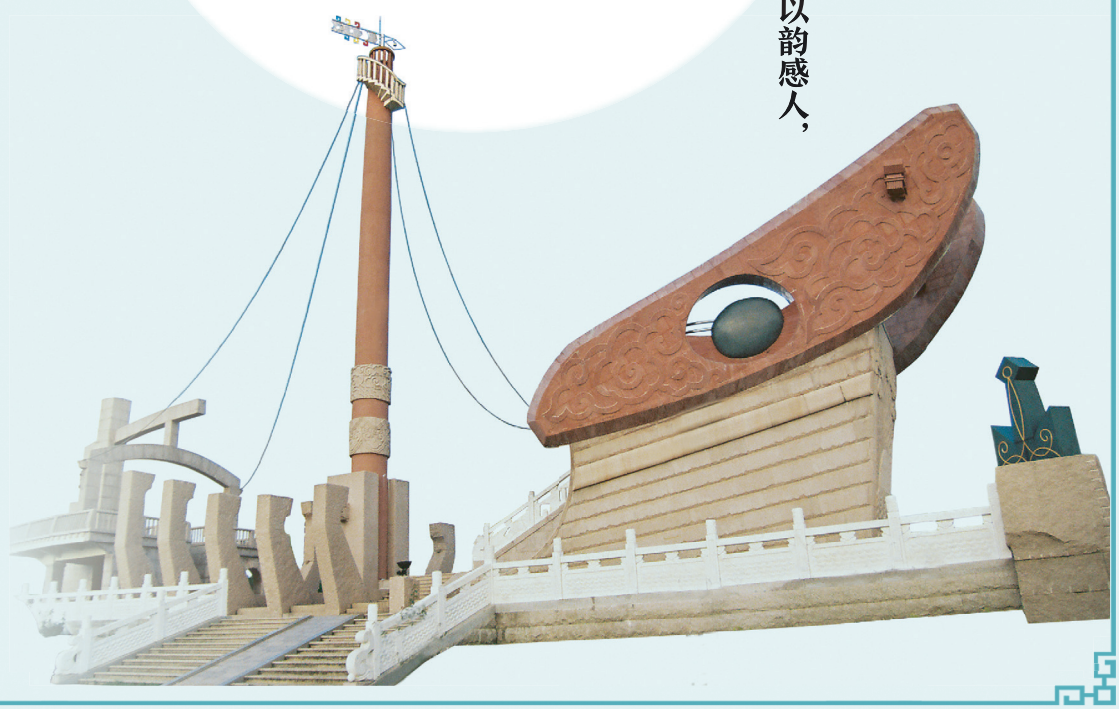
我还听到过大西洋边的二胡。一天下午没课，厚厚的云层把天空绘成灰紫色，我突然想到大一时住的宿舍区转转。宿舍区靠海，海风一阵阵地迎面吹来，很舒适。夹杂在风声里的是隐隐约约的二胡声。在美国的海边居然有二胡声？我在一张隐匿在草丛中的板凳上找到了乐手。一个男生面对大西洋，伴着海浪声和海风拉着二胡，乐声委婉浪漫，一个女生静静地坐在他身旁。随风摇曳的杂草仿佛是随音乐摇晃的观众。草丛外，海与布满云的天空都是深沉的，海天交际处却是明亮的白色。我不好意思驻足，慢慢地经过他们，悄悄地聆听着音乐。

春假只有短短的一周，但我没想到会被同学拉着回国，更没想到是他。这位同学跟我来自同一所高中，出国前却互相不认识。他英语极好，看英文书、听英文说唱，走在大街上那派头都会被认成是 ABC。大一刚到美国时，也是迅速地跟美国人混在了一起，出入于各种派对。一年过去，整个人却是一百八十度的巨大转变。如今周末常常约我吃中餐、聊人生、聊中国与美国，感叹自己的生活“不够中国”。我一直以为他是比我飞得更高更远的人，是真正生活在夹缝中的留学生。只是如今看来这飞在高空的风筝，还是被风筝线紧紧地攥在手中啊。

广东侨联工作 文化交流品牌

风韵南粤

弘扬中华文化，支持海外传承，以文化人，以韵感人，
讲好美丽中国故事，助推人类共同发展。



民国年间潮汕侨批中“家费”的表述方式

文 张钊（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编辑）

近代以来，包括潮汕人在内的海外华侨大都会在异国他乡奋斗的同时寄款回乡以满足家用，“侨汇”因而成了海外华人社会与侨乡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历史产物。关于侨汇的用途，学界已有很多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林金枝在《析华侨汇款及其作用》（《八桂侨史》1996年第3期）一文中将侨汇用款分为赡家与投资两类，并将赡家用款分为生活费用、购买土地、修建房屋、建造坟墓、婚丧喜庆等几大类。冯元在《侨汇与广东——1950年至1957年广东省侨汇款的考察》一文中则认为：汇款的用途分为赡养家属和事业投资两类，其中赡养家属的汇款主要用于家属的生活费以及买田造屋和造坟。显然，家庭生活开销是侨汇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潮汕侨批资料的问世，相关的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大多聚焦于一系列社会文化问题，对于侨批中的文字表述关注较少。事实上，华侨在汇款的同时往往会修书一封并在信中提及汇款的金额和用途。那么家庭生活开销这一项支出在一封封侨批中是如何被书写的？主要的表述方式有何特点？背后反映出了什么问题？相关问题无疑值得关注。本文拟就民国年间部分寄自泰国（旧称“暹罗”）的侨批中有关家费这一项支出的表述方式进行介绍，以期对侨批文化和侨汇产生更直观的认识。文中所引用的资料全部来自《潮汕侨批集成》（1—108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7年、2010年、2015年分三辑出版。

一、言简意赅

民国年间许多封潮汕侨批中有关家庭生活开销这一支出的表述方式都是直抒其意、言简意赅。其中最为常见的方式是使用“家用”一词。如一位名叫许振高的华侨在寄给家中大嫂的信中就说道：“兹缘付去一函外并银六元，到时查收以资家用……吾侄入学未审每年若多否?”他在另一封寄给大嫂的信中又同样表示：“兹乘羽便呈上函外并银十元，到时查收以为家用可也。兹者开春吾侄可送入学，是为至要。”

相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一位家在揭阳的华侨就在信中对母亲说道：“顺便付信局寄到大洋十五元，信到收入家中之用。另者儿在九月之初入谷廊，至十一月尾仍无利可取，未有利可分。如有利可分，自当再寄。”一位家在潮安的陈姓华侨则在寄给家中母亲的信中表示：“兹奉上国币三万元，至望查收家用。”他的一位潮安同乡同样在寄给双亲的信中说道：“今顺便付信局带去国币五十万元，到时查收以资家用。”家在澄海的曾为城也在寄给妻子的信中简短地交代道：“兹付去国币三十万元以应家用。”杨炎奎则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如此言道：

缘因迩来雨水不均，对于生意不佳。又况迩来币制不定，影响泰京各银信局。批局一度收批打回，一度停止收批。故此才延至于斯才寄信，致使家中乏银需求费用，而使大人之忧耳。伏维谅而恕之，泰中诸人老少平安，大人玉体及妹谅卜康健为颂为祷，兹奉上香港币三十元，至时查收家用。

除了“家用”这一常用词汇外，侨批中对于家庭生活开销也有其他形式的简洁表述，比如使用“家费”一词。一位华侨在寄给父亲的信中就说道：“兹遇火轮透汕，顺寄前埔泰万昌住铺携来一函并大银三元，到则检安祈为家费耳。但儿刻下未有事业可做，候近前有事可任，自当多寄，千祈免挂也。”也有澄海籍华侨在寄给儿子的信中表示：“兹付国币一万元，到时查收，籍补家费。”

还有一些与“家用”一词意思相同的词汇被用于指代家庭生活开销。一位名叫陈贤耀的华侨在寄给双亲的信中就说道：“兹因信局携信之便，奉上中央银五十元，到时查收，以应家需。”也有华侨在寄给家中兄弟的信中言及：“今奉上金圆券二十五元充作家中正当用度。”

简而言之，“家用”及其同义词是侨批中有关家庭生活开销最为常见的指代和表述。

二、分派与结余

一笔侨汇的受惠对象时常远不止一人，因而华侨往往需要在信中就汇款进行细致的分派。如一位华侨就在寄给母亲的信中说道：“兹逢轮返汕付上国币三十五万元，到时查收。内二万元两海嫂收，二万元二婶收，二万元外祖母收。余作家费也。”澄海籍的许利扶在寄给母亲的信中这样说道：“兹逢轮船回塘之便，奉上大银二元到时查收。内抹一元与众弟妹作为物食之用，余元以应大人寿诞之喜。”一位同时寄钱给妻子和父亲的林姓华侨则在信中如此说道：“今逢轮回国之便付去信局国币三百万元，到祈查收。交谢氏二百万元，一百万元为父亲伙食之用。”也有同样来自澄海的华侨在信中向母亲表示：“逢邮之便奉上港币五十元，至时查收。内计五元分给孙儿为糖果之用，其余收为家用。”

显然，这些华侨是采取“分派与结余”相结合的方式来表述侨汇中包含的家庭生活开销。无论是具体分派给某位亲属的钱还是结余留作家用的钱，都是侨汇的一部分。与此相类似的是，一位名叫杨捷崇的澄海籍华侨在寄给母亲的信中说道：“今逢轮船透汕，顺便奉上国币十二元查收。内抹三元交吾妻付还欠银，余存之项家中之用。”也有揭阳籍的华侨在寄给家中母亲的信中表示：

今适轮抵汕之便，寄上大洋银四十大元。信至之日，祈即检收以应家中之用。儿在唐之日，欠大弟兄之二十元，可暂还他费用。暹中人等平安，祈勿远念。可抹出银二元已为母亲肉仪之用，抹银一元与维添胞兄嫂之用，抹一元与分水大胞姐之用。

同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如刘梓磐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吩咐道：

寄一百元到时查收，内抹十元吾母收用。另抹五元璇卿妹收用，又抹二元梓梅嫂收用，又抹二元梓楠嫂收用，又二元梓真嫂收用，又抹二元梓名嫂收用，又抹二元梓乔嫂收用，又抹五元交婶母大人收用，余积存七十元以助家用。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而言，分派给各亲属的款项总额通常远远少于结余。黄钦恭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就说道：

兹值阴历岁终，故特寄上一信洋银四十二

元。内抹出银交大姐二元、二姐二元、三姐二元、细妹二元、林氏一元、外祖母一元、姆母一元、钦木兄一元共十二元，余三十元为家中之用。

薛芳兰在寄给母亲的信中也说道：

兹乘轮便奉上国币二十元，内计奉上大伯母一元，三伯母一元，细婶母一元，细叔父一元，以为茶果之需。我妻一元，裕福一元，以为零用，到时照为分发，余者以充家费。

华侨在侨批中以“分派与结余”相结合的方式表述和指代一笔赡家性的汇款无疑是非常高明的。这样做既可以显示对某位亲属的关心，也可以同时体现出一种为家庭考虑的大局观和责任感，既维系了个人感情，也确保了家族的整体利益，可谓一举多得！

三、以实物指代

除了以上两种方式外，华侨还会在侨批中以日常生活中的实物指代家庭生活开销。其中最为常见的要数“米”了。杨惟良在寄给双亲的信中就表示：

然而塘中一切行情，各物皆贵，儿已都知。前接家信，内中说及今年米粮到食。儿想自前所耕的田很少，米粮哪里到食呢？儿今在暹，不能想出你说的话。今只奉上国币十元，表通情事。请你一一从实说明。如若要用银项若干，可通函知。后信自当多寄家用。

他在两年后另一封寄给双亲的信中又说道：“现刻塘地米薪腾贵，未知家中每月要用几多银米，祈来知。顺便承轮寄上国币一百三十元。”家在澄海的吕成鑫则在寄给妻子的信中言道：

桑梓百物昂贵，民难聊生。而吾不能在家分负重担，问心自愧！兹又闻天旱复临吾乡，不禁怅忆，吾家之田园尚能耕作否？祈顺示知。兹寄去国币五百万元，至祈查收。作储粮食以防饥荒之用。

“薪米”一词的使用也比较常见。陈海泉在寄给母亲的信中就表示：“今承羽便付上大洋银六元，到时查收以为薪米之需。”同样家在澄海的陈锦辉也在寄给祖母的信中说道：“兹逢轮便呈上一札并大洋银五元以应家用……内抹大洋银半元分祖慈大人收用可也，余存之项吾母亲大人以助薪米之用。”一位家在隆都的华侨在寄给儿子的信中吩咐道：“兹有轮透汕之便，特付家书一封，寄交吉成昌信局带去，外付龙洋银二十元。如信抵日，当照拨点收，聊作薪米等费。”也有华侨使用“柴米”一词来指代家庭生活开销。如林如奎在寄给妻子的信中就表示：“今付去国币十元，至日查收。为资家中柴米之用。”

对于日常生活中的家庭开销，中国人大多以“柴米油盐酱醋茶”形象地加以概括。常言道：民以食为天！因此，使用“米粮”或“薪米”等词来指代家庭生活开销无疑是非常贴切和通俗的，同时也显得足够形象和传神。

由于生活在侨乡的普通百姓严重依赖侨汇过活，故华侨在寄款时也须费一番心思。直抒其意、言简意赅或者通俗、形象的指代既反映了侨汇的真实功能和性质，同时也迎合了侨乡对侨汇的需求，充满了极强的现实感。而之所以出现“分派与结余”相结合的表述方式，一方面是出于平衡家族成员之间利益关系的考虑，另一方面也是侨汇所带来的压力造成的。可以说，正是侨汇的实质以及家人对侨汇的严重依赖决定了华侨在侨批中对家庭生活开销的表述方式。

泰北华人对“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落实的影响

文 曾伟富（泰国玛希隆大学亚洲语言与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即“GMS”）是首个由澜湄流域六国共商共建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是“中国—东盟”的区域发展平台，深化“GMS”对澜湄流域国家共同开发湄公河资源打造区域国家共同发展和繁荣的共同体有着重要的意义。为了进一步将“GMS”打造成以项目落地为标杆的区域合作项目典范，自 2014 年李克强总理在第 17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提出以“政府引导、多方参与、项目为本”模式运作的澜湄合作倡议以来，早期各领域相关合作项目有序推进并完成或取得实质性进展。要继续推进和深化澜湄合作进程，除了政府的引导以外，需要多方参与进来，共同促进各领域相关项目的构建、具体实施及完成，将澜湄合作高效务实的理念进行到位。澜湄合作的推广除了在国家官方层面进行，还需要社会民众的参与与响应，澜湄国家的海外华人作为一支社会群体，可作为促进澜湄合作进程的一股强大社会力量源泉。其中泰国华人相对其他澜湄国家的华人而言，经济实力较为雄厚，政治参与度较高，文化融合度较好。而分布在泰国北部区域的华人群体更为特殊，他们大多为云南籍华人，长期定居于泰国“金三角”地带，在缅甸、老挝、中国等澜湄国家有着丰富的跨国关系网络，能在融入当地社会文化的同时保留中国地方传统文化，做到“同而不化”，在促进澜湄国家经济发展及社会人文方面都极具优势。若能利用其独特优势使其参与到“GMS”中来，将能够对促进“GMS”的深化和推广发挥一定的作用。

一、相关研究综述

从目前可收集到的资料来看，有关论述泰国北部华人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果，研究方向有移民史研究、宗教研究、历史研究、华侨华人研究、人类学及民族学的研究。

湄公河·金三角流域



移民史方向主要有：段立生在《访美斯乐——泰国北部的云南华人村》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该地区的风土人情、生活情况；黄素芳的《贸易与移民：清代中国人移民暹罗历史研究》主要论述广东、福建籍的华人及他们迁徙历史和迁徙途径；泰国学者班依·拉姆盖撰写和发表《泰国清迈的中国云南人》，选择生活在泰国北部清迈的云南人进行研究，主要论述泰北云南人在泰国的历史与现状；彭雪芳的《探访泰北苗族》主要研究泰北苗族的迁徙历史和生活现状；潘少红的《泰国华人地缘性社团的历史考察》，从历史学的视角论述泰国华人社团的发展与演变；日本学者王柳兰女士在《泰北云南人的跨境迁徙与社区模式》一文中，分析了泰国北部云南华人定居的方式，还附加有一些云南人聚居地的地图。

宗教研究方向主要有：姚继德在《回族马帮与云南丝路网络——泰国北部云南穆斯林的个案研究》，以居住在泰国北部的云南回族华人为研究对象，论述了云南回族马帮与古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关系，以及他们向东南亚的迁徙；梁洁在《泰北的回族穆斯林及其族群认同复苏现象》论述了泰北回教徒的发展；冯瑜与合富祥在《泰国北部华人穆斯林的“跨国穆斯林身份认同”》一文论述穆斯林身份认同的活跃性与动态性，重新定义了之前被地理疆域所界定的旧有的“边界”的概念。

从华侨华人研究方向研究泰北华人的成果这几年出现较多，包括历史、华文教育、华人经济等方面。黄启庆、吴雁江在《泰北华人村华语状态及教育情况调查报告》论述泰北华文教育的历史与发展；泰国学者纳静安的《泰国北部云南华人的文化认同》围绕海外华人的文化认同，阐述作为跨界民族的泰国北部的云南华人的历史及其现状；黄昆章在《宽容与融合：泰国华人争取生存发展问题的思考——以泰北美斯乐“云南村”为例》论述国民党残军难民村的发展与演变历史；Saiyai Yamkonglert、杨柠聪的《论泰北云南籍华人的历史与现状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与传承：以美斯乐为例》，对第二、三代美斯乐华人的现状等进行了阐述；游辉彩、许邱良的《泰国北部美斯乐村华人的生活及经济状况调查分析》，以泰北美斯乐华人为研究对象，研究他们的后代的生活现状；余海秋的《近年来泰北边境贸易情况及其对中国云南省的影响》，论述泰国北部边境贸易情况的变化，分析产生这一变化的原因以及变化所带来的结果，着重强调泰国边境贸易对云南省的影响。



泰国清莱中华文化教育协会长期招募志愿者支援泰北华文教育　木可/摄

较早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族学的视角对泰北华人进行相关研究的最有代表性的学者当数何平、谢远章等老一辈学者。何平教授的专著《移居东南亚的云南人》一书中，除强调移居缅甸的云南华人以外，还全面地介绍了泰国北部云南

华人的一些文化信息，包括移居的方式以及云南华人在泰国北部的清迈府和清莱府的聚居情况。谢远章先生翻译整理的《93 师难民的真相》（泰国甘乍纳·巴格邬提上校著），曾经在泰国《星暹日报》的《泰中学刊》连载（1999 年 6 月 26 日），这是一份难得的珍贵的资料，对研究泰北华人历史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中国中山大学人类学社会学院的段颖副教授可以说是从事这方面研究的新秀，他从香港中文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就开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他本人也是云南人，经常深入到泰北山区华人村庄进行田野调查，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泰北华人的研究成果，代表作《泰国北部的云南人：族群形成、文化适应与历史变迁》（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 年出版），以泰国北部的云南人（主要指原国民党军队、眷属及其后裔）村落、族群及文化特征为研究对象，通过田野调查及民族志研究，研究族群形成和建构，集中探讨这一族群如何在复杂、多元的政治背景中发展，并且不断地通过调适其与所在国及周边多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联，从而在异域延续、建构其极具特色的族群认同，并最终完成从“孤军”、难民到华人族群的历史转变。

这几年以泰北华人村为素材而创作的文学作品也不断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当数中国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作品《异域》，以及据此改编的由朱延平执导的电影《异域》，这些作品描写生活在美斯乐的中国人在异国他乡自力更生、顽强不息的奋斗过程。正是这些文学作品，让更多人了解泰北华人，同时也感动了很多人，中国大陆及台湾的许多慈善或救济机构及民众、马来西亚华人纷纷慷慨解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志愿者也纷至沓来，为泰北华人提供各种协助。

综合上述研究，大致有如下一些重要的结论：泰国北部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具有许多特殊性，与泰国中部和南部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有许多差别；泰北没有直接与中国接壤的国境线，所以居住在泰国北部的华人多属于跨境民族，因此，这里的华人的民族认同不是单一的，而是非常多元的；泰国北部华人村落和族群的形成，不是自然发展的，而是一系列历史和政治的因素造成的，他们的形成具有国家与民族的差异性；泰北华人村的大多数华人的文化认同既有别于泰国的主流文化认同，也有别于中南部华人的文化认同；泰北华人的政治认同也与中南部地区华人的政治认同有很大的差异。

二、泰北华人群体的形成

从历史上看，居住在泰国北部的华人主要是来自中国云南省的各族民众，其中有始于蒙元时期通过茶马古道而迁徙而来的伊斯兰信徒以及民族属性相近的傣族、苗族、瑶族等山地少数民族，到了近期则主要是由于中国内战迁徙而来的国民党残军及其后裔。国共内战末期，国民党从大陆溃退时从云南边境撤退到泰、缅、老三国（又称“金三角”地区）边境的李弥余部第三军、第五军的官兵及其后裔几经过辗转，最后到泰北山区定居。我们把这些人定居的地方叫“国军难民村”，他们是 1949 年泰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移民关闭大门之后进入泰国的，其中的一部分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后才加入泰国国籍，而许多人则至今还保留难民的身份。泰北华人主要分布在泰国北部的清莱、清迈、夜丰颂三府，约有 108 个华人村，人口约为 20 万，大多数为云南汉族，还有阿卡族、傣族等 6 个少数民族，多元文化也在这里融合，佛寺、清真寺、礼拜堂并立共存。由于泰北华人村庄经济的发展以及泰国对待难民和非法移民相对宽松的政策，大量居住在缅甸的华人正在源源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包括非法途径）进入泰北华人村庄。从祖籍地看，他们多来自中国云南省各民族，既有各个少数民

族，也有汉族。这些生活在泰北的云南族群被称为“Chin-Haw”。

三、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所具备的优势

地缘区位优势。泰国北部这一区域与老挝和缅甸接壤，以湄公河作为天然分界线，依次将中国、老挝、缅甸、泰国、柬埔寨、越南联系起来，从中国云南可以沿河而下经老挝、缅甸到达泰北并可前往柬埔寨和越南。泰国北部以其独特的地缘优势，尤其是泰北“金三角”地带为泰北华人的跨境交流提供了天然的便利条件。从前泰北华人大多从中国云南逐渐经过老挝和缅甸步行并乘船至此，无论以何种身份和途径达到泰北，他们都能在动乱的国际格局中生存下来并在此区域形成自己的华人社会，逐渐繁衍生息，如今已发展到第三代或第四代。他们在此生活定居已长达半个多世纪，从事各行各业，推动泰国北部的社会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的发展。若泰北华人参与到澜湄合作中来，以其长期生活的区域地缘优势，搭乘澜湄合作的顺风车将能在澜湄合作的跨境经济可持续发展和人文交流中有所作为。

人际联系优势。回顾泰北华人的发展历程可发现，在其迁徙至泰北定居的过程中，为生存所迫他们需在途中不断进行边境贸易以维持生计，在老挝、缅甸等澜湄国家之间都有其跨境经济贸易网络，熟悉边境贸易领域的事物，有着丰富的边境贸易资源。“金三角”独特的地理位置为泰北华商提供了发展空间，泰北侨商长期游走于泰国、缅甸、老挝及中国之间，对各国的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较为了解，通常能熟练掌握泰语和中文等两门语言以上，并有着敏锐的经商头脑，经济实力较为雄厚。再加上他们在云南老家还有侨眷，包括在缅甸和老挝也有其亲朋好友，有跨国人际关系网络，为其在澜湄国家之间进行跨境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提供丰富的资源优势。

文化认同优势。泰北华人在当地定居需与泰国人交往，进行文化的交流和融合。泰北华人群体的特殊性在于生存的需要使他们能够逐渐认同泰国文化，但同时他们也能很好地保留中国地方传统文化风俗，做到“同而不化”。由于泰北有的云南华人村寨较为封闭，泰国政府对其有限制，部分村民没有身份不得随意出入，这也使得云南文化得以较好地保留和传承下来，同化现象不是很明显。在泰北云南村落中云南文化因子随处可见，走进泰北云南村仿佛置身于云南一般，他们将云南文化传播到泰国的各个地区，尤其是泰国北部，包括清迈等重要城市。如今部分泰北云南村落已被开发为旅游景点，使泰国人在泰国也能够了解和感受中国云南文化。此外，由于经商和贸易等需要，部分泰国云南籍华人华侨与缅甸人和老挝人经常往来，在不同国家种族之间的交往过程中，也将带来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民心相通”是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往来的基础，而泰北华人可作为澜湄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载体，参与到澜湄合作中促进中国文化在澜湄国家的传播与发展，促进中国在澜湄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构建。

四、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的路径

泰北华人作为澜湄国家区域的社会群体之一，可利用自身优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相关方针政策的引导下参与澜湄合作，促进澜湄合作的深化。泰北华人如何参与澜湄合作并发挥作用，主要途径有以下两种：

一是泰北华商投资参与澜湄合作基础设施项目。以合作共赢、互利互惠的形式，带动澜湄国家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带动普通百姓共同富裕，促澜湄国家经济共同发展。澜湄合作的推广和深化过程中除了澜湄国家间政治领袖商议、制定相应互惠政策并提供指导外，更需要普通民众百姓积

极参与，以响应澜湄国家间政府的号召，才能将澜湄合作各基础建设设施项目具体实施并完成，真正将澜湄合作共同推进落实。泰北华商若能抓住机会搭乘澜湄合作的顺风车参与到相关合作项目中来，利用好自身优势将各相关项目进行到底，合作成果将为泰北华商各方面的发展带来看得见的利益，同样也将使澜湄合作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推广。根据《澜沧江—湄公河合作首次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外长们一致同意，澜湄合作项目及其资金来源由相关国家政府协商确定，澜湄合作中各项目的启动并不排斥社会组织及个人提供资金资助。华商能够以参与澜湄合作项目投资的方式，共同分享澜湄合作项目的利润和成果，并将能够带动大批华人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发展。

二是泰北华人可提供丰富的人力资源。澜湄合作需要跨国人才队伍，尤其是高水平人才，华人参与澜湄合作将填补澜湄合作对于人才和人力的需求。澜湄国家间共商共建的澜湄合作项目涉及面广，涵盖基础设施建设、农业发展、公共卫生、扶贫、水资源管理、科技领域、人员交流等领域的合作，为广大澜湄流域的普通社会民众提供了就业机会。其中泰北华人大多从小生活在华人村落，白天与泰国土著人一起在泰国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晚上还会到华人学校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他们的成长环境使其精通中文和泰文，具有华人勤劳、努力的特点。相对泰国人而言，泰北华人除了能掌握两门语言优势外，泰北华人社会中不少华人还对管理、农业、建筑业、制造业、旅游业等领域拥有一技之长，在澜湄合作的各阶层工作当中都能发挥其作用。如泰北华人村的村长、华人社团领袖、华文学校校长等华人政治精英、华人经济精英、华人教育精英等都可参与当地澜湄活动及项目的策划、组织和指导工作，其余华人群众以其掌握的职业技能和勤劳品质应聘和参与到澜湄合作项目提供的工作机会中来，为各项目进展提供有效的劳动力。

五、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所面临的问题

一是澜湄合作的宣传力度有待加强，民众认知不够。虽然澜湄合作的初期推广工作和各项目的开展已取得初步成效，但不少社会民众对澜湄合作仍不太了解，对澜湄合作的认知不足，持观望态度，社会各界参与度还需要加强。澜湄合作倡议自 2014 年 11 月第 17 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被提出以来，时间还不算长，澜湄合作是“一带一路”的区域发展战略，目的是要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的观念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民心。要让澜湄国家社会群体了解澜湄合作是什么、澜湄合作是为了什么、澜湄合作要做些什么、澜湄合作的未来发展方向。要加强澜湄合作的宣传，提高社会群体对澜湄合作的认知，才能加强社会群体对澜湄合作的参与度。

二是各界对泰北华人与澜湄合作的关注度还不够。泰北华人作为澜湄国家的社会群体参与澜



澜湄合作区域

湄合作极具优势并能有所作为，对促进澜湄合作的推广和深化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社会各界对泰北华人与澜湄合作的关注和研究还有待加强。泰北华人以其独特的区域地缘优势、丰富的跨国关系网络、较强的文化包容性等优势，若能广泛参与到澜湄合作中来，将促进澜湄合作的深化。同样澜湄合作的成果也将带动泰北华人的发展，部分泰北华人山区较为平穷落后，泰北华人的参与也将促进泰北区域的减贫工作，实现澜湄国家共同繁荣和发展，构建澜湄国家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是泰北华人自身缺乏情感归属，需相关政府部门带动和引导。由于部分泰北云南籍华人原先是国民党军队及其后裔，身份尴尬，在中国政治的变革和国际形势的动荡当中背井离乡，成了政治的牺牲品。有的在“金三角”有过贩毒历史，泰国政府对其保持谨慎的态度，大部分泰国云南人已加入泰国国籍，也有少部分人没有身份，不能自由活动。虽然过去已成为历史，如今的泰国云南籍华侨华人勤劳努力、积极上进，不少人已走出泰北云南村落，到清迈和曼谷等泰国其他城市发展，有的在泰国及边境区域经济贸易中已发家致富并造福一方，可外在仍对其存在偏见和刻板印象，使他们没有归属感。相关政府部门引导和带动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可能会导致区域和全球秩序调整的不确定性。

四是澜湄合作区域和全球秩序调整的不确定性。二战后，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基石是美国主导的地区和全球秩序。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美国国力的下降和新兴大国的崛起，地区和国际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剧烈的调整和变化。尤其是作为全球化主要推手的美国选出了主张“美国优先”的特朗普为总统和自由贸易发源地英国公投“脱欧”成功，这给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地区和全球秩序造成巨大冲击。特朗普当政以来，迅速废除了奥巴马政府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这颠覆了东盟以往所熟悉的一切，对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的前景充满的担忧。特朗普政府在 2017 年 5 月初举行的美国—东盟外长会议上也没有做出任何关于东南亚地区政策的声明或宣示。东盟对美国的东盟政策会如何调整和发展困惑不已，地区和全球秩序调整发展的不确定性使其在外交活动中倍加谨慎。

五是域外大国对澜湄合作的“离间”。近年来，地区和国际形势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中南半岛在历史上就是大国利益角逐的激烈的地区。美国、日本、印度等对中国崛起和在本地区影响的增强抱有高度戒心，在中南展开积极外交行动，离间破坏中国与东盟关系。美国奥巴马政府围绕南海问题不断制造热点，怂恿泰国对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提出挑战。日本重视发展与泰国的关系，2017 年安倍晋三出访泰国时提出多项对泰国基础设施建设援助计划。

六是泰国国内政治风险。泰国作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国内代表各个阶级的政治势力相互角力。军方势力则时常推翻民选政府出来执政导致泰国政局不稳政策持续性不够。普密蓬国王的去世使泰国失去了唯一一个可以凝聚全国人民力量、平息各方势力的领袖式人物。泰国正处于经济转型进程中，面临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南部伊斯兰极端主义、东北部跨国犯罪、北部的毒品泛滥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挑战等。随着泰国经济改革步伐加快，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将日益凸显，泰国家内部政治风险也亟须深入研究。

六、关于促进泰北华人参与澜湄合作的对策和建议

（一）政治安全方面。中泰双方共同合作，

严厉打击泰北区域如“金三角”地区的贩毒、走私、偷渡、贩卖人口等跨国犯罪。加强安全宣传教育工作，共同维护澜湄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共同联合培养澜湄国际警察，加强各国司法部门的交流与合作。长期以来泰北地区的安全问题一直是阻碍泰北华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和平稳定是国家及区域发展的前提，是当地百姓安居乐业的基础。澜湄各国要增加澜湄区域政治安全方面的合作与交流，携手共建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澜湄命运共同体。

（二）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澜湄国家政府加强合作，坚持以“政府指引、项目为本、多方参与”的导向，采取行动多方位多层次鼓励泰北华人参与澜湄经济发展合作项目。政府部门可采取的具体措施有：第一，中国与泰国政府协商共建泰北华人山区减贫示范项目，鼓励当地社会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参与减贫项目合作。因地制宜，根据泰北华人山区的特点和情况对其进行指导，提供技术支持，定期举办培训和交流活动，帮助其利用自身优势脱离贫困。第二，中泰双方共同协商经济扶持政策，减少对中小型澜湄跨国企业的关税，加大对减贫项目的资金投入，设立小额招标项目。由政府出资为主鼓励泰北华人集思广益、献言献策，由专家组织评审和评估，对适宜的有发展潜力和前景的项目进行资金支持。指导小额招标项目的实施，监督相关项目的进展。第三，定期举行招商引资活动，加强澜湄合作的宣传工作，鼓励华商参与澜湄合作，进行项目投资。让华商了解澜湄合作的相关政策、政府合作导向、项目发展前景等。如农产品贸易及电力市场等方面投资前景广阔。政府要采取行动让泰北华商认识到澜湄合作背景下许多跨国经济合作项目的投资机会与发展潜力。

（三）社会人文方面。第一，政府及相关社会组织采取措施，鼓励泰北华人群体参加澜湄合作社会人文交流的相关活动，支持泰北华人村级华人社团等华人社会组织举行澜湄人文交流活动。例如，在澜湄文化交流相关活动中邀请泰北华人村民、华文学校老师与学生、华人社团成员等参与，泰北华人村长可组织村民自发准备一些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表演参与到其中，让更多的澜湄群体了解中国文化。同时华人社会组织也可自行举办相关文化交流活动，邀请各界群体深入泰北华人村落，感受和学习中华文化。第二，举行回祖（籍）国走访活动，为泰北华人提供回乡的机会。泰北华人村落中许多老兵很想念家乡，却一直没有机会回中国、回家乡去看一看。中国政府相关部门可举办相关活动帮助他们回家乡走访，感受中国的变化与发展，让其后代重新认识中国。第三，泰国政府接纳和给予泰北华人村落中没有身份的村民，允许其自由出入华人村落，帮助泰北华人村的发展，帮助泰北华人找到情感归属，让他们怀着感恩之心，感谢泰王国给予他们的恩惠并为泰王国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第四，泰北孔子学院和华文学校加大对公派教师和汉语教师志愿者的培养，填补泰北山区对汉语教师的需求。国家汉办与国家留学基金委加大对泰北山区华人的教育资金支持，设立奖学金为泰北山区的优秀青少年提供来华学习的机会，加强泰北华文教育的系列工作。举办来华游学活动，为泰北华文学校的学生提供来华进修的机会，从而更好地学习中国语言文化。

虽然不同国家及地区的差异比较显著，但在“一带一路”倡导的“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这“五通”上，泰北华侨华人能够发挥积极作用。

恻隐与援助：略论华侨与抗日战争

文 苏昕宇（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助理馆员）

抗日战争爆发激发了整个华人世界愤慨和爱国热诚，海外侨胞由此掀起了以抗日救国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援助中国革命的高潮。这一时期，海外侨胞以其人数众多、旅居范围广泛特点，在援助途径、参与阶层、持续时间上呈现出独特性。他们的物质援助对于支援战争、稳定国内金融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宣传引发了国际舆论强烈关注；他们直接归国参战无惧牺牲的精神至今激励来者。

一

近代中国战乱频仍，自然灾害多发，人民生活困苦，加之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交流逐渐密切，中国逐渐沦为西欧列强商品倾销地和原材料来源地，大批手工业者破产，出国谋生成为了很多同胞的选择。诚如一名契约华工所诉，自己“不是受黄金梦的诱惑，不是被好奇心所冲动，完全是旧社会的无情的生活鞭子，驱使他们背井离乡”。这很好地说明了早期华侨移民国外之原因：绝大多数华侨都出身于广大劳动人民，迫于生计而旅居海外。与外国人或旅居地之本土人相较，华侨既无雄厚资本，又由于与国内亲属紧密联系需将积累的血汗钱寄回国内，他们在海外生存的压力可以想见。尽管如此，华侨对祖国充满着无限的眷恋和赤诚的爱国之心，如容闳所言，“予对故土及同胞之爱长盛不衰，并因恻隐之心与日俱增”。每当中华民族命运处于危难之时，海外侨胞总是挺身而出，倾注一切支援祖国。“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并一直受到华侨资助的孙中山就曾说过：“中国革命，多依靠于华侨的帮助，甚至以血汗换得仅能维持温饱工资的侨工，都肯出钱帮助。”

尤其自辛亥革命以降，华侨帮助国内建立革命组织、宣传革命思想、募资捐款，甚至直接参加革命武装斗争，对革命事业贡献巨大，堪称“革命之母”。这种状况一直在持续，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华侨援助中国革命事业掀起第二次高潮。宋庆龄在庆祝华侨第二届会员代表大会上指出，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援助“远在总理倡导革命之始。数十年来，未曾间断，尽其国民之天职，将其财力物力人力，效忠革命，贡献祖国，给国内同胞以极大的鼓励”。

尽管各种统计数据资料相差较大，如国民政府侨务委员统计出，截至 1946 年，海外华侨人数有八百五十万之众；当时报刊《国闻周报》所登载《华侨的抗战力量》统计数据为一千一百余万，然而大体上人们更偏向于认可后者。华侨约有两成旅居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剩余绝大多数则侨居在东南亚各国。无论如何，华侨人数庞大，散居地域之广，为当世所罕见。同样，海外侨胞对抗日战争的贡献也为举世所瞩目。

“九一八事变”后，海外侨胞愤于日本帝国主义之残暴和国内军阀政府之麻木，自发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其中仅成立的救亡团体就达两千之多。如缅甸华侨兴商总会立即发出

“为‘九一八’案电请国民政府切实筹备抵抗案”和“发表宣言唤起侨胞努力共谋对待案”；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要求国民政府抗日，并致电国联和美国，请求国际力量干预日本侵略。

随着华北局势危机加重，日本或鲸吞或蚕食中国之野心昭然若揭，并在整个华人世界引起轩然大波。华侨华人纷纷发表声明组建团体自发自愿以多种形式援助祖国抗战。1935 年，中共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呼吁同胞不能坐视国亡族灭而要为民族生存、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而战斗。《八一宣言》在全球华侨华人中引发重大响应，侨胞纷纷要求国民政府一致抗日。如旅法华侨组建“巴黎中华抗日战线”；华盛顿华侨在“五卅”十一周年纪念大会上呼吁停止内战，集中力量抗日；新加坡侨胞于 1936 年召开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华侨分布最多的东南亚地区，侨胞在缅甸、菲律宾均成立了抗日救亡团体。自辛亥革命以来，一场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长达数年之久的海外华侨华人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运动再一次开展起来。

二

于 20 世纪 30 年代之中国而言，日本已然完成近代化变革并在几次大的战争中跻身列强行列。无论工业水平、人员装备抑或是后勤保障，方方面面中国均极大落后于日本。而此时国民政府紊乱的财政金融状况也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军费开支。在这种异常艰难的情况下，华侨的援助显得尤为重要，他们通过捐款、义卖、侨汇、购买公债等方式在经济上支援抗战。

捐款是最普遍和最有效的一种援助方式。华侨捐款的方式、类型呈多样化。如南洋华侨筹款会就曾在筹款细则中拟定出特别捐、卖花卖物捐、货物助赈捐、舟车小樊助赈捐、游艺演艺球赛捐等方式。为了将捐款变成一项长期化、制度化的行为，海外华侨发展出“常月捐”这样一种卓有成效的援助方式。1937 年 10 月，马来西亚槟榔屿华侨总会发表《劝募长期月捐宣言》，其中警醒侨胞，对日作战将是长期性战争，华侨华人不能苟安海外，也并非可以依赖一两次的捐助解决问题，“我们海外侨胞的责任是捐款，是长期助赈……最好的办法，就是大众都来认月捐”，并表示“抗战一日不停，我们为月捐也就不断缴下去，直到民族得到解放为止”。同年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区华侨也采用了这种按月捐助的办法。“常月捐”的推行以及大量捐款汇至国内引起了国民政府强烈关注。蒋介石、宋子文等在致华侨救国团体电文中就提出，“海外月捐，增加长期抗战力量，所至巨关，各地侨团务必努力促进，籍收实效”。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亦通电要求海外侨胞应念及前方将士牺牲与战区民众的艰苦，推行长期捐助，“再接弥励，以争取最后胜利之光荣”。

经过政府鼓励和海外各抗日救亡团体组织，“常月捐”这种长期、固定性的捐助方式得到了推广和贯彻。整个南洋地区，无论无产阶级、工薪阶级都要按照月收入的百分之五上交捐款；菲律宾各机关社团学校工厂商店等职工，一开始将月入的两成捐献国家，随后缩减为一成，但捐款总量却有增无减。据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回忆，南洋各国 1939—1941 年间，马来西亚地区“常月捐”130 余万、菲律宾 60 余万、缅甸 30 万、越南地区 20 余万等。全面抗战期间，在美华侨参加义捐的有 3000 多人，每人义捐数额占据人均月收入的百分之五。一名归侨回忆，他在菲律宾当店员时，每个月的工资只有 4 元，但是菲律宾华侨人均每月捐款却有 5 元，可以想见当时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热诚。据统计，战时仅东南亚地区华侨捐款数额就约达 4 亿法币之巨；美洲地区所捐款数也达到近 7 千万美元。由此可看出海外侨胞的捐款数额之巨、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久。

与此同时，侨胞汇款在抗战时期成了中国国

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和国家外汇的重要来源。所谓侨汇，即华侨外出打工赡养亲人的费用，是广大侨胞同国内亲友保持联络的纽带。战时因其数量非常庞大，货币价值相对稳定，故其对补充军费开支、平衡贸易逆差、稳定国民经济和法币币值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陈嘉庚曾在其回忆录中指出华侨援助的重要性：抗战后国民政府“发行首次救国公债五万万元，虽如何极力推销，总不能达到半数”，“然政府每年发出公债两次，每次五万万元，至民国廿九年，抗战已三年半，共发出公债券三十余万万元，除首次外未尝再向民间募债，而完全由政府银行负责。银行何以有此能力？此则利用华侨汇款作纸币基金耳”。以1937—1940年侨汇收入和贸易入超作比，比率均在400倍以上。尤其到了1940年，中国侨汇收入为1,328,610,000法币，而贸易入超数仅为57,022,000法币，侨汇对入超比率为惊人的2319倍。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袭击美国并攻陷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南洋陷落。这一时期，来自东南亚地区的侨汇收入大为减少，而美洲特别是美国的侨胞仍旧为国内汇款，成为整个侨汇收入的重要来源。

据统计，截至全面抗战前夕，华侨华人支援国内汇款就达到了2亿多法币。1937年7月，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估算，1935—1937年间，华侨华人援助汇款累计达30亿元。全面抗战爆发后四年内，华侨汇款几乎占据了中国军费开支的百分之三十。而在整个抗战期间，侨汇超过了95亿元。源源不断的侨汇为战时国民政府在庞大的军费开支和稳定本国货币价值方面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极大缓解了国内财政捉襟见肘及贸易逆差过大的窘境。

三

经济支援外，海外华侨非常重视利用宣传工具，他们经常采用办报刊、发函电和声明的方式以达成督促国民政府抗日、引导民间抗日言论、报道反侵略战争动态、呼吁国际社会关注等目的。“九一八事变”在当时引起世界各国极大关注，东北义勇军孤军奋战的消息也通过各类报刊媒介传播开来，从这一事件开始，海外报刊集中关注、报道抗战拉开了帷幕，截至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华侨创办报刊事业蓬勃发展起来。一份侨委会的统计数据反映了这种状况：1935年，华侨华人所办报刊有84种，五年后增加至128种。短短数年间增加了数十种，在华人世界甚至世界范围内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美洲地区，华侨所办报刊有25种，遍及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智利、多米尼加等国；欧洲地区，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祖国抗日情报》日刊创刊，德国创刊的《祖国抗日情报》一时间销量猛增，影响巨大；在新西兰，侨胞周润森所办《侨声》半月刊也在当地唤起侨众抗日情感、呼吁关注祖国抗战方面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毫无疑问，在这些报刊中，声势最大、影响最广、种类最多、持续时间久、受众最多的依然是南洋地区华人华侨所办报刊。

进入抗战时期后，很多报刊往往专为宣传抗战而创刊，一些老字号报纸也因时趋势，联系社会实际，利用群众较易接受的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及时报道国内势态。如创刊于1923年的《南洋商报》就在这一时期提出理论性的文章应该摆脱空喊口号而代之以引导群众舆论进而展开实际行动。一些新鲜的词语如“救亡弹药”、各类文学报告、小品也应充实在该报的宣传材料中，以不断提升表达技巧。老报人于友在《报人往事》一书中回忆，“皖南事变”发生后，许多进步人士迁往香港，结社撰文，抨击国民党压迫抗日力量，“《南洋商报》认真反映这方面的情况……一切可供刊登的材料，都被及时地刊登出来”。

南洋地区侨胞创办抗日报刊一览

地区 / 国民	报刊名称
缅甸	《椰风》《觉民日报》《中国新报》《新知周刊》《印光日报》《晦鸣周刊》《南风》《曼德勒指南》《中缅周刊》《周报》《规律》
越南	《全民报》《全民日报》《真报》《侨众报》《越南日报》《侨声报》《民报》《公论报》《远东日报》《华南报》《时报》《中华报》《侨声报》《华商周报》《民族解放》《救国日报》《动员》《民族抗战》《民族斗争》
泰国	《重庆报》《中国人报》《唯真话报》
新加坡	《星洲日报》《南洋商报》
马来西亚	《现代周刊》《钟灵月刊》《古晋新闻日刊》《建国时报》《现代晚报》《新生月刊》《锡江日报》《现代日报》《华侨日报》《马华日报》《沙捞月日报》

华侨身份的特殊性及其在抗战中发挥的作用使他们的言论往往能较好地在国内重大事件中发挥一定作用。如 1938 年国民参政会召开前，陈嘉庚就曾致电大会提出“日寇未退出我国土之前，凡公务员对任何人谈和平条件，概以汉奸国贼论”提案。汪精卫当时高声朗读至此处，“形容惨变，坐立不安”，并“在倾听激烈辩论时，神色非常不安”，受到了很大的刺激。大会秘书处随即将之概括为“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著名爱国人士邹韬奋对提案高度评价，他指出这是“从三千里外的新加坡放出一炮直达重庆……这个炮弹里所装的不是实弹而是纸弹”，“真是一个奇迹”。

在海外华侨组织卓有成效的宣传动员下，抗战甫一开始就在整个华人世界掀起一股回国救援的浪潮。广大侨胞纷纷组建服务团体、创办航空学校、组织技术人员归国、甚至直接参军不远万里奔赴战场。参战华侨人数之众，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这部分人中仅广东籍归国华侨就有四万余人，美洲和澳洲等地也有千名华侨。战争中，不少热血青年华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各方面统计材料，大量航空、机械、防控、化学、防毒、交通工程方面的侨胞人才返回祖国；医护人员招募信息甫见报刊，印尼立即就有 400 多人报名参加；南洋等地医疗队携带了大量金鸡霜纳等药品随军转战武汉、长沙、桂林等地，救治大量病患；东江华侨回国服务团携带金钱、物资进入东江抗日根据地开展战地服务工作；为了修筑滇缅公路，南侨总会招募司机和技工，报名者达到数千名之多。马来西亚 3000 多名司机用鲜血和生命保证了这条生命线的畅通。这些司机们说，“一个华侨能出力，十个敌人九不回”。归国华侨人数如此众多，以致国民政府侨委会不得不制定《非常时期海外华侨专门技术人才调查表》分发各地以调查介绍华侨工作。对此，国民政府高度评价他们的贡献：“彼等中不少中产阶级之弟子，只以为同仇敌忾所驱使，是以历万险千辛而不辞，所以彼等对于祖国贡献效力之伟大，亦难以估量。”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将近百年，期间之艰辛困苦至今令中国人难以忘怀。战争中整个华人世界所迸发出的团结之伟力，更让我们铭记。广大侨胞至今还在为祖国统一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这种自抗战以来凝聚的中华民族意识将永远激励来者不忘过去，着眼未来。

爪哇岛华校忆旧

文 《华夏》记者 赵阳欢

2014年，时任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谢锋称，印尼约有2000万华人，是海外华人最多的国家。事实上，华人向印尼的移民历史悠久，据爪哇的文献记载，早在公元924年，中国的一艘大沙船在三宝垄附近沉没，船客漂流登岸，得到直葛王的允许，定居其地。这是华人定居爪哇之始。

爪哇岛华校历史

17世纪初，巴达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的旧称，简称“巴城”）成为荷兰东印度公司在整个亚洲地区的核心城市，大批华人移居巴城。出于荷兰东印度殖民地的商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需求，1619年，时任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设立了甲必丹制度，并将首个甲必丹头衔授予了华人苏鸣岗。该职位相当于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地官僚机构的中级官员，主要负责向华族社群传达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各项命令和指示，协调华人族群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之间的联络。

随着印尼华人的增多，华人后裔的教育问题开始引起注意。对于早期在印尼讨生活的华人来说，只有让孩子们受到良好教育，努力向上发展，才能改变整个家族的命运。1690年6月，巴城甲必丹郭郡观曾向荷兰总督提议：“凡唐人有疾病癫狂失性，无依倚者，盖筑美色甘病厝（即济贫院）以居之”，“至若唐人父母弃世，无人教导及贫乏之儿，建一义学，请一唐人先生以教之”。这样一来，“则病人有可延其性命，贫儿不致艰于读书”了。总督采纳了这个建议。同年8月，郭郡观在巴城创办识字班性质的明诚书院，1729年明诚书院附设于华侨普济院内，经费由华人公馆负担，学生有三四十名。印尼华文教育以此为开端。

苏甲巫眉的华校

1901年3月，巴城中华会馆创办了印尼第一间正规的华侨学校——中华学校。巴城中华会馆与中华学校的兴办，促进了爪哇岛华侨学校的诞生和华侨教育事业的发展。苏甲巫眉位于爪哇岛西部，距离雅加达80公里，是一座美丽却鲜为人知的山城，1906年苏甲巫眉中华学校诞生。

两年后，据传校董会内部因祖籍问题发生矛盾，争执不休造成分裂，1908年另成立了平民学校。此后30多年的发展情况，由于年久月深，人事变更，有关校务的各种记录文件多已散失，无从稽考。1942年，日本占领印尼，苏甲巫眉中华学校和平民学校被迫停办。

1945年，日本投降，印尼宣布独立，次年苏甲巫眉中华学校复办。1953年平民学校复办，共有学生180余名，设有幼稚班、高小、初中共8个班，分上下午上课。

1946年，爪哇岛展玉、苏甲巫眉、芝巴达、芝朱鹿四地的学校决定合并为“联合中学”；1948年，联合中学和中华学校又合并为中华中小学。1954年，中华中小学增设高中部。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印尼政府指令平民

学校停办，1965 年，印尼发生“9·30 屠华事件”，中华中小学以及其他华校被迫关停。

泗水新华中学

而在爪哇岛的另一端，华校的命运虽然大同小异，但也可从其发展的轨迹，遥想当年师生们的爱祖（籍）国之情。

20 世纪 20 年代，印尼的第二大城市泗水市已有泗水中华学校、振文学校、华侨小学和中国女学等 7 所华校，随着小学毕业生的增加，华人的初中教育问题亟待解决。而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间，印尼华文学校在华人社会的大力支持下出现迅猛的发展趋势。印尼各地普遍建立了华文学校。

1929 年，从泗水中华学校毕业的 20 多位学生创立了具有中学雏形的新型学堂——励志学社。学社设在泗水北部华侨集中区，初办时只有初中一年级，后来又开设了初二、初三，并改名为“励志中学”。起初由于经费不足以支付教师工资，学生们不得不数次举办文艺演出筹款补助。

可惜的是，这时期的华文教育虽然发展迅猛，但从事这项工作的推动者们始终未能处理好华文教育当地化的问题，随着华文学校的日益壮大，自然引起荷印殖民政府的注意和强烈不满。为了拉拢华侨后裔，培养为荷印殖民政府服务的公务员，荷印殖民政府于 1908 年开始创办用荷兰语教学的荷华学校，专门招收华侨子女，后来又准许华侨创办私立的荷华学校。荷印殖民政府一方面加大扶持荷华学校的力度，在课程设置、毕业就业等方面给予诸多优惠政策；另一方面对华文学校的教师推行歧视、迫害的政策，查禁华文教科书，限制华文学校的建设等一系列强大措施，给华人自主的华文教育发展套上枷锁。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荷华学校数量激增，愿意接受西化、荷化教育的华人增多，而泗水华侨中学和励志中学学生人数都不到 100 人，于是两校合并，成立了新华中学。

然而合并状态未能维持下去，由于两校师生不能很好地融合，1934 年 11 月，泗水华侨中学的师生返回原址，恢复华侨中学的名称，而励志中学的师生们仍沿用新华中学（以下简称“新中”）的名称。新中开设了商科、教育、学校行政、周末的服装裁剪等课程，培养了一批商贸、金融、文教、音乐等方面的优秀人才。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新中学生积极参加泗水华侨救灾会的募捐活动。学生们利用周末手持钱桶走街串巷向侨商们劝捐支援抗日。1939 年，新中举办抗日筹款游艺晚会，将所筹捐款购置一辆救护车，送到中国支持抗战，这些事迹充分表现出新中学生的爱国精神。

1942 年 3 月，新中因战乱暂停办学，1946 年 3 月复办，1966 年 4 月，新中被印



广东省印尼苏甲巫眉校友会成立大会合影

尼政府强制关停。在战前，新中共培养出 3 届高中毕业生和 9 届初中毕业生，战后复校 20 年，新中培养了 30 届高中毕业生和 32 届初中毕业生。从新中校门走出去的弟子数千，大多居住在印尼，其次是中国大陆和港台地区，少数分布在欧洲、美国、澳洲等地，他们都为各国各地的社会发展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力量。2004 年，新中校友又开办了“新中三语学校”，设有幼稚班、小学、初中、高中。至今新中三语学校已培育出三届高中毕业生，现在读学生有 1600 余名。新中三语学校使用印尼语、汉语、英语三种语言执教，其中汉语老师是来自中国的外派老师。新中的精神由此得以延续。

校友会的成立和现状

方文辉和陈碧梅是一对颇为特殊的归侨夫妇，他们各自管理着一个归侨校友会。陈碧梅 1960 年 5 月从印尼回到中国，两年后考入了暨南大学数学系。方文辉出生于印尼的一个华人家庭，家中有八个孩子，他是老大，曾就读于印尼泗水的新华中学。1960 年，怀抱着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的他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踏上了回国的道路，1962 年，他考入了暨南大学化学系。

这两位归侨青年能歌善舞，都是暨南大学文工团的成员，爱情的火花就这样不经意地点燃，两人开始了相伴一生的旅程。



方文辉和陈碧梅夫妇

印尼泗水新华中学广州地区校友会在 1988 年 5 月 1 日正式成立，首任会长为周金凤，现任会长是方文辉。该会的主要成员为曾在泗水新华中学就读的学生或任教的老师，现校友会约有 157 人，其中在广州生活的约 70 人。校友会成立后，每年举办两次聚会，组织两次旅游活动。1994 年，校友会组织了部分国内校友回到印尼参加新华中学成立 60 周年庆祝活动。

1993 年 7 月 4 日，广东印尼苏甲巫眉校友会在深圳成立，以广州和深圳的校友为主要成员，共约 50 人。校友会选举产生了第一届理事会，通过了校友会的章程，陈碧梅当选为会长。此后的 20 多年，按照校友会的宗旨“加强海内外校友之间的联系，增进友谊、互相帮助、互通信息，开展爱国爱乡活动，促进祖国的四化建设和统一事业和发扬团结有爱的精神”，校友会举办了不少联谊活动：一、每年召开一次年会活动，通过年会了解校友的近况，对困难的校友伸以援手。期间还曾多次组织校友赴郊外旅游。二、校友会曾于 1994 年、1997 年组织国内内地和香港的部分校友一起到印尼苏甲巫眉参加该地校友会举办的联欢活动。三、校友会曾于 1999 年、2001 年和 2004 年先后在深圳和广州举办了苏甲巫眉同乡校友联欢大会，来自全国多个地方及印尼的校友参加了这几次联欢大会。四、2006 年，校友会组织国内部分校友赴印尼参加苏甲巫眉中华学校诞生 100 周年纪念日活动。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上述两个校友会的校友们年龄渐长，部分校友辞世，校友会的活动慢慢减少。老校友没有足够的精力参加活动，又后继无人，使得校友会的存在感越来越低，是不少老归侨校友会遇到的共同问题。然而那些动人心魄的老归侨故事不应只留在老人的记忆中，所以作为年轻一代，我们应该做一个如实的记录者，让后世可以通过文字触摸那段特殊的历史。

广东侨联工作

联谊联络品牌

情系南粤

拓展内外朋友圈，画好最大同心圆，以侨为桥，以情聚谊，共促中外人文交流，增进中外友好合作。



我的法裔婆婆与她的中国邻居

文 牧童歌

mémé 这个易读又可爱的称呼，是加拿大法裔家庭里小孩子对祖母的叫法，也是我们全家对我婆婆的爱称。从我第一次走进 mémé 这个法裔大家庭，到今天，一晃 20 年，婆婆也已经 87 岁了。每次去看她，总有说不完的话，从生活到工作，从家庭到邻里，从社交网上的趣事到微博微信中我的登载，无所不谈。有时聊起她的小儿子 Ray，她还要特意支开他，和我嘀咕，非常搞笑可爱。而在这许许多多的婆媳聊天之中，有一个话题，她总是会提几句，那就是她的邻居。婆婆洞察力非凡，天天除了读报，还上网写电邮、查信息，将周围发生的事情，看在眼里、记在脑中。说起婆婆家隔壁的中国邻居，还要从 3 年前讲起。



婆婆把后院打造成小菜园

婆婆住的这个区，是在离多伦多中心大约 70 公里的一个东边小城市 Oshawa（O 城），一个曾经颇为兴旺的“汽车城”，加拿大通用汽车公司的总部和车厂都设在这里。城中几乎家家都和通用汽车有着关联。自从 2009 年的金融风暴后，通用汽车崩溃了，虽然后来重新运作，但怎么也回不到当年的辉煌时代，小城里不少家庭，也在这段时间离开了这座陪伴他们成长的城市，留下的，很多是退休老人或者住惯这个地儿而不愿离开的吧。

婆婆的家，是一幢典型的安大略省 20 世纪 50 年代的独立屋，一厅一厨一浴室，三个卧室，再加一层地下室套间。除了前院大草坪，婆婆把后院那棵大枫树以外的所有地方，都打造成小菜园了。每年春天种下各种蔬菜瓜果，盛夏初秋收获享用，几十年如一日，忙得不亦乐乎。婆婆家左边的邻居是一个独自居住的老头儿，乌克兰人，很小就来了加拿大，叫约翰。这个约翰老头儿退休前也在通用汽车做事，虽然老伴儿去世已久，儿女也都在外地，周末才来看他，因为拿着一份丰厚的退休金，过得也蛮自在的。约翰老头儿喜欢种种菜、做做自家罐头，闲时更会弄弄木头小家具。他和婆婆做邻居，相识多年，两家的后院也只是象征性地用铁渔网隔一隔，方便唠家常。

2014 年春天的一个周末，我和 Ray 哥去 O

城看婆婆。那天，一停车，我们就直接走进了她家后院的小菜园。我一边称赞着她种的蔬菜，一边给她拍照。笑声之余，婆婆静静地说了一句，约翰昨天晚上走了，她语气黯然。那天，我们照常和婆婆一起吃饭说笑，只是在离开的时候，拥抱她的那一瞬间，我捕捉到老人的眼神，却是一片哀伤。在回家的路上，Ray 哥开着车，我自言自语地说，婆婆今晚会思念，更会感受孤独吧。

这一年，金融风暴造成的损伤，逐渐被抚平。年中的油价高高地挂在近 90 美元一桶，中美股市都在上升线上攀行，而婆婆居住的小城，也默默发生着变化。就在约翰老头儿走后的第三个星期，一个周日的下午，婆婆从自家的窗户望出去，看见约翰老头儿的屋前草坪上，新插了一块地产商 For Sale 的卖屋牌子。令婆婆疑惑的是，卖屋牌子上的地产经纪是一个中国女子的名字，叫珊德拉·王，旁边还有很多中国字。婆婆心想，看来，未来的邻居有可能是像自己儿媳妇那样的中国人。正当她一边琢磨，一边望着窗外绿油油的草坪时，一个穿着地产经纪模样的亚洲女子，走下一辆银灰色凯美瑞房车，跟在她后头的，是一个瘦小的、皮肤油亮亮的、身高不足一米七的年轻亚洲男子，他穿着极其普通的牛仔裤 T 恤，神情略带恍惚。他们向着约翰老头儿的屋子走去。这就是婆婆与新邻居的第一次单边邂逅。



作者简介

牧童歌，旅居澳大利亚和加拿大多年。

这个夏天似乎过得特别快，转眼间，都 8 月中了。O 城的深夏很美，早晨的空气里已经飘逸着秋天的气息，婆婆家后院的大枫树那里，传来蝉鸣，夹杂着树叶在风中的沙沙声，着实令人遐想。婆婆那个不大不小的菜园子，在阳光的沐浴下，已是一幅丰收图了。攀爬到支架顶的各种豆子，红彤彤随手可摘的大小番茄，挂在木架子边儿的青瓜丝瓜，还有一片缀满枝头的树莓果子。当我走进园子，婆婆正忙活着她的红甜菜，拔起一大撮，说要给隔壁的小伙子阿本。

阿本是婆婆的新邻居，一个从广州独自移民来到加拿大的小伙子。他和婆婆的第一次打招呼，就是隔着两家后院的绿色渔网围栏，用断断续续的英文，问了个好。婆婆多年来习惯了约翰老头儿做邻居，现在来了个外国人住在隔壁，还不大会说自己的语言，这种沟通的生疏，总是令她心有不安。每次见着阿本，婆婆总是用极慢的英文，唠叨几句，也好打听了解一下。很快，从这一老一少的手脚夹拼的英文对话中，婆婆得知广州小伙子是个单身，移民来到加拿大已经大半年，注册了一个销售自行车零件的生意。机灵的阿本也很快了解到这位隔壁的老太太有一个来自羊城的中国儿媳妇，还有一个简单易读的、像小女孩一样的名字 mémé。

周末聚会时，婆婆一边给我切着她亲手烘烤的蓝莓酥皮派，一边开始向我提出她的疑问。

婆婆：为什么他的名字带一个“阿”？

我：他是怎么介绍自己的？

婆婆：他说“我叫阿本，就是英文名 Ben，和好莱坞明星本·阿弗莱克同名”。

我：嗯，他是广州人嘛，喜欢在名字前加个助词。

婆婆问了很多她想知道的

中国事情，比如中国人喜欢吃猪肉还是牛肉，中国人习不习惯喝她做的那种忌廉浓汤，中国人吃不吃生蔬菜沙拉，我和阿本是不是说同一种中国方言等。到最后，她拉着我的手说，我的甜心，你愿不愿意去隔壁拜访一下，用中国话和那小伙子沟通沟通？望着婆婆萌萌的恳求眼神，我知道，这个拜访是必需的。但这一天，阿本没有回家。

日子一天天过去，婆婆的夏天，也在忙碌周旋于儿孙们各种的琐碎事情中，不知不觉地飘走了。安大略省的 9 月中，枫叶渐红，一年中最美的金秋来到了 O 城。婆婆的忙碌生活，也渐渐地缓慢下来。阿本也似乎有更多的时间留在家中。进进出出地碰面多了，这一老一少的闲聊也频繁了。O 城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小城，移民基本上不会选择到这里安家落户，婆婆疑惑很久，终于忍不住开口问阿本，怎么不选士嘉堡或万锦市这些华人聚集的区。基于 mémé 有一个也是来自广州的儿媳妇，阿本对她格外信任，道出了背后的原因：O 城离华人聚居的士嘉堡市，只有 30 公里左右，开车 20 分钟就可以到那里逛华人广场、华人超市和无数的华人餐馆，而 O 城房价适中，环境也十分宁静。阿本用不到 30 万加币，就买下了约翰老头那保养得很好的一层半小洋房，前后院加起来约 800 平方米。这是 2014 年的楼市行情。

无疑，阿本是聪明的、幸运的，但是，从小到大在广州的楼宇生活，并没有教会他如何打理一套洋房，碰到像我婆婆这种极爱户外整洁的邻居，问题就来了。在北美，有一种广泛流传的说法，那就是中国家庭普遍不大注重花园设计和打理，好看讲究的花园，大多数不是华人家的。很多华人家庭干脆把草地铺成砖地甚至水泥地，以免麻烦。像婆婆这样，以把家园打理得井井有条为本分的，是完全不能理解阿本的。

阿本住进新买的房子才两个多月，屋前原本油绿的草地已经开始枯黄和杂草丛生，与隔壁婆婆前院那绿色葱葱的一大片，形成鲜明的对比。附近的邻居走过，总不免多看几眼或嘀咕几句，这令婆婆心里很不舒服，终日嘀咕这件事情。终于忍不住，有一天晚上等阿本家的灯一亮，知道主人回家了，她就走到隔壁敲门拜访。她从怎么给草地淋水，讲到怎么铲草施肥，我想，婆婆给阿本唠叨的园艺课，足以让小伙子受用终生。为了让阿本找不到借口不打理草地，婆婆专门领着小伙子去自己园子里的工具房，示范各种工具的用法。第二天，更从自己的工具房，选出一套工具送给了阿本。

阿本在 O 城的生活，渐渐也有大半年了。每天开着朴素的美国车，吃着自己做的中国餐，白天向城中的大小自行车店铺销售零件，经常早出晚归。周末也会铲铲草，出去喝喝多伦多有名的广东茶。他在西方，也还算从容有序。这天，阿本来到婆婆的家门口，战战兢兢地敲着门。婆婆闻声，从厨房走出来，开心地一边开着玻璃门，一边说：“Come in，ah Ben.”阿本用进步不少的英文和婆婆寒暄了几句后，然后从拎着的白色塑料袋里拿出一个大纸盒，递给婆婆，说，这是好吃的核桃酥，有名的广州点心，比得上西方的曲奇饼干哦。婆婆打开一看，哈哈笑起来，连声道谢，说，吃过的吃过的，我的甜心中国儿媳妇也很喜欢这个小点心，给我买过好几回呢。婆婆拉着阿本，让他等等，转身去厨房，拿出一个刚烤好的酥皮苹果派，硬是塞给了小伙子，说，现在是苹果丰收的季节，我前两天才去摘了一篮子苹果回来，烤了两个派，可香甜了，这可是加拿大的特色甜品，你会喜欢的。

吃，真是最好的友谊传递啊，一条世界通行的真理。就这样，阿本和婆婆的核桃酥和苹果派，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话匣子。随着秋风渐渐变得萧瑟，色彩缤纷的枫叶也开始飘落了。一天，婆婆在前院扫枯叶的时候，阿本很随意地走过来，闲聊中告诉婆婆，一下雪，他就要回中国，回广



O城的圣诞寒冬

州了。

加拿大这个枫叶国，在中国人眼里，永远是低调朴素的。从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大夫，到港人“九七”移民潮，再到有惊无险地度过十年前的金融风暴，一个近乎完美的国度，成为千千万万中国家庭的第二故乡。阿本拥有一个自行车零件的生意，销售对象是各种体育自行车店铺。在安大略省，这种生意限制在 3 个季度，从 12 月到第二年的 3 月，漫长的冬季，生意淡得可以关起大门。秋风越来越冷飕，阿本也越来越踌躇彷徨。婆婆已经两个星期没有见到他了。他那辆银灰色的美国车倒是几乎天天停在家门前。10 月底，万圣节即将到来，婆婆写了一张小卡片，放进阿本家的信箱，提醒他万圣节的风俗，得去买些糖果准备好，万圣夜扮小鬼的孩子们，会来敲门索取糖果。

就这样，这个广州人，在枫叶国的冷瑟秋夜里，听着孩子们踏着沙沙的枯叶跑进来敲门声，派着一把一把的糖果，度过了他人生第一个孤单的万圣节，也不知他是惊喜还是叹息。

12 月的 O 城，到处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家家户户的门上都挂着醒目的圣诞装饰，商店里更是张灯结彩，到处挂着促销的广告牌，而街道上不时会响起唱诗班献唱的圣诞歌曲。对于西方人，圣诞节就宛如中国人的农历春节，空气里弥漫着浓郁的祝福气息。平安夜那晚，婆婆从大儿子家的家庭派对回到家，用钥匙打开大门那一刻，一张方方正正的圣诞卡片掉落在地上，借着门灯，婆婆清楚地看见卡片上工工整整的几行手写英文字：

Dear mémé,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I'm gong back to China. See you next Spring.

Ben

阿本拎着来时用的大箱子走了。只是，这次大箱子里装满的是深海鱼油、蜂胶、花旗参和各种味道的圣诞节西人糖果。还有，那就是阿本那颗似箭般的归心。婆婆虽然常年习惯一个人住，但熟悉了半年的邻居一走，她的心，又开始感到忐忑不安起来。好在，圣诞节气氛喜悦，聚会忙碌，很快婆婆也就不觉得有什么，与儿孙们一



我与法裔婆婆

起，在欢笑中踏进了新的一年。

新年过后，婆婆的生活也安静下来，恢复了以往的规律。每次我和 Ray 哥去看她，闲聊中难免讲起阿本，讲起他那冬天空置的房子，婆婆显然忧心忡忡，担心铲雪服务的安排、室内温度的保持、水管的关闭等问题。终于有一天，阿本的房子有人气了。原来，被寒冬大雪“轰”跑的阿本，在走后不久，把房子交代给了中介公司，租了出去。

这一年的冬天，婆婆照常看看书、打打毛线、烹制各种美食和关照儿孙们的琐琐碎碎，偶尔，也会和阿本的租客打个招呼。每次和我闲聊，婆婆总是埋怨隔壁那对租客男女，说觉得不大对劲儿，一天到晚吵吵闹闹。我问，那是什么人啊？婆婆有点不屑一顾地说，一对中年的白人，白色垃圾那种吧。天啊，用到这个词，不是什么好事，我没有吱声，只是，心里默默地替千里之外的阿本担忧，希望一切顺利吧。

3 月底的一个毛毛雨的周日夜晚，我接到婆婆的电话，她语音焦虑，说一整天看到阿本家的车道上，有两辆车进进出出，在搬东西，有椅子沙发、柜子电视，大包小包。Ray 哥对婆婆说，妈，都这么晚了，关好窗帘、锁好门，别理那么多。婆婆仍然嘀咕着，说阿本租出去的是包家具的房子啊，有可能是盗贼，然后把似乎要继续的话又收了回去，不安地，收了线。我对 Ray 哥说，听起来有点不妥，还是和住在婆婆附近的大哥通个话，明天早上，让他过去看看，有必要的话，报个警吧。

第二天一大早，没等大儿子到来，疲倦担心的婆婆已经自己上网查询，拨了十几个电话号码，找到了阿本房子的中介公司，坚决要求他们立即派人来看阿本的房子。原来，这对白人租户递交的房租远期支票，已经“弹票”了两次，中介公司打去的电话也没人回，正要发出追租信件。当中介代表打开阿本房子的那一刻，傻眼了！阿本这前后花园洋房，屋外是一番早春的生机景象，屋内则被一扫而空，所有的家具、电器、摆设，甚至连窗户的帘子都被取下夺走，满地的报纸垃圾，地板都是狗啃的印子。应验了婆婆的担忧，这白色垃圾租户，把阿本第一次在 O 城买的房子，弄得不成样子。这种事情，发生在第一次在加拿大做房东的阿本身上，发生在第一次租房给当地白人的广州人阿本身上，一时间，一种极大的愤怒感和惭愧感，涌上了我的心头。此时此刻，我只想替阿本拥抱我的婆婆。

2015 年的春天，异常的飘逸，白玉兰烂漫盛开了几个星期，粉红的樱花也久久地缀满枝头，各家各户门前的芍药花争相炫耀，无尽夏绣球花的枝干，也长出了茂盛的叶子和花蕾。春意盎然，风暖花开之时，阿本带着已经退休的父母，从羊城回来了，回到了这个给予他希望、梦想与烦恼的 O 城。望着狼藉的家，他心灰意冷。重整家园，忙碌费心。此时此刻的阿本，望着伸开双手迎接他的 mémé，眼睛模糊了，也许，令他仍然感到安慰和人间有情的，还是这位多管闲事的邻居老人，我的法裔婆婆。

大马客

文 祝顺祥（广东侨界作家联合会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大马客的乡愁——世界客属第30届恳亲大会举办会场搭建的仿客家围屋场景

2019 年 10 月，世界客属第 30 届恳亲大会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办，约有 3000 客属乡亲出席盛会，包括我。

早前夫人听说我要去参加客属恳亲大会，她笑称：“你去是名副其实啊。”我不解，她就说：“我是客家人，你不就是客家人家属咯。”

原来，我就是“客属”，想想也对。夫人是湖南炎陵人，先祖清代从广东梅县迁入，是为客家人。到目前为止当地人一直都讲客家话，饮食上也打上了深深的客家文化烙印，比如客家小吃艾叶米果等。只是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对客家人这个群体可以说是一无所知，直到从事侨联工作后，才开始了解广东三大语系之一的客家语系。

先入为主，后到为客，千古皆然。“客家”从字面上来说，就是外来

移民的意思。客家人的先祖来自中原，在过去一千多年里翻越群山，南下开辟天地，从未停下迁徙的脚步，渐渐成为一支遍布全球且人文独特的族群。国内移民诸多，大多融入当地，成为“当地人”，只有客家人，他们征服群山、远渡大海去寻找容身之所，却始终称自己是客，他们经常漂泊，却始终谨记自己的根，脚下的土地终究只是借住，中原故土才是永生北望的家。

18—19 世纪，大批客家人有如海漂种子，纷纷过海越洋，在南洋异乡落地生根，马来西亚便是其中一个目的地。马来西亚简称“大马”，现有 3000 多万人，其中华人约占 20%。马来西亚客家人约 160 万，分散在大马各地，被称为“大马客”。

马来西亚许多主要城镇如吉隆坡、怡保、芙蓉等是由客家人开辟的。客家人到达马来西亚最早是在槟城，梅县松口人古石泉 1796 年在槟城创建的“仁爱堂”至今不倒，是东南亚最悠久的中药店。客家人在马来西亚，依旧是口操客语，维持鲜明的客家生活，梅县腔的客语是马来西亚客家话的主流，在沙巴首府亚庇市最大的传统市场内，到处都可以听到客家话。

微风起、落叶飞，迁徙之路辛酸尽，对马来西亚客家人来说，家在海的这一边，故乡在海的那一边，心中的丝丝惆怅常化作无尽的思绪。马来西亚客家人除了把家乡的民俗习



广东省侨联代表团和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左三）在会场合影

惯和信仰文化移植到马来西亚，以期缩短他们对家乡的心理距离，抚慰他们在异地彷徨不安定的生活，他们也会根据崇功报德、慎终追远的传统，将有功的族人或盟友，尤其是战死的英灵视为本土神明。

早年漂泊马来西亚的客家人寄人篱下、生活艰难，为了抱团取暖、团结互助，许多城市、商埠乃至村镇成立了客属社团，1801 年成立的槟城嘉应会馆是马来西亚最早的华人会馆，此次主办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马来西亚客属公会联合会有 79 个团体会员。客属社团普遍有成文的章程、规约，以凝聚乡情亲情，积极兴办公学、推广华文教育，开展各种文体活动，身负照顾同乡的重任，甚至连乡亲们的后事都一并承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各地的义山，1895 年惠州客家人叶亚来号召成立的广东义山埋葬了十几万人。在义山出现之前，部分老会馆则会将往生同乡的牌位供奉在会馆内，代表后代子孙对先人的缅怀，也是客家人在海外传承祖先信仰的最好说明。

无论是当初先贤漂洋过海，在求生存、求发展的初级阶段，还是稳定、繁荣的今天，客属社团都以服务社群为本，持之以恒，凝聚力量，深根固本，开枝散叶的方式虽然有所不同，但宗旨始终不变。一如崇先报本：秉承客家传统精神，感恩祖先，树立爱国爱乡的高尚情操；二如崇文重教：教育年轻一代求知进取，掌握知识，提升素养，共同建设文明社会；三如和睦乡邻：荣辱共当，福难同享互相帮助，联系感情，增强客家族群凝聚力。

因为行走世界，客家人播衍于全球各地，自古以来形成一种敦亲睦族、团结协作和开拓进取的文化精神，但长期以来没有一个世界客属乡亲欢聚、联谊的合适舞台，直到 1971 年，香港崇正总会成立 50 周年庆典，邀请世界各地 47 个客属社团举行庆祝活动，商定为“世界客属第一届恳亲大会”，还决定以后每一至两年轮流在世界各地有关城市召开一届。如今，世界客属恳亲大会影响日益广泛，已成为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联络客属乡谊的知名盛会。

第 30 届恳亲大会主题是“天下客家，永续共荣”，盛会期间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属同胞恳亲联谊，交流合作，共谋发展。广东作为全球客家人最集中的聚居地派出了多个代表团，远道而来的客属乡亲欢聚一堂、其乐融融，我虽然不会说客家话，但连蒙带猜基本上还是能听懂，在其中也感受到全球客家亲的浓浓暖意。

“全球客家事业杰出贡献奖”获得者印尼国际日报董事长熊德龙在会上致辞，这个一口纯正梅县腔的客家人说话风趣幽默，善于调动全场气氛，也可以看出他在全球客家人心目中的地位。得知他的身世后我感到莫名震惊：熊德龙生于印尼，兼有荷兰、印尼血统，出生后被遗弃于孤儿院，后被旅居印尼的梅县籍华人熊如淡收养，严格来讲他没有客家人血统，并不是客家人。熊德龙说他没有一滴中国人的血，但有一颗百分之百的中国心和一腔百分之百的客家情，让人深深地感受到他对中国的赤子之心。

此次到马来西亚，从入境到出境不过 30 个小时，真真做了一回马来西亚的匆匆过客，对马来西亚只有短暂而易逝的点滴影像，留在记忆里更多的是一张张模糊的客家人的笑脸，还有一段段轻快的客家人的语句，不知以后是否可以自诩为“大马客”呢？

新马游散记

文 孙向学



作者简介

孙向学，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深圳文学》主编。

人与坟的和谐

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机场往市区赶的路上，司机半路停车，导游说让我们到路边的厕所方便。说是方便，其实主要是让我们到附近的商场和小摊购物和买零食吃。我不能例外，在一小摊上买了一包榴莲，随意坐到小摊边上的一块石板上，吃着吃着零嘴，才忽然惊讶地发现，石板边竟是一座坟墓，墓碑就在我脚边。这时，我才认真地打量起周遭的环境，发现不远处还有好几座坟墓。人与坟墓混在一起，有的小摊架在墓上，有的游客坐到了坟头上，有的人甚至不自觉地踏着墓碑。开始，我以为都是无主孤坟，但仔细看，有的坟前还插着香，碑上的文字也清晰可见。当地小商贩和如织游人，穿行其中，却没有惊悚和忌讳，反而一派和谐。这样的景象，在国内根本无法想象，甚至被认为是大不敬。

后来在市区游览，我多次发现了坟场。这些坟场阴森森，四周既没有围墙围着，更没门楼门牌标明点什么。它们几十座、几百座，甚至成千上万座密匝匝紧挨在一起，就处在市区的街道旁，甚至居民住宅楼的边上。华人传统的坟墓与插个十字架的伊斯兰教坟墓分开，偶有混杂在一起的。马来西亚大都信仰伊斯兰教，乌鸦是伊斯兰教的吉祥鸟，乌鸦们在吉隆坡三五成群多得不得了，在这些坟场里的树上，乌鸦“哇哇”的叫喊此起彼伏。坟场加鸦鸣，这是我们的电影、小说里恐怖的场景之一，我的心不免一阵一阵发怵。马来西亚导游对此轻描淡写，他说死去的人就埋在身边，活着的人与他们不是更容易沟通和交谈吗？埋到郊外远远的山沟里，死者的灵魂就会孤独，这是活着的人所不愿看到的。多少年了，死者就在我们活着的人身边，大家和谐相处，没有谁说过感到害怕，更没有听谁说过闹鬼的事。

我打懂事起，鬼的故事不知听了多少，我也不知传播了多少个鬼的故事，就是身边有人，见了坟场，我的腿不禁也发软。在我们民间文化里，活人与死人的关系变成了人与鬼的关系，有时闹得极僵，虽然我们谁也没有真正见过鬼。

两种文化的比较，孰是孰非，恐怕没有谁会妄加定断。

马六甲的“乞丐”

据说马六甲是马来西亚最古老的城市，也是风光最秀丽的城市，然而，我对此地印象

最深的竟是“乞丐”。

在我的概念里，乞丐是伸手向人讨钱讨物的，但马六甲的乞丐不向人伸手。

那天我们正在游览，忽然一古老的城堡里传出了悠扬的小提琴声，曲子竟是《茉莉花》，在异国他乡听到江南小曲，倍感亲切，脚步不由寻着琴声而去。

拉琴的是一蓬头垢面的中年汉子。他穿的牛仔裤，裤角、膝盖、臀部满是破洞和补疤，已不能确认哪些是故意搞破的，哪些是真的磨坏了的。披肩长发由于疏于清洗和梳理，不由我不联想起“渣滓洞”里装疯卖傻的华子良。他的那双“波鞋”，那件弄不清什么颜色的衬衫，无不证明这是一个肮脏邋遢的家伙。然而，他眯缝着眼，陶醉于自己琴声的神态，还有那严谨的拉琴姿势，以及拉得地地道道的《茉莉花》，无不证明，他是一个小提琴演奏家。

导游说他是一个乞丐，听了他的琴声，如果谁愿意，将钱放到他脚边的破盆里就是。

他竟是乞丐！我很吃惊。导游还说，这样的乞丐，在马来西亚只有在旅游景点才能看到。言下之意，在别处是看不到的。听完了他的演奏，我心甘情愿掏钱递了过去。

继续走，又遇到了一位盘腿坐着吹口琴的乞丐，在熙熙攘攘的路边，他的口琴吹得再起劲，声音也是那么渺小，和拉小提琴的那位相比，他的艺术造诣，演奏水平相去甚远。他有自知之明，在他的腿前，摆着一大堆马六甲当地产的纪念品，诸如小海螺、小雕刻、花纸头等不值钱的小东西。听了他的口琴演奏，你随便丢几个钱过去，也可以随便拿走几件纪念品。许多人丢了钱过去，纪念品懒得去捡。乞丐一天下来，有相当丰厚的收获，导游说，有的甚至不在他的收入之下。

想想国内的乞丐，不给就死缠着要，给少了还嘟嘟喃喃说你小气，和马六甲的乞丐比，马六甲的高明多了。

新加坡：鸟儿的天堂

新加坡的鸟，多到居然飞到了川流不息的机动车道上了。那几只红嘴八哥，不知从何处飞来，它们在路中央站稳后，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然后扭秧歌式地大摇大摆走了十几步，又扑叭叭一齐飞向了路边的一棵大树上。前后只有两三分钟，路上的机动车也为此排起了长龙。为首的那位货柜车司机，连声喇叭也没按一下，他用怜爱的目光，瞧着八哥们飞走后，才将车开动。为了给鸟让道，车可以停下来排长龙，国民素质之高，令人肃然起敬。

我们到一家酒店吃饭，一下车，刚好碰到一厨工端了一盆饭菜之类的东西出来，嘴上念念有词。我以为他是去喂什么宠物，原来是喂鸟。鸟是天上自由自在飞着的鸟。厨工还没将盆放好，一群麻雀已迫不及待飞过来，站到了盆边大快朵颐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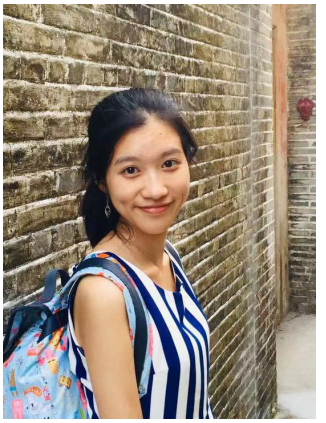
在国内，麻雀不是远离人群，就是在铁笼里瞪着惊恐的目光，等着人们的宰杀。哪像新加坡的麻雀，旁若无人，吃了人们给的食物后，开心地一哄而去，丝毫无被宰杀之虞。

新加坡八哥多、麻雀多、喜鹊多、画眉多，五花八门叫不出名的鸟更多，还有随处可见的乌鸦踪影。乌鸦在国内被我们视为灾星，那“哇哇”声就跟报丧似的，让人听了生厌。我插队的桂西，满山的乌鸦，后来到城市，哪里还曾见过。但在新加坡的屋檐下、房顶上、树丫上，哪里都是它们的安乐窝，幸福着呢。

鸟儿多，除了人们对它宠爱有加，百般厚待的原因外，新加坡原始森林般的绿化环境，更是鸟儿得以生存的重要原因。原始森林与人们刻意修饰的绿化有很大差别，前者不修剪，任其自由生长，密集，遮天蔽日，略显杂乱，更接近自然，鸟儿喜欢的就是这样的环境。新加坡当然也有刻意修剪了的花木，但更多的是古藤缠绕的参天大树，鸟儿多就顺理成章了。

法国音乐剧《摇滚红与黑》：是融合碰撞还是元素杂糅?

温咚荻



作者简介

温咚荻，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改编自“现代小说之父”、法国著名作家司汤达创作于1830年前后的经典长篇小说《红与黑》的法国音乐剧《摇滚红与黑》，2016年在巴黎宫殿戏院首演，2017年获得了水晶球奖最佳音乐剧提名。2019年来到中国巡演，11月在广州大剧院上演，引起中国音乐剧迷广泛关注。

《摇滚红与黑》第一次把文学作品《红与黑》与摇滚音乐相结合，在戏剧舞台上演，不仅选择了当代流行的音乐形式演绎经典，而且在舞台布景、道具元素等方面都做了新颖尝试，各环节均有可圈可点的精彩表现。

摇滚本身代表着反叛、反抗的精神，和《红与黑》对社会性和现实性的批判内核相贴合，男主角于连反抗社会现实，与固化的阶层做斗争，在权利、欲望和爱情中压抑地挣扎，正与当下摇滚精神相仿。用摇滚碰撞经典，符合当下流行热潮，在经典中加入流行元素，全新创作吻合如今观众的审美品位，更有亲和力、创造力，同时也和原作思想内涵相融通，用摇滚诠释文学经典的选择是聪明的、有意思的。

该剧的“摇滚”主要通过摇滚音乐呈现，《摇滚红与黑》一共创造了21首摇滚风格的歌曲，摇滚乐队现场伴奏，深受观众好评。于连独唱《荣耀向我臣服》(La gloire à mes genoux)可以说是本剧主打歌曲，体现了于连表面的克制压抑和内心的反抗与欲望，跟大众熟知的摇滚精神很一致，大段的独唱配合上背景屏幕红色和黑色的旋涡，让情绪宣泄得很直接，内心的反抗越强烈，现实中表面上就越压抑，越克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摇滚演绎的另一个呈现是把摇滚乐队直接放置在舞台上，舞台空间被分割成了上下两个部分，将近1∶1的比例。上半部分搭建的平台是一个完全属于摇滚乐队的演奏空间，5个乐队成员穿着时下简单随性的T恤和牛仔裤，弹着吉他，打着架子鼓；舞台下半部分则

留给音乐剧演员，穿着 19 世纪早期法国上流社会的宫廷式奢华服饰，进行传统音乐剧的舞台表演。

舞台背景的设计别具一格，和传统音乐剧越来越趋向复杂、立体的实体道具不同，《摇滚红与黑》的舞台背景仅仅使用了两块可向两侧移动的伪 3D 效果的 LED 屏幕，该屏幕可呈现立体景深纵伸效果，再加一块半透明幕布，拉上幕布把舞台分成前后两个区域，演员在幕布前后穿梭跑动，在 LED 屏幕背景的映衬下，身影若隐若现。屏幕展映的“绿帽子”“十字架”“铡刀落下”“画像表情”“爬窗户”等动画细节的设计充满了创意与幽默感，被观众津津乐道。同时，利用屏幕进行背景转换简单便捷，可以解决小说改编成舞台剧因场景太多而导致的布景转换难度。

从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红与黑》中文版全译本通常为 50 万字）到两个半小时的戏剧舞台，要完成两个不同的媒介形式之间思想内容、语言表达等呈现方式的转换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摇滚红与黑》在剧情上阔斧挥刀，删减了情节也删减了人物，主要抽取出了于连和两个女人的爱情线作为主要叙述。从一开始压抑对露易丝的爱慕，和露易丝大胆偷情，被迫离开，追求玛蒂尔德，枪击露易丝，到最终对露易丝表达爱意，整个主线都在讲爱情，前面部分“偷情被发现”成了为“离开露易丝”这一情节服务的，后面部分的“被露易丝举报”成为“枪击露易丝”，并最终“忏悔爱情”而服务的曲折；权利地位的争取似乎成了极为次要的事情，在巴黎勤恳工作寻求出头机会也是因为被露易丝无情抛弃了之后才不得不奋斗。原著中现实性、阶级性的批判自然也无法很好地表达出来，于连的悲剧更多像是一个无助的年轻人被有权势地位的反派无情地陷害。只有到最后死刑执行前，于连说出的那段具有反讽意味的独白，宣泄了对阶级分化和阶层固话的批判，才稍微挽回了一点让观众误认为“这只是一部言情剧”的错觉。

为了在两个半小时内展现完整内容，把小说爱情主线提出，弱化背景，简化更深层次的内容探讨，也未尝不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但遗憾的是，该剧连基本爱情线都没有叙述完整，每一个唱段的歌词内容主要是宣泄人物情感，淋漓尽致地表达人物内心，并不叙述故事发展，情节的交代仅仅是通过唱段与唱段之间少之又少的简单对白或旁白。该剧已没有明显的分场、分幕（除了中场休息），但每个场景的转换，剧情的推进还是极其生硬、跳跃，甚至苍白，更多的情节全靠观众自行脑补、填充，因此，情绪是无法连贯的。相应地，本应为锦上添花解决更换布景难度问题的 LED 屏幕，不仅没能掩盖掉剧情不连贯的硬伤，反而因为背景几乎无一空暇不停地换，实在太多太快，几乎没有静态的时刻，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在现场感觉仿佛是在看一部真人被择出了银幕的电影。

有人说这是“穷剧组”的“极简主义”，这大概是观众们对这个新颖剧目的厚爱，苛刻点说，这是元素太多的“简陋主义”，再加上舞台上半部被截出了个二层安放摇滚乐队，我不知道自己是在看音乐剧还是听演唱会，频频出戏。尤其在二楼、三楼观剧（一楼也许效果尚佳），演员、乐队、屏幕分离在不同平面，又全部充斥在眼睛里、视线中，注意力完全无法聚焦。

《摇滚红与黑》的音乐确实好听，美妙动人，让人热血沸腾。主演们不仅唱功好而且颜值高，就算将剧情抛弃，直接乐队和主唱开个演唱会，应该也能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该剧作为一次创新尝试，排除掉情节硬伤，如果将演员、乐队、音乐、舞台设计等每个部分单拎出来均会让人赏心悦目，只是，经典与流行的碰撞，多舞台新元素的融合，却进一步割裂了本不完整的剧情。跨媒介的舞台叙事与呈现，应该还是有很远的路要走。

芬兰教育之“本”

文 王惠（广州市教育研究院语文学科教研员、广州市中学生文联主席）

好的教育应该具有什么样的特征？怎么样才能办出好的教育？对于描画教育蓝图、进行教育设计、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这些问题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自2000年芬兰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国际学生评估（PISA）结果中名列前茅以来，芬兰的教育引发世界性的关注。毕竟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仅仅用一个国家内部的标准来衡量教育成功与否已远远不够，因为今后的人才都得面临和参与全球竞争。

于是，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工作者因为芬兰在PISA测试中所取得的成绩来到芬兰，渴望一探芬兰教育的秘密，但他们却往往意外地发现芬兰人自己似乎对这一荣耀并没有特别在意，显赫的得分既不在他们的预期之中，也不是他们的奋斗目标；更有意思的是，他们发现，无论在芬兰的哪一片土地上，孩子都能免费接受优质教育，免费享用营养午餐，免费获得特殊的支持，如此均衡的优质教育，毫无疑问是一个比在PISA测试中位居榜首更加令人震撼的成就，而这，才是芬兰教育的预期和目标。

是的，以人为中心、起点和目的，由全社会共同支持，重视夯实基础和联结生活，为了促进成长，这既是芬兰教育的特征和优势，也是一切好教育的特征和追求，而支撑这样的教育行为的，不过常理而已。

儿童本位还是成人本位？鲁迅先生《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中揭示了一种做父亲的常理，那就是依循生物界一切生物的做法：保存生命，延续生命，发展生命。因为要用进化和发展的眼光来看待生物界，“后起的生命，总比以前的更有意义，更近完全，因此也更有价值，更可宝贵”；所以“本位应在幼者”“置重应在将来”。而芬兰，正是按照这样的常理来进行社会规划和教育设计的。1921年，独立不久的芬兰就通过了义务教育法案，所有儿童必须接受六年小学教育。即使连年战争，物资极度匮乏也没有改变。1945年，芬兰科学家因在农业与营养化学方面的重大发明而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这是芬兰艰难困苦时代最耀眼的希望之光，也是教育强国的信心之光。二战之后，芬兰人口出生率飙升，儿童福利制度帮助有孩子的家庭渡过了艰难时期，儿童卫生医疗覆盖面也不断扩大。1948年芬兰通过学校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午餐的法案，1949年开始的孕妇卫生保健套餐计划涵盖了所有要生孩子的家庭。以儿童为中心的国家理念，为以儿童为本位的社会设计、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国家支持，同时，儿童的健康成长与个性化发展也为国家的成功奠定了最牢靠的基石——人就是一切，人是一切的基础。

孩子是社会的还是家庭的？在芬兰人看来，孩子不仅仅是家庭的，更是社会的，全社会都对每一个孩子的教育和成长负有责任，事实上，一个孩子出现问题，全社会将为此付出更大的成本，因此芬兰社会对学校教育的支持力度、对孩子成长的参与程度都很高。芬兰母亲待产时，政府的社会福利部门会给这些准妈妈专门准备一个待产包，除了新生儿需要使用的各种设备，还会有一本书，内容是适合朗读或哼唱给孩子听的诗句、歌谣和摇篮曲等。专业社工也会介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全过程，提供专业指导，必要的时候，甚至会取代家庭对孩子提供监护。

对于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越基础，越重要，应该是一种更加符合常识的认知，芬兰人就是这样认为的，所以他们会把更优秀的师资、更专业的人员投入到基础教育事业中去。与此同时，他们认为母亲这一角色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说十分重要，若新妈妈认为必要，可以享受三年的产育假期，高中生毕业典礼时，学校会为他们佩戴专门的小白帽，同时还要给每一位毕业生的母亲颁发荣誉徽章。另外，在基础教育阶段，芬兰人认为语言学习和人文底蕴至关重要，除了国家交流的现实需要，还有一个原因是基于学理的对于语言和思维关系的认知，因此国家课程大纲规定每一所学校都需要提供至少 8 门语言类课程，每一所学校都要通过阅读为学生的精神成长打好底色；芬兰人还认为理解和思维能力比知识记忆重要，认为动手实践和亲身参与更为重要，外在的知识信息通过查阅电子系统可以快速获得，内化的思维和创新能力才是未来社会的立身之本。

芬兰人不认同学生坐在教室里、由教师讲授的学习方式，他们喜欢到开放的环境和真实的生活世界中去学习，自然界中的森林和湖泊、社会中的各种文化空间和职业场所都是他们的学习资源，而最新版的课程大纲所提出的横贯能力和现象教学，也是基于真实的生活现象和现实问题，整合多学科的项目式或主题式学习方式，一个项目或一个主题学习任务的制定、实施和评估，既需要老师之间的合作，也需要学生之间的合作。正是这种真实情境、生活世界中的学习和成长，让孩子们能够在学习和生活之间建立关联，从而确认学习的意义；能够更加快乐地学习，并与同伴建立有效的合作关系。

质量用什么来衡量？在中国，一般而言，学校的办学质量、教师的教学水平、学生的学业表现都由考试成绩来判定。在芬兰，学生的幸福感和效能感是最重要的质量标准。做最好的自我，在芬兰不是拿最高的分数，而是不断发现自我、实现自我和突破自我的成长过程。

教育是扎根大地的事业，更是面向未来的事业，这既决定了教育的基础性和重要性，也决定了教育事业在务求实效的基础上天然而又必然地具有一定的理想主义色彩。国际 21 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以“教育：必要的乌托邦”这一命题表达了对教育的定位和期许：“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教育的主要目的都是使人作为社会的人得到充分的发展。”“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应该使每个人，尤其是借助于青年时代所受的教育，能够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确定在人生的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

显然，人的全面发展、充分发展是教育事业的核心，让所有人的创造才能和创造潜力都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是教育工作的理想和目标，不过是基于常理，偏处地球极北之地、面积只有 33.8 万平方公里、人口不过 552 万的蕞尔小国芬兰办出了全世界最好的教育。



推进西南联大文旅融合

文 白庚胜（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9 年 8 月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指出：要推动旅游景区提质扩容，打造一批高品质旅游景区、重点线路和特色旅游目的地，为人民群众提供更多出游选择，合理调整景区布局，优化游览线路和方式，扩展游览空间，推进“互联网 + 旅游”。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人文资源是旅游的核心资源。在新的技术推动下，新时代文化与旅游融合要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使文化繁荣和旅游发展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通过深入挖掘文化旅游资源，大力提升旅游的思想文化内涵，充分彰显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革命文化和红色基因传下去，让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广为弘扬。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近年来，云南一方面整合文旅资源，一方面大胆运用数字技术，与互联网公司合作解决困扰云南旅游业的难点痛点，通过数字技术与文旅产业的融合，带动了全省经济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在“一部手机游云南”模式继解决投诉难问题后，他们又利用数字技术解决了诚信购物、无忧退货等问题，提供了租车、景区导览、找厕所、拍照识花等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站式的文化旅游深度体验。最近，云南省政府又与腾讯宣布“云南新文旅 IP 战略合作规划”，通过新文创来打造云南省级文化 IP，并设计推出了云南旅游代言人“云南云”的 IP 形象，让全世界在游戏、电影、动漫、体育、音乐等数字文化中，重新认识云南当地的传统文化、民俗文化，特别是西南联大文化。

西南联大不仅代表云南，也代表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化精华。但是，多年来人们对这一文化 IP 缺乏系统的开发思路，也没有具体规划和战略，导致至今这一文旅游资源的富矿仍然尘封在历史中。而现在，与产业互联网的发展结合，利用最新的数字技术和平台，以新文创的战略思路来整合线上线下的文化旅游资源，可以充分挖掘西南联大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商业价值，打造出一个数字文旅时代的新经典，让这颗文化明珠在未来点亮云南、闪耀世界。

对如何打造西南联大文化 IP 以推动文旅融合，我有如下具体建议：

1. 系统总结西南联大的内涵和精神，发掘它在当下和未来的文化价值

西南联大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闪耀世界的文化 IP，是中外教育史上的奇迹，产生过 2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 名“两弹一星”功勋获得者、4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9 位党和国家领导人、170 多位两院院士以及 100 多位人文领域的名人。其最核心的价值，在于自强不息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我们应该总结，研究这种现象和精神，为国家民族崛起而读书、学习、拼搏。

2. 西南联大的文旅融合项目要由国家主导，相关省市和相关大企业联合参与，形成合力

西南联大牵涉北大、清华、南开、云南师大四所大学，以及北京、天津、湖南、云南四地。因此，西南联大文旅融合项目开发要有系统思维和顶层设计，由国家出面拨款，或投入人物力，制定完整、切实可行的方案，并由云南省与北

大、清华、南开大学加上湖南省成立西南联大联盟，设立全国性协会、学会组织，对西南联大文化进行全面策划、运营、监督、管理。将老校址建成西南联大博物馆或西南联大文创园区，同时设立永久性西南联大文化论坛，每年邀请西南联大的校友，以及全世界研究西南联大的学者专家，从文化、教育、技术、科技、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美术、摄影各种不同的角度发声，以激活西南联大的人脉和精神、力量。

3．文化与商业双轮驱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丰收

西南联大 IP 文旅融合项目要发挥市场和企业的作用，以市场化的方式构建西南联大 IP 产业链，特别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数字文化的力量来深入挖掘西南联大的影响力，让西南联大的 IP 与年轻人发生连接，成为时代精神的一部分，形成政府牵头，高校、社会各界力量踊跃参与的模式，发挥产、学、研各界优势，释放数字文化企业平台和技术资源能量。为此，可在西南联大联盟下面建立一个有独立法人的西南联大文旅总公司，从事建筑保护、资源开发、深度旅游、学术研究、图书出版等，滚动发展，良性循环，打造云南文化旅游产业新增长点。在数字技术上，它应与腾讯等企业联手，致力于打造世界级文化符号，如考虑通过新技术建设西南联大数字博物馆，让闻一多、朱自清这些历史人物在虚拟空间活起来，和年轻人互动。西南联大很多故事，另外在互联网上通过游戏、影视等多种形式重新演绎。

4. 设定西南联大旅游线路时，拉动云南的旅游业和文创产业及其他产业的发展

西南联大文旅融合项目旅游线路可以有不同的线路设计，按照老路，一条从长沙乘京广线至广东后经广西进入云南，一条从长沙抵广州后走海路到越南海防改乘滇越铁路到达昆明，一条是从湖南经贵州步行进入云南，可以拉动多省、多地、多校社会、经济、文化、旅游、技术、市场大联合与共同繁荣。目前由腾云推出的有关旅游线路，只包括了昆明等联大旧址（云南师范大学）、云南大学致公堂、东方书店、福照楼（联大主题店），以及红河的联大校区蒙自旧址、碧色寨、周宅听风楼、联大附中等处，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

5．给西南联大名人树碑立传，让西南联大IP活起来

对历史上西南联大培养出来的学者名家，应该作彻底摸底调查统计，建立一个有关名人库，并在西南联大校园区里建立一个雕塑群，给那些为人类、为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的西南联大学者、专家、科学家和艺术家塑像，并把像杨振宁这样西南联大出身的名人资源加以活化、加以转换，同时出版有关丛书，拍摄有关电影电视，开辟有关景点，组织有关活动，传播、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坚定科技创新信念，鼓舞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6. 恢复重建西南联大，推动云南边疆教育事业发展

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教育布局的大调整，且已开始第十四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国家必须考虑到云南作为抗日大后方，曾经为中华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特别是为西南联大的生存倾尽全省之力以呵护之，云南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教育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它的教育水平在全国尚属下游，因此应给予更多的关怀、支持，以促进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进步，强化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和谐力量，而恢复重建西南联大正可以起到这方面的作用，更好地实现教育公平、教育兴边、教育强边，并为西南联大文旅融合培育源源不断的生力军，以告慰西南联大的先辈，传承西南联大的薪火。



无尽的光阴

——谈温青诗集《光阴》

文 李一鸣（中国作家协会办公厅主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挺拔的身板，严肃的面容，偶尔一笑，嘴角一歪，剑眉下锐利的眼神，平添几分纯净和温情。正是京师最美的季节。池塘边，弱柳扶疏；蓝天上，白云舒卷；秋日的芍药居，迎来了又一批文学俊彦。这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批示开设的“作家的责任与使命”专题班。铁凝、李冰、钱小芊、张健、廖奔、陈崎嵘、白庚胜、李敬泽，悉数出场，盛大阵容，欢迎鲁 20——面向未来的骨干作家的到来。

49 名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将在这文学的殿堂、作家的摇篮，经受特殊的淬炼，享有众声喧哗中的静谧研修时光。国歌声中，站起来，一排排挺秀的青春树，一张张激越的、沉思的、庄重的、微笑的面庞。几位身着挺括军装的军旅作家，在五颜六色的人群中分外醒目。一双锐利的眼睛一闪。

后来，我常常回顾起当初的“发现”。

平素空旷宁静的“回形”教学楼沉寂半个月了。就如一艘静海上的船，默默镶嵌在静穆油画里。似乎一根头发丝落下来，也会惊起喧腾波澜。

就在那一天，蓦然间，呼啦啦涌进了一群人。

各种面孔、各色服装、各地方言。旧朋。新友。纸上早闻、人间方识。诗人相聚，分外喧哗；小说家叙谈，温文尔雅；散文家对视，默默不语；报告文学作家，激情飞扬；评论家紧紧握手，嘴里正是犀辞利语……

但……仿佛起了什么幽微变化？

喧嚣过后，不经意间，有些莫名情绪袭上眼角、眉梢、心头。

他们毕竟陡然从外地到了京都，忽然告别家庭生活进入集体活动，倏然从工作状态变为学生角色，就有那么一点寂寞、落寞、孤独、感伤、思念、牵挂、无聊，氤氲开来。

然而，又是突然间，这方静水，活了起来。

鲁 20 博客，登上案头。

鲁 20QQ 群，小小企鹅在每张电子屏上闪动光亮起来。

哪位学员建的，请起立！

他站起来，就如一棵碧绿的树，军姿严整，眼神犀利，间有一丝不被人觉

察的羞涩。

常常浮现在眼前，挥之不去的是，十六岁，那少年，告别贫困的家园，别了学堂，走向熙熙攘攘的社会。

建筑工地上，寒风中，一张青涩的脸、乱乱的发，沾满泥沙的衣服，他掂着瓦刀，一丝不苟地砌砖，闭上一只眼，瞄向基准线；豫北矿井深处，撑杆林立，一灯如豆，狭窄的只容一人侧身的地方，他满脸的黑，一铲一铲，煤屑洒落；广阔大平原上的庄稼地，在急速旋转的太阳下，像着了火，一个单薄的身影，一起一落，锄把上汗水和血珠粘合在一起……响亮激昂的军队进行曲中，他穿上军装；静谧严肃的考场，只有沙沙的笔头摩擦纸张的声音；军校操场上，回荡着节奏鲜明、高拔沙哑的口令；一个佩戴中校肩章的军官，缓缓举起右手还礼，眉目间有了些许沧桑，眼神锐利，因过于严谨而微微略歪的嘴角……

一份份刊物、一张张报纸，簇拥着落下来，落下来，他的名字如此醒目。

一步一步，他，推开文学殿堂的大门。

或许阅尽许多人间的苦难，那行行诗中，才爆发出精神的嘶鸣。但那不是悲伤，是苦恋：

我咀嚼黑洞底的乱石
指头中的灵魂
与石壁苦苦相恋

艰辛岁月，没有击垮他，他却在诗歌中获得生命的升腾：

每次天降大雪，
我一定是其中的一片，
落地、翻卷、融化……
只有诗歌，
才能让一个人如同雪花爬上枯草，
不断地重生、不断地湮没……

或许不是英雄情结，是童年少年的苦难赋予他一颗善感悲悯的魂灵，当地震在玉树发生，他主动请缨，远赴高原救灾。玉树抗震给他留下双重记忆，著名长诗《天堂云》，化作诗坛永远的回响；高原缺氧造成的心脏损伤，成为他对玉树贴心的回望。

天堂里云来云去……
没有人看清它的面目
那些飘扬的光阴
挂在了拥挤的天堂里
所有过往的精灵
都向下眺望
白云铺地，
大雪无乡……

一场灾难，缘成一种心灵的皈依，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有的是通透的灵性和神示神启：

一个皈依高原的生灵
是不能毁灭的
如同佛主的经卷和匍匐在地的草
用无数的轮回
描摹一个永世的希望

路途的艰辛
其实不只是一种磨难
是神明生长的过程
把天堂的云彩
一丝一缕挂在心间

从此
死亡不再是死亡
苦难也不再是苦难
神明引导的生命
永生于山石泥水和青草之间

面对灾难，他超越灾难，对于生命、生存、永恒，有了彻骨体验：

让我们原谅所有的厄运吧
包括那些山崩地裂的颤动
那些地动山摇的雷电
那些冰雪掩埋的泪滴
那些侵入内心的风寒

一切过去了，天地间，惟留下这朴素的神景，这哲学的传奇：

风醒了，水醒了
太阳照开了冰雪的泪眼
青稞抬起了头

天堂在哪里？在他的心中，乃是：

无需指引，
随时出现在回家的时候

从此，他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天堂云”。
光阴依旧流逝，他面对世界的眼光，总是有着新的发现和缄默中的抒发：

有弯曲才有弹性
一个人在弯路上积攒的力量
可以远远地射出自己

原来那些弯路，那些曲折，那些泥泞，那些旷远，无不具有人生的深意，人与世界，与存在，暗中有缘。

那个痒起来的伤疤
那个深潭是一朵残花睁开的眼

人生的痛与折磨，在他看来，本是生命中的“暖伤”，即便“所有种子的伤口吐出鲜嫩的匕首”，但“复苏的暖色”，正是这个世界写给人类的“光阴书”！

对存在的探求，对人性的揭示，对生命的敞开，对高梦的开放，对苦难的呈现，对地域文化符号的强化，对赞美诗境的开掘，对具体物象的升华，对意象的捡拾与选粹，对适切体裁叙事散发人性光芒的挺进，对诗歌形式的拓展……这不正是从《天生雪》《水色》《天堂云》到《光阴书》的精神指向？

我又看到那个少年，在诗歌的原野，在文学的巷道，在创作的基建现场……

我又看到那个军人，缓缓站起来，挺拔的身板，严肃的面容，剑眉下锐利的眼神中闪过一丝羞涩，英武中透出几分俊美几分纯净几分温情……

就送到这里吧，温青，前路看远，道阻且长，珍重无尽，拥抱芬芳！

智慧的痛苦　温暖的祝福

——读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文 蒋述卓（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暨南大学原党委书记、副校长）

海子是中国当代诗坛中最为年轻而显成就、最具天才而又英年早逝的杰出诗人。他 1964 年出生，1989 年卧轨自杀离开人世，但在他短暂的一生中，却为我们留下了 500 首抒情诗、7 部长诗，共计 200 余万字的诗文作品。他与骆一禾一样，同样对乡村、对麦地充满着崇敬的爱意，他对村庄、麦地的拥抱和歌颂显露出他那农家子弟敦厚纯朴的本色，而他对春天、大海的向往又寄托了他对理想、对家园的精神追求。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正是诗人向世人毫无保留地袒露出他的心灵世界，同时又寄寓着他对人类、对社会、对生活充满着热爱和深情的一首经典名作。

诗人萌发出“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的想法或许来自某一闪念，正如诗中所说到的那是“幸福的闪电”对他的一种提示和惊醒，这正如我们过惯了日常的生活已经意识不到什么是幸福，或者因为生活艰难只能勉强维持生计而从来不敢去想象什么是幸福一样，它需要“闪电”的启示。其实，幸福就来自对生命的重视，以及对尘世生活的热爱与珍惜。“喂马、劈柴”是宁静的劳作生活，“周游世界”又是快乐的休闲生活，这二者并列一起构成劳动与享受的人生。劳动着是幸福的、愉快的，正如享受着同样是幸福与愉快的一样。没有劳动又何来享受呢？即使是为生存而艰辛的劳作也同样会使人感到幸福，幸福指数来自我们内心的感受。幸福不是天堂中的幻影，也不是飘浮在云雾中的海市蜃楼，它就来自再简单不过的“粮食和蔬菜”，一切想躲避尘世生活的所谓幸福追求无疑是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地球一样，那正是陷入痛苦而抛弃幸福的起始。但海子却要选择他个人的超越，而不得不陷入智慧的痛苦。他就如代人类受难而来临人间的基督一样，宁愿选择抛弃尘世的享受而给人警醒，这就是他最后陷入不幸的起因。

海子是痛苦的、矛盾的，他知道尘世的生活于人是必需的，但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他又渴望着超尘脱俗，他的诗人气质又使他在心灵深处向往着浪漫，一所面朝大海的房子静静地伫立在春暖花开的季节和优美的环境里，那正是他独自的幸福想象和终极理想。“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这就是他的选择。诗人以一种诗意的生存方式让读者与他分享幸福的理想，并给世人留下一个绝对美好的精神世界。

这“房子”是海子的精神家园，“大海”是海子无私、单纯、清澈、宽阔的胸怀，“春暖花开”是海子温和、善良、奉献的性格象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诗人要“和每一个亲人通信 / 告诉他们我的幸福”，也要给每个陌生人祝福，甚至还要“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他不仅对亲人、陌生人充满温情，而且还将这种温情推及大自然，这是一种何等伟大的胸怀和慈善的心肠！

海子离去了，却给我们留下了对幸福的理解与向往，对生存意义与生命价值的沉重思考。海子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祝愿就像春天里盛开的花朵一样永远在向我们微笑着，温暖着我们的心田，也如那滔滔大海的呼吸，始终环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给我们提示着——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



阿丽玛和达古拉

张宇航（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馆官员、羊城晚报原总编辑）

内蒙古巴彦淖尔，是名声在外的黄河河套地区。千里黄河从宁夏磴口进入蒙古高原，河水北流折往东方再往南，形成一个巨大的“几”字。

巴彦淖尔，蒙古语为“富饶的湖泊”之意，因境内有乌梁素海——一个面积达数十平方公里的咸水湖而得名。阴山和狼山，把巴彦淖尔分为南北两部分，北边是辽阔的草场，南边因靠着黄河而成了河套地区。我们要去的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就在两地交接处。

巴彦淖尔盟（后改为市）纪检委副书记朝格图是个热心肠的人，性格与他名字的含义“燃烧的炭火”一样。他把向广东热心人推荐的贫困学生比作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朝书记得知我们要来看望资助的学生，早早就与巴盟教育局和临河、乌拉特前旗、乌拉特中旗的学校联系好。

海流图镇是乌拉特中旗政府所在地，相当于广东的县城。经朝书记和乌拉特中旗教育局推荐，广东热心人在这里资助了几十位贫困学生。其中一位名叫阿丽玛的初中生，由我女儿张焰资助。阿丽玛，蒙古语是“梨花”。许是家境贫寒的缘故，这朵梨花有点瘦弱，忧郁的眼神，让人怜悯。张焰当时正念高中，她从朝书记寄来的贫困学生资料表里选中了阿丽玛，决定用自己的压岁钱帮助这位小妹妹读书。

朝书记接上我们，经乌拉特前旗和五原县，来到海流图。阿丽玛和妈妈，还有由广州市育才中学老校长袁玉莲资助的布仁、李江燕资助的乌日古玛拉，早早等候在旗蒙古族中学校园里。与这些受资助孩子见面，就像与久别的亲友重逢，彼此间不会有陌生感。乌日古玛拉抱紧李江燕，哭着喊“妈妈”；李江燕也在流泪，把准备好的下学年资助款交给乌日古玛拉的奶奶。布仁接过我们代袁校长带来的学习用品和资助款，不住地道谢。这位小男孩不知道袁校长的性别，写信时称其为“袁爷爷”，逗得 1949 年前就在香港参加地下党、教书育人几十年的老校长直乐。

阿丽玛和妈妈有些腼腆，慢慢地熟了，才显得轻松起来。其实我们早已了解阿丽玛家共四口人，爸爸打零活，妈妈当环卫工，供她和弟弟上学，家境贫寒。我们把资助款塞给她妈妈：“为了孩子的明天，大家一起努力好吗?”阿丽玛搂着妈妈，懂事地点点头。

远远地，走过来一个穿着绿色蒙古袍、扎两条辫子的小姑娘，笑起来脸上露出俩酒窝。旗民中校长说，她叫达古拉，是提请广东热心人资助上学的第二批贫困学生之一。“好，我们负责资助!”眼前的小家伙挺招我们喜爱。同来的摄影师刘亚江举起照相机为达古拉拍特写。后来这张照片成了我们的散文集《守护善良》的封底。

达古拉也是乌拉特中旗人，家在草原上，父母都是牧民。近些年雨水少，草不好，养羊养牛入不敷出，家里难以凑齐供达古拉读书的费用。我们想起来中旗的路上，看到草原因缺水而荒漠化，有的地方还泛着白花花的盐碱，心里沉甸甸的。靠放牧为生的牧人，全指望长生天能降下甘霖，羊羔快快长大。这下好了，达古拉联系上广东热心人，可以安心读书。

阿丽玛和达古拉，但愿这两朵花儿共饮珠江水，快乐地长大。

乌拉特草原、阿拉善草原、杜尔伯特草原以及内蒙古所有的草原上，还有多少阿丽玛和达古拉在嗷嗷待哺？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困难时，内蒙古草原养育了 3000 多名华东地区的汉族孤儿。我们又需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报答这份恩情，也为草原上的孩子做点什么？

王佩瑜——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文 张欣（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广州市作家协会主席）

毛主席诗词《雪》最让人无法企及的是它的气势磅礴，是一代伟人的胸襟。可见一部作品的才华、用典固然重要，但尤可习得，而其中的巨大张力、辽远空间则更接近天然之力，这在主席的诗词里也算是神作吧。

我们形容一个人有气场，常常是被伊的气势所震慑。

王佩瑜，自出道以来一直是中性装扮，男发长衫，不饰脂粉不戴珠玉，似乎一切女儿家喜欢的东西都与她无缘，素成清汤挂面。

第一次看到她的影像资料，是她唱《智取威虎山》里的“穿林海跨雪原”，当即惊为天人，完全被她的气势碾压。嗓音敞亮的京剧演员多了去了，但是一开口便能夺人心魄，让人后背发麻的并不多见。

这就是演员的爆发力。

这次王老板到广州大剧院开清音会，我有幸听了现场。的确她的爆发力不是盖的，瘦削的身材，窄窄的双肩，根本想象不到她的声音如此的恢宏粗犷，力撼千钧，令全场肃穆无声，紧接着才炸响第一个满堂彩。

第二是她声音的表现力。

声音这个东西看不见摸不着，嗓音亮堂还可以说老天爷赏饭吃，但是要表现出诸葛亮、杨四郎这类人物的气度壮怀，让声音彰显力量是非常不容易的。

《空城计》中的唱段内既有紧张无奈的情绪，又有智者的坦然以及大军压境片刻间的视死如归，五味杂陈的内心世界通过唱腔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就是“角儿”的魅力和担当。

没有“角儿”哪来的“座儿”啊。

最后是她的收放自如，王老板最擅长的是唱腔大开大合。

遇到直舒胸襟唱腔根本无上限，声响九霄云外。但在需要收音的地方，绝不拖泥带水，刹得没有半点彷徨，滴水不漏。

这样的演唱给观众带来的感觉是痛快、尽兴。

也是现代意识在这门古老技艺中的具体渗透。我们常常感叹京剧的拖沓，戏称脚一抬唱半年，这样的节奏自然会错失年轻观众。

王老板的现场给人欣欣向荣的感觉，有许多年轻观众乐在其中。

散场时观众久久不愿离去。

王老板只是返场谢幕，恭敬鞠躬，多一段都没有唱。

剧院天顶灯光亮起，空旷的舞台上伴奏走得一个不剩，唯有一张青案、几把椅子。满目怅然，令人难舍。

好的艺术，从来都是如此。



歌乐山下渣滓洞

王瑛（文学博士，华南农业大学中文系主任、教授）

这倒是一个风景绝美的地方，绿树成荫，溪水潺潺，偶有飞瀑；山也有一个好名字，歌乐山，可喜可乐。若是山凹处筑一小屋，有云时看云，有雾时赏雾；门窗不隔百鸟和鸣，不绝花香草香暗侵；高兴了上山顶看看日出日落，倘若有心事可想，倚一青石发半天呆也是美极——只是这么一个适合高隐的地方，却有一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渣滓洞。

房子是寻常房子，青瓦土墙，窝在山坳里，掩在树荫下，被一圈高墙拢了。墙上有许多国民党当年留下的口号："命令重于生命，工作岗位就是家庭""长官看不到想不到听不到做不到的，我们要替长官看到听到想到做到""青春一去不复返，细细想想！认明此时与此地，切莫执迷!!"但凡读过几年书的人，都知道《红岩》，知道江姐和可怜的小萝卜头，人们对渣滓洞，应该是很有几分恨意的；对这个泯灭人性的地方，也很有几分好奇的。

挪进当年关押革命者的牢房，气氛变得沉重了。

太虐心了，江姐和小萝卜头，《挺进报》和铁窗诗社。想到和看到，看到和感同身受完全不是一回事。很多人一开始也许只是好奇渣滓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监狱，认知里有《红岩》里的酷刑和刀光，但一旦真正走进牢房，走进房间里烈士的照片和简介（有的人连照片都没有），很容易就被带回黎明前夕的中国，看见1949年11月27日的大火和杀戮，小萝卜头细瘦的脖颈和江竹筠纤细的十指……这么多年轻的人啊，很多人都没有过30岁，都是年轻的美好的血肉之躯啊！人们被震撼了，人群拥挤，寂然无声，表情大多严肃甚至悲怆，眼里含着泪水。革命者的故事，令人痛惜、窒息，令人愤恨。

铁窗诗社的诗字字血泪，每一个字都看得见刀砍枪戮，看得见英勇赴死，看得见信念和博大。我们的和平和自由里，有无数先烈的血和生命。

一个父亲的声音响了起来，他在读铁窗诗社的诗，几乎把墙上的每一首诗都读了一遍，带着四川咏歌的腔调，读给他尚未开蒙的幼子听。有时，他还会停下来解释几句。那小儿是个好奇的孩子，他不太理解父亲的认真和庄严，但感受到了父亲情绪的波动——他知道父亲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必须认真听，他在一片腿林里仰起头，努力理解父亲的话语。

"幸福来得不容易，国家的富强来得不容易，"一个年轻的母亲叮嘱大概刚刚开始念小学的女儿，"要珍惜啊，知道不？要爱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嗯。"小女儿乖巧地应道。"爱就是要好好学习，学好了，报效国家。"小女儿一脸严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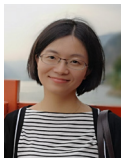
"都要逃了，为什么还要杀人?"有人愤愤不平。谁能说清楚人性之恶呢?

解释已经不重要了，无论什么理由我们都无法原谅。那么多活生生的躯体，就这样被1949年11月27日的机枪集中扫射，就这样被扫射之后还要大火焚烧！好不容易逃脱出来，还要被补枪补刀致死！1949年11月27日一定是个被诅咒的日子，那一天魔鬼降临。

一步步挪进来，看一圈先烈被关押的地方；三步一回头地离去，感慨万千。又见牢房围墙外的岗哨和机枪位，心里升起无边的恨意，竟一句话也不想说。

这清澈翠绿的山，怎么就叫了歌乐山呢？可是不叫歌乐山，又何以命名？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真义



文 王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文化系主任、教授）

庄子有句名言“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句话流传甚广，还曾挂在我小学的教室里，激励我们“学海无涯苦作舟，书山有路勤为径”，发奋求学。现在看来，这其实是个笑话，因为庄子的这句话还没说完，紧接着的后半句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庄子在此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与“学海无涯苦作舟”相反的含义：以有限生命追求无限的知识，危险啊！

知识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吗？为什么庄子要对发奋求知的行为发出警告？让我们从庄子的价值观谈起。

> **在庄子看来，任何以危害生命为代价追求身外之物的行为都是可笑的，因为它舍本逐末、得不偿失。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庄子之所以要对发奋求知发出警告，是因为他担心人们将知识凌驾于生命之上，造成对生命的戕害与异化。**

人的一生总是被各种价值包裹，比如道德、财利、权力、名声、情感、知识、生命等，而这些价值总是通过一定的序列呈现在人的意识之中。有的把道德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有的把财利摆在首位，就像“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俗语所宣示的。还有的把情感视为最高追求，比如以身殉情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而对于庄子而言，生命尤其是生命的体验才是他最为看重的，而其他的价值都是身外之物。

《庄子》中有一个寓言，说如果有一个人用珍贵的随侯之珠，去弹打飞得很高的麻雀，世人定会笑话他，因为他使用的工具（随侯之珠）太过贵重，而他希望实现的目的（雀）微不足道。在庄子看来，任何以危害生命为代价追求身外之物的行为都是可笑的，因为它舍本逐末、得不偿失。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庄子之所以要对发奋求

知发出警告，是因为他担心人们将知识凌驾于生命之上，造成对生命的戕害与异化。

惠施就是因知识而异化的典型。他学富五车，博学而又善辩，总是提出一些看似高深的命题炫耀于天下，比如南方既没有穷尽也有穷尽、今天到越国去而昨天已来到、天下的中央在燕国之北越国之南，他还特别喜欢与人辩论诸如“卵有毛”“鸡有三足”等怪异的辩题，靠辩赢他人获取名声。一般人或许觉得惠施很有知识，而在庄子看来，惠施不过是一个被万物之理牵引，而时刻不得安宁的可怜人。他对知识的追逐，就好比形与影的竞走，永无休止，神伤体乏；他所追逐的知识无法养护他的生命，反而在耗损他的生命。

看到庄子对惠施的批判，不知那些发际线持续后退、经常被失眠困扰、写了诸多云遮雾罩论文的高知，会不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伤感。其实，被知识异化的何止高知？各位可以回顾一下自己的求学生涯，从小到大，在学校里学了多少只能应付考试、一辈子都用不上的知识，并被这些知识折磨。有多少知识教育沦为应试的知识点教育，它漠视学生的生命需求，遗忘教育乃促进生命的初心，将一个个鲜活的人当作装载知识的容器，以至于像“黄花岗起义谁打响了第二枪”“谁又打响了第三枪”如此无聊的考题赫然出现在历史考卷上。

知识对生命的异化，在中小学阶段表现得最为惨烈。孩子们被迫将求知作为生活的绝对重心，在学校和家长的联手管制下，知识就如同一张无所不在的网，将孩子们牢牢罩住，而他们真正的生命需求却没有被善待。这样的结果就是，知识与孩子们的关系发生了颠倒，不是孩子们在占有知识，而是知识在占有孩子。孩子们日渐丧失对知识的热爱，开始逃避知识，甚至厌恶知识。但迫于学校和家长的严密监管，孩子们不得不将生命需求压抑下来，无可奈何地肩负着知识的重担继续前行。但孩子们对知识的厌恶并未缓解，而是在高考结束后集体撕书扔书的狂欢中得以释放，并一发不可收拾地延续到管理松弛的大学阶段。于是，放风成为大学生的常态，他们终于可以卸下知识的重担，对自己长久以来不得舒张的生命进行加倍补偿，谈恋爱、打游戏、搞学生活动、找实习，就是没心思学知识，即使是那些能够真正促进生命的知识。

由此反观庄子对发奋求知所发出警告，不得不叹服其穿越时空的思想魅力。庄子并非贬低知识的价值，他只是在提醒世人：“人应是知识的主人，而非知识的奴隶”。想必这才是“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真正用意。

纪信之替



文 商震（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

西充县是南充市的一个下辖县。春秋时期，巴蜀地区（含现在的四川地区、一部分陕西、甘肃地区）有三个国家，巴国、蜀国和充国，也是“三国鼎立”，充国之南是南充，充国之西就是西充。后来充国最先被灭掉。春秋时期的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西充县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矗立着一组故事性很强的雕像，讲的是秦末纪信“诳楚存汉”的故事。按照现在的行政划分，纪信是西充人，所以这组雕像立在西充，经常听到现在的人们口口声声“人心不古”的慨叹，而这里要“复古”，广场叫“忠义广场”。

> **忠，是忠于带头人，忠于这支队伍或忠于这个集体；义，是对带头人的厚义，对这个集体的情义；义是置己身生命于度外的勇气，是生如沧海死如虹的英雄气。**

纪信原本是赵国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北人，是什么时候、怎么迁徙到四川去的，历史没有记载。我甚至没有找到纪信究竟是出生在河北还是四川。生年不详，出生地不详，由此可以断定，纪信不是名门望族的后代。有史料称，纪信出生在当时的阆中县紫岩乡扶龙村（此地现为西充县），在没有其他地方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我们就认可吧。

史料上说，纪信是秦末时参加了刘邦的起义队伍，此种说法我存疑。我更相信纪信是在刘邦做汉中王时投奔的汉军。纪信在死前仅是个“部曲长”，这个“部曲长”是个八品官，也就是现在的科级干部。如果纪信是在刘邦起义之初就跟着刘邦，不可能是这么小的官级。也有一种民间传说，纪信作战勇敢，

但是嘴不好，是碎嘴子，凡事喜欢带着怨气地嘚吧嘚，民谚俗语有一句“嘛嘴骡子卖个驴价钱”，指的就是常常嘚吧嘚的人。因为刘邦不喜欢嘚吧嘚的人，所以就一直不重用纪信。我认为这是民间口头文学，纪信若是常常带着怨气地嘚吧嘚，早就被刘邦杀了，八品官也混不到。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过两次纪信，一次是《鸿门宴》，纪信仅是个随从侍卫，另一次就是我要说的“诳楚存汉”。

刘邦被项羽的部队围在荥阳，外无救兵，内无粮草，危在累卵。项羽喊话刘邦：“再不投降，即刻攻城，城破之时就是你刘邦丧命之日。为了不残害百姓，你赶紧投降！”刘邦听了项羽的喊话，真的是接近了绝望，此时纪信来到刘邦面前献上一计，说：“大王啊，咱俩长得很像，我代替你去投降项羽，你化妆成百姓逃离。”刘邦说：“你这是送死啊！”纪信说：“我死了，就是死个军士；你是汉王，你死了，汉军怎么办？这些跟着你东拼西杀的弟兄们怎么办？”估计此时刘邦已经泪湿胸襟了。于是喊来陈平，给项羽写降书，约定第二天晚上掌灯时分，出东门投降。

许多史料都认可，纪信长得像刘邦（但纪信并不是刘邦故意养的替身）。而纪信在最关键的时刻，使用了与刘邦长相相似的特点，要求替刘邦出城投降，或者去送死。影视剧演员经常有替身，那个替身是为了赚钱，许多政要、财阀也有替身，那是让替身替自己死。纪信替刘邦赴死，是主动的，不是上面说的几种替身的情况。能够解释纪信替身行为的只有“忠义”二字。那时刘邦还不是皇帝，而且能不能当上皇帝，刘邦自己心里都没谱，众人也不看好刘邦会当上皇帝，没人敢押宝在刘邦身上，纪信替身刘邦时，刘邦能不能活下来都是未知数，而纪信用自己的命去抵押，不是押宝刘邦能当上皇帝，押的是作为人的基本素养“忠义”。忠，是忠于带头人，忠于这支队伍或忠于这个集体；义，是对带头人的厚义，对这个集体的情义；义是置己身生命于度外的勇气，是生如沧海死如虹的英雄气。

纪信被项羽烧死了，刘邦随着百姓逃跑了，这才有了楚汉之间的继续争斗，最后才有了四百年的汉朝。

刘邦当皇帝后，没忘了纪信，封纪信为“安汉公”，并以纪信的家乡紫岩乡为中心，重新划了一个县，叫“安汉县”。“安汉县”历经几个朝代的不断划分，现在紫岩乡属于西充县。于是，西充县是纪信的故乡，西充县在做城镇文化建设时，建造了“忠义广场”。

忠义，本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脊梁，失去了忠义，这个民族将是一盘乱沙子。可是现在，忠义这个词被挂在嘴上者众，真去践行者少。但愿纪信及“忠义广场”能对修补民族脊梁起到一定的作用。

征稿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是中国侨联主管主办的唯一一本人文性、文史性、知识性综合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诚恳向各界作者约稿，欢迎惠赐展示海内外侨界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企业家、艺术家等各行各业名人的风采，归侨、华侨华人在祖国与侨居国所做的贡献，和他们在当地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各方面的现状和走向，精彩的中国故事，以及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海内与海外》主要栏目有：封面人物、本刊特稿、中国故事、特别报道、热点人物、侨界之光、侨乡揽胜、唐人街、名人访谈、大家风范、名人轶事、神州风物、人在海外、域外见闻、史海钩沉、心灵呼唤、中国在线、文化视野……

本刊声明：

1.投稿稿件自发出之日（以电子邮件发送日为准）起，三月内未收到采用通知，可转投其他媒体。2.投稿者有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等侵犯他人知识产权行为，或稿件内容侵犯他人名誉权、隐私权、人格权的，由投稿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3.稿件发表后，即向作者寄出样刊和稿酬。4.凡在本刊发表的作品，本刊享有出版权与转载权。包括传统媒体、出版物、数字媒体、数字出版物、网络平台等。作者本人若要用于自媒体发布的，须在作品发表在本刊三个月后。如需转载、摘编本刊已发表的作品，均须同时获得本刊授权。5.投稿者的作品用于数字媒体、数字出版物、网络平台发表的，本刊支付的稿费已包含上述使用方式的稿费。6.凡向本刊投稿者，除附有书面特别声明外，均视为投稿者接受上述要约。

投稿方式：

电子投稿：hnyhw111@126.com。邮件主题栏标明稿件类别，字数一般不超过3000字，并请配发相关照片。

《海内与海外》杂志社编辑部

要出书　找阅客

出版咨询：18688311527（微信同号）

YUEKE 阅客®　阅客图书编辑出版中心
定制每一位作家的心血之作

为各级政府、企业、各大高校、作家、自由撰稿人提供地方史志、企业史、企业文化、企业案例集、学术著作、教材、课题成果、职称规划、文学作品、纪实作品、文集画册、民间故事等书籍的策划、撰写、编辑、设计、校对、印制、发行等一条龙出版服务。

阅客文化简介

广东阅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阅客文化”）是一家以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及教育类著作为主的专业图书出版公司。公司拥有着一支专业的有着丰富从业经历和策划经验的图书策划团队，不管是自费书还是合作书，公司均用最市场化的标准予以策划、包装，令其以最佳的形式得以呈现。

阅客文化秉承“书有道·阅无界”的出版理念，致力于成为一个文化理想的倡导者和行动者。以引领智慧阅读的旅程的产品态度，打造优质的、全媒体形式的文化产品，提供当下的、鲜活的、有价值的、有态度的以文学艺术、社科思想为主要方向的出版与阅读。并从事文化活动的策划组织、影视作品与文创产品的开发，是一个活跃而富有影响力的文化机构。

阅客图书产品展示

